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 2014 年度入库项目

张宪文 主编

日本侵华图志

第 19 卷

“慰安妇”与性暴行

苏智良 陈丽菲 编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 2014 年度入库项目

张宪文 主编

日本侵华图志

第 19 卷

“慰安妇”与性暴行

苏智良 陈丽菲 编著

K264
214/19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侵华图志. 19, “慰安妇”与性暴力 / 张宪文主编; 苏智良, 陈丽菲编著.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474-1474-3

I. ①日… II. ①张… ②苏… ③陈… III. ①日本—侵华—史料—图集②日本—侵华事件—性犯罪—史料—图集 IV. ①K265.60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39714号

日本侵华图志 张宪文 主编

第19卷 “慰安妇”与性暴力
苏智良 陈丽菲 编著

责任编辑 郭珊珊

装帧设计 王 钧

封底篆刻 管树强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规 格 210毫米×285毫米

17.25印张 546幅图 150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3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合作项目

山东画报出版社有限公司

《日本侵华图志》编纂、出版工作人员名单

编纂委员会

主 编

张宪文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荣誉资深教授

副主编

关 捷 大连民族学院教授
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沈 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研究馆员
井晓光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
马振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曹必宏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王希亮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赵继敏 伪满皇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员

执行副主编

曹大臣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姜良芹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王卫星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齐春风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
洪小夏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委 员

- | | | | |
|-----|-------------------|-----|------------------|
| 经盛鸿 |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 杨克林 | 香港新大陆出版社编审 |
| 郭铁椿 |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 吴先斌 | 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研究员 |
| 杨惠萍 | 大连大学教授 | 曹 艺 |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研究馆员 |
| 张 瑾 | 重庆大学教授 | 唐润明 | 重庆市档案局研究馆员 |
| 陈丽菲 |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 夏 蓓 | 南京市档案馆研究馆员 |
| 武 菁 | 安徽大学教授 | 戚厚杰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高晓燕 |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严海建 |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
| 何天义 | 河北省社科院抗战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 关 伟 | 大连民族学院副教授 |
| 田苏苏 |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柳 宾 | 青岛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
| 邓 平 | 重庆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李 鑫 |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研究馆员 |
| 任银睦 | 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研究员 | 陆 军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齐红深 | 辽宁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研究员 | 潘 涛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审校委员会

主任委员

张宪文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荣誉资深教授

委 员

- | | | | |
|-----|------------------|-----|---------------------|
| 史全生 |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 李继锋 |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授 |
| 臧运祜 |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 曹大臣 |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
| 江 沛 |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 | 姜良芹 |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
| 廖大伟 |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 王卫星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 赵兴胜 |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 | 齐春风 |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 |
| 徐 畅 |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洪小夏 |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

各卷主要编著者、审校者名单

- 第1卷 《战争动员》 曹大臣 / 编著 洪小夏 / 审校
第2卷 《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1894—1905） 关 捷 关 伟 / 编著 史全生 / 审校
第3卷 《侵占台湾五十年》（1895—1945） 洪小夏 殷占堂 / 编著 傅光中 / 审校

- 第4卷 《侵占大连四十年》(1905—1945) 郭铁椿 关伟等/编著 王卫星/审校
- 第5卷 《山东问题与济南惨案》(1914—1929) 任银睦 柳宾等/编著 徐畅/审校
- 第6卷 《九一八事变与侵占东北》(1928—1932) 刘长江/编著 曹大臣/审校
- 第7卷 《建立伪满洲国与对东北的殖民统治》(1932—1945) 赵继敏/编著 曹大臣/审校
- 第8卷 《侵占华北地区》(1932—1945) 罗存康 曹艺 李鑫/编著 赵兴胜/审校
- 第9卷 《侵占华东地区》(1932—1945) 王卫星/编著 赵兴胜/审校
- 第10卷 《侵占华中地区》(1938—1945) 马振犊 陆军 潘涛/编著 李继锋/审校
- 第11卷 《侵占华南地区》(1938—1945) 马振犊等/编著 李继锋/审校
- 第12卷 《上海租界、香港的占领与统治》(1941—1945) 杨克林/编著 廖大伟/审校
- 第13卷 《情报与间谍活动》 马振犊 戚厚杰等/编著 张宪文/审校
- 第14卷 《无差别轰炸》 张瑾 唐润明 邓平/编著 臧运祜/审校
- 第15卷 《化学战与细菌战》 高晓燕 王希亮/编著 徐畅/审校
- 第16卷 《南京大屠杀》 曹必宏等/编著 李继锋/审校
- 第17卷 《“三光作战”与“无人区”》 田苏苏/编著 江沛/审校
- 第18卷 《毁坏城镇》 夏蓓/编著 齐春风/审校
- 第19卷 《“慰安妇”与性暴行》 苏智良 陈丽菲/编著 王卫星/审校
- 第20卷 《虐杀战俘与奴役劳工》 何天义等/编著 江沛/审校
- 第21卷 《经济侵略与资源掠夺》 齐春风 严海建/编著 史全生/审校
- 第22卷 《文化侵略与奴化教育》 齐红深/编著 郭铁椿/审校
- 第23卷 《扶植伪政权》 经盛鸿等/编著 臧运祜/审校
- 第24卷 《生态破坏与社会控制》 武菁/编著 廖大伟/审校
- 第25卷 《投降与受审》 姜良芹/编著 臧运祜/审校

部分图片提供者

殷占堂 杨克林 吴先斌 杨莲福 姜良芹 邱明轩 刘启安 李晓方 张蓉 刘新勇

项目策划 殷占堂 尹奎友 傅光中

项目统筹 傅光中 赵祥斌

设计统筹 王芳

编印统筹 李新宇 许诺

印务专员 甄西苏 刘奎山

发行统筹 王莹伟 祝东江

营销专员 张桐欣

编 务 郑丽慧 桑葆琳 李忠秋

方言 付坤 莫超

于东 张广成

总序

张宪文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两千多年友好往来的历史。其间，无论是日本遣唐使来华，或者是中国鉴真和尚等东渡日本，两国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都十分密切，对两国的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1868年，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这一重大政治变革，这在日本历史上是最重要的转折点，它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走向大发展的道路。由此，日本从幕府制封建王朝迈向天皇制君主立宪的现代国家。

可是，日本是一个岛国，四面临海，领土狭小，资源贫乏。日本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其前首相山县有朋等人，于19世纪90年代提出了一系列向外扩张的“侵略有理”的理论，抛出所谓“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政治主张，将周边各国视为其利益所在，必须加以控制。以此理论为指导，日本逐步形成了其吞并朝鲜、侵占满蒙、独霸中国，进而将侵略势力扩展至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大陆政策。1928年，由田中义一首相主导召开的东方会议，标志着日本的大陆政策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与此同时，日本在国内也形成了以军部为代表的军事政治体制，组成了包括陆军省、海军省、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以及后来的关东军司令部、支那派遣军司令部等军事机构在内的强大军事政治集团，并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日本的政局。自19世纪后期开始，日本军事力量迅速向朝鲜、中国展开侵略行动。

日本不仅在中国土地上挑起了瓜分中国的日俄战争，参与了由西方国家发动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而且独自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即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从1931年至1945年的第二次中日战争。

甲午战争，日本摧毁了清王朝新兴的海军力量，给中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由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历时14年的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更加深重的灾难。日本以战争手段，侵占了中国自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到华南的大片国土，毁坏了中国许多大中城市，破坏了大面积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从东北到中原内地，大量的矿产资源和工农业产品被日本掠夺，占为己有。战争破坏了中国人民的生存条件，导致大批民众流离失所，被迫走上逃亡之路，形成了非正常的人口流动。许

多沿海工厂企业和大中专院校，被迫迁往内地，在艰苦的条件下维持着基本的生产和教学研究工作的。而在中国沦陷区，日本占领者则以种种手段加强压迫和控制，致使中国广大民众生活在苦难之中。

日本在以军事行动占领中国的同时，对中国人民采取了更加残酷的手段。譬如，在各地制造了大量的屠杀惨案和“万人坑”。它推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实施化学战和细菌战，虐杀战俘和强掳劳工，在中国各地实施无差别的狂轰滥炸。尤其残忍的是，日军在南京制造了屠杀 30 万和平居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的人间悲剧。上述惨案或行为，均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国际公约和人类基本道义原则。

日本的大规模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受到严重挫折。但是，在民族危机和国家危亡面前，中国人民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各民族、各政党、各阶级，团结一致，浴血奋战，英勇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终于在 1945 年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战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均严格依照国际法规，坚持维护人类的基本道义原则，在大量事实基础上，对日本战犯的侵略罪行，作出了公正合理的判决。

可是，战争已经结束 70 年，日本在美国政府的长期包庇、纵容下，不仅战争罪行未得到彻底清算，而且拒绝承担侵略战争的责任，甚至美化其战争罪行，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强征“慰安妇”，坚持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由于历史问题的争论不断升级，加之钓鱼岛领土问题的矛盾日益突出，导致中日关系不断恶化。众多的日本民众在右翼势力的欺骗和蒙蔽下，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认识模糊、是非不清，甚至存在严重的误解。因此，历史学者有责任向广大人民包括日本民众揭示历史真相，帮助他们认清历史事实，辨明是非，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维护并加强中日友好。

以图像展现和解说历史，是历史研究最为有效的方法。图像的直观性，能使人们对历史产生最直接、最深刻的认识与理解，因而当今中外历史学者都开始重视图像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山东画报出版社和有关学者采集并掌握了日本侵华历史图片约 25000 幅。这些十分珍贵的原始图片，来自日本、美国、中国大陆和中国港台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博机构，以及中外私人收藏。我们按照“重要性、稀缺性、高清晰”的原则，强调图片的来源出处和准确解读，努力向读者或研究者提供可靠而且有价值的图片史料。为此，我们按照日本侵华历史的时间顺序和相关专题，整理编辑为《日本侵华图志》共计 25 卷。

可以说，这套 25 卷本《日本侵华图志》的内容，客观、全面、直接地揭示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尤其是日本自 1894 年挑起中日甲午战争到 1945 年战败投降为止的侵华历史及其在中国实施的各种暴行。它们是日本侵华历史的铁证。有了上述大量第一手的真实的历史图像“立此存照”，日本右翼势力任何否认侵华历史和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所犯罪行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参加这套大型图志编著工作的，有南京、上海、北京、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

济南、青岛、石家庄、合肥、重庆、香港等地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史志研究机构、历史档案馆、抗战纪念馆、博物院以及其他学术文化机构的专家学者，他们对历史学、中日关系、抗日战争史，有深入的专业研究和学术造诣。本书编委会对他们为书稿编纂工作付出的巨大艰辛，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谢意。

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尤其是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和山东出版集团的领导，十分关心、支持本《图志》的编辑出版。在此，我谨代表《图志》编委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山东画报出版社承担了本图志的全部编辑、出版工作，有关社领导、编辑和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为此付出了十分艰苦的劳动。编委会向出版社有关人员表示诚挚的谢意！

2014年12月16日

凡 例

《日本侵华图志》是一项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多卷本图书出版工程。全书共 25 卷，每卷平均约 8 万字、1000 幅图，共计约 200 万字、25000 幅图。该项目已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并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2014 年度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为了充分体现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在编纂过程中，各卷遵循了如下体例及规范。

一、关于书名。本书总名为《日本侵华图志》，按照时间顺序和不同专题分为 25 卷，每卷 1 册，各卷序号列入卷名，如《日本侵华图志（1）·战争动员》《日本侵华图志（2）·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1894—1905）》《日本侵华图志（16）·南京大屠杀》等。

二、各卷内容构成。本书各卷由以下内容构成：总序、凡例、目录、综述、正文、大事记、主要参考文献、索引、后记。

三、正文层次结构。多数分卷正文分为两个层次，少数分卷分为三个层次；与之相适应，正文设置两级或三级标题。每级标题以序号加题名的形式呈现：一级标题形式为“第一章 XXXXXX”“第二章 XXXXXX”，二级标题形式为“一、XXXXXX”“二、XXXXXX”，三级标题形式为“（一）XXXXXX”“（二）XXXXXX”。一二两级标题进目录，三级标题不进目录。章题下有 1000 字左右的概述，节题下有 200 字左右的简述，每幅图片附带包括图片出处在内的 100 字左右的图片说明文字。因特殊情况，有的分卷如《情报与间谍活动》《“慰安妇”与性暴行》等，编纂体例有所不同。

四、图片辑录原则。作为图志，本书各卷图片资料的辑录，遵循“重要性、稀缺性和高清晰”三原则，力争以清晰的画质呈现历史现场和事实真相。

五、图片编排顺序。本书按不同专题分卷编纂，所选图片资料，一般以历史事件为线索进行串联，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和事件的内在联系排列组合。每页图片及其文字说明均重新编码。

六、语言文字规范。书中语言文字表述，坚持事实第一、理性至上之原则，淡化主观感情色彩，尽量使用中性词汇，不用蔑称或溢美之词。如涉及侵华日军，一般不用“日本鬼子”“日寇”“强盗”“恶魔”等字眼。日文史料中日方对其侵华行为的自我标榜和溢美之词，以及对中方的污蔑不敬文字，引用时加注说明或用引号处理。历史地名一般使用当时称谓，其后加括号注明现在名称，如“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涉及台港澳、西藏、新疆、蒙古的用语，以及伪政权的国号、年号、官职等称谓，一律遵从我国的有关规定。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称谓，一律使用全称，比如“朝鲜族”“蒙古族”，不能简称为“鲜族”“蒙族”等。涉及少数民族政权的用语，避免出现“满清”“蒙元”等称呼，而应直接表述为“清朝”“元朝”。1949年以后的台湾历史，不能用“中华民国”纪年。

七、引文注释规则。行文中的引文需要注释的，一律采用页下注，注释序号用六角括号加阿拉伯数字的形式（如〔1〕〔2〕〔3〕），每页重新编码。引文注释规则与本“凡例”第十条“主要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相同，其中为出版物的，要在末尾加注引文所在页码。

八、图片说明及出处著录规则。图片说明文字，以交代图片包含的历史信息为主，主要说明五个“W”：What（何事），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地），Why（何故）。说明文字之后，在六角括号“〔〕”之内，注明图片来源或出处。凡是作者具名的照片、绘画或图表，一律载明作者姓名；无法查明作者姓名的，视情况注明提供者或收藏者。未刊档案，注明馆藏地及案宗号；已刊登或出版的，注明著作权人和书刊名称、出版年月、页码。为尊重历史、保存原貌，所选图片资料中人名、地名的错字、别字以及不规范用词，均按原样直录，然后加括号注明正字。出处采用外文（主要是日文）的，按原外文书刊著录完整规范的外文，著作权人前不加国别，如“〔《一億人の昭和史・日本の戦史（3）・日中戦争（1）》，毎日新聞社昭和五十四年（1979）六月二十五日版，第16頁〕”“〔千葉光則：《秘蔵写真で知る近代日本の戦歴（3）・満州事変》，フットワーク出版株式会社1991年12月6日版，第78頁〕”；外文中文译本著作，以现代汉语著录，原著作权人前加小括号“（）”注明国别，如“〔（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本书翻译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190頁〕”。图片出处文字句末不带句号。

九、“大事记”格式。以时系事，或一日一事，或一日几事，每事一条，每条一记。年份单独占一行，日期及事件另起行。日期后空一字格。行文追求要言不烦、言简意赅。

十、主要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各卷参考使用的历史文献或其他图文资料，均在书后以“主要参考文献”的形式列出重要的相关信息。参考文献分类编纂，各类中又按时间先后排序。著录规则主要有：

著作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文献题名 / 版别。责任方式为著时，“著”字可省略，其他责任方式保留。引用翻译著作时，原责任者前以六角括号“〔〕”加注国别，将译者作为第二责任者置于文献题名之后。出版者名称容易造成混淆或

产生歧义以及有必要的，出版者名称前加小括号“（）”标注地名。如：“高添强等编著：《香港日占时期》，（香港）三联书店1995年7月版。”“〔日〕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宿久高等译，孙连璧校，（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版。”

著作析出文献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析出文献题名 / 文集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文集题名 / 版别。如：“王卫星编：《日军官兵日记》，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8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

期刊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文献题名 / 期刊名及年期（或卷期，出版年月）。如：“张济顺：《沦陷时期上海的保甲制度》，《历史研究》1960年第10期。”

报纸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篇名 / 报纸名称与出版年月日 / 版次。如“万居：《日本国民的厌战情绪》，《申报》1938年12月15日，第4版。”早期中文报纸无版次的，可标志卷册、时间或栏目及页码。

手稿、档案文献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文献标题 / 文献形成时间 / 藏所 / 卷宗号或其他编号。如：“支那研究会編：《山東の富源：附・膠州湾の価値》，（東京）活人社大正三年（1914）版，青島市档案馆藏，A10180。”

电子文献标注顺序：责任者 / 电子文献题名 / 获取和访问路径 / 引用日期。如：“Robin Waldman. AGAS.8. <http://blogs.archives.gov/TextMessage/2012/05/21/Identification-in-world-war-ii-china-friend-or-foe/agas-8/>, 2014年12月22日。”“韩练成捐赠：侵华日军海南警备府长官、海军中将佐贺启次郎投降时交出的海军军刀，http://www.jb.mil.cn/cp/wjws/yjww/201007/t20100709_13917_17.html, 2014年12月22日。”

本书各卷所引日文文献较多，所引文献没有中文译本的，原则上按原文献用日文进行完整规范的著录；为便于阅读和查找，也可以用现代汉语进行翻译著录，但不得混用中日两种文字著录同一文献。

十一、数字用法。本书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GB/T 15835—2011）之规定。特别注意事项如下：

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且又很得体的地方，特别是当所表示的数目比较准确时，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在进行时间记数时，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分，使用阿拉伯数字，如“20世纪30年代”“1937年12月13日”“15时40分（下午3时40分）”；中国干支纪年和夏历月日、1949年以前的历史纪年、日本的非公历纪年，使用汉字数字，并采用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历，如“丙寅年十月十五日”“八月十五中秋节”“民国二十六年（1937）”“昭和十三年（1938）”。

军队序列、部队番号，按照中日历史文献的习惯用法，一律采用汉字数字：一位数的用一个汉字，如“第六师团”；两位数的带“十”字，如“第二十四军”；三位数（含三位数）以上的，用汉字数字排列表示，如“第八八九团”“第一一六连”。

目 录

综 述	1
第一章 “慰安妇”制度的发端	17
一、近代日本社会的“性”	19
二、首个日军慰安所——大一沙龙	21
第二章 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实施	33
一、华东地区的日军慰安所	37
二、华中地区的日军慰安所	79
三、华南地区的日军慰安所	87
四、华北地区的日军慰安所	99
五、东北地区的日军慰安所	109
六、西南地区的日军慰安所	117
七、香港、台湾的日军慰安所	127
第三章 “慰安妇”制度的中国受害者	135
一、中国受害者的身份与年龄	139
二、日军强征中国性奴隶的途径	150
三、幸存者的控诉	155
第四章 日军对中国女性的强奸暴行	189
一、日军在占领地的强奸暴行	193
二、妇女受害的个案	201

第五章 战后日本对“慰安妇”制度的掩盖与否认	209
一、日本政界否认“慰安妇”制度罪行的言论	213
二、日本司法界否认“慰安妇”制度的罪行	216
三、国际社会谴责日本的“慰安妇”制度	225
大事记	238
主要参考文献	247
索引	251
后记	258

综 述

本卷所叙述的，是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实施的性奴隶制度——“慰安妇”制度，以及对中国妇女的一般性暴行。

“慰安妇”，在目前的研究语境中特指 20 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因日本政府或军队之命令，被强迫为日本军队充当性奴隶的受害妇女群体。“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时期日本政府强迫受害国妇女充当日军士兵的性奴隶，并有计划地为日军配备性奴隶的制度，是日本法西斯违反人道主义、两性伦理、战争常规的制度化、无可辩驳的国家战争犯罪行为。“慰安妇”的历史也是世界妇女史上空前的、最为惨痛的女性集体被奴役、被残害的记录。现在，在欧美语境中，英文 Comfort Women（慰安妇）这一缘起于日本原有单词的“委婉”表述，日益为直指其罪恶本质的 Sex Slaves（性奴隶）所替代。

一、关于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的历史

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的第一阶段为 1932 年 1 月到 1937 年 7 月，日军慰安所在上海、东北等地相继出现。

1868 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国力大增，逐渐走上军国主义的扩张道路。1918 年 3 月，为阻止苏俄军队的东进，英、法军队在摩尔曼斯克登陆，对苏俄实行武装干涉，日本也乘机出兵，入侵中国的北满及与之毗邻的西伯利亚。三年间，先后共有 11 个师团的日军进入中国东北和苏俄远东地区^{〔1〕}。在侵略苏俄的过程中，日本的娼业主得到军方的特许，带领妓女随军行动，为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尽管如此，仍发生了大量日军强奸事件，导致军队中性病流行。据日军估计，

〔1〕（日）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第 2 册），尚永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230 页。

有10%—20%的日军官兵患有性病，总数达1.2万人，因性病减员的人数远多于战斗伤亡人数^[1]。这次性病大流行极大地震动了野心勃勃、正在走向战争之路的日本军方。此后，日军高层便殚精竭虑地思考，在未来战争中如何防止因性病而削弱部队战斗力的对策问题。日本海军的《海军军医会杂志》、陆军的《军医团杂志》等刊物频频发表专业文章，开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最后取得了一致的结论，即应尝试建立一种由军队控制的有卫生保障的性服务制度，以解决日益庞大且海外派遣增多的士兵性欲问题^[2]。

自清末以后，上海便成了日本海军在海外的最大基地，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就设在上海东北角的虹口地区。为了满足士兵的性饥渴，给士兵提供安全的性服务，最迟在1932年1月，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已经在虹口选择了“大一沙龙”等四家日本人开设的风俗店，作为海军的指定慰安所。二十年来，中国学者对“大一沙龙”慰安所进行了长期的调查，查找到了大量人证物证。经过学者的努力，该慰安所旧址——上海东宝兴路125弄，已经由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实施保护。“大一沙龙”是目前相关资料中记录时间最早的日军“慰安所”。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日军“慰安妇”制度开始向强征非日本女性，即强迫亚洲各国女性充当日军性奴隶的方向发展。

1932年1月28日，日本向上海发动进攻，并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为此，日本组成上海派遣军实施增援。至3月，在沪日军已达3万余人。为防止因大规模强奸事件导致的性病泛滥和军纪败坏，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决定仿效在日本海军的做法，从日本关西地区招募一个陆军“慰安妇”团，并在吴淞、宝山、庙行和真如等战斗前线，建起为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该“慰安妇”团，是日本陆军第一次有组织地发起并参与“慰安妇”制度建立的行动，且成为日本战时“慰安妇”制度的重要尝试与日后的样板。

此后，在上海的日本人和朝鲜人一直经营着慰安所。日军占领中国东北以后，也在东北各地设立了面向关东军的慰安所。

第二阶段为1937年7月—1941年12月，日军慰安所在中国占领地得以全面推广。

日军全面推行“慰安妇”制度的根本动力是侵略战争的全面展开，南京大屠杀是其全面实施这一制度的转折点。1937年，日本先后制造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屠杀暴行，大量无辜妇女遭遇奸杀。在国际舆论的谴责和日益严重的性病面前，日军高层开始加紧实施“慰安妇”制度，于是，在上海、南京等地建立慰安所的计划被迅速提上日程。

上海杨家宅慰安所是日军上海派遣军直接设立的大型慰安所，其“慰安妇”多达百余人。经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长达二十年的研究与实地调查确认，设在上海的各种慰安所至少有160个。南京也是日军设立慰安所较多的城市。2003年，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邀请来自朝鲜平壤的受害者朴永心来南京，

[1] (日)矢野玲子：《慰安妇问题研究》，大海译，（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32页。

[2] 《军医团杂志》，第190号、第288号；《海军军医会会报》，第30号等。

确认了她当年的受害地——利济巷慰安所。目前各方的研究证实，日军在南京的慰安所至少有 50 个。此外，杭州、武汉、广州等地也是日军慰安所设立较多的城市。

第三阶段为 1941 年 12 月—1945 年 8 月，在中国占领地推广慰安所的同时，日军还在东南亚各地设立慰安所，以及日军慰安所的覆灭。

随着战争的延续，慰安所在中国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西、河北、河南、天津、北京、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贵州、云南等省市广泛设立。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军占领区域扩大，慰安所的设置范围也从中国大陆扩大到了香港、台湾、新加坡、缅甸、印度尼西亚群岛、菲律宾、马来亚、越南、东印度群岛、太平洋东部诸岛、日本本土等地。

这一时期的日军“慰安妇”，除了从中国、朝鲜、日本强征来的性奴隶外，还包括东南亚各地的妇女，甚至在东南亚的西方妇女、在中国东北的苏联妇女也难逃厄运。

在台湾，慰安所的设置北以艋舺、西门町、北投为主要集中区，南则多在台南新町。当时，台南的小梅园慰安所，是日军神风特攻队出发前必去寻欢的场所，嘉义朴子东亚楼也是日军指定的慰安所。1944 年太平洋战事吃紧后，台湾各地都设有日军特攻队，慰安所也大量增加。从文献资料来看，日军在台招募“慰安妇”主要通过捐客等方式，以“担任护士”和“从事食堂工作”等名义诱骗或迫使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据台湾学者初步估计，台湾“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至少有 2000 名^[1]。

二、日军慰安所的类型

就其所属关系、性质和经营方式而言，日军慰安所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军队直接设立的固定慰安所（也称之为“军慰安所”），如 1938 年初在上海设立的杨家宅慰安所，就是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设立的。汉口日租界的滨江大道旁建有海军直属的慰安所，广州、济南、南宁、桂林等地都有日军直营的慰安所。日军在北起黑龙江的中苏边境，南至海南岛的天涯海角，东起辽宁，西至云南中缅边境的广袤的中国占领地设立了数以千计的直营慰安所。从现有资料看，军队自行设立的慰安所是最普遍的形式之一，其主管者可以是方面军、师团、旅团、联队、大队，甚至是警备队或小队。当军队转移时，他们通常会强制“慰安妇”们一同行动。

第二种是日本侨民开设的慰安所。这种由日本侨民在军方命令或支持下开设的“军督民办”慰安所，数量非常多。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一些妓院主便带领妓女来到中国东北，在关东军营舍周围设立大量供军官使用的“料亭”和供士兵使用的“游廓”，其驻地旁边形成了“花柳街”。随着战争的扩大，这种“花柳街”推

[1] 台北市妇女救援基金会：《沉默的伤痕——日军慰安妇历史影像书》，（台北）商周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 页。

广到中国和亚洲各地，遍布大城市和偏僻乡村。这些慰安所老板往往通过贿赂军官而获得开设慰安所的特权，以牟取暴利。而军方也由于在战争中无法兼顾所有战地慰安所的建立，加之有掩盖军方直接建立慰安系统的必要，故积极倡导日侨来经营慰安所，如上海江湾的一些慰安所，武汉东山里、积庆里的12家慰安所及斗级营的20家慰安所，南京的华月楼慰安所、汤山高台坡慰安所，以及海南各地的慰安所等，这些都是日本人经营的。被称为上海日本海军最大的慰安所“海乃家”，便是由日本东部海军特别陆战队与日侨坂下熊藏在1939年签约，由海军提供房屋、开办费以及所需物资而设立的，并明确慰安所的所有权归日本海军，坂下只有经营权^[1]。

第三种是由日军指定使用的民间妓院形态的慰安所。这类慰安所多是汉奸、朝奸受日军指令在中国各地建立的。其个别慰安所除日军外，一般日本人也可以利用，如上海的“大一沙龙”，即使在战争时期也对日侨开放，北平宣武门内六部口的人民俱乐部、南京傅厚岗和铁管巷的慰安所、芜湖凤宜楼慰安所等也是如此^[2]。

第四种是日军或民间经营的流动式慰安所，其中有设在火车、卡车和轮船上等多种。1938年春，日军第十一兵站司令部遣送一批“慰安妇”从上海乘火车前往杭州，这列火车便成了沿途日军部队官兵的流动慰安所。慰安所的管理者通常用卡车将“慰安妇”运至部队驻扎地，然后用木桩和毛毯围起来，或用木板搭成棚子，作为临时慰安所。有的日军慰安所兼有固定与流动两种形式，如三亚市、海口市的日军慰安所，除了接待当地日军官兵外，还要每月分批到偏僻的兵营、据点巡回“慰安”。按照日军命令，海南那大市慰安所将“慰安妇”组成几个分队，随时前往周围的日军据点^[3]。甚至还有将一镇强行指定的女性分成一“慰安组”，平时住家，每周轮流去炮楼中的固定地点完成“慰安”任务^[4]。

三、关于中国“慰安妇”的人数研究

尽管日本政府和军部为其军队有计划甚至按比例地配备了“慰安妇”，但前线的日军部队在缺少“慰安妇”的情况下仍迫不及待地就地掳掠、强征当地妇女，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且被掳妇女数量非常多。由于战败时日本政府及日军大量销毁有关“慰安妇”的档案，也由于日本政府至今未公开“慰安妇”的全部历史文件，要准确掌握日军与“慰安妇”的比例和数量是较为困难的。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通过对各种资料数据的分析作还原历史真实的努力。例如，根据作战计划，1941年，

[1] 华公平（坂下熊藏之子坂下元司的化名）：《従軍慰安所「海乃家」の伝言》，日本機関紙出版センター1992年8月版。

[2] 汪业亚：《凤宜楼“慰安所”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芜湖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芜湖文史资料》1998年第三辑；朱未央：《铁蹄下故都妇女的哀啼》，《日寇燃犀录》，（重庆）独立出版社1938年版。

[3] 吴连生口述，林良材等整理：《楚馆悲歌，红颜血泪——那大市侵琼日军慰安所亲睹记》，转引自符和积主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海口）海南出版社1995年5月版。

[4] 如上海崇明岛上庙镇被害女性“七个姐慰安组”口述调查，见第151页。

关东军准备动员 70 多万人的军队和 2 万人的“慰安妇”，其比例为 37.5:1。但是，这个比例并没有得到日军认同。目前日本学者普遍认同当时日军中流行的“29:1”之说，也就是军队认为三十七八名士兵配给一名“慰安妇”距离实际情况较远。根据人体生理特性，一名“慰安妇”大约应对 29 个军人，才能大致使日军官兵得到性满足而不致引起内部混乱。据 29:1 的比例，日本学者再加上“慰安妇”因逃亡或死亡而需补充的更替率（他们认为更替率大约在 1:1.5 或 1:2.0 之间），算出的“慰安妇”总人数大约为：

$$300 \text{ 万（日军）} \div 29 \times 2 \approx 20.6897 \text{ 万人}$$

即第二次大战期间的“慰安妇”人数为 20 万左右。这一研究结果是 1992 年前后由日本学者研究得出的^[1]。

但在那时，中国大陆的日军“慰安妇”问题还未引起国际学界的充分重视，中国几乎还没有展开正式的、有规模的调查。因此，这一数字，是日本学者主要根据日本国内、韩国的研究以及对东南亚地区的部分调查得出的。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开展“慰安妇”调查和研究之后，发现了以前未被注意的以下问题。

第一，日军部队实施“慰安妇”制度的严密性和配备“慰安妇”的完备性，远远超出此前研究者的预计。不但日军主力部队被规定配备慰安所，而且即使在警备队、小分队以及前线的碉堡、据点也普遍设有此类设施，或虽未专门设立慰安所的建筑，却强征强抢良家女子为“慰安妇”。这表明，受日军“慰安妇”制度侵害的妇女远比此前研究的范围广大。

第二，此前得出的“慰安妇”20 万人数量的估计，是以日本、东南亚，特别是以朝鲜女子的调查为主体的，中国妇女的人数在其中只是象征性的，而二十年来中国大陆调查到的慰安所遗址、历史目击证人及“慰安妇”制度幸存者证言中，均证实有大量慰安所强拉当地女子的事实，其中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由于中国大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主战场，因此，在未将中国受害妇女计算在内的前提下，上述 20 万的人数显然是偏少与失真的。

第三，关于更替率。从二十年来受害者的证言和各地的地方志资料中可知，在战争中，特别是战争的中期和后期，日军对中国军民，尤其是平民的杀戮是变本加厉的。《安庆文史资料》中有一个案例：1938 年 6 月，日军在安徽桐城抓捕大量当地女子设立慰安所，结果这些女子均被日军官兵“褻侮、奸淫、杀害”。1938 年出版的《敌寇暴行录》，记录了一位中国牧师陆某误入设在上海虹口的日军“行乐所”，救出了他的邻居——一位新婚女子，据这位女子所言，“行乐所”大楼有 3 层，里面全部是中国女性。慰安所按年龄分别关押中国女性，令其不得穿衣服。她们日夜遭受日军蹂躏，每天都有人死去，而每天又有新人补充进来。该慰安所关押中国女性有数百人之众。而这些女性，最后均下落不明。据《侵华日军暴行总录》一书记载，

[1] 吉見義明：《從軍慰安婦》，（東京）岩波書店 1995 年 4 月版。

1941年夏，海南博鳌市慰安所的50多名中国妇女被日军全部杀害于塔洋桥边，其原因是，她们“不肯好好接待日军”。1944年5月，在湖南株洲日军设立的一家慰安所中，10名中国“慰安妇”中有8人丧生^[1]。这些零碎的记载，只是沧海之一粟。由于中日是交战国，中国“慰安妇”比日本、东南亚、朝鲜受害者的死亡率要高，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在这样高的死亡率下，根据相关资料和“慰安妇”受害者的证言，直到1945年，日军仍然有增无减地开设军队慰安所。因此，将更替率定为1:1.5和1:2.0之间可能偏低。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提出，更替率应在1:3.5到1:4.0之间，其计算得出的结果是：

$$300 \text{ 万 (日军)} \div 29 \times 3.5 \approx 36 \text{ 万人}$$

$$300 \text{ 万 (日军)} \div 29 \times 4.0 \approx 41 \text{ 万人}$$

也就是说，在二战期间，被日军强迫为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人数应在36万至41万之间，除去此前日、韩学界研究方调查提出的20万韩、日受害女性，则中国女性受害者约为20万左右。尽管这个数字是在二十年来研究和实地调查结果基础上的一种推论，但其可以大致反映出中国妇女在二战期间受日军荼毒之深重的基本概况。

四、关于日军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性奴隶的途径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日军高层便号召部队“抢粮于敌”，在这一口号下，日军所需的各种物资大多抢自中国战场，其中当然也包括性奴隶——“慰安妇”。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升级、侵华日军人数的日益增加，日军更加残暴地掳掠中国女子充当“慰安妇”。在中国占领地和前线，日军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

第一，使用暴力掳掠当地妇女。日军在战场或占领的城乡，公开掳掠中国妇女，这种做法对于日军来说是最为便利的，其既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也省去了许多繁琐的手续，所以这种对中国妇女的掳掠遍及中国各地。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便在城乡各处掳掠中国年轻妇女，将她们“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一面让我们的女同胞羞耻，不能逃跑，一面又让充当他们兽欲的工具”^[2]。日军占领芜湖后，首先就是掳掠妇女，甚至派士兵到尼姑庵中掳掠年轻貌美的尼姑充当“慰安妇”，此后又在周边地区扫荡时掳掠了许多民女投入慰安所。在云南的腾冲、芒市、龙陵等地，几乎所有被查证的受害幸存者，均是被日军在光天化日之下掳掠去的。日军占领海南岛后，即派部队到村寨去强掳少女，供其开设慰安所，或者在强征的劳工中，挑选美貌的汉族、黎族女子投入“快乐房”慰安所。1940年，日军一部侵入山西的

[1] 李秉新等编：《侵华日军暴行总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0页。

[2] 宋美龄：《抗战建国与妇女问题》，（重庆）《中央日报》1939年1月15日。

[3] 李秉新等编：《侵华日军暴行总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41页。

方山县扫荡，在设立据点后，立即要求伪政权征召“花姑娘”，于是，伪政权强征妇女，建立了慰安所^[3]。

第二，设下各种圈套，引诱妇女坠入陷阱。日军常用的手法是，以招聘女招待、洗衣妇等名义诱骗妇女。1937年11月占领上海后，日军特务部门便在租界诓骗妇女，“他们放出野鸡汽车，候在娱乐场所前面，等顾客上车后，汽车飞也似的驰着，到了僻静地方，将男子抛下或干了，女客便从此无影无踪”^[1]。一时间，租界内失踪女子大增，妇女们人人自危。日军还在大街小巷张贴并在报刊上刊发招工启事，诱骗中国女子。19岁的中学毕业生阿珠，其父亲所在的工厂因战时倒闭，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她在报纸上看到了广告：“某公司为扩充业务起见，拟添聘女职员数位，凡年龄在16岁以上、25岁以下，略识文字者，均可应聘，尚能粗通国语或日语者更佳，月薪50元，有意者请至某处面洽。”征得父母同意后，阿珠前往应聘，主考者一见阿珠便表示满意，并当即签约。岂料这里是诱骗妇女为“慰安妇”的机关，从此，阿珠陷入魔窟而不知所终。日军占领桂林后，也以设立工厂为名募集女工，然后强迫她们充当军队性奴隶。日军占领广州、香港后，以招募赴海南的护士、医务人员为名，骗招300多名青年女子，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学生，年龄小的仅17岁，大的也才20岁。她们被押至海南昌石县的石禄慰安所，从此落入人间地狱。在海南岛，日军还经常组织“战地后勤服务队”，唆使汉奸张贴广告，鼓吹说“服务队”的任务是给日军官兵洗衣服、照顾伤员和打扫营房卫生，诱骗妇女参加，甚至还派人到上海、广州、香港等地招聘诱骗称：“海南岛开办大医院，招聘大批姑娘学习当护士和护理，薪水高，到那里去做工有吃有穿，还有大钱寄回家。”^[2]于是有不少受骗的女子前来应聘。这些人到海南后，均被押进慰安所，从此陷入暗无天日的人间魔窟。

第三，日军占领一地，形势稍稍稳定后，便指使汉奸组织出面，挑选妇女充当“慰安妇”。其中一种手法便是登记“良民证”，挨家挨户挑选年轻貌美的女子。南京陷落后，日军除了经常到国际安全区掳掠、强奸妇女外，还利用发放“良民证”之际，从中拉来数千名中国妇女。这些妇女没有一个人逃过被强奸或虐杀的厄运，其中一些人还被运往东北，充当关东军的性奴隶，从此无人知晓她们的生死。1939年，在日军的指使下，山西文水县的汉奸政权张贴布告，明令征召妇女，布告全文如下：

文水县公署训令，差字第一号令：南贤村长副，为训令事。查城内贺家巷妓院，原为维持全县良民而设，自成立以来，城乡善良之家，全体安全。惟查该院现有妓女，除有病者外，仅留四名，实不敷应付。顷奉皇军谕令，三日内务必增加人数。事非得已，兹规定除由城关选送外，凡三百户以上村庄，每村选送妓女一名，以年在二十岁左右，确无病症、颇有姿色者为标准，务于最短

[1] 《孤岛近讯》，《妇女生活》1938年第5卷第12期。

[2] 符和积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续），（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712页。

期内送县，以凭验收。所有待遇，每名每月由维持会供给白面五十斤，小米五升，煤油二斤，墨一百余斤，并一人一次给洋一元，此外游客赠予，均归妓女独享，并无限制，事关紧要。^{〔1〕}

布告中的“贺家巷妓院”是专为日军设立的慰安所，所以布告称“为维持全县良民而设”。由于受害妇女不堪日军凌辱折磨，或死或逃，仅剩4人，于是“皇军谕令”伪政权要求城镇、村庄选送“妓女”，实际就只能是选送良家女子，但日军还有条件：一是年龄20岁左右；二是“确无病症”，否则将会传染性病；三是要“颇有姿色者”。日军“谕令”伪政权征召女性，但一应支付，却由伪政权维持会供给，被征女性也并无来自军队的报酬，从所谓“游客赠予，均归妓女独享，并无限制”，完全可以看出日军铁蹄下受害民众的屈辱与无奈。

第四，将中国女俘虏强迫为性奴隶。在中国战场上，日军极少设立女战俘收容所，除部分女俘虏在审讯后即被杀害外，其余大部分被日军运到华北、华中等地及前线充当“慰安妇”，以防止其逃跑或与中国抗日部队取得联系。如中共领导的海南琼崖纵队第四支队的炊事员周某某，下乡筹粮被日军俘虏后，即被投入慰安所。这些女俘虏沦为“慰安妇”后，每天遭日军侮辱，生不如死，其中一些人千方百计寻机报仇。在慰安所，曾发生中国女战俘刺杀施暴的日军士兵或者割下其生殖器的事。因此，日军官兵对中国女战俘“慰安妇”较为警惕。这些女俘虏奄奄一息，已失去利用价值时，通常会成为日军新兵练习刺杀的活靶子。日军第十四师团士兵田口新吉回忆道：

日军在作战中，一抓到这些人（指八路军游击队女战士——译者注），立即送到后方的大队本部去。在大队本部里，如果她们受了伤，就由医务室先给她们治伤，如果没有受伤，则由担任情报工作的军官对她们进行审讯，这是通例。但是，这些中国女性就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虽然士兵们有时也偷偷传说：这些当官的家伙又干好事了，但谁也不会去追查这些中国女人的去向。

当时，日本军队中从来就没有建立过女俘虏收容所，那么这些女人被弄到哪里去了呢？我听到的一种说法是把她们弄去当“慰安妇”了。但是，那些有特务嫌疑的女人以及在八路军中受过教育的女兵，是不可能让她们进入一般的慰安所的。因为如果让她们进了慰安所，她们随时都会逃跑，二是她们可以与八路军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这是很危险的，因此，决不会把她们送到那种地方去。

那么，她们被送到哪里去了呢？都送到华北、华中一带最前线地区的两三个分遣队据点里去了。那都是些日本或朝鲜“慰安妇”无法到达的情况恶劣的地区。这些据点四周都建有围墙，盖有炮楼，每个炮楼由一个小队左右的士兵

〔1〕《文献》第5卷，1939年2月。

进行守备。那些俘虏来的妇女就是被送进这些据点里去的。^{〔1〕}

第五,征用妓女。在大城市,日军或汉奸政权往往强行征用现有的妓女来充实“慰安妇”队伍。在上海、南京、武汉、天津和广州等地,都有文献档案和口述调查证明,日军往往通过伪政权强征妓女从军上前线,或者指令妓院为军慰安所。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些被征用的妓女并非自愿,特别是被征用上前线的情况,自残、逃离者均有之,而存活下来的幸存者,在此后的人生中更是历经磨难,虽生犹死。

在被强迫为“慰安妇”的中国妇女中,有许多少数民族妇女,其中有来自台湾高山族、东北满族和朝鲜族、海南苗族和黎族、云南傣族、广西壮族等民族的妇女。朝鲜族聚集的吉林延边地区,是日军最早征用少数民族妇女的地区,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关东军便在东北地区强掠朝鲜族年轻女子充当性奴隶。

五、关于“慰安妇”受害者遭受的苦难

日军“慰安妇”的年龄大多为18—20岁。1943年1月和4月,日本陆军军医对江苏淮阴的12名“慰安妇”进行了体检,这些“慰安妇”只有日本名字,其中年龄最大的喜代子32岁,年龄最小的是19岁的君子、新子、百合子和荣子,这12名“慰安妇”的平均年龄为23岁^{〔2〕}。

许多朝鲜“慰安妇”幸存者证实,她们当初被强掳时年仅14—18岁。日军在占领中国时,还曾掳掠幼女或少女充当“慰安妇”,如海南的一些中国“慰安妇”只有十二三岁,在南京被掳掠的年龄最小的女孩只有9岁。在日军慰安妇中,也有五六十岁的年老者^{〔3〕}。

在一些慰安所内的中国“慰安妇”中,还出现了“姐妹慰安妇”“母女慰安妇”“姑嫂慰安妇”等现象,山西孟县的尹林香、尹玉林姊妹双双沦为日军的性奴隶;上海崇明的朱巧妹一家就有4名妇女被迫成为日军的性奴隶。

关于“慰安妇”每天被迫“慰安”受摧残的程度,因各地各慰安所的不同和时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一般每名“慰安妇”每天接待日军十多人,每天接待30—50人的记录也不在少数。朝鲜“慰安妇”金德镇在回忆那段痛苦的往事时说:“我得了病,像膀胱炎那样,流血,解不出小便来,去医院诊治。其他的女人中,有很多都是性器官肿得十分厉害,连针眼大的缝隙都没有,还出血……我没有染上性病,但由于年轻时子宫过于损伤,落得个子宫倾斜症。”另一位原籍朝鲜的“慰安妇”李英淑作证说:“我应酬很多士兵,性器官很多次肿得不像样子,只得

〔1〕日朝协会埼玉县联合会编:《随军慰安妇——日本旧军人的证言》,何吉:《日军强逼中国妇女为“慰安妇”资料摘编》,《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

〔2〕(日)吉见义明主编:《从军慰安妇资料集》,大月书店1992年12月版,第278页。

〔3〕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7月版,第160页。

去医院，下腹疼得像要炸裂一样……我几次性器官发炎，一年入院三四次。”^{〔1〕}繁忙的时候，每间“慰安妇”的屋前均排起了数十人的长队。在特殊情况下，“慰安妇”一天“慰安”日军士兵的次数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甚至有一天内被迫接待60—70名士兵的记录^{〔2〕}。

从日本老兵的回忆来看，“慰安妇”每天接待日军士兵的数量也是相当多的。负责慰安所管理的日军少尉大山正五郎回忆道：“一个女人穿着一件衬裙，头上扎着围条，以勇敢的姿态横躺着。一点感情的酝酿也没有……只是进去出来而已。士兵们闻到女人特有的气味，触摸着她们的肌肤，这就够了。士兵们进去出来，女人们跳起来飞奔向厕所，如此反复循环而已。”有一个“慰安妇”在3个小时之内竟接待了76名士兵^{〔3〕}。日本老兵曾根一夫回忆说：“在条件恶劣的最前线守备地，（一个“慰安妇”）有时一天要应付七八十人，甚至100人。一天要应付100个男人，假定24小时不眠不休息地工作，每小时约要应付4人，换句话说，每15分钟要处理一人。若扣除最低限度的睡眠和吃饭时间，则每小时约需处理七八人。”^{〔4〕}所以，“慰安妇”之间流传着一首名字叫《我的肉体并非橡皮做的》的歌曲，以表示对非人待遇的不满^{〔5〕}。

根据大量的口述实证材料，“慰安妇”长期处于非人的、奴隶般的生活状态，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由于生活条件十分恶劣，遭受的又是非人道的折磨和摧残，大多数“慰安妇”几周之后便产生不感症。如果“慰安”活动不停止，继之而来的就是生理异常。刚开始充当“慰安妇”时，她们月经来了也不能休息，慰安所管理者会让“慰安妇”不停地喝盐水，以止经血，或者命令“慰安妇”将卫生纸卷往身体深部塞，然后再去接待日军官兵。这样的生活不到半年，她们就会出现持续性的月经不调，接着便进入停经阶段，有些只有20多岁的“慰安妇”，竟然一连几个月甚至数年没有月经（如日本“慰安妇”庆子曾一次停经达4年之久）。^{〔6〕}一些慰安妇停经后嘴唇上面会生汗毛，并变得粗黑起来，在暮色中，日军士兵有时会问：“你是男的吗？”时间长了，她们生理发生变化，便不能生育了。另一方面，怀孕的恐惧却一直伴随着“慰安妇”。日军士兵大多明白，中国或朝鲜的“慰安妇”并非妓女，就会不使用安全套，于是，在各地慰安所，相继诞生了许多无辜的婴儿。这些孩子的命运一般都很凄惨：一些中国“慰安妇”所生的婴儿立即被日军杀死，也有案例记录朝鲜“慰安妇”所生的婴儿送给中国农民，日本“慰安妇”的孩子则幸运地被送回日本，而大部分也不知下落。

〔1〕（日）矢野玲子：《慰安妇问题研究》，大海译，（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198页。

〔2〕（日）矢野玲子：《慰安妇问题研究》，大海译，（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198页。

〔3〕金一勉：《天皇の軍隊と朝鮮人慰安婦》，（京都）三一書房1976年1月版，第109—110页。

〔4〕（日）曾根一夫：《一个侵华日本兵的自述》，时事出版社编辑部选编：《悲愤·血泪——南京大屠杀亲历记》，（北京）时事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149页。

〔5〕（日）曾根一夫：《一个侵华日本兵的自述》，时事出版社编辑部选编：《悲愤·血泪——南京大屠杀亲历记》，（北京）时事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149页。

〔6〕（日）千田夏光：《从军慰安妇·庆子》，（东京）文光社1985年8月版，第239页。

长期的摧残使“慰安妇”出现性病、疟疾、便秘、乳房剧痛、胸部疾患、月经失调、会阴糜烂变形等“职业病”。一旦她们动作迟缓或表露厌倦，便会遭到辱骂和殴打。一名“慰安妇”幸存者回忆道：“那时我才19岁，还不知道男女之事，不知道怎样干才好。第一天，一下子就接待了20个士兵，到第五个人时，我以为自己也许快要死了。那个地方又红又肿，像桃子一样大。一边哭，一边用毛巾冷敷了一个晚上。”^[1]由于长期的性奴隶生涯，她们的阴部经常裂口出血，并肿胀变形，虽经涂药治疗，但因没有治愈的时间，最后导致阴部麻痹。有位“慰安妇”幸存者回忆，“即使被虫子或老鼠咬了都没有感觉”^[2]。

根据日本记者千田夏光的研究，“慰安妇”中，因为长期睡眠不足、卫生条件差及营养不良，至少有10%的“慰安妇”患有肺结核^[3]。

在战争年代，“慰安妇”得了缺乏特效药治疗的肺结核，等于被判了死刑。日军对中国、朝鲜“慰安妇”中的肺结核病人，不给予任何治疗，因为她们只是随处可以掳掠到的“慰安妇”而已，药品比她们的生命更贵重。为了活下去，这些患者自己想方设法弄些大蒜汁来应付，但这最多只是延长了些许生命，最后仍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临死时，这些“慰安妇”从包裹里翻出好衣服，央求其他“慰安妇”帮忙穿上，然后无生无息地死去。^[4]对于中国“慰安妇”中的性病患者，日军给予的态度是，轻者治愈后继续留用，病重治疗无效者即处死灭尸。那大市赵家园慰安所开张一个月内，就有3名患有性病的“慰安妇”被活埋^[5]。南京高台坡慰安所受害者雷桂英老人，也对笔者口述了受害者同伴因病被日本兵运至山沟架柴烧尸的实例。

1929年出生的万爱花，是最早站出来控诉的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幸存者之一。1992年，在旅日华侨的安排下，万大娘到日本各地演讲，一遍又一遍控诉当年日军对她的野蛮蹂躏和残酷迫害。日军的迫害除了使她各种妇科病缠身、丧失了生育能力外，她的形体也因此而扭曲变形，一只手臂丧失了功能，一只耳朵的耳垂也缺损了一大块。这是她反抗日本兵强奸之后遭到毒打，日本兵手上的戒指钩住其耳环所致。

日军官兵并不把中国“慰安妇”当人看待，仅视其为泄欲工具，恣意践踏，百般摧残。海南赵家园慰安所的日本老板娘每逢突击接客日，便要求“慰安妇”整日赤身裸体地躺在铺板或“慰安椅”上，任由日本兵接连不断地发泄兽欲。这种“慰安椅”形制特别，“慰安妇”仰躺在椅子上，臀高头低，手脚失去活动自由，只能任由日本兵变换花招地站立宣淫。“慰安妇”稍有不满意或反抗，便会遭到严厉处罚。如海南“慰安妇”阿燕因不堪忍受日军的轮番奸淫，挣扎反抗，结果立即被日本军官用刺刀刺穿大腿。阿燕昏死过去后，那个军官竟照样继续蹂躏她。一次，日本兵强迫

[1] 金一勉：《天皇の軍隊と朝鮮人慰安婦》，（京都）三一書房1976年1月版，第113頁。

[2] 金一勉：《天皇の軍隊と朝鮮人慰安婦》，（京都）三一書房1976年1月版，第158頁。

[3] （日）千田夏光：《从军慰安妇·庆子》，（东京）文光社1985年8月版，第115頁。

[4] （日）千田夏光：《从军慰安妇·庆子》，（东京）文光社1985年8月版，第116頁。

[5] 符和积：《侵琼日军慰安妇实录》，《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

那大市的“慰安妇”坏英变化姿势接待，被坏英拒绝后，日本兵竟将坏英绑在柱子上，用辣椒和食盐抹搓其阴部，使其痛不欲生。至于拳打脚踢，更是中国“慰安妇”经常受到的“待遇”^{〔1〕}。

由于日军灭绝人性的残暴行为，“慰安妇”们常被虐待致死。山西孟县的李秀梅证言，她于1940年8月17日（农历七月十四日），被日军抓入炮楼充当“慰安妇”，她正值15岁的豆蔻年华，但经过日军5个月的摧残，右腕残疾，右眼瞎了，下身流血不止，若不是其父兄变卖家产，花银元赎出，她早就被迫害致死了。事实上，“慰安妇”中相当多的人，不是遭到日本兵的虐杀，就是死于疾病，还有些因经受不住这无尽的苦难而自寻短见。在石碌慰安所，一名女大学生不甘凌辱，被日军吊打至死；新婚不足一周的香港矿工梁信的妻子黄玉霞被押入慰安所，梁信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妻子，但还没团聚，其妻即被日本管事打死，黄也含恨上吊。该慰安所的两名“慰安妇”被折磨得精疲力尽后，不能继续“服务”，便被扒光衣服吊在树上活活毒打致死^{〔2〕}。

中国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们对日军的暴行曾进行过各种形式的反抗，其中逃亡是最常见的方式。但是，她们很难找到机会逃出火坑，不少人在逃亡途中即被日军杀死。“慰安妇”最绝望的反抗是自杀，在许多慰安所中，都曾发生中国“慰安妇”自杀的事件。海南崖县一名刚烈的黎族少女，因不堪忍受多名日军士兵的同时恣意淫辱，咬断舌根自杀身亡。朝鲜“慰安妇”宋神道作证说，她曾亲眼目睹，一位不甘忍受折磨的“慰安妇”，躲在厕所里，喝下大量用以冲洗下身的消毒清洁剂，结束了年轻的生命^{〔3〕}。

20万中国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能够熬到日军投降而活下来的实属万幸。如海南石碌慰安所的300多名“慰安妇”，经过4年的摧残，共有200多人死亡，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活下来的仅有10多人^{〔4〕}。黄流日军机场慰安所原有广州籍女子21人，最后只剩下黄惠蓉等4人^{〔5〕}。感恩县新街市慰安所的40多名中国少女中，最后只活下来10多人^{〔6〕}。即使幸存下来的妇女，也因遭受长期残酷的摧残，绝大多数丧失了生育能力，晚年陷入了孤独的凄凉境地。根据精神医学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理论，所有幸存者都有明显的PTSD症状，而且因日军长期性暴力造成的深重创伤，导致幸存者的PTSD成为慢性病程，长达几十年不愈。她们承受

〔1〕符和积主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续），（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75页。

〔2〕符和积主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海口）海南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728页。

〔3〕（日）矢野玲子：《慰安妇问题研究》，大海译，（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201页。

〔4〕符和积主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海口）海南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750页。

〔5〕符和积主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海口）海南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647页。

〔6〕戴运译：《我所知道的日军黄流机场的“慰安所”》，东方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东方文史》第9辑，第44页。

着世俗偏见，在传统伦理道德观的重重压力下煎熬，“带着难以名状的羞愧心情苟活至今”^{〔1〕}。日军“慰安妇”制度对各国幸存者所造成的隐形影响和持续性伤害，使这一历史问题成为现实问题，并在各个方面发人深省。

六、日军对中国妇女的一般性暴行

从1931年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开始，在战场和后方对妇女的强奸、轮奸暴行就一直不断。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所到之处，都有强奸事件发生，被害的中国妇女难以计数。

野蛮残忍的日军将对中国妇女的性暴力作为刺激其征服欲望，鼓励其杀伐士气，抚慰其沮丧情绪的重要手段。因此，日军的性暴行得到日军上层的纵容。

日军对中国妇女强暴事件呈现普遍性。

首先是空间的普遍性。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北大肆强奸、轮奸妇女。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军对中国女性不分年龄、职业、身份，甚至是孕妇、病妇、老妇，均进行惨无人道的强奸、轮奸，仅南京一地就有数万起此类惨案。1938年初，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在报告中指出：“南京陷落后一个月内，两万多名妇女被日军强奸。”^{〔2〕}郭沫若在1938年6月指出，“在我军退出之各地区内，奸淫已成为日军之经常行事，壮年妇女，固不待论，即老妇幼女亦不免横遭侮辱，其因轮奸而致死亡，或因拒绝要求而被害者，所在皆是”^{〔3〕}。

对于这种司空见惯的暴行，日军军官和执法部门几乎不加干涉，军官甚至带头强暴妇女。据日本老兵回忆：“在一线部队，有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放松。无一人为了儆戒而遭到枪决的……不，也没有受到惩罚。干坏事的，不仅仅是士兵，有时军官先干在前头。厉害的中队长、大队长什么的，他们在去南京之前，即使是战斗中，有的也带着女人。这些女人反正都是随便抓来的，……据说他们天天晚上同女人睡觉。”^{〔4〕}如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到一，“自己更无人性地每日奸污中国少女”^{〔5〕}。

日军的此类暴行许多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实施的。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茨博士战后作证指出：“那是最粗暴最悲惨的景象。就在我的邻居家里，妇女被强奸，其中还包括大学教授的妻子。有五次，我亲眼目睹日军强奸妇女并把他们从妇女身上拉

〔1〕符和积主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海口）海南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467页。

〔2〕杨夏鸣编：《东京审判》，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7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397页。

〔3〕郭沫若：《为日寇暴行告全世界友邦军人书》（1938年6月），《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

〔4〕《日本士兵冈本健三自述》，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000页。

〔5〕《证人佟衡口供》（1955年4月15日），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90页。

下来。根据我们前面提到的安全区的报告，也根据我对发生在各难民营以及金陵大学教学楼里的强奸案例调查记录，其中涉及3万名难民，共计有数千起强奸案……我的一个朋友亲眼看见，就在南京神学院的操场上，一位中国妇女被17名日本士兵轮奸。我不想重复那些与强奸有关的变态和虐待狂的暴行，但我想提一下仅在金陵大学操场上，就有一个9岁的小女孩和一个76岁的祖母被强奸。”^{〔1〕}

其次，日军对中国妇女的强暴事件呈现时间上的持续性，从战争开始直到战争结束。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发生了南京大屠杀，直到1938年5月，对于妇女来说，南京仍是极不安全的城市。伪南京市警察厅厅长王春生曾证言，在南京城门口站岗的日军官兵对进出城门的中国妇女公然侮辱。“对于进出城之中国人民检查颇严，对于青年妇女使之衣扣解开，裤带解脱，彼见得赤身裸体拍手大笑……诸如此类，不胜其数。”^{〔2〕}1941年，日军占领海南澄迈县昌堂村，在众目睽睽之下，竟将整个村庄的青年妇女全部轮奸，然后刺死^{〔3〕}。这样的暴行并非个案。

对妇女的性暴力，日本战犯也有许多供词。日军第三十九师团步兵第二三三联队的江先光供认，日军在湖北当阳县北部，抓住一名游击队队长的妻子，见该妇女年轻貌美，便百般侮辱，并将其轮奸，日本兵还将棒子插进其阴户，最后将她一丝不挂地绑在树上，并将其极其残忍地刺死^{〔4〕}。曾任日军第五十九师团步兵第五十四旅团班长的富岛健司回忆，1943年，在华北渤海湾，“只要见了中国女人，不管妇幼，就说：‘要想活命，就要听我的话。’然后就肆意侮辱和欺凌。如果遇到有反抗的，就先折磨半死，然后再杀掉”。一次，日军找到8个女人，先将17岁的少女轮奸，他和水岛上等兵一起，把一个带着吃奶婴儿的妈妈“连踢带打地强奸了”^{〔5〕}。1943年11月，日军新兵石田干雄按照军官的命令，找到了一名年轻的母亲，他先将啼哭的婴儿杀死，然后强奸了这个“皮肤白皙、眉清目秀”的女人，他承认曾“强奸了许许多多的中国妇女”^{〔6〕}。

日军对中国妇女的性暴行绝不是个别、偶发的，而是日本军队进行的集团犯罪。更为恶劣的是，日军在实施性暴行过程中，有时强迫中国人互奸，有时还伤天害理地强迫受害人亲人之间乱伦，子奸母，父淫女，甚至强迫和尚强奸妇女，以此取乐和侮辱中国人民，挑战人类尊严的底线。战后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战犯谷寿夫时，法庭判决称：“日军在中华门外，于强奸少女后，复迫令过路僧侣续与行奸，僧拒不从，

〔1〕《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方对其证据的总结》，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7月版，第397页。

〔2〕督办南京市政公署档案，南京市档案馆藏，1002—1。

〔3〕中共澄迈县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澄迈县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资料》，2001年印行，第82页。

〔4〕公安部档案馆编：《火刑——日本战犯供述档案揭秘》，（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30—39页。

〔5〕（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历史的见证》，袁秋白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41—145页。


〔6〕（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历史的见证》，袁秋白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77—179页。

竟被处以宫刑致死。”〔1〕

日军肆无忌惮的性暴行，给受害者留下永远无法磨灭的创伤和痛苦，幸存下来的受害者，均有严重的心理创伤。受害者自述，即使时隔半个多世纪，听到日本男人说日本话，都会让她们浑身发抖；当谈话涉及到性暴力时，有些老人会呕吐，有的甚至突然精神失常，大哭大叫。

侵华日军对妇女的性暴行是极其严重的战争犯罪，不仅是大量的强奸、轮奸事件，更令人发指的是，二战时期的日军实施了大规模的性奴隶制度，这一系列罪行将战争犯罪者永远地钉在了世界历史的耻辱柱上。

〔1〕《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及附件》，胡菊蓉编：《南京审判》，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4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90页。



第一章

“慰安妇”制度的发端

1918年3月,为阻止苏俄军队的东进,英、法军队实行武装干涉,日本也乘机出兵,向中国北满及与之毗邻的西伯利亚扩张。先后共有11个师团的日军入侵中国东北和苏俄。在侵略苏俄的过程中,发生了大量的日军强奸事件,导致军队内性病流行,染病日军总数达1.2万人。这次军队性病大流行,引起了正在全力将日本拖向战争之路的日本军方的高度重视。此后,日军高层便考虑在未来战争中,如何防止因性病而削弱战斗力的对策问题。最后的结论是,必须建立一种由军队控制的有卫生保障的性服务制度,以解决日益庞大且外派增多的军队的性欲问题,以全面保障军队的战斗力。

自清末以来,上海是日本海军在海外的最大基地,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就设在上海虹口。为了满足士兵的性需要、给士兵提供安全的性服务,1932年1月,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在虹口选择了“大一沙龙”“三好馆”“永乐馆”和“小松亭”等4家日本人开设的风俗店,作为日本海军的指定慰安所,其为目前资料所见最早的“慰安所”记录。

1932年1月28日,日本发动的一·二八淞沪战役爆发。至3月,在沪日军已达3万多人。为防止因大规模的强奸事件导致的军纪败坏和性病泛滥,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前往上海之前便决定,仿照在沪日本海军的做法,从日本关西征调第一个陆军“慰安妇”团,并在吴淞、宝山、庙行和真如等战斗前线建立为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这个“慰安妇”团,是日本陆军第一次有组织地参与“慰安妇”制度建立的行动,它成为后来日本战时“慰安妇”制度的重要尝试和样本。战争结束后,冈村宁次曾透露说:“我是无耻之极的‘慰安妇’制度的缺席的始作俑者。昭和七年(1932)上海事变时,发生了两起官兵强奸驻地妇女的事件,作为派遣军副参谋长的我,在经过调查后,我只有仿效海军早已实行的征召妓女慰安军的做法。”〔1〕

由此,二战时期罪恶的“慰安妇”制度应运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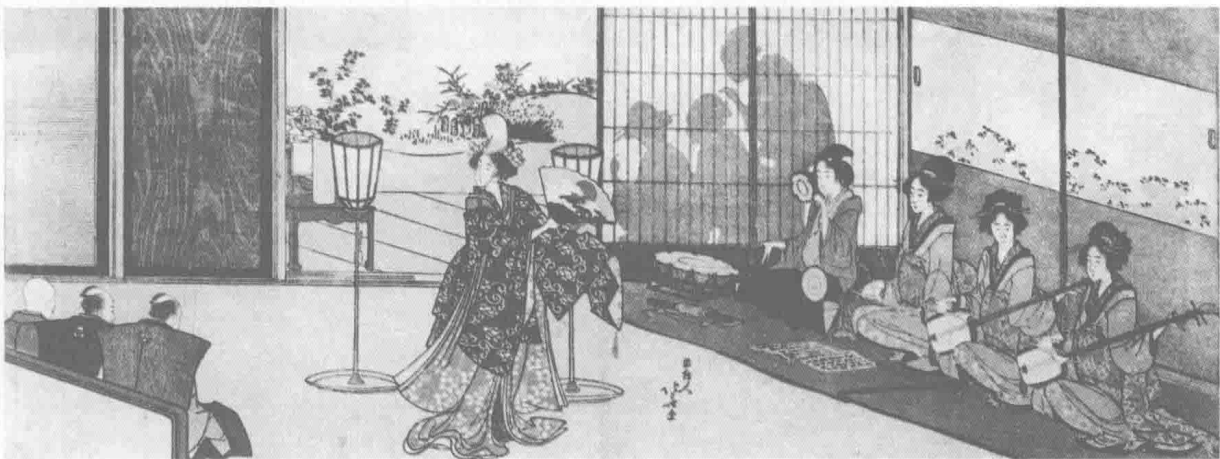
20世纪30年代初,在东北地区和上海,出现了一批日军慰安所。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以后,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从辽宁到云南。这些慰安所中,有些是日军自行设立和管理的,有些是日军委托日侨设置的,也有些是日军指使汉奸或伪政权建立的。

〔1〕(日)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大将资料(上)·战场回想篇》,原书房1970年版,第302页

一、近代日本社会的“性”

日本推行“慰安妇”制度，与其社会构造和对“性”的观念有关。

从性别学的角度观察，日本社会呈现出一种典型的“男上女下”社会结构。古代日本长期奉行一种“性政治”观念。男性政治家们并不把“性”看作是一种私人领域的行为，而是从国家的角度把它当成一种公共资源，使它在社会范围内进行独特的政策扩容。从幕府时期目的在于消解反对力量，以“阉割大名睾丸”的艺伎培养为突出标志的公娼制的建立和推行，到近代国家倡导对资本原始积累起到巨大作用的海外游娼大潮的掀起，直至战争时期为本国军队配置“慰安妇”的军事性奴隶制度，都可以看出这条将女性作为工具、利用和践踏女性进而践踏人类的可耻观念的明线。“慰安妇”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至少在13世纪中期的日本即已经出现。根据小野武雄《吉原和岛原》一书的记载，足利将军二代时，为了激发官兵的斗志，受命讨伐菊池光武的军队（1359年），就每船配备10—20人的“倾城”（妓女），作为“夜晚的慰安妇”^[1]。“慰安妇”本身就是近代日本武士政治的产物，然后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扩张而迅速发展为军事性奴隶制度^[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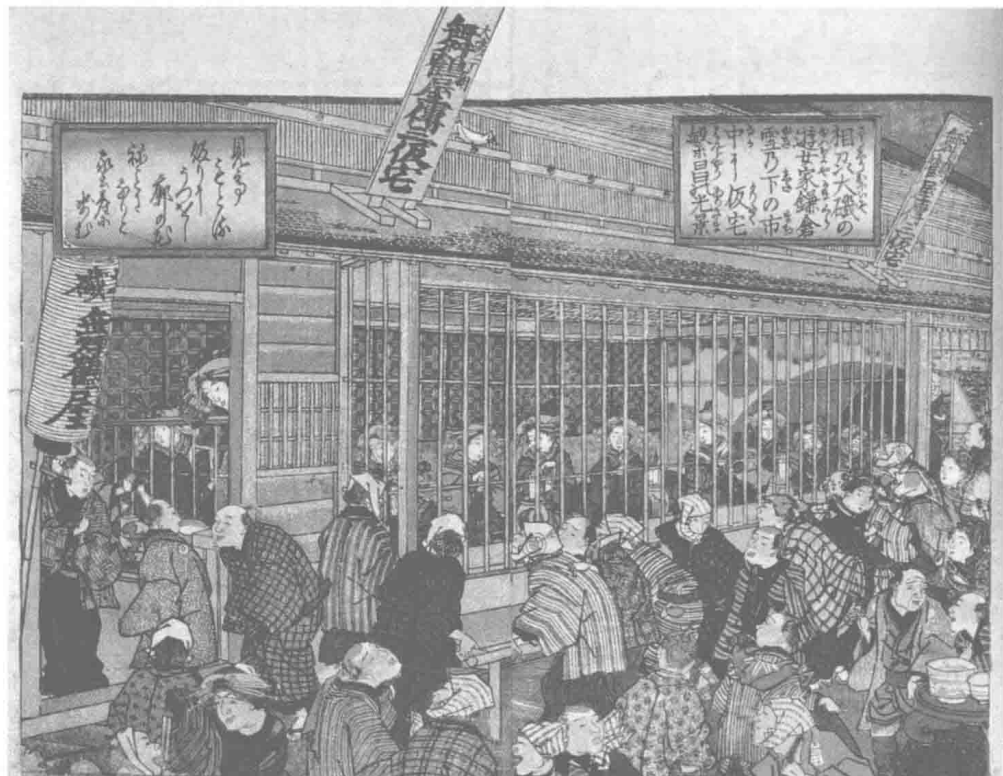
艺伎是日本社会一种专业阶层的妇女，传统营生是取悦男子。除巧言利口外，她们必须具有唱歌、跳舞和弹奏“三味线”（日本琵琶）的技能。艺伎有些也不得不卖身。图为葛饰北斋19世纪创作的绘画作品《深川区（今东京江东区）的艺伎表演》。〔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藏，转引自 *Japanese Erotic Fantasies Sexual Imagery of the Edo period*. Hotrl Publishing, Amsterdam2005. p15.〕

[1] 金一勉：《游女からゆき・慰安婦の系譜》，（東京）雄山閣1997年版，第12頁。

[2] 陈丽菲：《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版。

1 艺伎与日本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达官贵人出入游廓，常于觥斛交错之间密定大策。伊藤博文曾言人生的最高境界是：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江户时代艺伎所在的游廓纳入游廓区的条件，就是与幕府签下保证书，为幕府暗中调查反对幕府的武士力量，做好拥护幕府武家人的服务。图为歌川国芳的名画《在妓院格子窗后的女子与行人》，男人们可以透过木窗，挑选他们心仪的艺伎。〔阿姆斯特丹 Ferry Berthdet 藏，选自木版画《寝の夢》1836年版，转引自 *Japanese Erotic Fantasies Sexual Imagery of the Edo period*. Hotrl Publishing, Amsterdam2005. p13.〕

2 京都日本传统的文化和政治中心，这里的艺伎也是日本最为出名的。到了江户时期（1603—1867），江户（今东京）的艺伎也迅速增多。图为歌川国芳所绘的《大门，江户吉原入口》。〔阿姆斯特丹 Ferry Berthdet 藏，选自木版画《寝の夢》1836年版，转引自 *Japanese Erotic Fantasies Sexual Imagery of the Edo period*. Hotrl Publishing, Amsterdam 2005. p52.〕



1



2

二、首个日军慰安所——大一沙龙

二战前，日军指定的第一批军队慰安所在中国上海出现。

1932年1月，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在上海的虹口选择了“大一沙龙”（原址宝山路，1930年后迁至东宝兴路）、“永乐馆”（狄思威路，今溧阳路）、“小松亭”（虬江路大富里5号）、“三好馆”（吴淞路松柏里）等4家日本人开设的风俗店，作为海军的指定慰安所。这些慰安所通常不挂牌子，也没有慰安所的名称。“大一沙龙”最初除了接待日本海军官兵外，也接待日本侨民。其地址为东宝兴路125弄1号，后扩展到2号、3号和123弄，共5幢房屋。最初所内的女性为日本人和朝鲜人，后来开始增加中国女性，到战争中后期，则以中国女性为主体。这个慰安所一直开办到1945年战争结束。周边的上海居民们对于这个慰安所有着清晰的记忆。



东宝兴路125弄1号是一幢西式住宅，原是上海广东移民的会馆，后来成为“大一沙龙”慰安所的主要建筑。〔苏智良1998年摄〕

■1 “大一沙龙”慰安所由日侨近藤夫妇经营，后来扩展到5幢房屋，这些房屋至今保存完好。图为“大一沙龙”慰安所旧址鸟瞰图。〔苏智良 2000年摄〕

■2 图中左侧带台阶的房屋为“大一沙龙”慰安所的厕所，现在仍是居民们使用的厕所。〔苏智良 1994年摄〕



1



2



1



2



3

1 在战时刊印的《支那在留邦人人名录》一书中，刊有“大一沙龙”的广告。上面印有“大一沙龙”日语发音的罗马字“DAIICHI SALOON”，以及电话号码“46940 或 (02) 2801”等。其日式庭院的照片与今天125弄1号的庭院完全一致。〔《支那在留邦人人名录》，苏智良1998年翻拍〕

2 东宝兴路125弄1号的日式花园至今犹存，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花坛和弧形台阶，与上图（即战时的“大一沙龙”广告）中的庭院样式完全吻合。〔苏智良1993年摄〕

3 今日的“大一沙龙”遗址中的日式花坛保存完好，但假山已十分破败了。〔苏智良1993年摄〕

■1 东宝兴路当地居民认为，在125弄1号庭院里的这棵树，树形特别，方圆几里内均无第二棵这样的树，推测是日本人当初从日本移植来的。〔苏智良2009年摄〕

■2 根据东宝兴路居民回忆，“大一沙龙”对面曾是慰安所的汽车库，共有两幢房屋，均为抢夺中国居民的房屋改建的。这两幢房屋在20世纪90年代被拆除。〔苏智良1995年摄〕

■3 陆明昌老人证言，1932年，他本人就在“大一沙龙”里做粗活，一直干到1945年日本投降。他记得，到20世纪40年代，“大一沙龙”里主要就是中国女性了。老人在晚年还能说上几句日本话，现已去世。〔苏智良1998年摄于陆明昌的高境庙新居〕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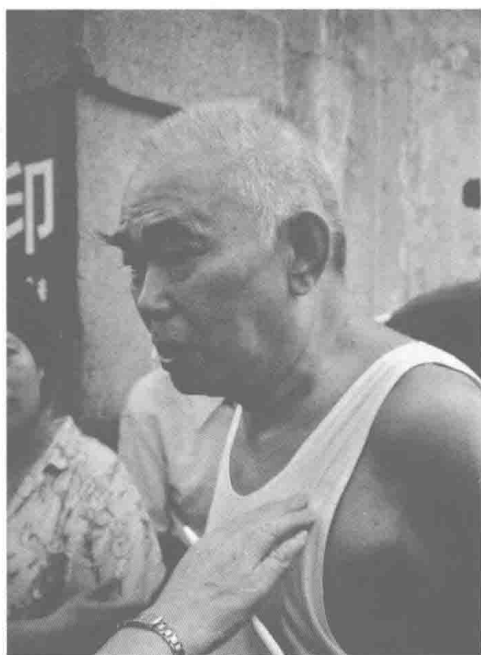
3



1



2



3

1 家住“大一沙龙”遗址附近的林铃娣老人（1924年生），晚年对“大一沙龙”还有清晰的记忆：“我父亲是个桶匠。‘大一沙龙’我们叫它‘大一记’，老板娘经常来我家订购小木盆，这种小木盆是给慰安女与客人洗澡时放置毛巾和肥皂用的。一次定做总有10只，每只价钱是1日元。那时我只有十来岁，这些木盆每次都是我送过去的。但只能送到门口，不准进去。里面的女人都穿着和服、木屐。”〔苏智良1994年摄〕

2 木匠陈阿金老人在他师傅的带领下，当年曾一起为“大一沙龙”慰安所做过装修。〔苏智良2001年摄〕

3 桶匠张银富老人曾为“大一沙龙”慰安所制作过不少木桶，他的师傅就是林铃娣的丈夫。〔苏智良2001年摄〕

1 这个圆形的水泥地原来是日军士兵跳舞的场所。根据周边老人们的回忆，舞场的中央原是个小小的喷水池。〔苏智良 1999 年摄〕

2 根据证人们的回忆，125 弄 1 号的底楼，当年是个面积不小的酒吧，日本军官时常在这里喝酒。此地现已成为居民们的公用厨房了。〔苏智良 2001 年摄〕

3 东宝兴路 125 弄 3 号底楼的吴家，原来是“慰安妇”的房间，里面并排镶嵌着两块精美的木雕。〔姚霏 2007 年摄〕

4 慰安所时代的木雕——富士山，至今仍保存在吴家的房间里。按其工艺与风格来看，应是从日本运来的。〔苏智良 2009 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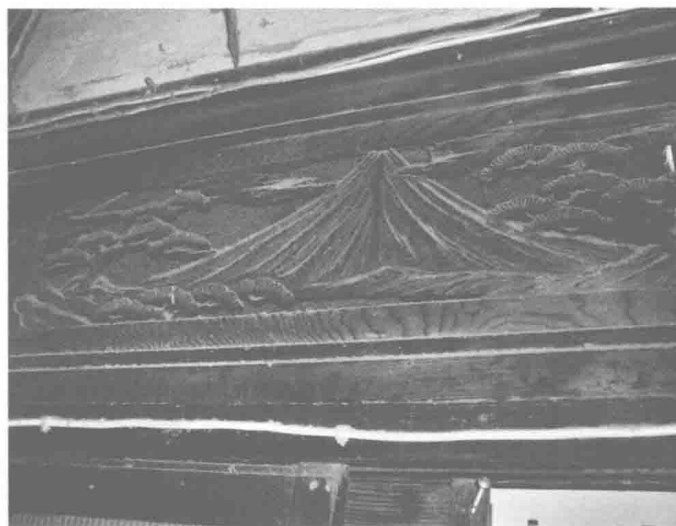
1



2



3



4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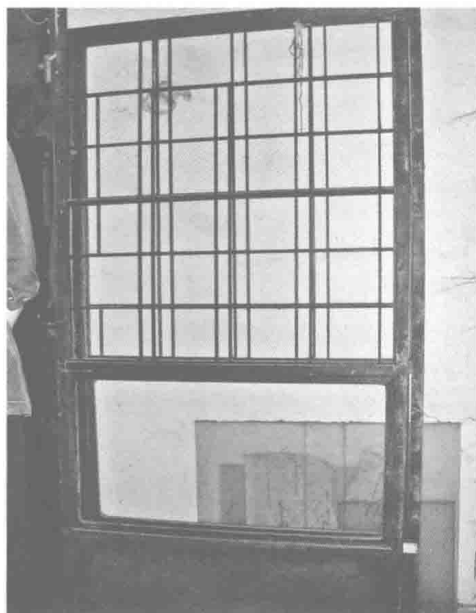
■1 图为吴家保存的另一块慰安所时代的木雕——琵琶湖。琵琶湖也是日本著名的风景名胜。这是经许多日本朋友现场参观后确认的。〔苏智良 1995 年摄〕

■2 “大一沙龙”遗址里保存着不少日式构件，125 弄 1 号二楼的郑大妈房里，日式移门依旧完好。〔姚霏 2007 年摄〕

■3 “大一沙龙”的一些日式门窗被保留下来，图中的这扇移门，居民们至今仍在使用。〔姚霏 2007 年摄〕



2



3

1 1998年，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在日本东久留米市拜访日本老兵近藤时与其合影。战争时期在上海江湾当通信兵的近藤，自言曾去过许多像“大一沙龙”一样的慰安所，他直到退休后才回到日本。〔西野瑠美子1998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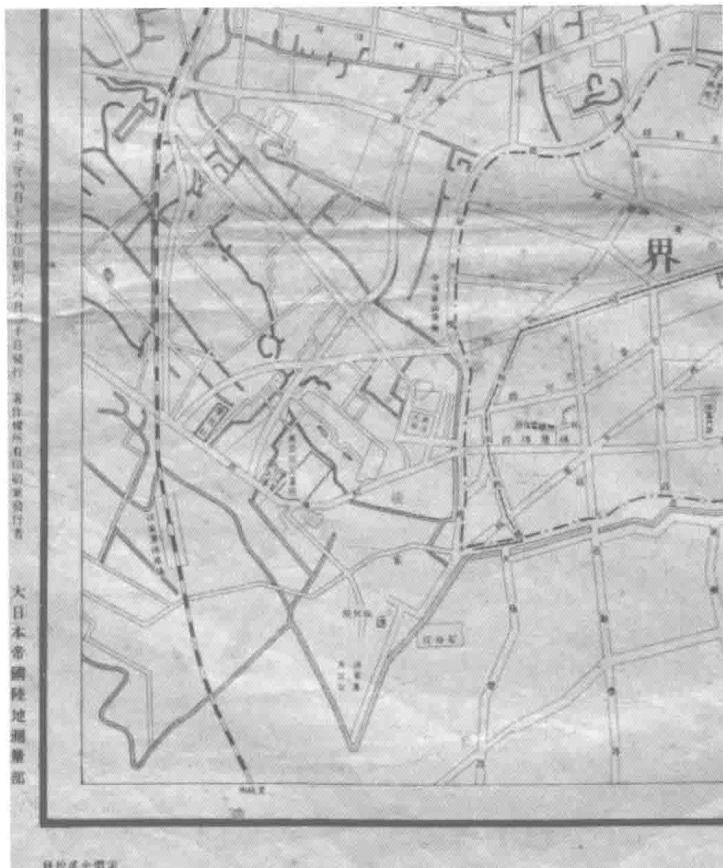


2 经多方查证，125弄1号楼楼梯边的是体检房间，日本军医每周要来检查“慰安妇”的身体。其目的是防止日本官兵感染性病。〔姚霏2006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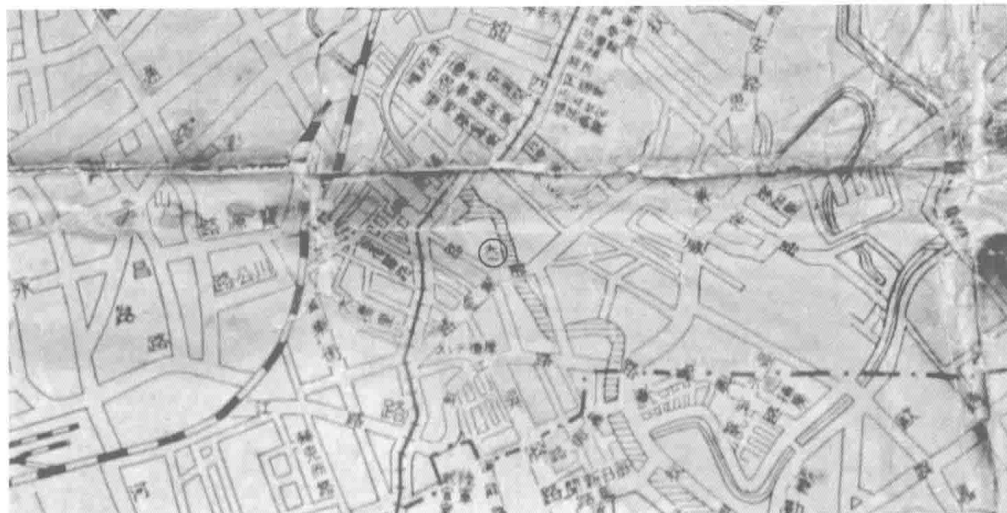
3 图为保存完好的刻有“大一”字样的门板，这是慰安所时代的遗物。该块门板存放在125弄2号与123弄10号的过街楼二楼。〔姚霏2007年摄〕

4 刻着“大一”字样的门板，现在依然保存完好。〔姚霏2007年摄〕





2



3

1 图为日本于“昭和十二年”，也就是1937年的8月15日在东京印制，并于20日发行的《上海市街图》，比例为二万分之一。

2 这张《上海市街图》是为了装备上海派遣军而赶印的。

3 《上海市街图》上清楚地标明了“大一”慰安所的位置，也就是说，地图的绘制者或者说是日本军部，也早已知晓“大一沙龙”这个慰安所的位置和情况，并向日本陆军官兵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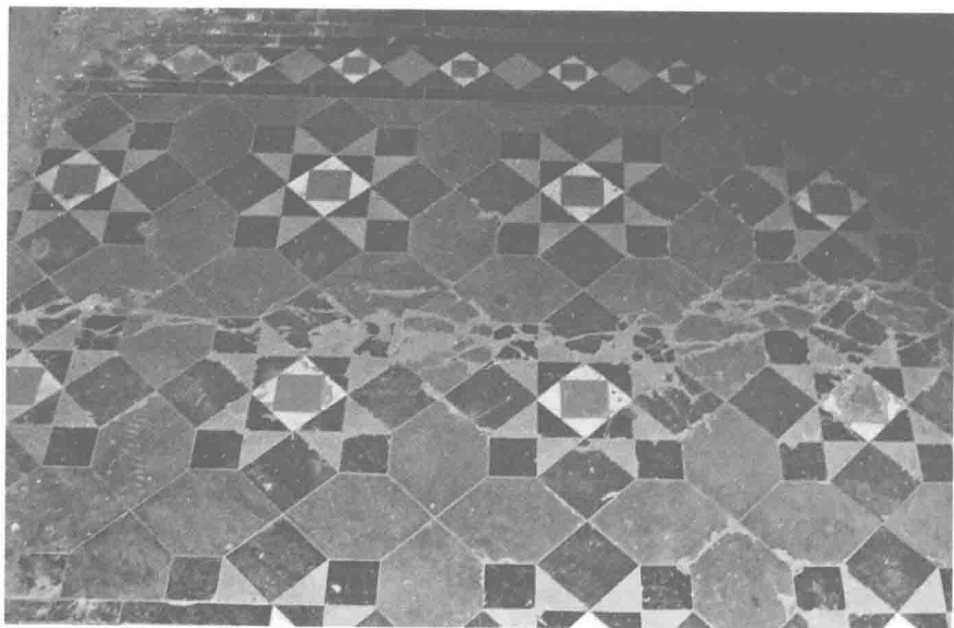
1 “大一沙龙”内各幢房子之间连有通道，如今已用墙隔开。图为125弄2号与3号的建筑。〔姚霏 2007年摄〕

2 “大一沙龙”遗址地面上的釉面砖，还是当年的原物。〔苏智良 2004年摄〕

3 当年“慰安妇”的房间，旧门、旧窗多保留着。图为东宝兴路125弄1号二楼的旧窗。〔姚霏 2008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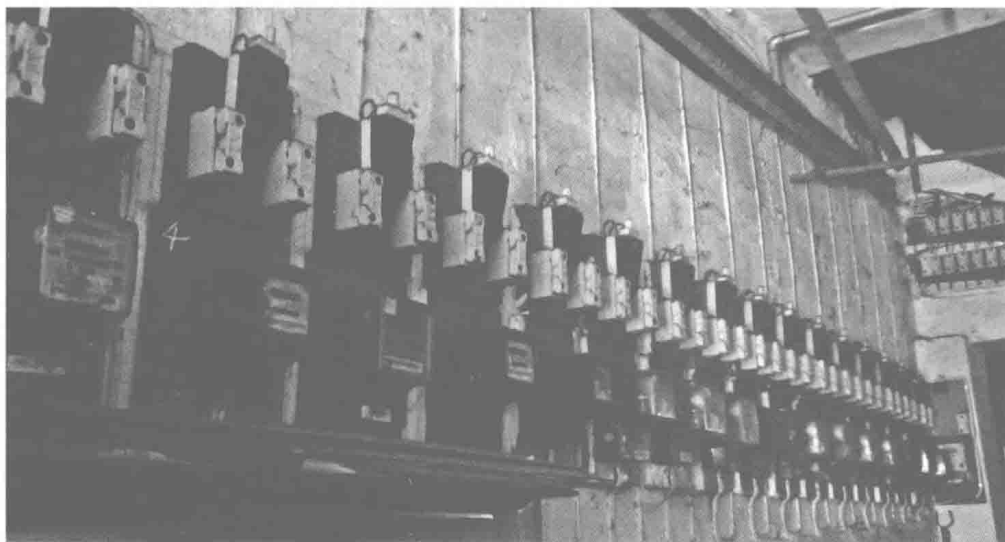
1



2



3



1



2



3

1 125弄1号居民们的电表蔚为壮观。“大一沙龙”遗址上至今仍居住着五十多户居民。保护遗址的工作任重而道远。〔姚霏 2006年摄〕

2 对于曾经在这里开办的慰安所的历史，许多知情者已经去世。图为长期居住在东宝兴路125弄的94岁的知情者吴三让老人。〔苏智良 2010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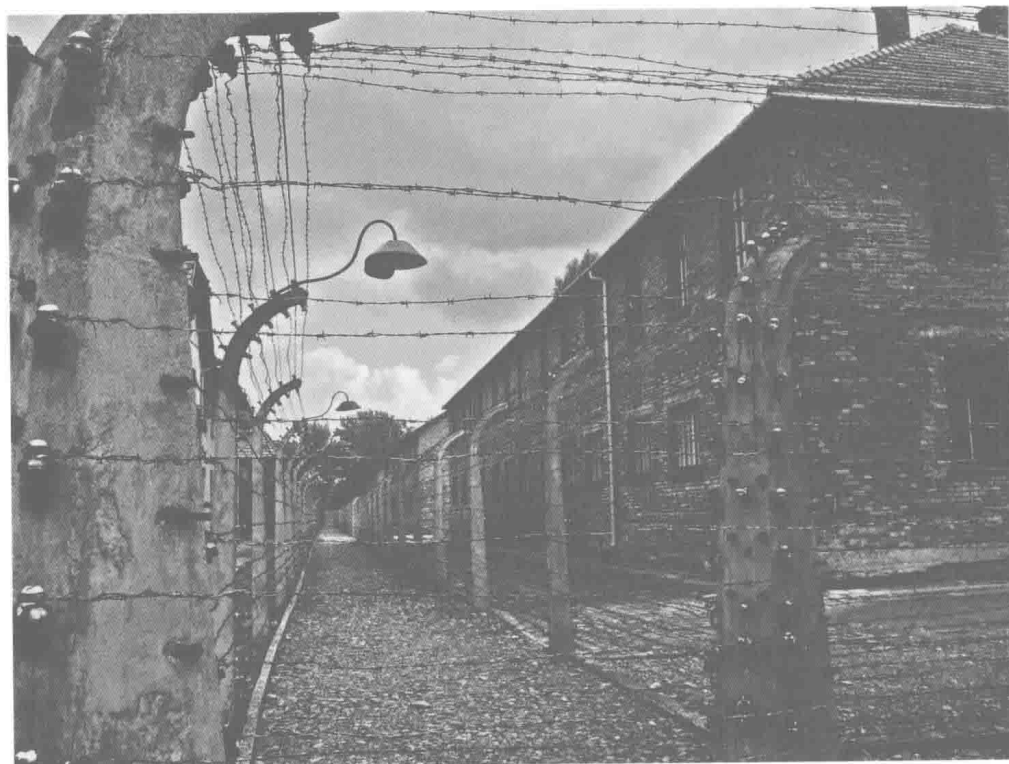
3 图为125弄1号楼装修后的面貌。保护“大一沙龙”慰安所遗址十分重要。〔苏智良 2005年摄〕

1 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世界上第一个警示性的文化遗产，那么我国的奥斯维辛在哪里呢？“大一沙龙”能否成为亚洲的战争警示性文化遗址？图为波兰的奥斯维辛纳粹集中营正门。〔苏智良 2008 年摄〕


2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铁丝网。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整体保护，每天都有数以千百计的游客去参观，以反思战争，保卫和平。〔苏智良 2008 年摄〕



1



2



第二章

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实施

1937年11月，淞沪战役结束之后，日本的上海派遣军与第十军在进攻南京途中，犯下烧、杀、抢、掠等数不胜数的恶行，并在占领南京后制造了大屠杀，引起越来越大的国际反响。统辖两军的日华中方面军司令部，为了控制局势而于12月初下达命令，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要求上海派遣军于1937年12月开始推行“慰安妇”制度。

“慰安所”是对应于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中相对固定的“合法”强暴场所的统称。实际上，当时遍布中国各地日军强暴场所真正以“慰安所”命名的并不是很多，日军常常各取所需地来命名慰安所，比如“娱乐所”“女郎屋”“会所”“料亭”“食堂”“别庄”“寮”等等；有些临时搭建或者强占民房、学校、庙宇为慰安所的，则随当地名称；有些在战地搭建又转移的，可能就没有正式名称。

现在，我们能从日本文献中看到一些较早在中国战地设置慰安所的明确记录。1937年12月11日，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在日记里写道：“从（华中）方面军那里收到关于建立慰安设施的文件。”^{〔1〕}由此可知，在12月13日占领南京前，华中方面军就已向上海派遣军下达设立慰安所的命令。另外，第十军也收到了同样的命令。12月18日，在浙江湖州，该军参谋寺田雅雄中佐指挥宪兵队秘密强征当地女性，设立了日军慰安所。而上海的慰安所事务，则由上海派遣军参谋部命令参谋部第二课长长勇中佐负责。12月19日，饭沼守留下了这样的记录：“委托长勇中佐迅速开设‘女郎屋’。”^{〔2〕}上海的日军慰安所便这样在日军高层的直接指挥下迅速建立起来了。

随着战事的进展，日军慰安所也在中国各地占领区普遍建立。在中国的占领地，从城市到农村，从沿海到内地，军队规模从师团、联队到警备队、小分队，甚至于在前线阵地的据点里也设有慰安所。慰安所就像影子一样与日军形影不离。

以新公布的吉林省档案馆所藏日军文献为例，1938年2月，日军华中派遣军宪兵队司令官大木繁向该军参谋部的报告中，记录了南京、镇江、金坛、句容、常州、丹阳、芜湖和宁国等地区的慰安所情况，其中除了宁国因交通断绝情况不明外，其他各地均已设立慰安所。档案记载，在芜湖，“慰安妇”比上一旬增加了84人，在该地的109名“慰安妇”中，日本女性48人，朝鲜女性36人，中国女性25人；在镇江的109名“慰安妇”，要面对15000名士兵，平均1名女性要应付137名士兵。

〔1〕（日）南京战史编纂委员会编：《南京战史资料集》，（东京）偕行社1989年版，第211页

〔2〕（日）南京战史编纂委员会编：《南京战史资料集》，（东京）偕行社1989年版，第220页

一、华东地区的日军慰安所

(一) 上海的日军慰安所

上海是日军最早设立慰安所的城市。根据中国学者二十年来对全国的调查，上海能确认的慰安所遗址最为集中，因为上海既是中国的首位城市，也是日军前往中国内地和东南亚的枢纽港口，南来北往的日军部队非常多，占领的时间也非常长。经确认，上海典型的大型慰安所至少有4家：在日本华中方面军直接命令下，由上海派遣军设立和经营的大型慰安所——上海杨家宅慰安所（建立之初就有104名“慰安妇”，前后合计“慰安妇”达数百人），海军直营的峨眉路慰安所，千田深谷部队慰安所，设立在其昌栈码头的陆军慰安所等。据日军军医麻生彻男《上海より上海へ》的战地回忆录^[1]，江湾甚至形成了上海地区最早出现的日军的“花街”——慰安所一条街，其中最出名的是贴着日文对联的万安路慰安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上海原租界地区也出现了慰安所。根据各类文献和实地调查，上海的日军慰安所遗址至少有160处。



这是一张在“慰安妇”题材方面影响最广的照片之一：上海杨家宅慰安所。这些木屋是日军工兵部队赶造的，建造时日本工兵也曾驱赶当地的中国农民一起建造。〔麻生彻男：《上海より上海へ》，（福岡）石風社1994年版，第17頁〕

[1] 麻生彻男：《上海より上海へ》，（福岡）石風社1993年版，第17頁。



1



2



3

1 杨家宅慰安所就建立在翔殷路的这条小河边，当年的木屋早已不存，但战后村民们常从小河中捞出日本清酒瓶子、饭盒等日军遗物。
〔苏智良 1996 年摄〕

2 图为战时曾任日军预备役大尉的麻生彻男。战时他应征来到上海，用一架莱卡照相机拍摄了杨家宅慰安所的照片。战后他曾担任九州医科大学校长，1989 年 7 月 11 日故世。〔麻生彻男：《上海より上海へ》。封面后勒口〕

3 军医麻生彻男曾奉令参与建立慰安所，晚年时，他对日本实施的“慰安妇”制度有所忏悔，出版了战时回忆录《上海より上海へ》一书，披露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图为该书的封面。

4 麻生彻男在战时几乎天天记日记，图为他保存下来的军队日记。〔麻生彻男：《上海より上海へ》，第 6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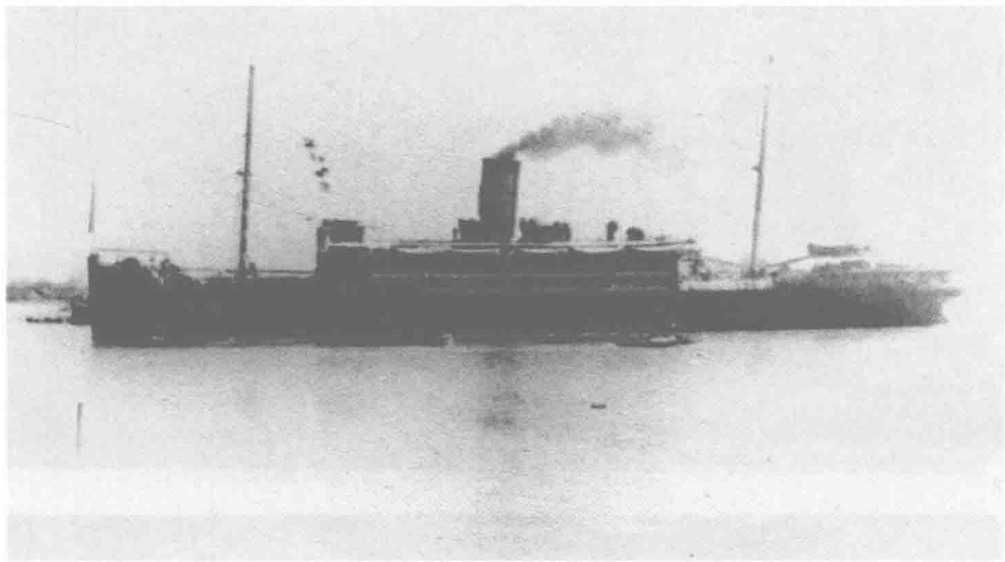
4



1

■1 1937年12月11日，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在日记中记有《从方面军来的关于慰安设施的实施意见》，表明松井石根这时已有在军队中设立慰安所的计划。19日，饭沼守又在日记中记载了拜托华中方面军参谋、上海派遣军参谋部第二课长长勇中佐迅速负责建立“女郎屋”——慰安所，并要求东兵站司令部具体实施建立慰安所的工作。〔（日）南京战史编纂委员会：《南京战史资料集》，（东京）偕行社1989年版〕

图为军医、护士等在杨家宅慰安所门前的留影。〔麻生微男：《上海より上海へ》，第17页〕



2

■2 图为运送“慰安妇”的日本“海运丸”号轮船正在开往上海。为了尽快且有效地得到“慰安妇”，负责华中方面军给养任务的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派出了军官和聘用人员石桥德太郎等，到福冈等地征募“慰安妇”，然后乘坐被陆军征用的“海运丸”号轮船赶往上海。〔麻生微男：《上海より上海へ》，第20页〕

■3 21岁的日本酌妇（妓女）庆子，来到日本的“慰安妇募集处”报名，她被告知：马上可以获得1000日元，干几个月就可以回家。然而庆子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为了这1000日元，她竟付出了7年的青春和一生的幸福。图片中右侧的这位女子就是庆子。〔麻生微男：《上海より上海へ》，第15页〕



3

1 庆子等先是被集中到长崎的“水天楼”旅馆，然后上了船。图为庆子（下方中间者）在“海运丸”号轮船上。〔（日）千田夏光：《从军慰安妇·庆子》，（东京）文光社1985年8月版，书前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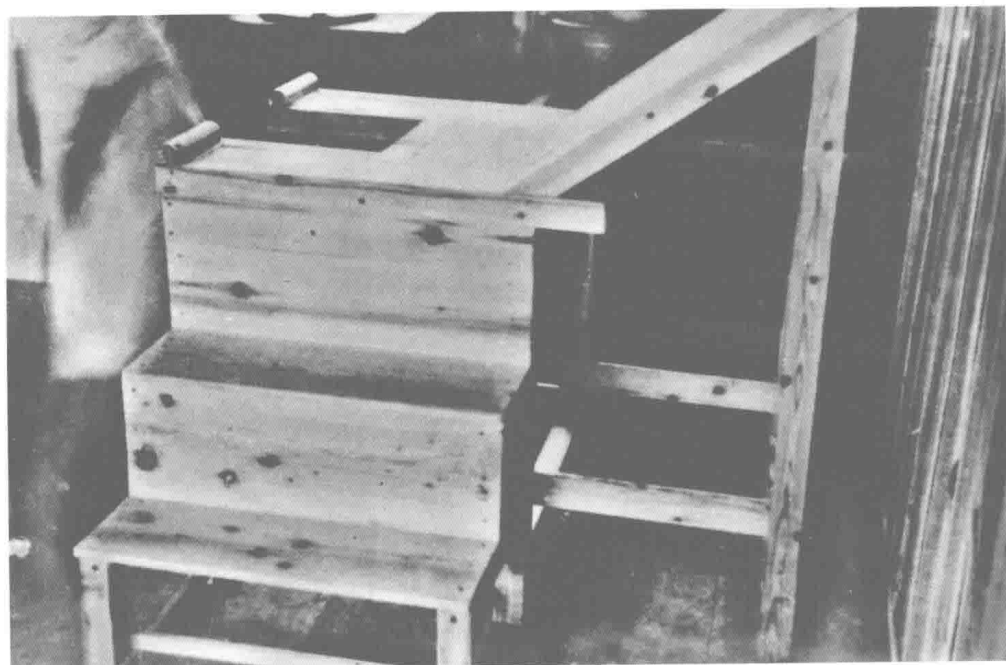
2 这些征集来的女性被送到了沙泾小学。1938年1月2日下午，军医麻生彻男接到命令，带着护士和助手火速赶到其美路，并在沙泾小学前合影（左三为军医麻生彻男）。〔麻生彻男：《上海より上海へ》，第14页〕

1

3 1938年1月2日，麻生彻男命令会木工的士兵连夜制作了这个妇科检查台，以完成第二天对女性的身体检查任务。现在各国“慰安妇”历史纪念馆复原当时的慰安所检查台，都依据了这一样式。〔麻生彻男：《上海より上海へ》，第15页〕



2



3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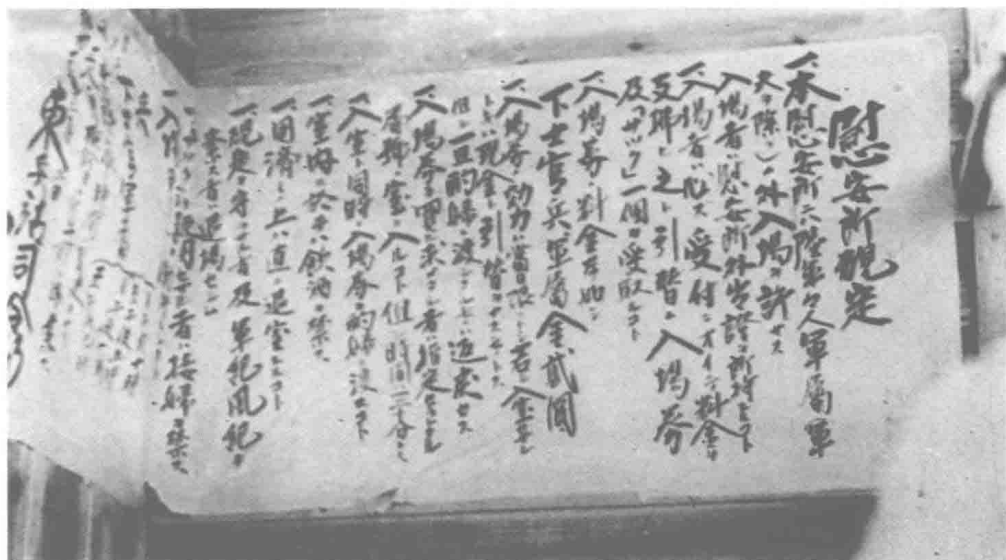
■1 1938年1月3日，女性们排着队，等待身体检查。从服装上可以辨认出，有些是朝鲜女性，有些是日本女性。〔麻生微男：《上海より上海へ》，第14页〕

■2 到上海杨家宅慰安所后，日军聘用人员石桥德太郎这时才对妇女们说：“过去我曾说过到战场来是为了给士兵们烧饭洗衣，现在你们已经知道，真正的工作就是用自己的身体慰劳士兵，也就是满足士兵们的性欲。”接着士兵取来和服，命令朝鲜女子们脱下朝鲜服装，要日本妇女教她们穿和服，说明天起里面不准穿内裤，一律只准穿内裙。〔麻生微男：《上海より上海へ》〕

图为曾设立杨家宅慰安所建筑群所在地的东沈家宅。〔苏智良1998年摄〕

■3 1938年1月13日，日本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制作了“杨家宅慰安所”的木牌。这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军设立的第一个军队管理的正式的慰安所。图为当时竖在杨树浦路上的杨家宅慰安所的广告牌。〔麻生微男：《上海より上海へ》，第16页〕

1 图为麻生彻男拍摄的杨家宅慰安所规定。其落款清楚地写着“东兵站司令部”。其中的内容，与中国各地和东南亚各地所发现的慰安所规定的内容基本一致。〔麻生彻男：《上海より上海へ》，第16页〕



2 图为东沈家宅的沈月仙老人（左一）正在作证。当时她家菜地就在慰安所边上，一天，她的父亲一早去自己家的菜地时，竟被杨家宅慰安所的日本哨兵开枪打死。由此可见当时日军对慰安所看守之严密。〔苏智良1995年摄〕



3 据东沈家宅的老人们回忆，这间屋曾是杨家宅慰安所的专用烧水屋。今已被拆除。〔苏智良1995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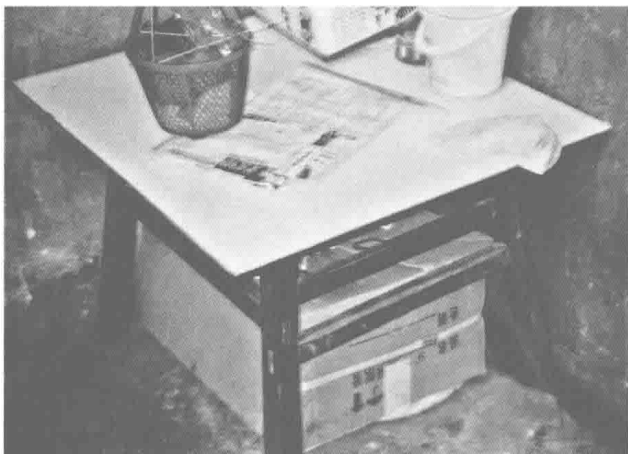
1



2



3



4

■ 1 图为杨家宅慰安所使用的装豆酱的木桶。上面依稀可见“若松”的日本商标。日本投降后，杨家宅慰安所周边的居民将其捡回，当做米桶。〔苏智良 1997 年摄〕

■ 2 杨家宅慰安所放木炭用的火钵，后来成了沈美娣家的粪缸。今存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资料馆。〔苏智良 1996 年摄〕

■ 3 从杨家宅慰安所旁的小河中，居民经常会捞到日本兵用的饭盒、酒瓶等，这是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从东沈家宅居民家中征集的日本清酒瓶，现藏于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刘蕊 2014 年摄〕

■ 4 这张小桌有些年头了。据老人们回忆，当年日军士兵如果早到，而慰安所还没开门时，他们经常到沈美娣家的这张小桌旁赌博。〔苏智良 1999 年摄〕



1



2

1 东沈家宅的居民史富生指着东沈家宅 61 号说，这里就是原来杨家宅慰安所卫生室的位置。杨家宅慰安所的 10 幢木屋，被日军在战败撤退时放火烧毁。〔苏智良 2000 年摄〕

2 图为东沈家宅农民史留留老人。当年他曾被日军抓去，到村庄的东侧协助日本工兵建造杨家宅慰安所的房子。史留留老人回忆：“我亲眼看着日军将东头的房子全部拆毁后，造起了这照片上的日本式木屋，我也曾做过一点活。你们叫慰安所，我昵叫它‘日本堂子’。里面的女人有朝鲜人，也有中国人，但所有的女人都穿着和服。进进出出的全是日本兵，有时是坐汽车来的，他们经常喝酒。慰安所吃用的水，不是像我昵一样吃河滨水，是去挖了井，（用机械）从地上揪出来的。里面还有个 小庙，日本人常常双手合十，鞠躬。”〔苏智良 1994 年摄〕



3

3 杨家宅慰安所使用过的不锈钢碗。后来被史留留捡回了家，一用就是半个世纪。图为 1999 年，韩国国家电视台 KBS 的工作人员在拍这个历史证物。〔苏智良 1999 年 5 月 28 日摄〕



4

4 日本日军罪行调查团在团长山内小夜子女士（前排左三坐者）带领下，来到史留留老人家，听他讲述日军杨家宅慰安所的往事。图为当时的合影。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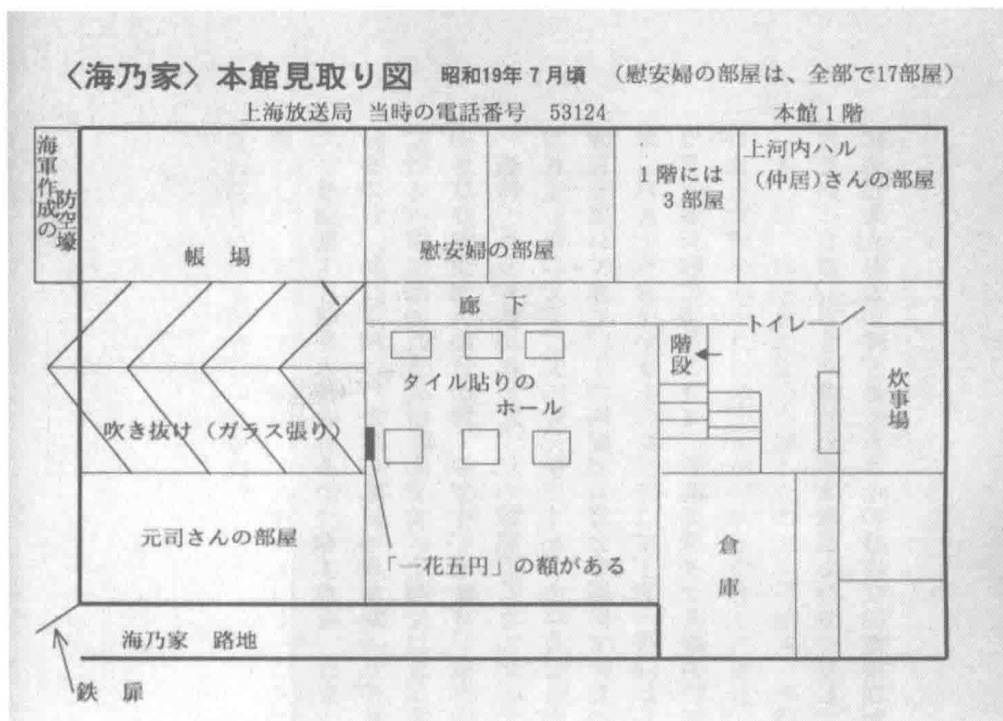
1 图为当地居民在讲述日军慰安所的往事。他们记得，那时垃圾堆里有许多安全套。〔苏智良 1999 年 2 月 24 日摄〕

2 图为“海乃家”慰安所老板与“慰安妇”的合影。从穿着上看，她们有的穿着和服，有的穿着旗袍。这是日本海军专用的“海乃家”慰安所的集体照。〔华公平：《従軍慰安所「海乃家」の伝言》，日本機関紙出版センター 1992 年 8 月版，第 48 頁〕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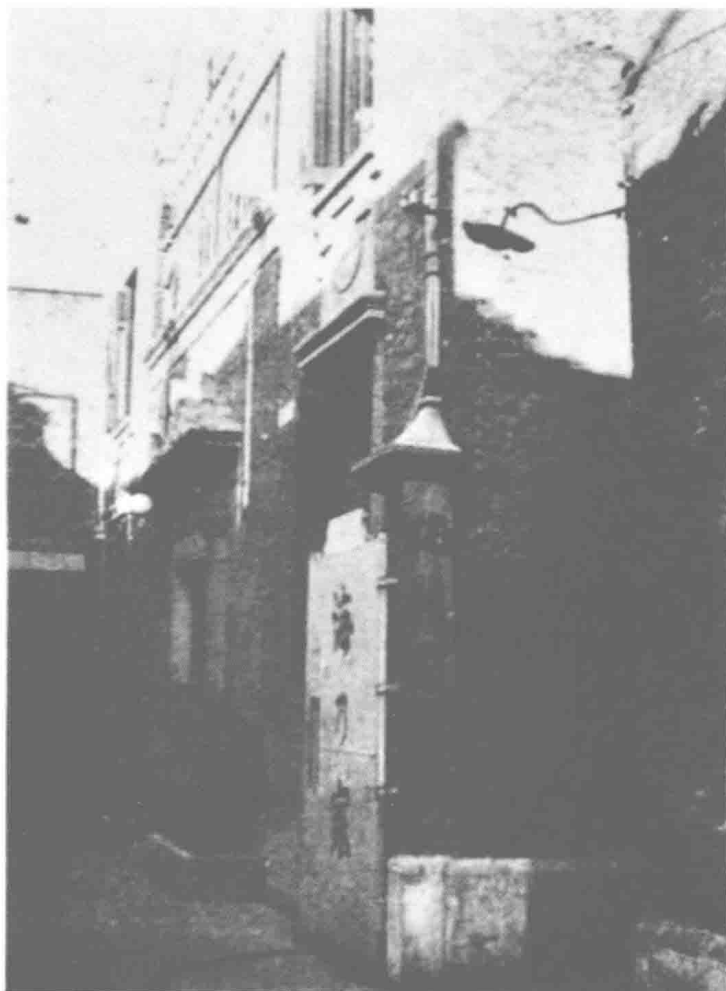
3 “海乃家”是日本驻上海的海军全权委托坂下熊藏经营的慰安所。坂下熊藏 1898 年出生于和歌山县，曾加入日本海军，退役后未回日本，而是在沪开设“煮豆屋”谋生。海军方面找到他，希望与他合作建立慰安所，这就是“海乃家”。图为“海乃家”平面图。〔华公平：《従軍慰安所「海乃家」の伝言》，第 60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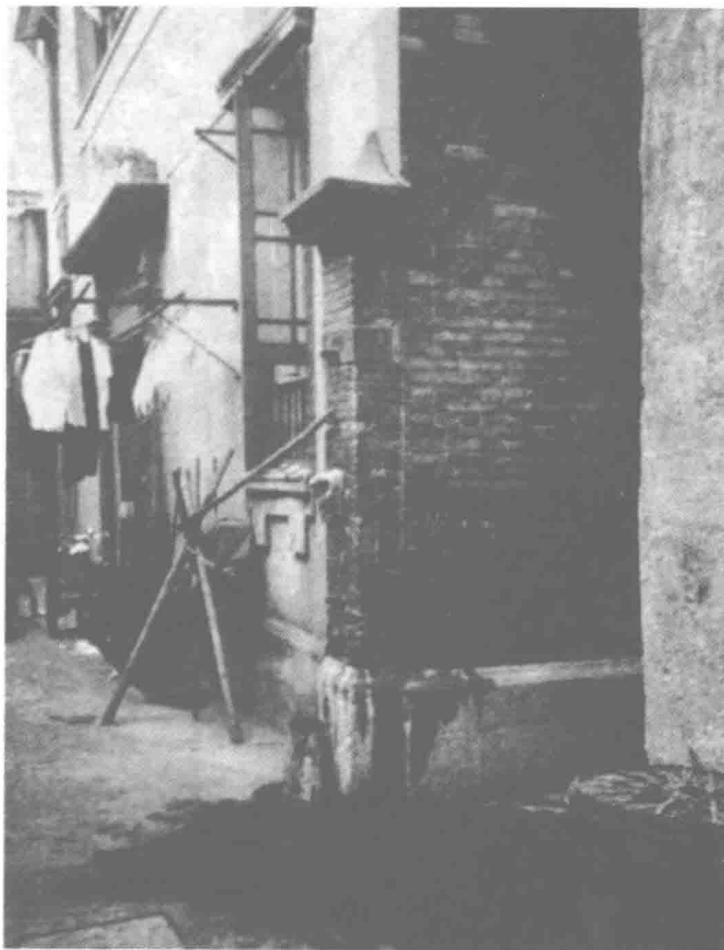
3

1 在海军的配合下，坂下熊藏对公平里 12 号整幢房屋进行了内部修整。公平里原与旁边的川本里（今公平路 411 弄）相通，日军为安全起见，将通往川本里的道路封死，在从公平里弄堂进入 12 号“海乃家”的地方，新安装了大铁门。如今这扇大铁门早已荡然无存，但墙上铁门的铰链尚在。图为当年的“海乃家”。〔华公平：《従軍慰安所「海乃家」の伝言》，第 81 頁〕

2 “海乃家”一楼有大厅、经理室、厨房等，西侧有 3 间“慰安妇”的房间，加上二楼的 14 个房间，共有 17 个“慰安妇”房间，每个房间约 12—16 平方米。二楼的当中是个大厅，供宴会使用。1939 年，经过装修后，“海乃家”便开张了。图为华公平 1990 年重返上海时所拍摄的海乃家原大门处，他说和以前相比几乎没有变化。〔华公平：《従軍慰安所「海乃家」の伝言》，第 80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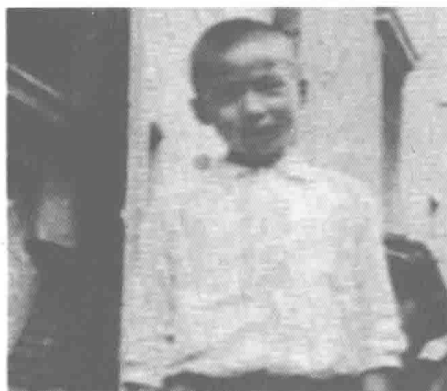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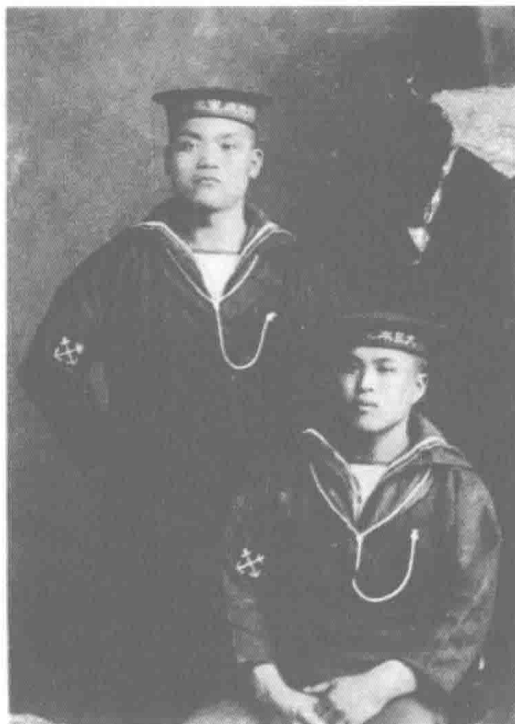
2



1



3



2

1 “海乃家”的一楼大厅里贴有全部“慰安妇”的照片，并贴着“一花5日元”的纸条。慰安所规则指出，付钱须用军票。图为“海乃家”的管理者在虹口公园游玩。〔华公平：《従軍慰安所「海乃家」の伝言》，第67頁〕

2 日本籍“慰安妇”，多是老板坂下亲自去日本招募的，因此坂下熊藏几乎每年要到日本去三次。照片为坂下（站立者）在海军服役时的照片。〔华公平：《従軍慰安所「海乃家」の伝言》，第73頁〕

3 1940年，“海乃家”拥有日本“慰安妇”10人、朝鲜“慰安妇”10人、中国“慰安妇”20人。图为华公平的二哥在慰安所留影。〔华公平：《従軍慰安所「海乃家」の伝言》，第60頁〕



4



5

4 “海乃家”的经营一直延续到日本投降。1946年3月，坂下熊藏全家乘“丰荣丸”轮返回日本。坂下熊藏到了晚年又回到了煮豆为生的生活，1991年他在家乡辞世。图为刊登着“海乃家”慰安所故事的日本文杂志封面。

5 坂下熊藏之子坂下元司（化名华公平）于1944—1945年间，在上海协助其父经营，目睹“慰安妇”的种种惨状，事后倍受良心的谴责，1991年10月重返上海，寻找当年的遗迹。他回忆说，“海乃家”那幢房子的房间和结构与慰安所时代几乎没有变化。坂下元司回国后写成《従軍慰安所「海乃家」の伝言》，并向新闻界公开了他所知道的慰安所内幕和罪行。图为坂下元司在原“海乃家”建筑前留影。〔华公平：《従軍慰安所「海乃家」の伝言》，第135頁〕



1 “当时的日本人包括慰安所老板全家，对我们中国人都是穷凶极恶的。”公平里6号的老伯（1995年近70岁），回忆往事时仍然不能释怀。图为“海乃家”相关人员在虹口公园的合影。〔华公平：《従軍慰安所「海乃家」の伝言》，第55頁〕

2 坂下元司对“海乃家”的受害者还有记忆。他说，有的“慰安妇”在苦境中吸上鸦片；有的因偷同伴屋子里的财物而被殴打后逐出，死在路边。“在鹿儿岛开往冲绳的运输船上，乘有十多名朝鲜慰安妇，当受到美军飞机攻击时，我游上了奄美大岛，没有去帮助那些女人。”“男人从军是当然的事情，生命没有保证，在死之前，体验女性也是当然的事，这种思想很流行。”图为“海乃家”慰安所所在的公平里。〔苏智良1995年摄〕



2



3

3 1943年，日本海军当局决定开设“海乃家”分馆。对此，坂下元司还有清晰的记忆：“海乃家”分馆设在离公平里本馆约一公里处，房子的外观像是美国风格的小型旅馆，为三层建筑，周围没有花园，进门是一个大厅，这个西式建筑设备较好，有热水汀。图为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确认的“海乃家”分馆的建筑。〔苏智良2003年摄〕



1



2



3

1 家住公平里8号的罗老妈妈（1995年74岁）回忆说：“那年我20岁，上阳台晒衣裳，我家正对着12号的‘海乃家’，有时晒衣裳时朝北面的‘海乃家’看一眼，马上就会受到日本人的训斥。但是，没有人的时候，我还是会朝‘海乃家’看看，有时就会看到穿旗袍样子的中国女人，好像生着病，在灶披间（沪语，指厨房）偷吃冷饭团。”图为“海乃家”分馆之后门处。〔苏智良2003年摄〕

2 坂下元司的母亲（中立者）和日本海军士兵等在“海乃家”分馆门前合影。〔华公平：《従軍慰安所「海乃家」の伝言》，第41頁〕

3 坂下元司的母亲和日本“慰安妇”在“海乃家”分馆合影。〔华公平：《従軍慰安所「海乃家」の伝言》，第86頁〕

1 坂下元司的另一个名字就叫华公平，显然他的名字是为了纪念“海乃家”设立在公平里而取名的。这是华公平在日本报纸公开“海乃家”慰安所的报道。〔《宣传研究》1992年6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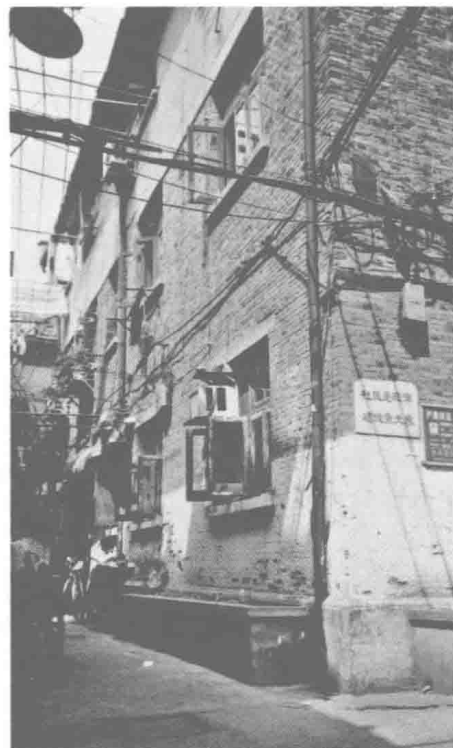
2 位于东长治路609弄3号的“海乃家”分馆是一幢3层建筑，规模也不小。〔苏智良2003年摄〕

3 在《支那在留邦人人名录》第32版中，记载着“海乃家”分馆的地址。经调查，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确认“海乃家”分馆为东长治街609弄3号。图为海乃家分馆的房门。〔苏智良2003年摄〕

4 慰安所时代的木门被居民们完好地保存下来。图为“海乃家”分馆的内景。〔苏智良2003年摄〕



1



2



3



4



1



2



3

1 原“海乃家”分馆的大门，依旧保持原来的风貌。随着城市改造，如今“海乃家”分馆的建筑已荡然无存。〔苏智良 2003 年摄〕

2 “海乃家”分馆慰安所时代的厕所，抽水马桶依然保存完好。〔苏智良 2003 年摄〕

3 图为“海乃家”分馆中“慰安妇”和士兵使用过的浴缸，至今保存完好。〔苏智良 2003 年摄〕

■1 四川里 63 号的内部结构至今仍保持原样：厕所是木板造的；装着滑道的移门上还残存着当年日本相当普遍的 5 厘米左右的拉手。图为四川里 3 号原慰安所的窗户。
〔苏智良 1999 年摄〕



■2 四川北路 1604 弄四川里曾有 3 个慰安所。“六一亭”在北四川路四川里 63 号，为海军慰安所。家住日本久留米市的近藤老人，学生和青年时代是在上海度过的，根据他的证言，四川里弄口的 63 号，19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日侨经营的酒吧，一·二八事变后实际上是接待日本军官的慰安所，名为“六一亭”。“六一亭”入门后是个大房间，当时用来提供酒菜和咖啡，后面是厨房，旁边有螺旋形楼梯通向二楼、三楼，当时只有店员和海军军官才能上楼。楼上为一长排房间，共有三十余间，每间七八平方米。据近藤所言，这里的“慰安妇”全是日本女子。图为“六一亭”内的螺旋式楼梯。
〔苏智良 1998 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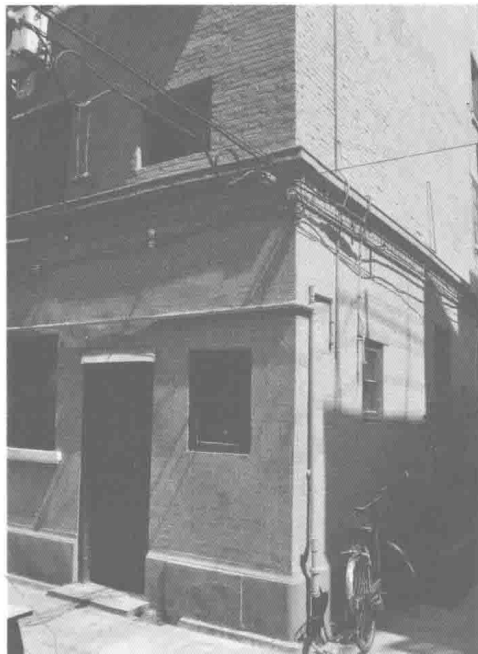


2



3

■3 四川里 63 号 3 楼的房门上，还保留着当年插放“慰安妇”名牌的牌框。〔苏智良 1998 年摄〕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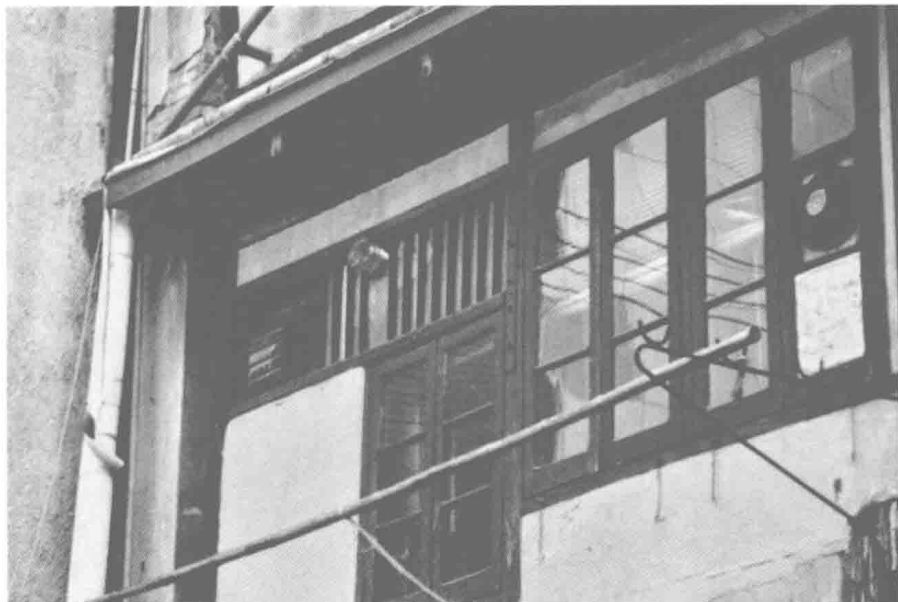
3

1 四川里 63 号后面的 52 号是一幢 3 层建筑，当年日侨网罗了十多名日本少女，开设了为日本军官服务的慰安所。现在这里底楼是四川街道图书馆和川北邮社，楼上仍是民居。当年窗口外的花架至今犹存。图为 1604 弄弄堂。〔苏智良 2009 年摄〕

2 根据周围居民回忆，四川里 52 号 3 楼上的这个有木质围栏的窗式小阳台，为当年供日军娱乐用的“点歌台”。士兵们要求“慰安妇”在这扇窗户前唱歌。〔苏智良 1998 年摄〕

3 四川北路四川里 1604 弄 41 号实际上是一条支弄，两侧各有一幢 3 层楼房，原来这里是浙江兴业银行的职工宿舍。八一三事变后，部分中国人出外逃难了。日军占领该地后，即将未出走的中国人全部赶走，霸占了原第三支弄的 29 号至 36 号及第四支弄的 41 号至 48 号两长排合计 16 个门号的楼房，翻造整修为慰安所，并将 29 至 36 号的前门封堵，前后两排统一由第四支弄出入，再在 29 号屋后角和 41 号屋前角两边山墙角外沿建一铁门，只保留排首幢门号 41 号，而将 15 个门牌取消。这里也曾是个大型慰安所。〔苏智良 1998 年摄〕

1 上海居民徐祖恩（1994年82岁）住在四川北路四川里1604弄41号的后面。他回忆说：当年四川里后门被日军封死，只有前门才能进出，弄口有个岗亭，由日本兵守卫，除日本人以外，只有居住在这里的中国人才能入内。日本人在41号前的空地上挖地一丈余，修了防空洞，并在防空洞上面造了一个和式亭子，挂着4个大灯笼。靠东侧的那幢，进门第一层是将校专用的酒吧，旁边有较为宽敞的日本式大浴室，供“慰安妇”和日本军人洗澡。酒吧侧面是宽达2米的楼梯，沿楼梯到2楼，是分隔成一个个小房间的“慰安妇”的“服务”之地。图为41号2楼的窗户。〔苏智良1998年访谈并摄影〕



1

2 上海居民陈炳荣（1924年生）全家原住在浦东其昌栈大街（今为钱仓路）350号，这是个颇有规模的大宅院，当年曾被日军强占为慰安所。中间的二层大建筑有38个房间，四周是平房。这是其父长年从事商贸积累资金建造的，被称为浦东最好的民宅。图为钱仓路350号的平房。〔苏智良1998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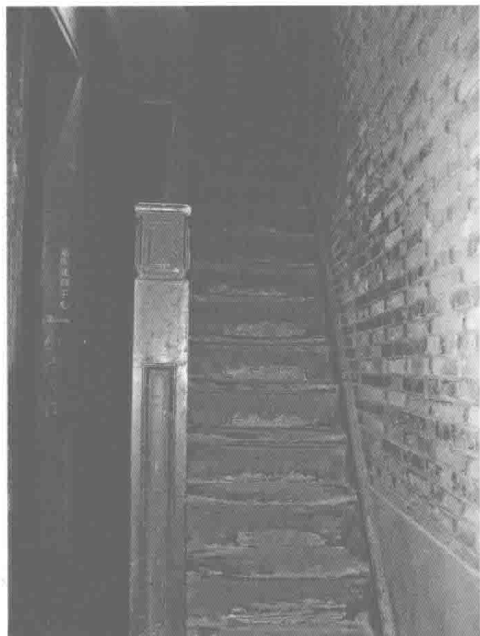


2

3 据陈炳荣家当年的管家黄文忠回忆，日本人来了以后，逼着他到慰安所做杂务，但不给工钱。慰安所里全是中国女子，“慰安妇”每星期只能洗一次澡，每天吃同样的饭，即一个饭团和洋葱豆腐汤。慰安所里的中国姑娘没有人愿意干那种事情，但女孩子没法反抗，有的姑娘遭到毒打还受了伤。黄文忠每天的工作是采购食品和日用品等。根据他回忆，其昌栈慰安所还只是个分所，其总部设在四川北路横浜桥堍。图为钱仓路350号其昌栈慰安所旧址。〔苏智良1998年摄〕



3



1



2



3

■1 其昌栈慰安所由两名日本侨民当老板负责管理（一男一女），一名中国妇女从旁协助。这名中国妇女年龄约30岁，精通日语，充当翻译。有时，日本官兵过多时，她也被老板逼迫接客。慰安所内尚有数名工作人员，多为中国人。黄文忠当年就负责运送大米、油、盐、酱、醋等物品。厨师原为日本人，后改为中国人。这批工作人员与“慰安妇”之间基本不接触。用餐时，“慰安妇”在房内，而勤杂人员则在固定地点。图为其昌栈慰安所旧址内通向二楼的楼梯。〔苏智良2000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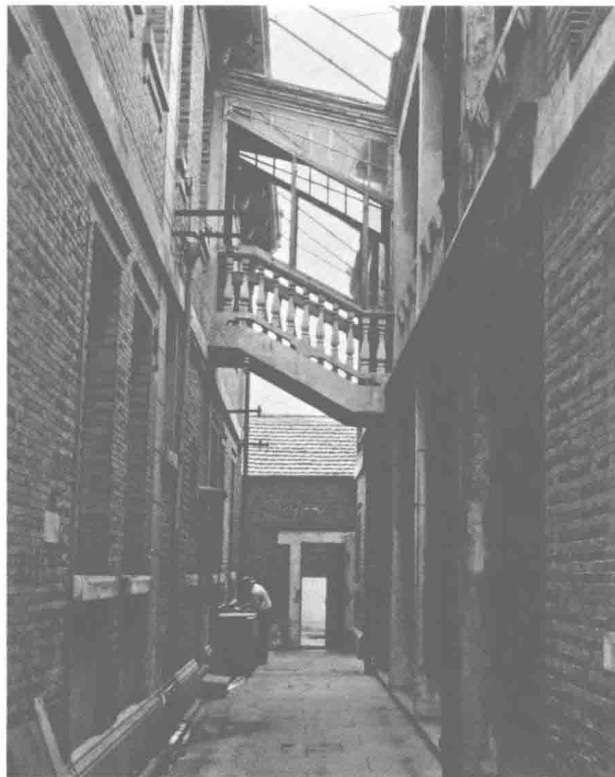
■2 根据黄文忠回忆：其昌栈慰安所的“慰安妇”约30至40人，各有编号。日本人将容貌娇好、身体健康的妇女编成一系列号码，将条件差的妇女编成另一列号码，身体不好等无法再用的妇女同样有编码。这批已无法继续“使用”的受害者不久就会消失，然后又有一批“新面孔”出现。因此，“慰安妇”人数虽然时有增减，但总数仍保持在三四十人。图为该慰安所管理室的壁炉。〔苏智良2000年摄〕

■3 每逢星期六下午及星期天，大批日军官兵就来到其昌栈慰安所，有时甚至需要排队。一般士兵每人逗留20至30分钟，军官通常可以留宿。不管采取何种形式，日军官兵都需要向老板支付一定数量的钱款。他们一般身着军装，或单独，或集体前来。这间屋子是军官慰安所的“慰安妇”体检室。〔苏智良2000年摄〕

1 陈炳荣证言：1943年，日本人突然到此，将房客全部赶走，陈家也被赶到主楼南面的平房内，然后日军在这里开设了两家慰安所。中心主楼被日本人开设为军官慰安所，四周的平房是士兵慰安所。慰安所管理者是两个日本侨民，而“慰安妇”则都是中国人，有二十多人，大多说苏北话，最多的时候，两个慰安所的女子有四十多人。日本士兵只被允许白天进入，晚上慰安所则接待日本军官，如果晚上军官少的话，士兵也会偷偷进去。图为其昌栈慰安所遗址两幢楼之间的通道。〔苏智良 2000 年摄〕

2 20世纪90年代以来，曾是中学教师的陈炳荣，常给世界各国参观者讲述其昌栈慰安所的故事。〔苏智良 2004 年摄〕

3 这幢曾被称为战前浦东最好民居的建筑，已被浦东新区政府予以保护，并挂上了“陈氏住宅”的铭牌。〔苏智良 2005 年摄〕



1



2



3



1

■1 江湾地处中日两军“八一三”激战的中心地区，因此，很多中国居民都已逃亡。日本陆军便将一些较为坚固、宽敞的房屋拨给日侨妓院老板，以合作方式开设慰安所。1938年初春，有70名朝鲜女子被送达上海，后又有大批朝鲜女子到达。一时间，江湾镇出现了十余家日侨经营的慰安所。图为江湾镇万安路旧屋，今均因老城改造荡然无存。〔苏智良1995年摄〕



2

■2 图为当年日侨在江湾经营的一家慰安所。该所门首贴有一副对联，上面用日语写着：“热烈欢迎圣战大胜的勇士，请接受大和女子奉献身心的服务。”大门两边有精致的铁窗花，入内是个大院子，二层建筑，一排落地红漆大门，显示出当时地方富绅的气派。〔麻生微男：《上海より上海へ》，第9頁〕



3

■3 据史料记载，江湾镇万安路上有来自长崎的日侨松下芳松开设のみよし（“一二三”之意）陆军慰安所，当时地址为万安路777号；有来自日本香川的泷田良助开设的朝日楼慰安所，地址为万安路761号；有原籍香川的泷端良介在万安路759号开设的平和庄陆军慰安所。这些慰安所都在实地调查中得到证实。图为日军在江湾慰安所前合影。〔麻生微男：《上海より上海へ》，第19頁〕

■ 1 这家贴有对联、后被新闻媒体广为刊载的慰安所现在在哪里？苏智良教授根据照片和麻生彻男的文字记载所显示原来民居应是地方富绅的信息，到江湾镇调查。万安路745号主人严秋泉，是江湾镇的首富。他的宅邸在战时曾被日人抢夺，作为慰安所使用。解放后745号成了江湾镇的公安派出所，大门入口找不到当年的痕迹。但宽敞的庭院两侧各有一棵挺拔的古树，以及两三处假山石装饰的角落。庭院的后面是一幢老屋。其格局与照片基本一致，只是落地的木门下面已改建为半墙，但那一长排红漆的天窗则面貌依旧，甚至连中间的落水管也保持着旧照中的原貌。〔苏智良1997年摄〕



1

■ 2 这幢二层木结构的房屋，现在进门是接待室，地上仍是当年铺就的花砖，两侧是厢房，有木梯通往二楼。二楼正中的朝南房间，阳光明媚，外面有一个很大的晒台。西面的晒台已经改建了，而东侧的晒台却仍是陈旧模样。东晒台的铁窗花与旧照上的铁窗花完全相同。〔苏智良1996年摄〕



2

■ 3 万安路745号现已是江湾镇派出所，大门的景象早已面目全非，几经变化了。〔苏智良1994年摄〕



3



1

■1 据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的调查，解放后这里还有一名原“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留了下来，她住在万安路779号，名叫根娣，是苏北籍女子。根据其房东杜佩华（1997年72岁）回忆，根娣租住的是后面一间小屋，里面也没有什么家具，她战后年龄30岁左右，与一个比她大20多岁，只有一只眼睛，名为阿宝的男人结婚。1948年春，根娣好不容易有了身孕，但在分娩时因难产而亡。图为万安路慰安所旧屋。〔苏智良1995年摄〕



2

■2 万安路774号的吴宝初老人（1919年生）、万安路720号的李阿珠老人（女，1920年生）等证实说，万安路769号是慰安所，名为“陆军慰安所”，老板是个日本浪人，30岁左右，有一妻室，但没有子女，中国话说得相当流利。所内的“慰安妇”有10多名，都是中国人。图为万安路769号慰安所旧屋，今已拆除。〔苏智良1997年摄〕



3

■3 万安路588号至594号，曾是江湾镇上规模较大的慰安所。这排房子原是严泉秋家开设的酱园，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八一三事变后，严家避难外逃，日军占据严家后开设慰安所。管理者也是日本浪人。日军对严家房屋进行了改建，原来的房间全部改为日式小屋，一式拉门拉窗，室内铺榻榻米，共有30间。后边的平房则改做厨房、仓库和下人居住之处。中间的夹弄改为卫生间，安装日式抽水马桶和洗澡设备，天井里挖了防空洞。慰安所开张后，“慰安妇”多数是日本人，少数为朝鲜人，均穿和服、木屐。还有一些中国姑娘做“女招待”。图为万安路日军慰安所遗址。〔苏智良1995年摄〕

1 峨眉路 400 号是日本海军下士官兵集会所，也是日本海军建立的慰安所。经过七十年的风雨，原慰安所的售票处仍保存完好。〔苏智良 2014 年摄〕

2 山中三平在《上海陆战队故事》中写道：“在陆战队，下班后除了去队内娱乐慰安机构外，军官们还去司令部旁的海军俱乐部，下士以下的士兵们大多都去密勒路的集会所……下士官兵集会所以前在老靶子路，……但如今又有新建的地方，这里也是相当宽敞、设备俱全的三层楼摩登集会所。”这一建筑战后成为大公职业学校的校舍，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军用设施。现在是峨嵋路 400 号。〔（日）山中三平：《上海陆战队物语》，《改造 上海陆战胜利临时增刊号》，1937 年 11 月〕

3 峨眉路 400 号日本海军直营的陆战队慰安所规模颇大。根据上海市民周新民先生连续数年的调查，许多旧物尚在。图为该慰安所大门遗迹。〔约摄于 2003 年，周新民提供〕

4 图为上海老城梦花街上的慰安所遗址。〔苏智良 1996 年摄〕



1

海軍下士集会所

「陸戦隊では、勤務から離れると、隊内での娯楽慰安機関のほか、に将校は司令部の隣の海軍クラブ、下士以下は密勒路の集会所へと大がい出かけていく。……下士官兵集会所は、以前老靶子路にあつたが、……今のところに新築されたもの、ここもなかなか広くて設備の行き届いた三階建てのモダン集会所である。」（山中三平「上海陸戦隊物語」『改造 上海戦勝記念臨時増刊号』1937）終戦後は大公職業学校の校舎となり、新中国成立後は軍の施設。最近になって取り壊された。峨眉路400号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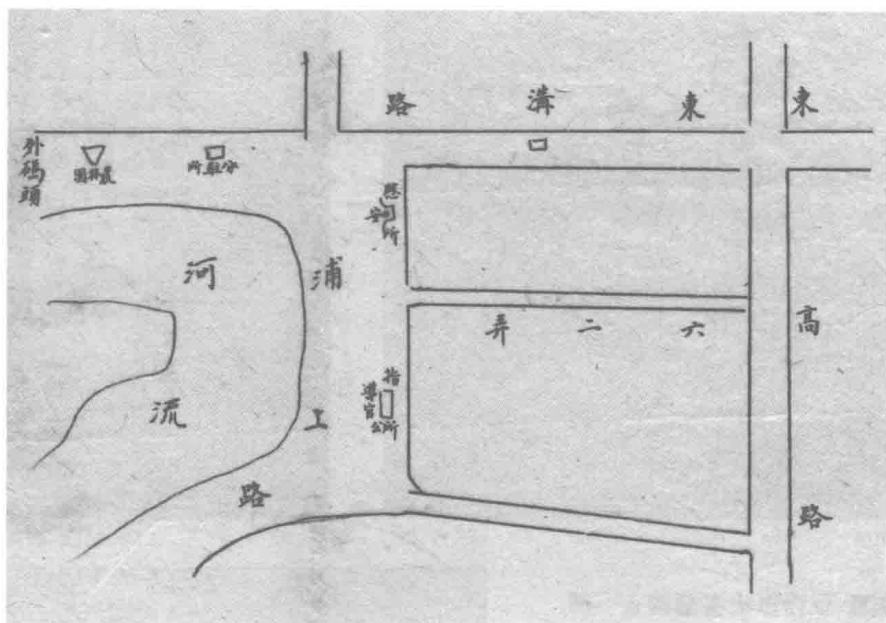
3



4

為呈報事據高橋區分局呈稱該區浦上路慰安所地自庚辰年呈報於本月十日有市九路水
 長顧保清更憲 隊東漢海路分局所呈請陸軍部核准設立之慰安所地在本縣浦上路六號開投
 慰安所地有數畝地係由第七團及工兵各營已於庚辰年冬月所購得之客人遺棄在該地及軍用子
 華人既不願將子地也該地係由第七團及工兵各營已於庚辰年冬月所購得之客人遺棄在該地及軍用子
 於工部局外陸軍部核准設立之慰安所地係由第七團及工兵各營已於庚辰年冬月所購得之客人遺棄在該地及軍用子
 所呈報地查予情附呈呈請核准設立慰安所地係由第七團及工兵各營已於庚辰年冬月所購得之客人遺棄在該地及軍用子
 呈報地查予情
 市長 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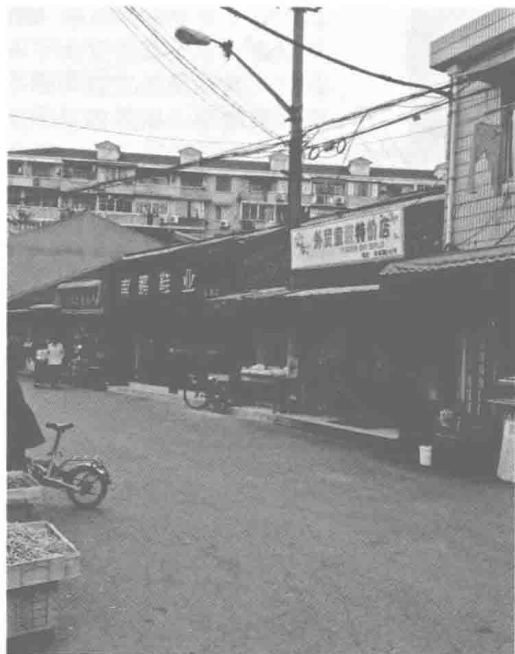
附呈 呈圖一份 呈單二份
 上海特別市警察局局長盧英同



1 日军在上海各处均设立慰安所。当时的浦东东沟还是农村，日军也在这里建有慰安所。图为伪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卢英同意建立浦上路慰安所，致伪市长陈公博的呈文。〔原件藏上海市档案局，转引自金炳华主编：《抗日战争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166页〕

2 图为浦上路的日军慰安所示意图。图中可见慰安所的南面有个日军设立的“指导员公所”，其目的是指导和保护慰安所的设立与营运。〔上海市档案馆藏〕

3 浦上路慰安所约位于今浦东东高路185弄。图为东高路鸟瞰图。〔李君益2014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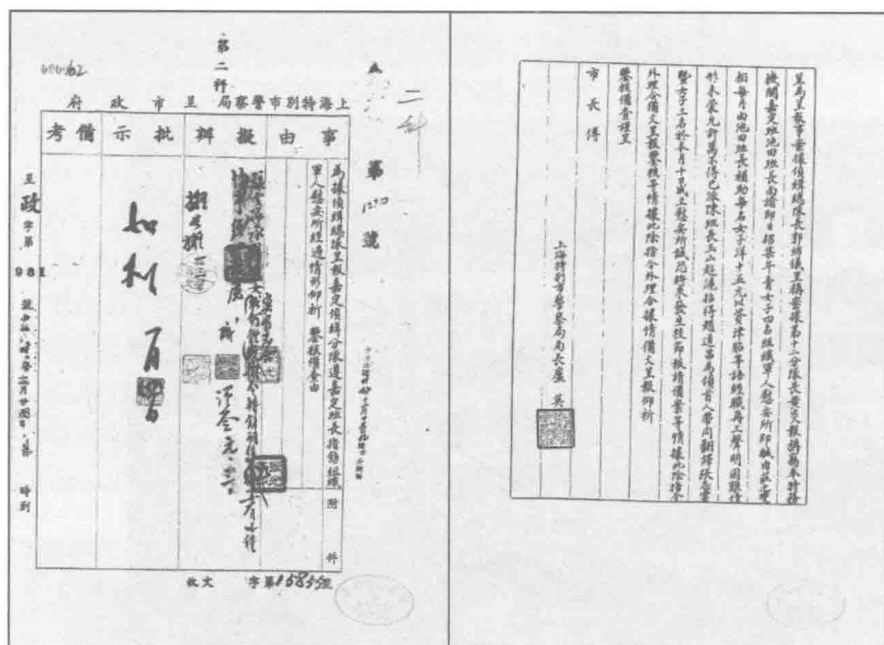
1



2

1 根据多次实地调查，浦上路慰安所很可能在东高路的南鹏鞋业处。图为“南鹏鞋业”店址。〔李君益 2014 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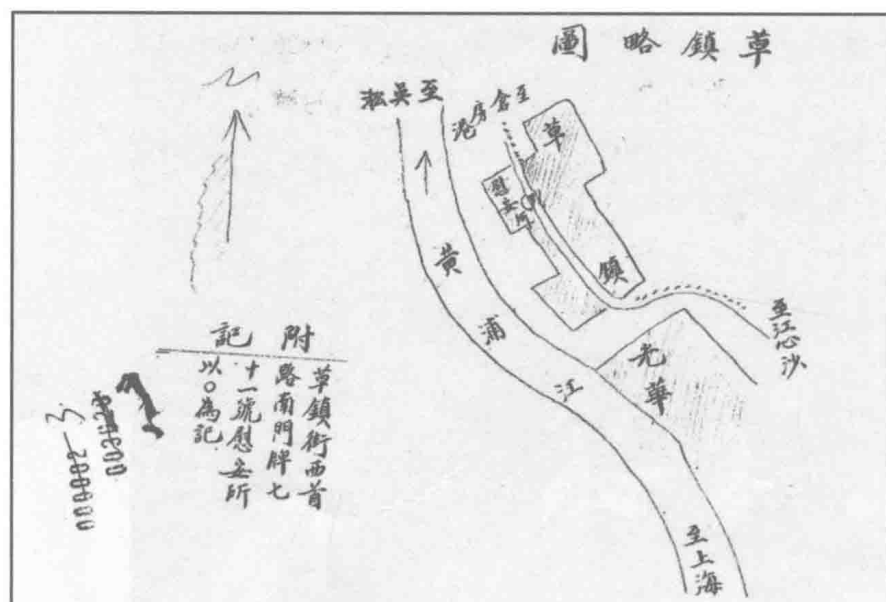
2 日本老兵 B 证言，他曾经在共产党抗日根据地强奸女子 7 人，其中有抗日战士的妻子、工作人员的妹妹等。这些当然是报复性地侮辱。有时还将少女和已婚女子抓来，成为日军的专用性奴隶。据 B 所知，他所在的部队至少开设了 3 个慰安所。图为上海浦东庆宁寺的慰安所遗址，这是设在石库门里的慰安所。〔苏智良 1999 年摄〕



3

3 1939 年 12 月，日军嘉定班池田班长要求伪政权“召集” 4 名中国女子建立慰安所。伪政权于 10 日在嘉定设立慰安所。图为伪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卢英致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的呈文。〔上海市档案馆藏〕

4 在日军的强烈要求下，杨金水等人诱拐中国妇女在浦东草镇设立慰安所，地点为南塘宅 37 号，其中有 5 名“慰安妇”。这个 1939 年建立的慰安所“纯系供给友军方面，其他概不招待”。这是草镇慰安所的位置示意图。〔上海市档案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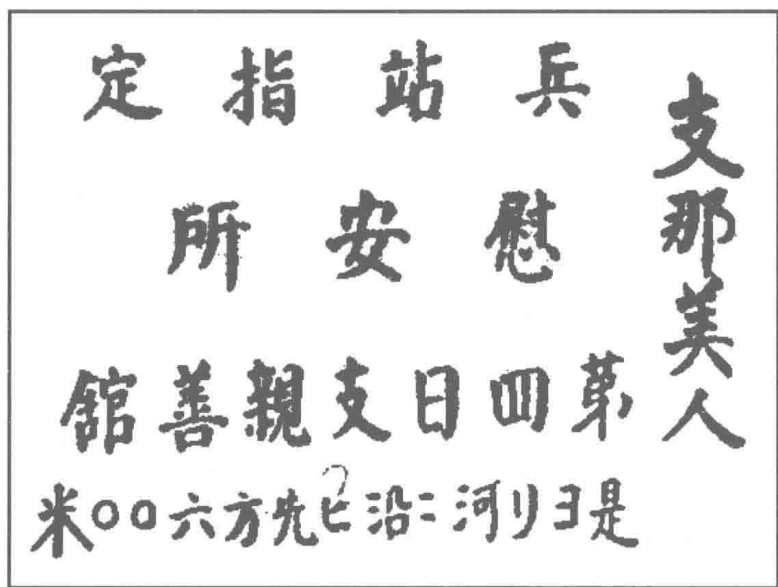
4

（二）南京的日军慰安所

与上海相同，南京的慰安所也是在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直接指挥下开设的。

相关史料明确显示了日军内部设立慰安所的流程细节：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上村利道在日记中记述，1937年12月28日，“审议第二课关于南京慰安所开设问题的提案”^{〔1〕}。上海派遣军军医部立即接手检查南京“慰安妇”身体状况的工作。军医部的渡边大尉在该日记载，“送走丰岛大尉，和某某联系明天对78人进行梅毒检查”，这表明上海派遣军已确定了第一批南京“慰安妇”人选。他接着写道，“下午一时，小出少佐去某处参加会议（关于慰安所的会议）”。“梅毒检查医官某某说佐伯中尉、平尾少尉要来。明早与他们商议梅毒检查”；“下午五点和小口大尉共同视察第一楼、第二楼和四达里、瑞芳泉”。这就是南京的第一批慰安所。

南京是日军设立慰安所较多的城市，无论城乡，都有这种“合法的强奸中心”。2003年，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邀请来自平壤的受害者朴永心回到南京，确认了她当年的受害地——南京利济巷慰安所。这个地处南京市中心的利济巷慰安所遗址的去留问题，已争议了多年，南京市政府于2014年决定予以保护，并设立旧址陈列馆。



南京的日军慰安所种类繁多。这是南京第四日支亲善馆的广告，它明确写着“亲善馆”是日军兵站指定的慰安所，地点在沿河600米处，里面是中国“慰安妇”。该广告的照片保存在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的档案文献中。贝德士在附记中写道：“这个特殊的两幅大牌示悬挂在中山北路，距新街口圆环不远，正竖立在一所女子学校对面，而宪兵司令部也在附近。”〔章开沅教授1996年提供，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

〔1〕（日）南京战史编辑委员会编：《南京战史资料集》，（东京）偕行社1989年版，第280页。

■1 傅厚岗慰安所是日军将校级的高级慰安所。经调查确认，其开设在原民国要员的公馆中，楼高三层，慰安所负责人叫大西。图为傅厚岗民国公馆旧址（今傅厚岗28号）。〔苏智良1996年摄〕

■2 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的川中洁一回忆说，当时日军每个联队都建立了慰安所。黄泥岗的这幢老房子，是日军鼓楼慰安所的一部分，这里曾是日军在南京市中心的慰安所之一。〔苏智良1995年摄〕

■3 利济巷地处南京市中心，日军在这里设立一些大型慰安所。图为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与南京大学高兴祖教授，在利济巷东云慰安所遗址调查时的合影。〔1999年8月14日摄〕



1



2



3



1



2



3

1 1939年8月，17岁的朝鲜少女朴永心被强行送到南京，成为东云慰安所的日军性奴隶，她被迫改名“歌丸”。图为利济巷日军慰安所的建筑。〔苏智良2004年摄〕

2 在慰安所，朴永心饱受欺凌，身上落下多处伤疤。2003年11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邀请朴永心重返中国，对其受害事实进行实地调查和认定。图为该中心主任苏智良、日本学者西野瑠美子等在南京车站迎接朴永心老人。〔沈晓青2003年摄〕

3 朴永心老人重回利济巷，立即就认出2楼的一间屋子就是当年她遭受凌辱的受难地。为了活命，她在慰安所学会了吸食鸦片。1942年5月，朴永心随日军到了缅甸和云南。图为朴永心在云南寻访当年的慰安所。〔朱弘2003年摄〕

■1 1942年5月，朴永心被日军强行带到缅甸和云南。在腾冲的慰安所，她受尽凌辱，在日本兵的强逼下，被迫拍摄了裸体照片(上坐者)。这些照片被细心的腾冲照相馆的老板保存了下来。〔云南保山方志办陈祖樾提供〕

■2 腾冲照相馆老板的儿子熊维元保存着他父亲交给他的裸体“慰安妇”照片的底片。〔陈祖樾提供〕

■3 1944年在滇西松山激战中，怀孕的朴永心与其他姐妹终于逃脱魔爪，被中国远征军解救。这张“怀孕的慰安妇”照片，可以说是“慰安妇”题材最著名的照片之一。该照片由美国随军记者拍摄，时间是1944年9月3日。原件保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陈丽菲、苏智良：《追索——朝鲜“慰安妇”朴永心及其姐妹们》，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页〕



1



2



3



1



2



3

1 在龙陵松山，朴永心与当年带领远征军来解救“慰安妇”的放牛人李正早再度相逢，两位老人感慨万千。
〔朱弘 2003 年摄〕

2 图为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 2002 年赴平壤慰问朴永心老人时的情景。1944 年 9 月 3 日，最后被送到松山腊勳慰安所，躲过炮火和死亡的朴永心，被中国远征军解救，当时她已怀孕。朴永心当年在中国的陆军医院流产后，被送回朝鲜。2000 年，朴永心作为证人出席了东京民间“慰安妇”制度法庭的审判活动。2005 年 8 月 6 日，朴永心老人在平壤去世。
〔刘宝辰 2002 年摄〕

3 多年来，中外学者一致呼吁南京市政府保护利济巷慰安所遗址，并创办“慰安妇”纪念馆，这一倡议在 2014 年有了结果。图为日本“慰安妇”问题研究者西野瑠美子（右三）、中国留日媒体工作者朱弘（右一）等在利济巷慰安所遗址前调查。
〔沈晓青 2003 年摄〕

（三）华东其他地区的日军慰安所

随着战争的延续，日军的慰安所也广泛设置于中国各地。在日军占领的华东地区，包括江苏、江西、安徽、上海、浙江等省市，从大城市到市镇，甚至日军占领的农村，均设立了大批日军慰安所。如杭州、苏州、常州、南通、常熟、如皋、湖州、镇江、丹阳等地，1938年出现了许多慰安所。据《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记载，在镇江，日军将从各村庄抢来的妇女分给军队，“一个女人供15至20人。在仓库周围，只要是太阳照着的合适场所，用带叶的树枝搭个帐子，士兵们拿着盖有中队长图章的所谓的‘红券’排好队，脱下兜裆裤……”^[1]据日本老兵回忆，杭州的慰安所的名称有长生楼、关门亭、鹤屋等；苏州的日军慰安所有大东旅社、新苏台旅社、老苏台旅社、瀛洲旅社、中华旅社、乐乡饭店、祥符旅社、第一旅社、阊门饭店、铁路旅社等等。



陆支密第745号秘密文件，是日本大本营给日军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参谋长关于建立慰安所、募集“慰安妇”的文件，日期是1938年3月4日。〔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藏〕

[1] (日)太平洋战争研究会：《不寻常的最前线》，《朝日文艺》1971年1月；李秉新等主编：《侵华日军暴行总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0页。



1 据日本随军记者报道，日军占领江苏如皋后，立即设立了一批慰安所。日军把几家大民房改建为临时慰安所，在当地强征一些良家妇女，由日军特务机关的翻译负责管理。图为如皋县受害者周粉英老人遭受蹂躏之地——白蒲日军慰安所遗址。〔苏智良 2007 年摄〕

2 图为苏州祥符寺巷 24 号的日军慰安所（解放后遗址为皮市街派出所）。〔苏州日报记者高岩提供，2001 年 1 月 14 日摄〕



2

■1 2000年，苏州日报社曾对苏州市慰安所遗址进行调查，确认了10个日军慰安所：苏州大东旅社（大马路）、新苏台旅社（大马路）、老苏台旅社（大马路）、瀛洲旅社（石路口）、中华旅社（上塘街）、乐乡饭店（观前街）、祥符旅社（祥符寺巷）、第一旅社（鸭蛋桥浜）、阊门饭店（阊门下塘）、铁路旅社（丁家巷，时称“繁乃家”）。“人间天堂”的苏州变成了人间地狱。图为苏州和平街原慰安所遗址。〔苏州日报社提供，2003年摄〕

■2 地处苏州寺后街转角处的和平街65号，曾是日军的慰安所遗址。〔苏州日报社提供，2003年摄〕



1



2



1

1 范学贵先生是研究金坛历史的历史爱好者。他用了多年时间，确认金坛有7个日军慰安所遗址：火巷32号慰安所、丹阳门大街慰安所、大陆饭店慰安所、花街的两个慰安所等。2005年5月22日，日本老兵本多立太郎在金坛谢罪时，当场指认金坛市火巷32号为当年日军的慰安所，并说“这里的中国姑娘最多”。图为火巷32号日军慰安所遗址。〔范学贵编著：《金坛慰安所遗址资料汇编》，2010年印行，封面图片〕



2

2 江苏扬州的“绿扬精舍”是一家著名的旅馆，日军占领扬州后即在此开设了慰安所。根据日军名古屋步兵第六联队的统计，有当地的中国“慰安妇”60人，日本“慰安妇”30人，朝鲜“慰安妇”20人，总数有110人。〔（日）名古屋第六会：《步兵第六联队历史追录》（第2部），1971年私家版，第97页〕

图为该慰安所遗址。



3

3 一名日本老兵回忆，在扬州作战时，上级发来指示：“为了发扬官兵的士气、保持严肃的军纪，我军将派遣慰安妇到你们部队来，希望按期尽快完成合适的慰安设施，特别是在征用当地慰安妇的场合要注意保持卫生。”随着命令的下达，后方送了数十名“慰安妇”到前线来。她们的管理由副官负责。日军接收了扬州银座（繁华街道的名称）一栋三层建筑的大饭店，并将其改造成慰安所。〔（日）名古屋第六会：《步兵第六联队历史追录》（第2部），第97页〕

图为“绿扬精舍”建筑〔2008年摄〕

■1 日军时常抢劫少女作为性奴隶，这从日本士兵方面也得到了证实。1991年，当时的侵华日军老兵，71岁的政木五朗回忆说，他1940年2月应召入伍，在南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通讯队担任卫生兵。当时他只有20岁，没有任何性经验，在老兵的带领下，也经常去慰安所，遇到的是只有十多岁的中国姑娘。〔《朝日新闻》1991年9月5日〕。

南京汤山的这幢房屋，当地居民叫它“戴笠楼”，并证言抗战时期这里就是一个日军慰安所。〔苏智良2006年摄〕



1

■2 日军华中派遣军宪兵队司令大木繁曾向上级报告称，1938年2月，镇江有109名“慰安妇”，要面对15000名士兵，1名女性平均要对付137名士兵。报告明确记载，在2月中旬的10天之中，有8929名日军官兵进入了镇江的日军慰安所，1名“慰安妇”在10天中平均要应对82人。

图为亚洲各地的日本侵略受害者们在香港举行集会。其中有中国的三名受害者。〔苏智良2001年摄〕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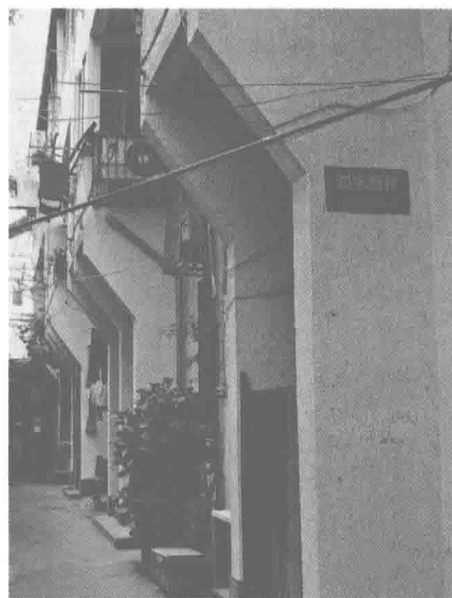
■3 抢动少女作为性奴隶，这从日本兵方面也得到了证实。这是日军在南京设立的一个慰安所的遗址。〔苏智良2006年摄〕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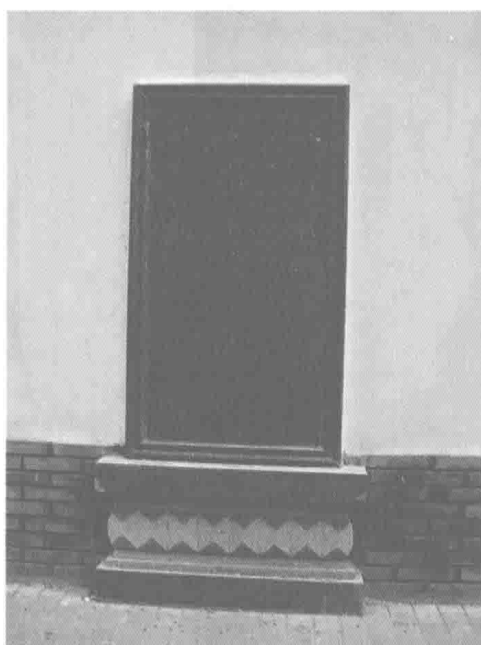
1



2



3



4

■ 1 杭州西湖畔的湖边村，原是风景秀丽的城区，战时这里成了日军慰安所的集中地。〔苏智良 2003 年摄〕

■ 2 图为杭州泗水新村的建筑，日军曾在此建立慰安所。〔苏智良 2003 年摄〕

■ 3 杭州泗水新村慰安所是日侨开设的“关门亭”慰安所。据调查中居民证言，门口悬挂日本国旗，尽管没有士兵站岗，但有类似门卫的人看门。印象中里面有 20 多个中国姑娘。图为泗水新村原慰安所的大门。〔苏智良 2006 年摄〕

■ 4 图为记载着杭州将军路该慰安所历史的石碑。〔苏智良 2004 年摄〕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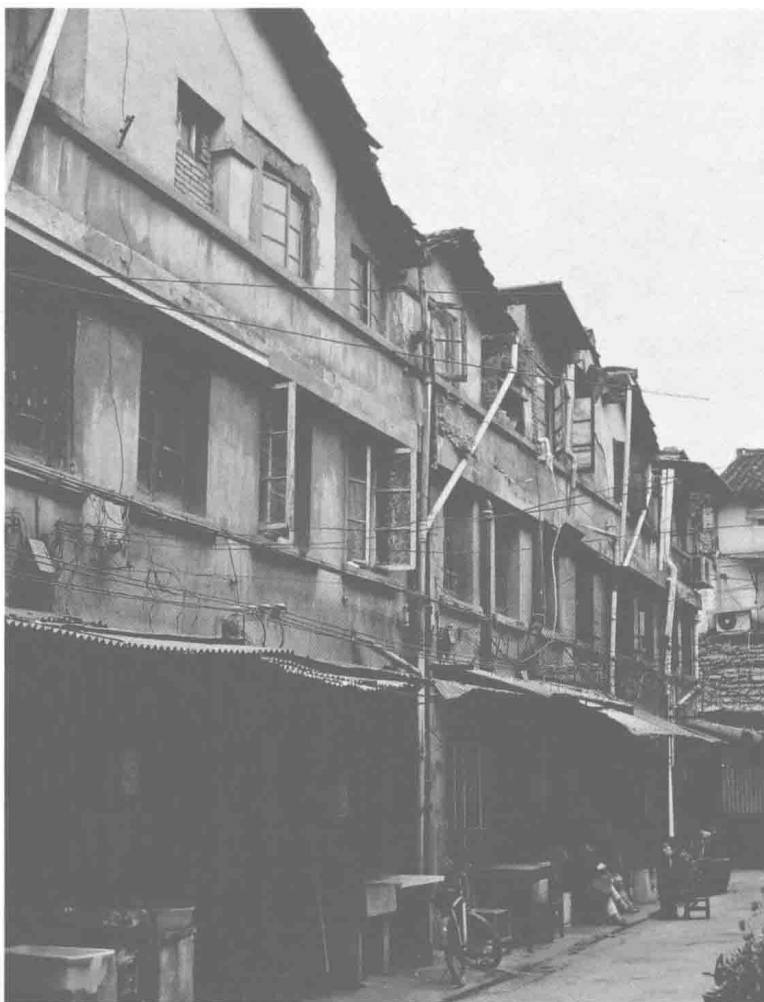
■1 图为杭州泗水新村的老房子。杭州拱宸桥一带是当年日本驻军较多的地方，所以那里也有一定数量的慰安所。根据苏智良教授的实地查访，当地流传着一个故事：有个日本侨民在拱宸桥一带开了个慰安所，里面都是被日本人抓来的中国良家妇女，包括当地姑娘。那年夏天，这个日本人的两个老婆因为天热在拱宸桥上纳凉，被当地人抓起来当人质，用来交换关在慰安所里的中国姑娘。遭遇此事件之后，这个日本人最后良心发现，居然关闭了慰安所，许多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女性由此见了天日。〔苏智良 2006 年摄〕

■2 图为金华石门村的慰安所遗址。原雅堂街 20 号（今 49—1 号）为“菊水慰安所”，现改做窗子的临街青石门额上，“菊水”两个字还依稀可辨。据调查，这个慰安所的开办者是朝鲜海州的河钩焕，里面有朝鲜“慰安妇”17 人。〔《钱江晚报》2013 年 4 月 10 日〕



2

1 日军在杭州的慰安所遗址局部。〔苏智良 2006 年摄〕



1

2 金华石门镇有一个日军司令部，日军霸占农民的房屋建立了慰安所。其中有个作恶多端的小队长叫松上年雄，七十年后，许多当地人还记得他的名字。〔《金华日报》2013 年 4 月 12 日〕



2

■1 日军在安徽也设立了很多慰安所。凤宜楼慰安所是日军于1938年1月在芜湖设立的第一个慰安所。该所白天为士兵使用，晚上向军官开放，先后有200名中国妇女被抓进去，其中有位年轻的尼姑。有一位妇女不堪忍受凌辱而跳楼自杀。据调查，1941年，芜湖至少有9个慰安所。〔范家骅、耕汉：《华昌街与烟花女》，《安徽文史资料》第16辑，第164页〕

朝鲜受害者李天英饱经沧桑，晚年生活在安徽。这是20世纪50年代她在芜湖的留影。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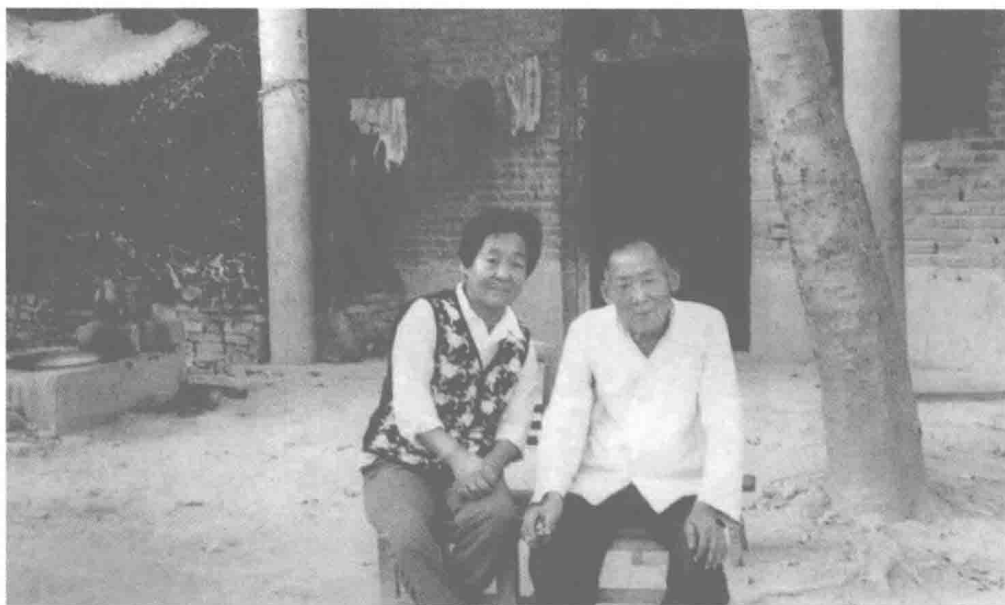


2

■2 1938年2月，日军华中派遣军宪兵队报告称，芜湖已有109个“慰安妇”。而事实上，仅凤宜楼慰安所在1月份就抓了200个中国妇女为性奴隶。可见下级部队直接抢抓中国妇女建立的慰安所，并不在上述资料的统计中。这类个案表明，日军慰安所、“慰安妇”的数量，比目前可见的日军文献实际统计数更多。〔吉林省档案馆所藏关东宪兵队档案〕

图为在凤宜楼慰安所前排队等候的日本兵，由香川茂1938年1月30日摄影。

〔山谷哲夫编：《冲绳のハルモニ》，晚声社1979年12月版〕



3

■3 日军在安徽蚌埠、滁县、凤阳、合肥、安庆、太湖县、巢县等地均设有慰安所。

战后留居在中国安徽的朝鲜受害者李天英与老伴关朝信的合影。〔(韩)朴宣泠、(中)刘宝春：《历史的漩涡》，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8月版，彩照页〕



1

2

「陣中日誌」一九三八年七月五日、六日

No. 4
 七月五日
 午前中 慰安所
 ケル六時 中隊員が酒を飲み、午後六時より
 酒場へ出て大いに酒を飲んだ。
 半島人軍慰安所には見物、食事をする。
 九月二三日、上海、
 午三時頃、歸隊する。復す。
 時計のガラスを修理する。四時。
 七月五日 水取 雨降、蛙撃放す。
 今日、雨降り、一日中、蛙に浴び、酒を飲み
 宿舎に在りて一日中、蛙に浴び、酒を飲み
 専ら、今先、蛙撃せざる中、蛙に浴び、酒を飲み
 専ら、夫れ、蛙撃せざる中、蛙に浴び、酒を飲み
 出発す。

3

1 1938年2月1日，日军侵占凤阳县城，在疯狂屠杀的同时，还掳掠大量当地妇女，强迫她们留在日军的慰安所里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稍加反抗，就被残杀”。从寻觅房屋到抓捕良家妇女设立慰安所，均由维持会负责。日伪不放过任何一个中国妇女，连修道院的中国修女也被抓进慰安所。〔李秉新等主编：《侵华日军暴行总录》，第710、734页〕
 图为受害者黄伍仲老人。〔胡海英2000年摄〕

2 1940年5月，盘踞宿州的日军在城中设立一些慰安所，其中有一个设在帝国旅馆，里面多是抢来的中国良家妇女。
 图为在慰安所外等待进入“慰安妇”房间的日本军人。〔妇女救援基金会主编：《沉默的伤痕——日军“慰安妇”历史影像书》，（台北）商周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3 日军士兵在1938年的《阵中日记》中记载，在安徽蚌埠，军官逼迫“慰安妇”通宵陪酒。〔高崎隆治：《「陣中日誌」に書かれた慰安所と毒ガス》，梨の木舎1994年1月版，第45—47頁〕

1 图为安徽宁国望阳阁日军慰安所的“慰安妇”。这是日本记者香川茂于1938年4月23日拍摄的。〔山谷哲夫编：《冲绳のハルモニ》〕

2 紫金庄慰安所的中国“慰安妇”，由香川茂1938年5月2日摄影。〔山谷哲夫编：《冲绳のハルモニ》〕



1



2

二、华中地区的日军慰安所

日军在湖北、湖南和河南占领地，设有许多形态不一的慰安所。在武汉、长沙等大城市，这些慰安所较为完善，多有军医体检制度等。武汉作为日军的集结地，慰安所也非常普遍。在老联保里、生成里、新联保里、六合里、积庆里等地均设有慰安所。日军第二十九师团曾在当阳、宜昌、荆门等地设立慰安所^[1]。而在河南等前线，日军小部队直接掳掠当地女性充当性奴隶，卫生条件极差。据日本战犯供认，在河南，日军利用原妓院改造成“星俱乐部”，里面有30多名中国年轻女子，每人每天要遭到二三十个日本兵的摧残，被迫成为日军的泄欲工具^[2]。受害妇女生命毫无保障。日军在株洲朱亭镇设有一个慰安所，结果十多名当地妇女中有8人被蹂躏致死。在长沙和衡阳，也有日军兵站直营的慰安所。



武汉的日军慰安所颇多，特别是汉口，有多个慰安所集中地，积庆里就云集着许多慰安所。1938年11月底，该地的慰安所达30家。〔長次健一：《漢口慰安所》，圖書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42頁〕

图为汉口积庆里日军慰安所遗址。〔苏智良1998年摄〕

[1] 袁秋白、杨瑰珍编译：《罪恶的自供状：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历史审判》，（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63页。

[2] 袁秋白、杨瑰珍编译：《罪恶的自供状：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历史审判》，（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42—143页。

1 积庆里是日军规划的在武汉最大的慰安所群，图为当年的慰安所遗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受害者指出，积庆里 22 号就是她当年受害的地方。这位受害者至今仍生活在汉口。〔苏智良 2001 年摄〕

2 1991 年，73 岁的日本老兵小山三男回忆，战时他在汉口当兵，也曾去过两个慰安所，里面的“慰安妇”估计有 100 人，有个“慰安妇”还流着泪对他说：“我们是作为特殊的护士而被征募到战场来的，想不到竟让我们干这个。”《每日新闻》1991 年 12 月 27 日。

图为日军士兵绘制的积庆里慰安所群示意图。〔户井昌造：《戦争案内一ぼくは二十歳だった》，（東京）平凡社 1999 年 9 月版〕

3 日军的兵站负责设立慰安所并进行管理。这是汉口兵站设施的配置图，其中有积庆里慰安所等。〔长沢健一：《汉口慰安所》，第 4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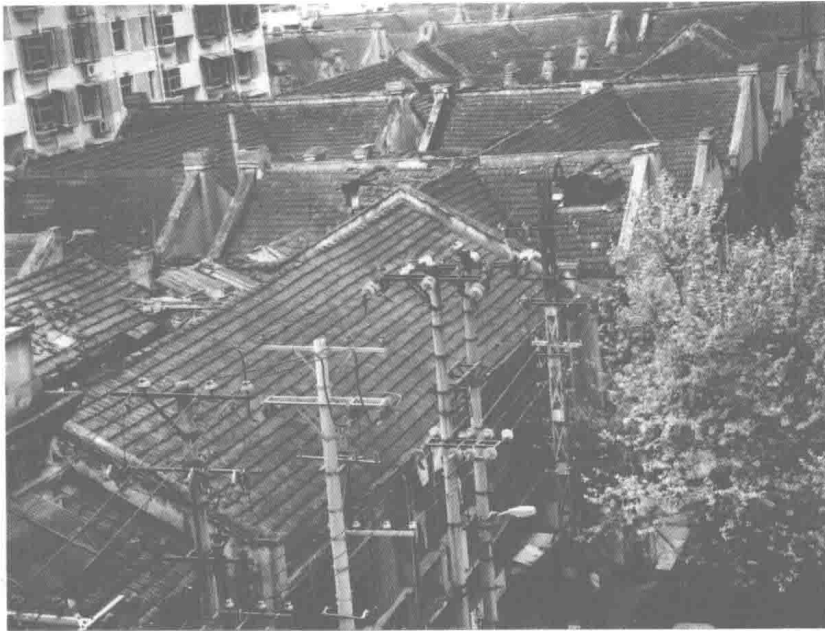
1



2



3



1

1 根据幸存者和日本老兵的回忆，武汉联保里是日军慰安所的集中地。战时曾出现了许多慰安所。图为联保里建筑群。〔苏智良 1998 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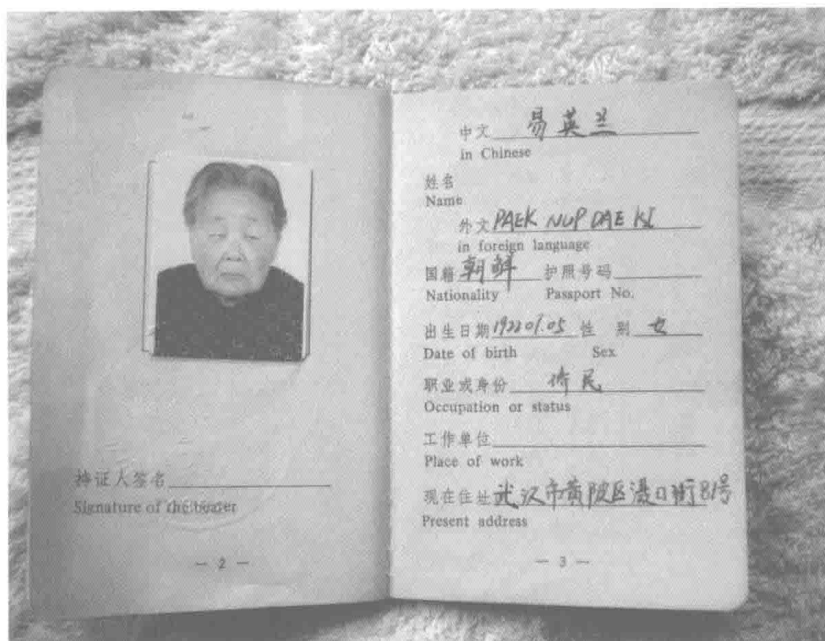
2 据日军第三十九师团长陆军中将佐佐真之助回忆，在师团驻地湖北当阳，有日本人经营的慰安所，其中有一些是中国妇女。

武汉联保里也是慰安所密集之地。图为 20 世纪 90 年代的联保里。〔苏智良 1998 年摄〕

3 武昌的斗级营可以说是武昌慰安所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支那在留邦人人名录》（1942 年第 33 版）上记载着在斗级营就有 4 家慰安所：18 号的梅崎楼、47 号的大盛馆、80 号的菊水、96 号的大和馆。易英兰从朝鲜被诱骗至武汉，成为日军的性奴隶，这是她的中国居住证。这位老人最终老死在武汉。〔苏智良 2007 年摄〕



2



3

■1 原汉口兵站司令部军医大尉长泽健一战后写了回忆录《汉口慰安所》，日军在汉口豪华典雅的璇宫饭店设立了兵站司令部。图为璇宫饭店。〔长泽健一：《汉口慰安所》，第42页〕

■2 图为武汉市汉口生成北里的日军慰安所遗址，这是四通八达的弄堂房屋，可以看出当年的慰安所规模不小。〔苏智良1998年摄〕



1



2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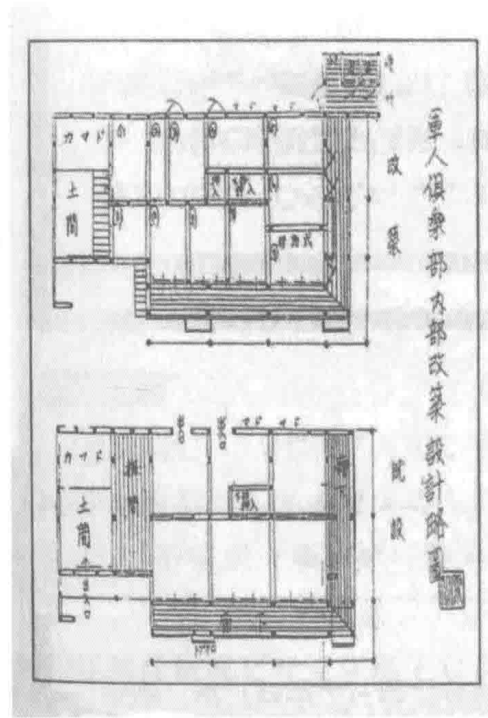


2

1 图为日军军医长泽健一于1942年秋拍摄的“和平馆”慰安所，门口写着“第六慰安所”，可见还应有第一到第五慰安所，它们都是日军兵站设立的慰安所。〔長次健一：《漢口慰安所》，第41頁〕



3



4

2 日本“慰安妇”患病后，兵站将其送到医院治疗。图为长泽健一于1942年秋拍摄的“慰安妇”。〔長次健一：《漢口慰安所》，第179頁〕

3 日军在宜昌市平和里曾设立四个“慰安所”：一力馆、国际馆、阿也美馆、阿也美本馆。据在这里干过活的陈忠孝老人回忆，一个慰安所里就有三十多个妇女。图为日军在宜昌平和里设立的“国际馆”慰安所旧址大门。〔孙维玉2001年6月摄〕

4 日军独立山炮兵第三联队本部于1939年6月下达《给各队长的指示》，其中提到：在特殊慰安所外面，师团指定小贩或饮食店(军人酒吧)。图为日军称之为军人俱乐部的慰安所的内部设计图，时间是1944年12月。〔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藏〕



5

5 据日本老兵回忆，在湖北荆门日军司令部所在地，隔两三栋房子就有一家慰安所，“慰安妇有朝鲜人和当地的女子共四五十人”。〔(日)森金千秋：《恶兵》，文从社1978年版〕

图为日本兵等待进入“慰安妇”的房间，后墙上贴着慰安所的注意事项。

1 1942年，日军占据洪湖新堤、峰口后，便设立专供日军军官淫乐的慰安所。他们把从四乡抢来的少女或青年妇女关押在慰安所内，随时供其奸淫、摧残。常常是六七个日本兵接连对付一个“慰安妇”，致使这些妇女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一位姓高的年轻寡妇被日军抢来后，遭日军肆意蹂躏，几天几夜不准穿裤子，后虽经家人花钱赎回，但从此卧床不起，两年后含恨而死。图为湖南受害者刘秀英老人。〔苏智良2001年摄〕



1

2 据日本老兵回忆，1938年，他在岳州（岳阳）担任铁路警备。1938年10月，部队前往通山方面的南林桥，将无人的民居改造成慰安所。该部队一直驻扎到1939年4月，在距部队150米左右的一个小山上就有一个慰安所。中国“慰安妇”穿着中国服装，朝鲜人穿着和服，有叫“花子”等名字的。慰安所由部队管理。〔従軍慰安婦110番編集委員会編集：《従軍慰安婦110番》，（東京）明石書店1992年6月版，第38頁〕



2

图为湖南沅江县张家庄，这里原是一个规模庞大的慰安所。〔苏智良2001年6月26日摄〕

3 1944年，日军进占宝庆城后，第一一六师团后方主任参谋立即命令驻宝庆宪兵队长山田定准尉寻找中国妇女，准备开设慰安所。山田定令日军曹长找汉奸带路，找来十多个中国女子，并将她们交给后方主任参谋，不久，日军官兵祈盼的师团慰安所便开张了。在长沙和衡阳，日军的兵站自己经营慰安所。在安化，日军野战医院管理着“特殊慰安街”。



3

图为湖南受害者谭玉华在她家门前讲述苦难往事。〔苏智良2006年摄〕



1

1 1945年1月16日，日军第十一军独立第八十八旅团侵入湖南宜章，一路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占领全县后，日军强迫县内每日送100担大米和10名姑娘充当“慰安妇”。图为湖南益阳的慰安所遗址。〔苏智良2001年摄〕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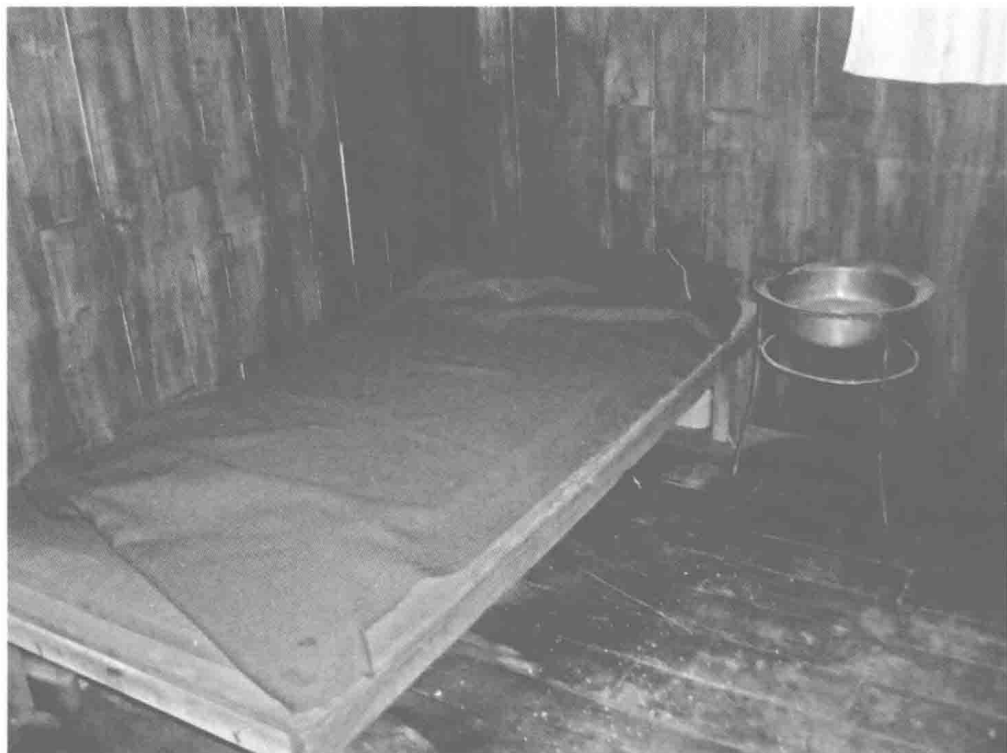
2 日军占领洛阳后，即由师团后方参谋主持，将当地民居改为慰安所，并掠夺中国女子充当“慰安妇”。日军在河南各地建立了许多慰安所。图为河南舞钢朱兰店村的慰安所遗址。路右边是日军司令部，斜对面就是日军“慰安所”。据时人回忆，经常看到日本兵和朝鲜女人进出。〔张国通2001年摄〕

3 舞钢市为平顶山市所辖之县级市，位于平顶山市区东南80多公里。出舞钢市东南15公里，有一尹集镇。该镇于1945年初被日军占领。这三间旧瓦房，就是当年日军的“慰安所”。其中的受害者有柴珍、刘玉花、苏明娃等。〔张国通2001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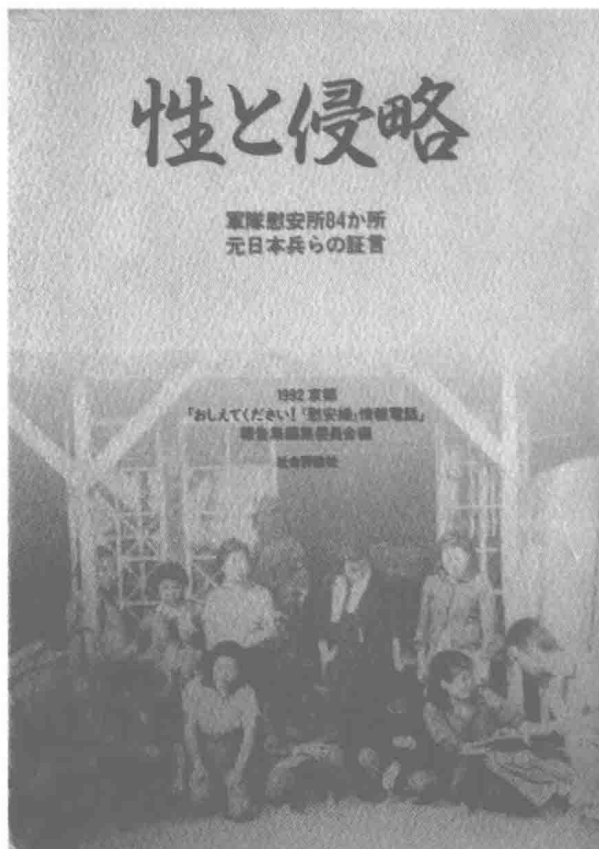
3

1 根据河南大学孙建国教授的调查，许昌老城今结核病医院院内，当年曾建有日军慰安所。其地址今为清虚街（南头）97号。据说慰安所内主要为朝鲜“慰安妇”。旧房已于多年前被拆，并建有新楼房。图为复原后的“慰安妇”房间的一角。〔陈丽菲 2007 年摄〕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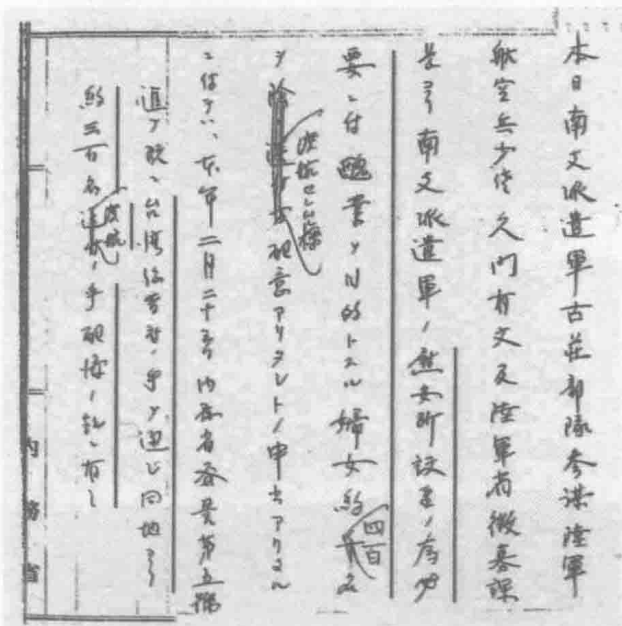
2 20世纪90年代，日本一些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和市民运动成员，积极开展日军性奴隶真相的调查。图为他们征集日本老兵的回忆编集的书的书影（慰安婦情報電話報告集編集委員会編：《性と侵略—軍隊慰安所84か所元日本兵らの証言》，社会評論社1993年7月版），书中记载着84个慰安所的详细情况，这些慰安所大多设在中国。〔苏智良翻拍〕



2

三、华南地区的日军慰安所

1938年6月，日军第一〇四师团及海军陆战队占领汕头，此后又先后占领广东各地。1939年2月，日军第二十一军登陆海南岛。同年11月，日军第五师团及台湾旅团占领防城，并进占广西大部。1941年4月，日军宇佐美支队占领福建连江、长门、长乐，21日占领福州、福清。开始对福建进行殖民统治。在占领区，日军先后建立了各种类型的慰安所。海南岛是日军进占东南亚的枢纽和基地，日军部队进出频繁，慰安所遍布全岛。根据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和海南省政协的长期调查，确认了至少70个慰安所遗址。日军通过各种途径征集中国“慰安妇”，且人数较多。根据调查，仅在澄迈一县，日伪政权就征用了369名“慰安妇”^[1]；在福州中心城区著名的三坊七巷，也曾有日军设立慰安所的记录；厦门则有安田、明月等慰安所。1942年9月3日，在日陆军省课长会议上，恩赏课长指出，要在现有基础上追加“将校军官以下的慰安设施，拟按以下规模：华北100所，华中140所，华南40所，南方100所，南海10所，库页岛10所，共400所”^[2]。由此可见，日军慰安所的规模不断扩大，其数量是非常惊人的。



日军第二十一军占领广州后，即开始营建慰安所。据该军统计，1939年上半年，该军管辖的“慰安妇”有850名，下属部队控制的“慰安妇”有150名，共计1000名。图为日本内务省警保局关于派遣“慰安妇”前往中国华南的文件。〔（日）女性的战争和和平资料馆编：《2000年女性国际民间法庭集》，第48页〕

[1] 中共澄迈县委党史研究室、澄迈县地方志办公室编：《抗日战争时期澄迈县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资料》，2008年印行（内部），第13页。

[2] （日）矢野玲子：《慰安妇问题研究》，大海译，（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220页。



1



2



3

■ 1 据日本老兵回忆录记载，在中山大学南门处的新港西路上，就有数个慰安所。图为新港西路的老房子。〔苏智良 1997 年摄〕

■ 2 根据知情者提供的材料，广州东源大街曾是日军慰安所聚集的地方。〔李翔摄〕

■ 3 在广东淡水，有新町慰安所、东山慰安所、白云慰安所和河南慰安所等。图为日军在广州的慰安所遗址。〔苏智良 1997 年摄〕



1

■1 2012年，广东“三灶岛侵华日军罪行遗迹”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遗迹由日军机场遗址、碉堡、弹药库、“慰灵”石刻、日军慰安所、兴亚第一国民学校遗址、兴亚第二国民学校遗址、万人坟和千人坟等组成。照片上的这栋房子曾是慰安所，当年名叫“军人集会所”。〔《珠海特区报》2009年4月7日〕



2

■2 图为三灶岛的日军慰安所。这里原是学生读书房，日军在二楼中间横向拉上一道布帘，中间隔成若干小格，每个小格里都有地铺，约有20间。日本兵由二楼两侧的楼梯排队，经过登记后轮流到布帘隔成的小格里发泄兽欲。十多个“慰安妇”每周必须为数千名士兵提供性服务。〔刘昌言2014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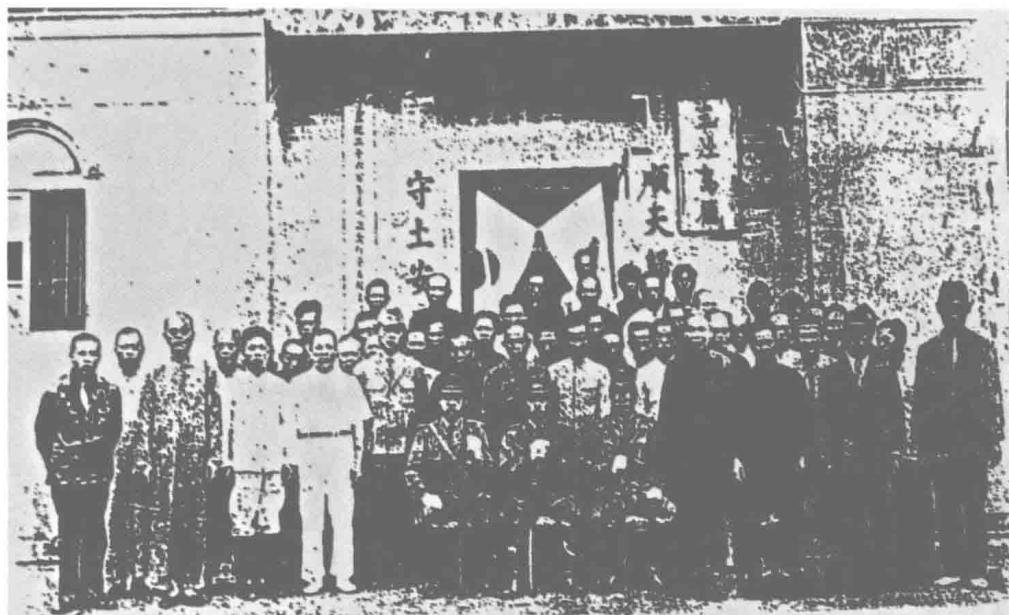
3

■3 据有关证人指认，这间慰安所当时是由北投八胜园经营，这里只是一个分店，店主是一个身材雍胖的欧巴桑，另外还有个50岁左右的男掌柜。最初的“慰安妇”都是日本人，后来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广州身穿旗袍的中国姑娘。图为该慰安所遗址。〔刘昌言2014年摄〕

1 这个慰安所的中国“慰安妇”命运非常悲惨，她们每天昼夜遭日军蹂躏，因军人太多排不上队而在楼下来来回回、骂骂咧咧的准士官屡见不鲜。图为1940年日军军官与相关人员的合影，右侧的军官为主计长工藤。〔刘昌言提供〕

2 1939年4月，日军侵入海南，此后逐渐将海南定位为进攻东南亚的基地，大批日军登陆，几乎在全岛各地都设立了慰安所。据海南省政协等单位组织的调查，确认了至少63个慰安所遗址（近年增加到70个）。图为德国国家电视台在海南保亭拍摄陈金玉阿婆受害的故事。〔陈厚志2007年摄〕

3 日军仅在三亚、崖城、藤桥就建了6处慰安所，每处有十多名至二十多名青年女性受害者。这些慰安所由日本女子管理。日军在崖城占用导南村两间民房设立了两个慰安所，其中一个称“华南庄”，是日军军官的慰安所，另一个称“崖泉庄”，是日军士兵的慰安所。三亚慰安所设在新建的浮脚屋（其地址在椰风酒店后），是军官慰安所。图为“崖泉庄”慰安所遗址。〔苏智良2001年摄〕



1



2



3



1

1 海南临高县新盈镇的慰安所由一个名叫川冈的队长负责，他对这个拥有中国、朝鲜、新加坡等国女子的慰安所作了极其严厉、苛刻的规定，被日军称为“川冈制度”。规定：“慰安妇”不得随便走出慰安所，不准逃跑，否则，连同家属立斩；要无条件地听从日军的使唤和摆布，对日军不得无礼；要绝对服从两个管理员的管制，否则，处以重罚；每个“慰安妇”必须每天接待 50—60 士兵，忙时须接待 70—80 个士兵。〔符和积主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续），第 188 页〕

图为新盈镇原日军慰安所旧貌，现位于该镇红民街 9 号和 10 号房的左边。〔胡海英 2001 年摄〕



2

2 据当地老人回忆，日军为了打消中国“慰安妇”怕失面子的思想顾虑，将多数本地籍的“慰安妇”调往外县“服役”，而在澄迈“服役”的多是外地人，面孔陌生者居多。由于她们与外人接触的机会很少，所以外界并不知道她们的籍贯和名字。图为海南东方市的日军慰安所遗址。〔苏智良 2001 年摄〕



3

3 在烈楼市新街有一个慰安所，供日军军官使用，其“慰安妇”多数来自临高县。据当地老人回忆，新李村的学优公祠是“慰安妇”的集散地，经常有新的“慰安妇”在那里换来换去。图为海南省海口市慰安所旧址。〔张国通 2008 年摄〕

1 图为海南东方市的慰安所遗址。〔苏智良 2000 年摄〕

2 东方县（现为东方市）新街镇为日军驻屯地，建有不少慰安所，该建筑为日军在海南东方的士兵慰安所遗址。〔胡海英 2000 年摄〕

3 图为海南定安县原日军慰安所的遗址，房屋的主人就是图中这位莫大娘。〔苏智良 2000 年摄〕



1



2



3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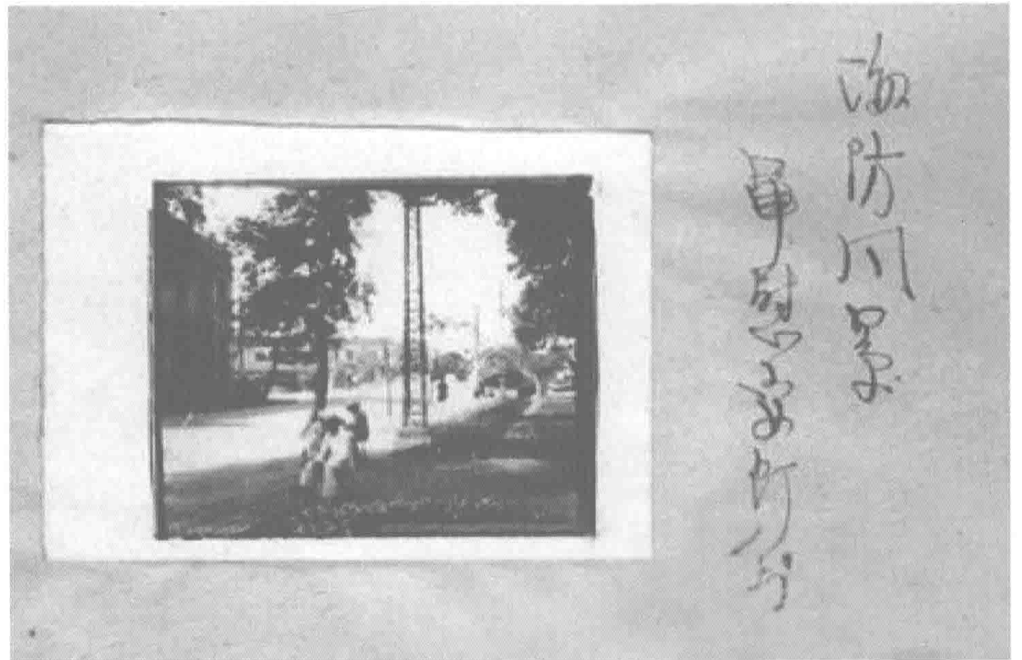
2

1 1942年春，日军在石碌铁矿开办了一个“慰安所”，并以香港“合记公司”为名，在香港、广州等地大批招收青年女工。先后共有三百多名青年妇女被骗来石碌矿山。“慰安所”四周均设警戒网，日夜都有日军巡逻，戒备森严。因逃跑被抓回来的“慰安妇”，有的当场被打死。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时，幸存下来的“慰安妇”只有十多个人。朴来顺——一位来自朝鲜的女性被抓到海南，成为性奴隶，再也没有回过故乡。她后来担任养路工，终生孤居，客死海南。2014年1月，陈丽菲教授采来一束野花，祭奠这位受尽苦难的女性。〔苏圣捷2014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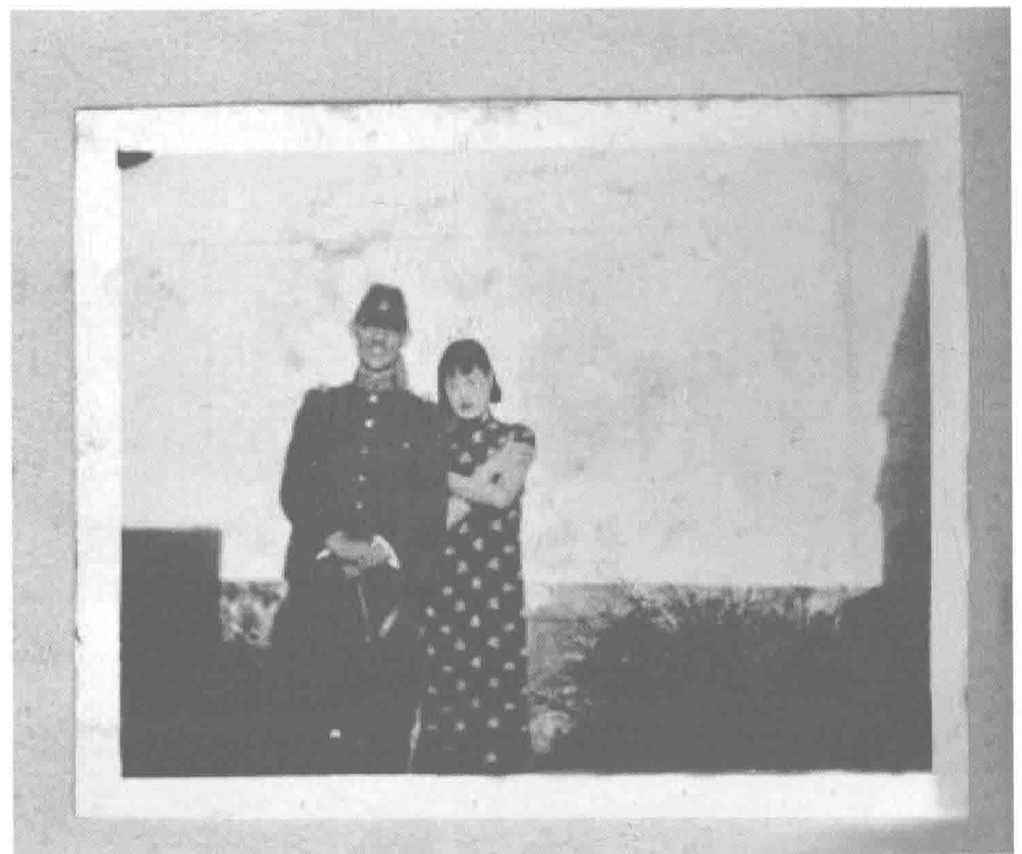
2 1939年11月，日军侵入广西南宁。日军第五师团长今村后来回忆，1940年2月，南宁已有15个慰安所，设在旅馆、民房、学校甚至寺庙里。这是宾阳的“慰安妇”旧照。〔《南国早报》，拍摄时间不详〕

1 日本随军记者小俣行男记载，1940年9月，在南宁街头有供日军使用的慰安所，其是从广东迁来的，数目有十八处，中国人“慰安妇”一百几十人。由于陆军的移动，她们难以营业，便决定返回广东，但没有足够运载她们的卡车。图为在海防的日军“慰安妇”旧照。〔《南国早报》，拍摄时间不详〕

2 日军占领桂林后，即以设立工厂的名义招募女工，结果这些被招募来的女工全部被日军逼迫做了“慰安妇”。1945年2月，日军师团计划设立慰安所。在桂林，第五十二旅团通讯队的驻地附近，也有慰安所，里面朝鲜人居多，日本“慰安妇”则很少。图为在广西宾阳发现的日军士兵侵华相册，内有“慰安妇”照片。〔《南国早报》，拍摄时间不详〕



1



2



1

■1 据知情人贺广堃回忆，桂林文昌桥和南门桥间有慰安所，他曾看到“里面有6名16岁至20岁年龄的中国妇女赤裸或者半赤裸着身体，有的大腿上还有血迹，有的坐在地上哭，有的则面无表情坐着，大厅里，还有七八名光着身子的日本军人”。〔《桂林日报》2007年4月30日〕

图为日本兵在慰安所。
〔村瀬守保：《私の従軍中国戦線—村瀬守保写真集》，日本機関紙出版センター2005年3月版，第108頁〕

■2 日军1941年4月22日占领福州后，即在城内设立了许多慰安所。曾有千余名榕城良家女子被日军掳去当“慰安妇”。图为福州日军慰安所乐群楼之一角。〔苏智良2001年摄〕



2

■1 闽南俗语称“三坊七巷，出将入相”。三坊七巷为昔日福州城的精华所在，为岭南读书人之根基。但是，人们怎能想到，福州沦陷期间，日军曾将这一著名的书香之街变成军队的“花街”，在这里设立了一批慰安所。〔苏智良 2001 年摄〕

■2 乐群楼原来是英国领事馆的俱乐部。乐群楼面积很大，现在里面住了十来户居民。战时日军在此建立慰安所，楼房基本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图为乐群楼的正门。〔苏智良 2001 年摄〕



1



2



1

■1 周边的居民们多知道乐群楼慰安所的故事。据老人们回忆，战争时期，这里是日本人的俱乐部，而且慰安所是军官慰安所，每天晚上军官们都到这里来欺辱性奴隶。图为乐群楼的侧面。〔苏智良 2001 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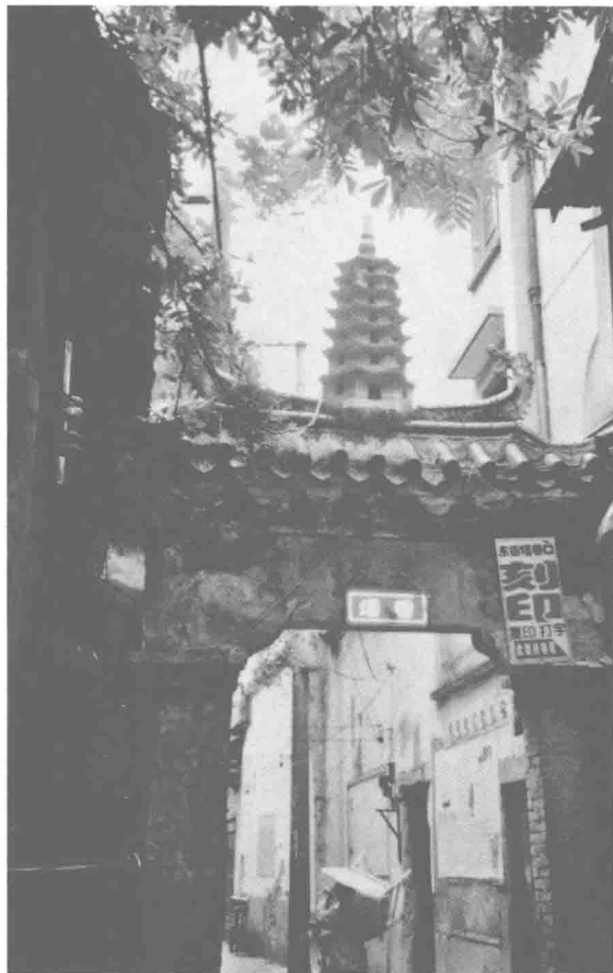
■2 乐群楼的旁边有一个教堂，就在这神圣的教堂之侧，日军设立了“合法的强奸场所”，长期对妇女进行蹂躏。图为乐群楼的后门。〔苏智良 2001 年摄〕



2

■1 福州塔巷顾名思义，因塔建巷，至今巷口仍有座宝塔。据记载，日军占领时期，在这里建立军队卫生检查所，以对附近的“慰安妇”进行体检。〔苏智良 2001 年摄〕

■2 1938 年 5 月，日军侵入厦门，很快便在周厝巷等地设立了一批海军慰安所，名字有“钹乃”“安田”“明月”等。图为福州塔巷 26 号建筑。〔苏智良 2001 年摄〕



1



2

四、华北地区的日军慰安所

日军侵占内蒙古、山西、河北、北平、天津、山东等省市后，普遍设立慰安所。日本老兵高桥哲郎回忆，日军将官使用的是叫作“偕行社”的慰安所，在有部队的地方都有；一般士兵使用的是慰安所，不叫慰安所，起了日本名，比如用“樱”“椿”等名称，用这个来做区别。仅从山东省来看，在大队本部驻扎的地方有慰安所，没有“偕行社”，如果不是特别大的城市没有这个区分。在地方的中队、小队驻扎的地区根本没有这个区分，因为本来将官的人数就少，主要就是这样，总之“偕行社”就是将官使用的慰安所^[1]。日军第十五师团在河北唐山、丰润、沙河镇等建立慰安所，抓来60名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2]。曾是中国劳工部干部的李鹏兆至今记得，在北平绒线胡同西侧的宣内大街上，有一幢大洋房，门口挂着“皇军俱乐部”的木牌。晚上，经常有喝得醉醺醺的日本兵进出这个慰安所，有时还到周边居民家门口大喊“花姑娘的有”^[3]。天津的日本防卫司令部通过伪警察系统征用“慰安妇”。1942年6月，日军强征229名妓女去前线，最后有86名被送往河南^[4]。这个天津日军防卫司令部也设有慰安所，汉奸负责定期给日军提供“慰安妇”，每批20—30人。日军一一〇师团在保定设立多个慰安所。驻扎在河北的第十四师团的田口新吉后来回忆，有个“慰安妇”说，那天晚上一共接待了21人，寒冬腊月里，老得一个又一个抱那些冰冷的身子，真有点忍受不了。田中感叹，那真是一个残酷的性的地狱。据山西志愿者和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调查，山西太原、运城、阳曲等城市有日军设立的正规慰安所；在前线，日本兵直接到村庄里掳掠妇女，将她们作为性奴隶进行虐待，数量多得惊人。日军占领曲阜后，命令维持会每日必须提供100名妇女充当“慰安妇”^[5]。同样，济南曾设立众多的慰安所。曾经担任日军第五十九师团第五十四旅团第一一大队下士的绘鸠毅供认，在山东的索各庄，他们将一名女战俘作为两名下士官专用的“慰安妇”，因为食物供给困难，这个下士官竟将女战俘杀了，分给士兵们吃^[6]。在幸存下来的受害者控诉，慰安所就是日本政府及其军队一手制造的“性奴隶监房”和对妇女的屠杀场。

[1] 《高桥哲郎：对侵略过中国这个事实，我们不能忘记》，《光明日报》2014年9月7日。

[2] 袁秋白、杨瑰珍编译：《罪恶的自供状：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历史审判》，（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5页。

[3] 《李鹏兆先生致苏智良的信》，1997年6月18日。

[4] 《天津特别市警察局为劝遣妓女赴河南慰劳经过情形给市政府的呈文》（1944年6月8日），天津市档案馆藏。

[5] 管雪斋编：《抗战一年》，汉口华北图书公司1938年版。

[6] 《绘鸠毅：日军强征慰安妇并杀掉吃肉 立下谢罪碑誓不再战》，《光明日报》2014年9月5日，第3版。



1



2

1 日本老兵小平喜一回忆，日军自1939年起，先后在内蒙古铁路沿线地区建立了若干个慰安所。这些慰安所里，几乎全部使用中国“慰安妇”，只有极少数朝鲜女人。图为两个朝鲜女子正在渡过黄河。正是这张照片引起了日本记者千田夏光的注意，从而揭开了“慰安妇”的历史内幕。〔（日）伊藤孝司：《白飘带噙在嘴》，1994年私家版，第16页〕

2 1937年9月，日军侵入山西，此后的八年间，日军在山西各占领地设置了许多慰安所。1937年应召入伍的第二十师团经理部的中村信，曾回忆1938年第一军经理部在运城管理“慰安妇”的事情。〔（日）中村信：《大草原》，青云社1971年版〕

图为千田夏光著《从军慰安妇》的书影。

3 1942年，日军装甲第三师团在包头设立了军官专用慰安所。在偏僻地区，日军会用卡车将“慰安妇”送去分队驻地。〔村瀬守保：《私の従軍中国戦線—村瀬守保写真集》，第10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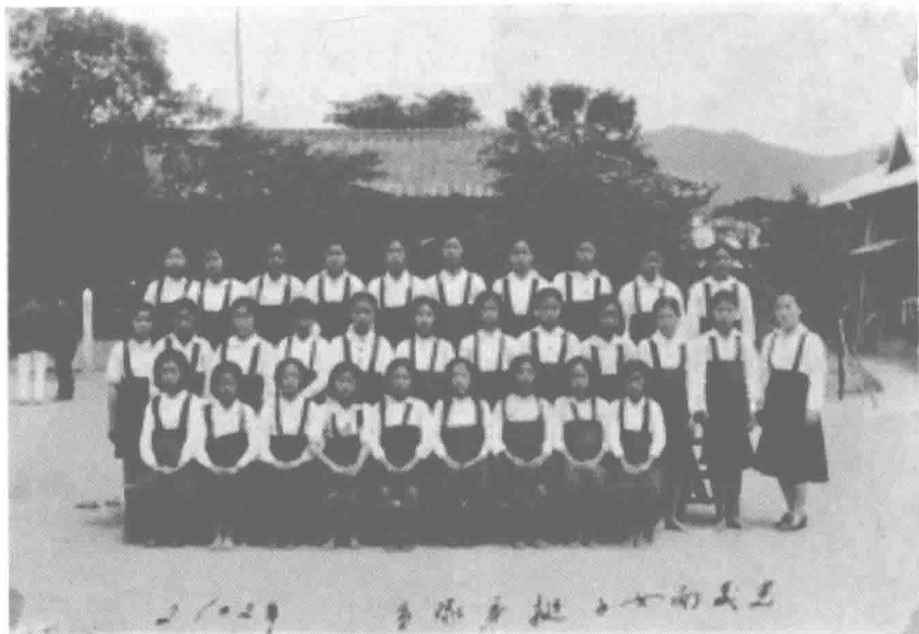


3

■1 蔚县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南部，1938年1月4日，在这个县城里，400名非常体面的中国少女被汽车运往张家口。此外，日军还要求当地每个村庄交出15—25岁的处女10名。此举完全是组织的强制征集。这些女性成为了日军的性奴隶。〔《抗敌报》1938年1月13日〕

在日本统治下，朝鲜组织了不少女子挺身队，将年轻女子遣送到中国。

■2 据知情者李鹏兆回忆，七七事变后不久，在北平绒线胡同西侧的宣内大街，有一座高台阶的洋房，门口挂着木牌“皇军俱乐部”，当时12岁的李鹏兆在绒线胡同的崇德中学上初一，每天路过这个慰安所，只见日本军人进进出出，十分热闹。晚上，经常有喝得醉熏熏的日军士兵到周围的中国居民家门口大喊“花姑娘的有”。在前门大街的繁华地带也有慰安所。图为北京宣内大街新文化街口的旧屋。〔苏智良2001年9月15日摄〕



1



2



1



2

1 原日本第十五师团六十七联队联队长铃木启久曾回忆在河北建立慰安所的往事。由于唐山地区的铁路是华北的交通大动脉，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控制这条动脉，成立了一个“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对这件事是全力支持的，特向公司派出警备兵。按照日军的惯例，我下令在我联队盘踞的5个地方（丰润、沙河镇及另外3个地方）建立了慰安所，并抓来60名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中央档案馆所藏档案〕

图为日军使用的军票（正面），虽然军部曾有进慰安所要支付军票的规定，但战败后军票全部成了废纸。更何况大量的调查事实证明，许多慰安所的开办成本由伪政权承担，中国方面的受害者大多数不但未有分文报酬，反而需要家属用钱款财物将受害过甚无法“使用”的受害者赎出。

2 日本老兵三井泰治2000年6月接受采访时说：“在石家庄时那里有慰安所，老板是朝鲜人，把女人十二三个一批乘卡车运送。慰安所分为士兵用和军官用，我曾见过他们拿来那种票子。……现在因为‘慰安妇’的问题，日本政府受到各种各样的指责。我认为这是当然的事。毫无疑问是日军干的。现在常在电视中看到，当年的‘慰安妇’都成了老婆婆了，她们的样子真是很可怜。”

图为日军使用的军票背面。

■1 日本老兵水野靖夫回忆，在邯郸驻扎的日军士兵，最向往的事情就是去慰安所，一有空闲，他们就会互相发问：“怎么样？去P屋吧？”“好的，去！”一个老兵回忆道：1939年5月，登陆（青岛）后的我们，结伙去慰安所。那是一处像医院般的大房子，一条走廊横在中间，左右都遮着门帘，里面是窄小的床，大约50张吧，女人们横卧在上面。士兵们排列在门帘前。有的门帘上印有红色的标记，表明里面的女人有病。每人可用十五六分钟的时间，稍有超过，帘外就喊“还干哪！”也有老兵为了寻找自己喜好的女人，而到处掀帘窥视。〔水野靖夫：《日本軍と戦った日本兵》，白石書店1974年版〕

图为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他曾承认，他参与实施“慰安妇”制度，是该制度的始作俑者。

■2 在郑州，日军第十二军司令部也设立了慰安所，其中有5名“慰安妇”，她们被迫每人每天接待日本军官十多人。图为北京宣内大街新文化街口旧屋，据说这里原来是日军慰安所。〔苏智良2001年摄〕



1



2



1

1 日军占领济南后，在中心城区建立了多个慰安所，经二路小纬六路就曾设有“皇军招待所”。图为经二路的旧建筑。〔苏智良 2011 年摄〕

2 在济南，有军官专用的慰安所，里面是日本“慰安妇”。下士官使用的是朝鲜人的慰安所，而士兵只能去有中国“慰安妇”的慰安所。济南饭店曾是旧日本领事馆。〔苏智良 2011 年摄〕



2

1 日本老兵浜崎富藏在《满身是泥的士兵》中记载：“一抓到年轻的女性，日军就让她伸开双手，看她的掌心。如果是农民或劳动者的手，就当场将她当作玩物，然后带到县城，卖作“慰安妇”。有钱人家的小妾或女佣、白手心的女人，就被怀疑是八路军的人，交给宪兵，经过拷问后，大都被虐杀了。”济南纬三路也曾设有慰安所，图为济南纬三路路牌和旧屋。〔苏智良 2011 年摄〕

2 原日军军官广濑三郎战后交待：从 1942 年 4 月到 1945 年 3 月，在新泰、泰安、临清、莱芜、济南、张店、博山、周村、德县、东阿等地，指示各大队设置的慰安所即有 127 个。济南主要有“樱桃”军官用慰安所，六大马路“星俱乐部”，纬八路慰安所，二大马路纬九路慰安所，还有历城县、历城县西营村、章丘县（县城内、南曹范、西彩石）、长清县崮山等地设有慰安所。〔中央档案馆所藏档案〕

图为济南纬八路的路牌与旧屋（外部翻新过）。〔苏智良 2011 年摄〕



1



2



1

1 日本兵久保二郎回忆：1943年，济南有慰安所，妇女均是中国人。瞧见她们脸的时候，所看到的完全是小孩子的脸，问了几次话，她们都没有回答。后来反复询问，终于有了以下的回答：“日军侵入我们村庄时，我的兄长和其他十四五个人全部被刺杀后埋起来了。我们家族出逃了一个月，总算战斗减弱下来了，于是我们就回了家。但一天日军军官敲开了我们的房门，抓了我的姐姐，父亲拼命地要阻止，结果被日军军官杀了。我的姐姐大叫着，那军官又把我姐姐也杀死了。”后来，她也成了性奴隶。日军在纬四路也有慰安所。〔（日）久保二郎：《朝风——我们忘不了战争》，1988年2月私家版，第28—29页〕

图为济南纬四路的旧屋。〔苏智良2011年摄〕



2

2 日军独立步兵第四十四大队有1300人，还有本部的500人。各部队驻扎在山东临清周围15—20公里的地方。当时设了3个慰安所。一个叫“太阳咖啡屋”，一个叫“叶隐居酒屋”，还有一个是军官专用的割烹屋，本部附近的慰安所常派“慰安妇”到下面去巡回“慰问”。一般要两三天时间。那种场合，第一天多是中队长独占，第二天才允许士兵使用。当时用两辆卡车为工具。士兵有时还强奸当地民女。〔（日）《战争责任研究》第23辑，第2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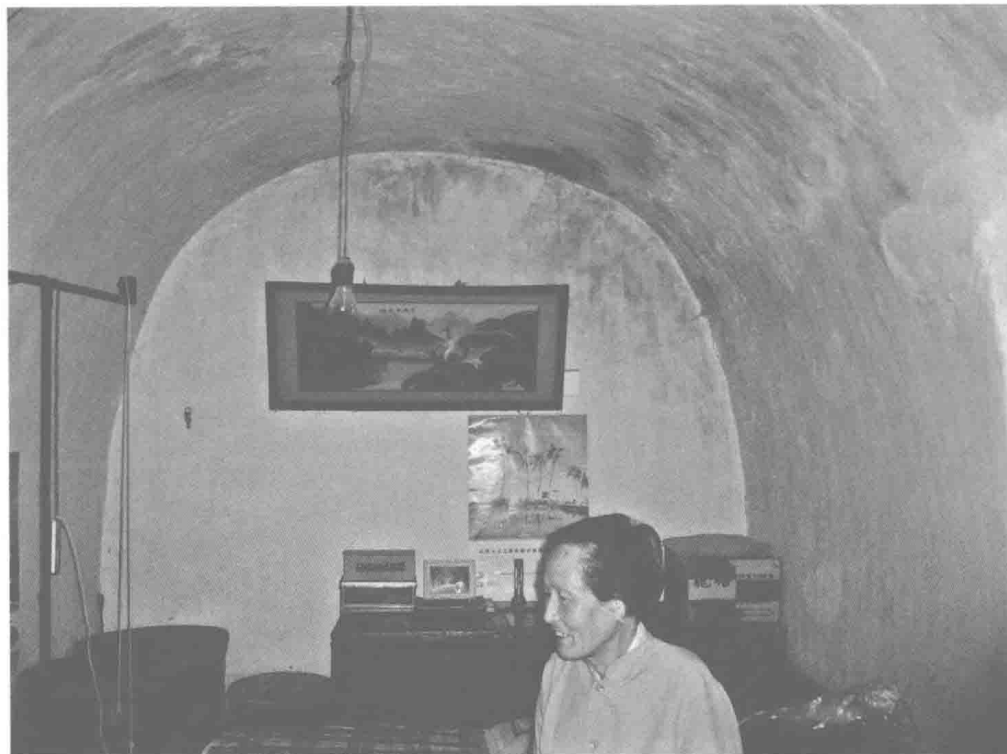
图为“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尚春燕老人的家。〔姚霏2007年摄〕

1 战犯秋田松吉供认：自1940年2月至1941年5月，第四十三大队第三中队山东省章丘县南曹范分遣队长山根信次伍长以下15名士兵在南曹范盘踞期间，他任该队一等兵步哨。山根伍长通过伪村公所，强制带来5名中国妇女做“慰安妇”。日军15人对该5名中国妇女进行了1年零5个月的淫污。〔中央档案馆所藏档案〕

图为刘面换老人在她孟县羊泉村的家里。〔姚霏2006年摄〕

2 金子安次1940年11月入伍，跟随混成第十旅团进入山东。这是他和战友在临清县慰安所前等待时的合影。前排右边就是金子安次。〔（日）女性的战争和和平资料馆编：《女性国际战犯法庭集》，第44页〕

3 战后，金子安次在中国被捕，对自己和日军的战争罪行有所忏悔。2000年12月，金子安次在东京女性民间法庭作证。图为他在一次集会上讲述自己当年在华北侮辱中国女性的事实。〔（日）女性的战争和和平资料馆编：《女性国际战犯法庭集》，第44页〕



1



2



3

五、东北地区的日军慰安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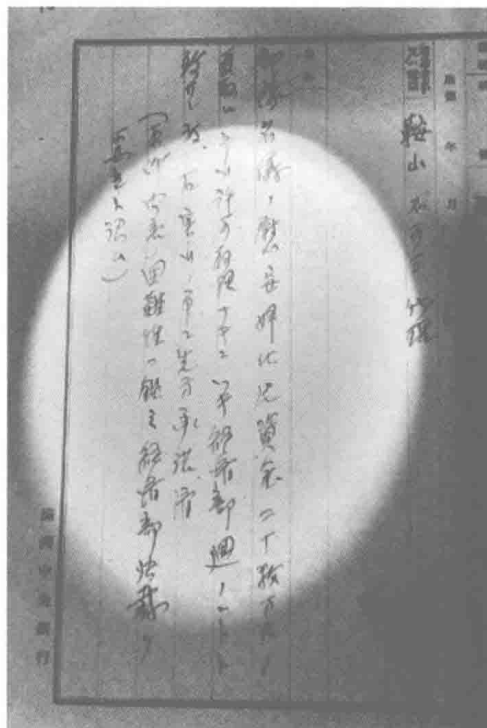
日军 1932 年就在东北地区建立了慰安所。此后，日军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各占领地建立了大批慰安所。在关东宪兵队的档案中记录的东北慰安所的地点有奉天（今沈阳）、新京（今长春）、东安、平阳、鞍山、东宁、珠河、北安、勃利、密山、海拉尔、老黑山、石门子、大肚川、八面通、牡丹江、下城子、伊列克得（今属内蒙）等。这些慰安所有些就是关东军自己建立的，大多设在部队营区。1941 年 10 月 16 日，在黑河的日本兵武田武二郎在信中写道：“北满黑河市街北方四黑的山神府兵舍的川村、井上、绵引各位，心情愉快地畅想着回后方的日子，在一望无际的旷野，村庄也没有，在显示国威的各兵科的兵舍，仅能看到利用陆军兵舍一角开设的东西方向的慰安所。所谓的慰安所既像一寸见方的小剧场，也像储物的小屋，很难描述出来具体的模样。但这里却是生活在此兵舍的士兵非常重要的消遣解闷的地方。”〔1〕除了日军自己开设的慰安所外，在城市里，日侨、韩侨及中国汉奸设立的慰安所也普遍地存在着。



大连武昌街一面街一带，旧时称逢坂町，这里曾出现过二十多家慰安所，是东北著名的慰安所“花街”。图为一面街慰安所原址群。〔苏智良 2000 年摄〕

〔1〕《关东军宪兵队北安地方检阅部〈邮检月报〉》，昭和十六年（1941）十月十六日，吉林省档案馆藏。

1 图为1945年“满洲中央银行”鞍山支店经关东军第四课批准，以军用公款科目转账划拨日军购买慰安妇专项资金等内容的电话记录。第七九九〇部队在1944年底到1945年初，汇款4次共计53万日元用于购买“慰安妇”，即建立和经营慰安所。〔《“满洲中央银行”鞍山支店“慰安妇”采购资金电话记录》，“康德”十二年（1945）三月三十日，吉林省档案馆藏〕



1



2

2 京都十六师团福知山二十联队的老兵证言：“慰安所是在军队的指挥下经营的，‘慰安妇’有日本人和朝鲜人，一个所里有15人左右。从白天到下午4时，一般是士兵。从下午4时到晚上8时，是下士官（伍长、军曹和曹长）。8时以后是军官。军官如果没有钱的话，干完了就回去，有钱的则可以留宿。我们去慰安所时，都是带着安全套去的。我们支付的是‘满洲银行’、朝鲜银行或日本银行的钱。”图为哈尔滨北二道街鱼市胡同的慰安所旧址。〔苏智良2000年摄〕



3

3 营口永世街（今西市区凯旋里）为日本侨民的集中地，因此有日本地名“日本町”，后来称作“二本町”，这里有为日军服务的慰安所。图为大连武昌街南巷慰安所旧址。〔苏智良1999年摄〕



1

1 吉林的公主岭（市）、四平街（今四平市）等地都有日军慰安所。慰安所的建筑有的是平房，有的是两层建筑，比较漂亮，其中一家叫“万水楼”。慰安妇中有朝鲜、日本和中国女性，其中东北当地妇女的卫生条件最差。去慰安所的士兵都持有免税票，可以少给20钱（10钱等于1日元），下士官则免税更多。免税票与安全套是一起拿到的。日本兵回忆，士兵们去慰安所自然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所以往往都是吃了饺子后去慰安所。〔从军慰安妇110番編集委員会編：《从军慰安妇110番》，第34頁〕

黑龙江是日本武装移民的目的地之一。图为当年日本开拓团旧址。〔苏智良2008年摄〕



2

2 吉林的延边地区设有很多慰安所。“京城慰安所”里多是朝鲜女子。在第十六师团伏见第二十九联队驻地，就有日本老鸨经营的慰安所，日本、朝鲜和中国的妇女都有，尤其是中国女子很多，看上去只有十多岁，完全是孩子，她们还要干打水等活。在黑龙江的日军炮兵部队里，也设有各类慰安所，一般士兵进去的价格是1.5日元。吉林省档案馆所藏的关东军档案中有不少“慰安妇”资料。图为记录老黑山、牡丹江等地设立慰安所，士兵殴打“慰安妇”的档案。〔吉林省档案馆藏〕



3

3 1943年，延吉有慰安所第一、第二兴亚馆，里面主要是朝鲜“慰安妇”，士兵每次给1.5日元，下士官给2.5日元，军官给5日元。图为延吉光明街的老房子。〔苏智良2014年摄〕

1 1992年韩国学者尹贞玉教授等曾到吉林珲春调查，她们惊奇地发现，原日军慰安所建筑仍存在，一间间两个半榻榻米大小的狭长的房间、铁格子窗等还在。战争时，这里承担了日军“公众厕所”的作用。至今在东北还有一些战时旧建筑保存着。图为关东军驻扎过的旧屋。〔苏智良2010年摄〕

2 在延吉，军官大都是在名为“银水”的料亭作乐。图为苏智良教授在洛杉矶与曾在吉林被逼为“慰安妇”的韩国老人李玉善交谈。〔2001年摄〕

3 李玉善被从朝鲜半岛骗到吉林，在慰安所受尽凌辱。战后与救她的中国农民结婚，直至丈夫去世后才回到韩国。图为在洛杉矶接受采访的李玉善老人。〔苏智良2001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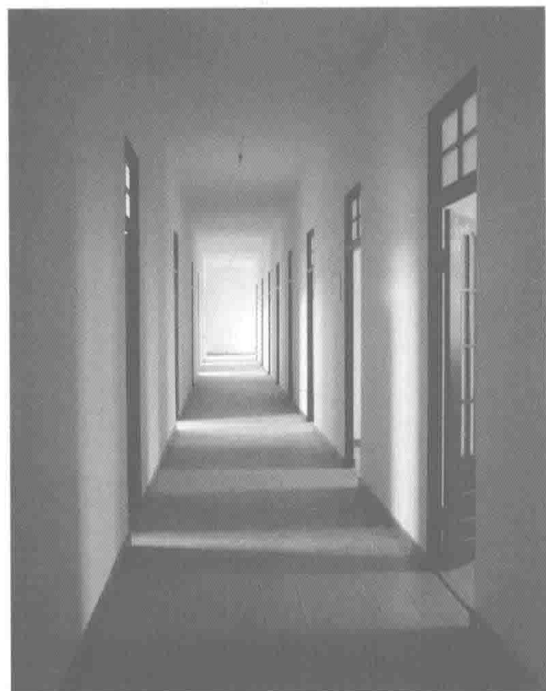




1

■1 在孙吴，一度出现日军2万人面对50个“慰安妇”的局面，于是，日军部队之间就发生了“慰安妇”争夺战，甚至双方拔刀战斗。也有些士兵在演习时溜走，去慰安所或抢夺当地妇女。〔（日）千田夏光：《从军慰安妇》，双叶社1973年版〕

孙吴军人会馆里仅“慰安妇”的房间就有二十多间，它本身就是一个大型慰安所。〔苏智良2010年摄〕



2

■2 孙吴的军人会馆是关东军的主要驻屯地之一，里面设有慰安所。朝鲜人文明金曾在此遭受蹂躏。图为文明金受害的地方。〔苏智良2010年摄〕

■3 日军老兵回忆：1942年在黑龙江穆棱市炮兵队当兵，每天有不同部队进来，因此慰安所十分繁忙。“慰安妇”一个月只能休息一天，也就是性病检查日。军医会来检查，几乎所有的女子都患有子宫内膜炎、阴道炎，长期下来，没有月经，也不会生孩子了。房间里有消毒液。士兵多的时候，在门口排起了长队。士兵们敲打着门，哐哐作响。每个人只有10到15分钟时间，“慰安妇”连吃午饭时间也没有，只好一边吃饭，一边抬屁股。“慰安妇”穿着和服，不能自由外出。慰安所前有宪兵站岗，怕泄露机密。因为军官可以留宿，所以“慰安妇”确实也知道军事机密。〔从军慰安妇110番編集委員会編：《从军慰安妇110番》，第50頁〕

图为黑龙江东宁石门子慰安所残留的瓷器碎片。〔苏智良2001年摄〕



3

1 哈尔滨是东北日军慰安所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市中心的南勋街上曾有不少日军慰安所。〔苏智良 2002 年摄〕

2 哈尔滨市平房区的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和日本空军第八三九二部队，共有官兵 2500 余人。日军在平房附近设置了两个慰安所，一个俗称日本人妓院，一个俗称朝鲜人妓院。曾在院中做杂役的方玉翠老人回忆：“我原在日军七三一部队‘东乡村’洗衣房做劳工。1940 年调到在南厂平房火车站附近的朝鲜人妓院当杂役。到这里才知道这个朝鲜人妓院和旁边的日本人妓院，从来不接待中国人和朝鲜人，而在每天下午都有尉官以下的日本军人及中下层的文职人员（他们称军属）来这里寻欢。实际上这两个不挂牌的‘妓院’是专门为日军七三一部队和八三九二部队下级军官及士兵服务的慰安所。校级以上的军官嫌这里低级不来，他们到哈尔滨市内的将校俱乐部去。这个朝鲜人慰安所拥有二十多名‘慰安妇’，每天接待日军尉官以下的官兵大约四百名。”〔苏智良采访哈尔滨日军七三一部队细菌战罪行陈列馆原馆长韩晓记录〕

图为南勋街上的慰安所旧址。〔苏智良 2002 年摄〕



1



2



1

1 土屋芳雄战后交代：齐齐哈尔有3个日军慰安所，其中一个在现在的电报大楼附近。“在慰安所大门口没有露骨地标明慰安所字样，叫军人俱乐部。其中一个是日本‘慰安妇’的慰安所，两个是朝鲜人的慰安所。‘慰安妇’平时日子接待30到50名士兵，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还要整夜陪伴日军军官，所以是日夜不得休息，没有不得病的。”日苏诺门坎之战时，日军从齐齐哈尔征调1500名士兵到前线增援。这1500人临行前最后一次去慰安所。这时慰安所门前排起了长队，每人限时10分钟，后边的士兵还不断地催促前面的快一点。这些“慰安妇”个个累得死过去一般。〔長岡純夫：《われ地獄へ堕ちん—土屋芳雄憲兵少尉の自传史》，日中出版1985年7月版〕

图中的光辉旅舍是哈尔滨历史悠久的旅馆，战时这里成了慰安所。〔苏智良2001年8月摄〕



2

2 日本老兵市川一郎回忆，在齐齐哈尔的白城子，有慰安所四五处，每个慰安所大约有二三十名“慰安妇”。军医每月要对她们进行一次性病检查。临近战争结束时，军队将要撤离白城子时，在街上放火，想把市街烧光，然后登上货车向南溃逃。〔（日）《阿格拉》杂志1992年17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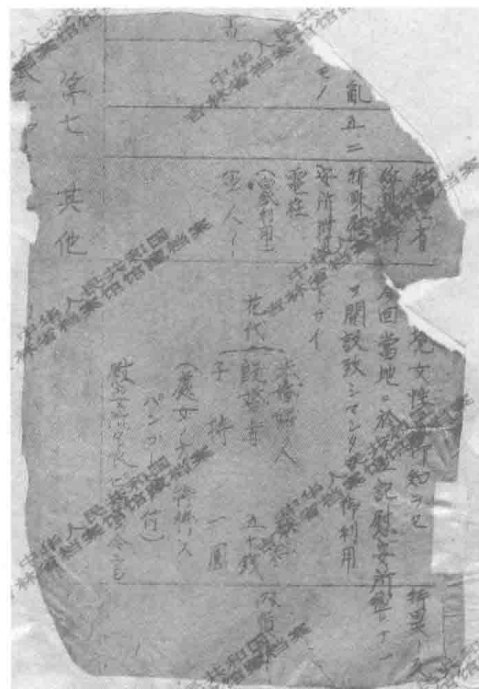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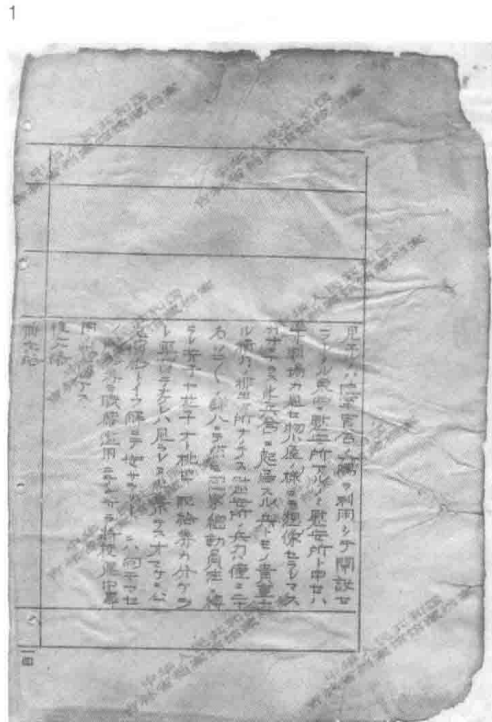
孙吴曾家堡的这幢屋子，战时是日式酒保，里面曾有不少“慰安妇”。〔苏智良2008年摄〕

1 黑龙江东部的日军军事重镇虎头，原有中国慰安所6家，1935年又新辟朝鲜人慰安所2家，1938年增加日本人慰安所3处。1933到1945年，有日本“慰安妇”30名，朝鲜“慰安妇”8名，中国“慰安妇”11名。以1945年计，总计不过四五十人的“慰安妇”，要为1400名日本官兵提供“性服务”。在虎头之战结束后，她们均死在虎头要塞的山洞里，有的人怀里还抱着孩子，成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殉葬品。〔王承礼等主编：《苦难与战争十四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7月版〕

图为东安的关东军士兵宿舍（1937年）。〔《わが聯隊—陸軍郷土歩兵聯隊の記録》，ノーベル書房1978年10月版〕



2 黑河的日本兵武田武二郎给国内友人的信中，披露了军队慰安所的情况：“慰安所的兵力只有20名，都是朝鲜人，均受国家总动员法的制约，分发芳子、花子等粉红色配给券。不是军队的话，无法看到此情此景。因为是打折后的公定价格，所以不面向（非现役的）工薪人员。配给券作为一种职权滥用的方式，专门供给将校。”黑河宪兵队决定扣押这封信。〔吉林省档案馆藏〕



3 一天，牡丹江的日军宪兵队发现在绥阳街“特殊慰安所”附近的电线杆上，贴着一张用白纸写的告示，内容如下：“国境女性敬请周知，此次在当地开设如下慰安所供利用。酬金：未婚——免费；已婚——五十钱；有子女——一元（处女优待，另分给面包和咖啡）。”下面的落款是“慰安所所长P军司令官”。此页上有日本宪兵队判断这是无聊士兵所为的批示内容。此事也可推断，日军出入慰安所是当时非常普遍的行为。〔吉林省档案馆藏〕

六、西南地区的日军慰安所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曾有证据显示，日军在桂林以招工的名义，诱骗中国青年女子充当“慰安妇”。日军在广西的城乡建立了不少慰安所。1942年日军侵入云南滇西地区后，在腊戍、芒市、遮放、畹町、腊勐、腾冲、龙陵等地抢掠傣族、汉族民女，建立慰安所。1944年，在中国军队收复滇西的惨烈攻防战中，日军眼看即将败亡，竟逼迫一些“慰安妇”使用氰化钾等毒药自杀，甚至残忍地将她们杀死，也有一些中国和朝鲜妇女被中国远征军解救，脱离了苦海。



日军占领桂林后，即以设立工厂的名义招募女工，结果这些被招募来的女工全部被日军逼迫做了性奴隶——“慰安妇”。1945年2月，日军某师团计划设立慰安所。在桂林，第五十二旅团的通讯队驻地附近，也有慰安所，里面朝鲜人较多，日本“慰安妇”则很少。无论中国人还是朝鲜人，“慰安妇”的名字大多是“君子”“雅子”“秋子”等。〔陈丽菲 2009年摄于韩国“慰安妇”历史馆〕

■1 据日本随军记者小俣行男记载，1940年9月，在广西南宁的街头，有供日军使用的慰安所，是从广东迁来的，数目有十八处，中国“慰安妇”一百几十人。在有些慰安所里，“慰安妇”的名牌挂在墙上。〔陈丽菲 2009年摄于韩国“慰安妇”历史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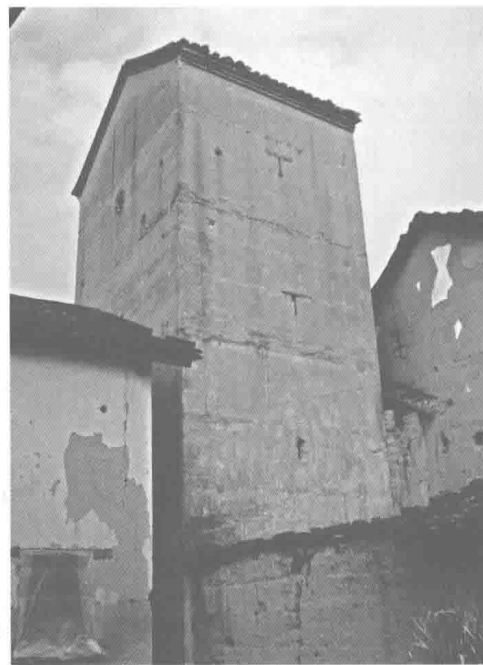
■2 云南芒市的三棵树慰安所由侵华日军第十五集团军第五十六师团开办，时间是1942年夏天至1944年冬天，历时约两年半，“慰安妇”人数不详，有日本妇女、朝鲜妇女、中国妇女，由日军直接管理。芒市的老人们回忆：当年日本兵在街上抓了80个傣族姑娘，用卡车拉到了各个慰安所。等到日军战败时只有一个姑娘活着回家，而这个姑娘也已精神失常。〔陈祖樑提供〕

图为日军白塔慰安所遗址。〔苏智良 2002年摄〕

■3 在广西荔浦，日军在马岭驻扎至少100人，于是在马岭抢占农民房屋设立慰安所，并就地抢掠年轻女子充当性奴隶。这是马岭慰安所的房屋。〔苏智良 2008年摄〕



1



2



3

1 云南腾冲县腾越镇陈家宅慰安所的房屋原来属陈国珍、陈国宝兄弟，他们当时在缅甸做生意。房屋结构为四合院，前后两院，还有两眼水井。“慰安妇”主要是朝鲜人，有三十多个。日军在溃败前，竟将“慰安妇”投入水井中淹死。陈家主人回来后，曾从水井中捞出十几具女性尸体，当时还没有腐烂，都是穿裙子、拖鞋的。
〔陈祖樑 1998 年摄〕

2 1942 年，日军侵入云南西部地区，在腾冲县腾越镇光华路设慰安所。为日军第一四八联队服务，对象是军官，房内挂着日本画，女子穿着和服。“慰安妇”的门上挂着牌子，上面表明该妇女的身体检查日期与军医姓名。大门口有日本士兵站岗守卫。
〔苏智良、陈丽菲 2001 年调查记录〕

图为腾越镇蔡家慰安所一角。
〔苏智良 2002 年摄〕

3 日军在腾冲城内侵占民宅，设立陆军慰安所。
〔陈祖樑提供〕



1

2

3



1



2

1 日军在最后强逼“慰安妇”自杀。中国远征军占领腾冲后，掩埋了这些已开始腐烂的“慰安妇”尸体。〔中共腾冲县委宣传部编：《血色记忆——腾冲抗战见证录》（下册），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291页〕

2 1944年中国军队反攻腾冲时，日军竟将一批“慰安妇”用氰化钾毒死，然后用火焰喷射器毁尸灭迹。战时的腾冲文庙竟也被日军做了慰安所。图为现在的腾冲文庙。〔苏智良2002年摄〕



3

3 据当地老人回忆，1942年，日军赶走腾冲文庙的人员，抓来当地女子，在这里办起了慰安所。〔苏智良2002年摄〕



1

1 根据陈祖樑先生的调查，侵华日军第十五集团第五十六师团第一四八联队某大队（部队长江藤），在腾冲的荷花池开设慰安所，开办时间从1942年10月初至1943年6月底，前后历时约9个月。慰安所的房屋为木结构四合院，系强占前荷花池村民尹家令家的民房开办。图为腾越镇原工商联主委杨之静家，这里也曾是日军慰安所。〔苏智良2009年摄〕



2

2 1942年日军占领云南龙陵后，驻龙陵日军军政班本部长田岛寿嗣下令设立董家沟慰安所，里面关着二十多个中国姑娘。图为董家沟慰安所遗址入口处。〔苏智良2009年摄〕



3

3 龙陵董家沟董家老屋约建造于20世纪30年代，四合院式，中有院子，本地称四合院五天井。老屋上下两层，木结构，雕刻精细，镏金雕花，相当有艺术性，两层的客堂楼还有木制对联等，共有22个房间。〔苏智良2005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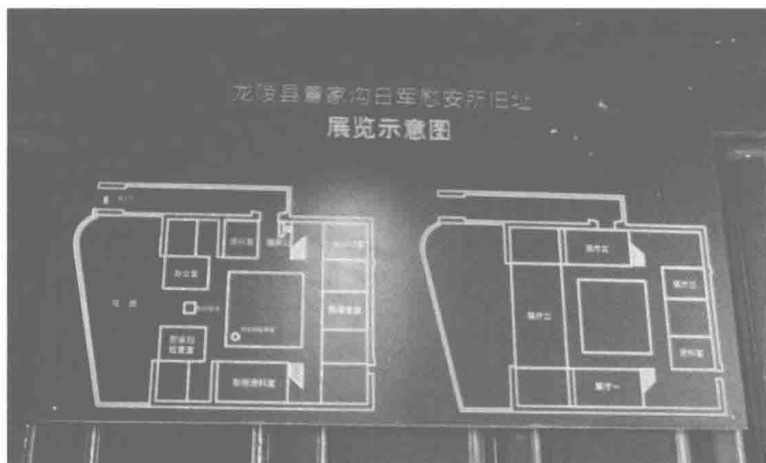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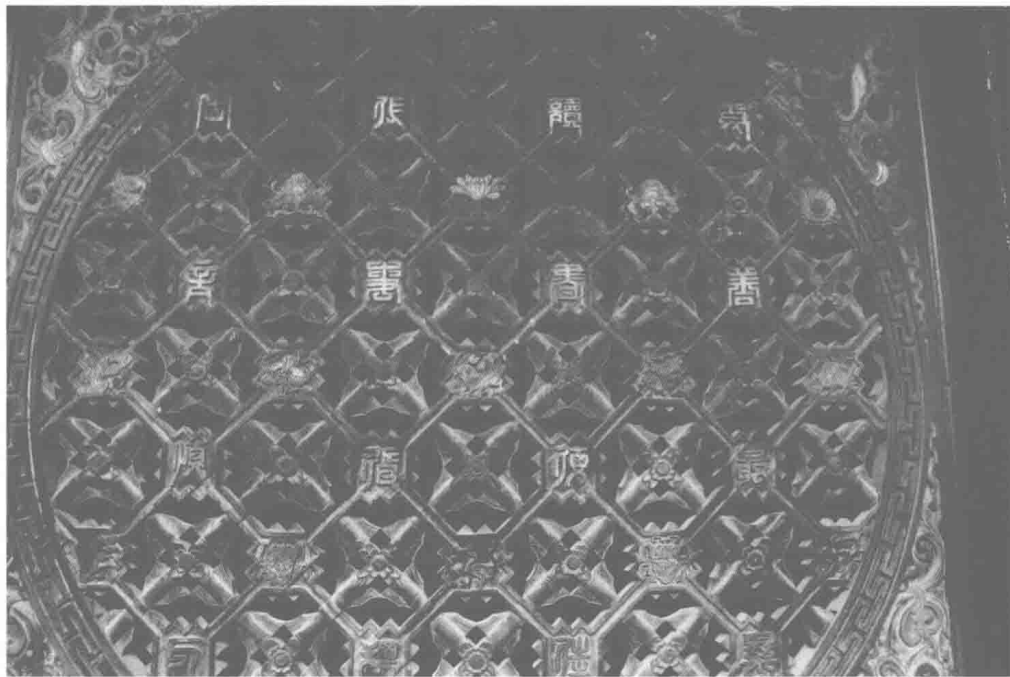
1 龙陵董家沟董家老屋的木窗至今保存完好。〔苏智良 2005 年摄〕

2 董家沟慰安所遗址一度非常残破，这是遗址一角。经各方呼吁，当地政府投资进行了修缮。〔苏智良 2002 年摄〕

3 董家老屋的房梁上有“丙子年”的字样，表明该房屋是 1936 年建造的。〔苏智良 2005 年摄〕

4 如今董家沟慰安所已建成陈列馆，图为馆内示意图。〔苏智良 2012 年摄〕

5 陈列馆复原了日军慰安所的规定，并翻译成了中文，以便让中国观众了解。〔苏智良 2012 年摄〕



4

5



1



2



3

1 董家沟慰安所遗址修缮过程中，发掘出许多慰安所时代的遗物，这是挖出的日式器皿。〔苏智良 2012 年摄〕

2 在董家沟慰安所遗址，发掘出不少“慰安妇”使用的化妆盒、化妆瓶等。〔苏智良 2012 年摄〕

3 如今，董家沟慰安所遗址陈列馆已成为亚洲为数不多的在日军慰安所遗址基础上建成的陈列馆，每天接待着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张国通 2010 年摄〕

■1 2001年8月25日，苏智良、陈丽菲、陈祖樑、沙必璐等在龙陵县外办副主任赵其慧的引导下，寻访了白塔村的日军慰安所旧址。该房屋较完整地保存着。正屋两层，左右厢房，木结构，现由赵姓人氏居住。当地人忌讳讲此处过去为慰安所，门上还挂着道家红布符咒。
〔苏智良2001年摄〕

■2 在滇西大反攻中，中国远征军解救了不少“慰安妇”。这是一批脱离苦海的各国“慰安妇”，看得出她们的心情非常愉快。〔（日）伊藤孝司：《白飘带噙在嘴》，第17页〕

■3 原松山拉孟（腊勐）日军阵地中的慰安所旧址，龙陵县政府建立了指示牌。〔苏智良2010年3月摄〕



1



2



3



1



2



3

1 刊登日本在龙陵腊勐部队全军覆没的1944年9月21日《朝日新闻》，文中仍在美化日军。

2 滇西有不少老人熟知日军占领时期的情况和远征军的故事。腊勐乡的杨家运老人当年被日军拉去干活，他在讲述他所知晓的慰安所故事。〔苏智良2000年摄〕

3 中国远征军的反攻，解救了不少“慰安妇”。这是被中国远征军解救的朝鲜受害者。〔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1 1944年9月3日，中国远征军从龙陵松山战场解救了“慰安妇”，远征军战士正在电话联络，将幸存者送往后方。〔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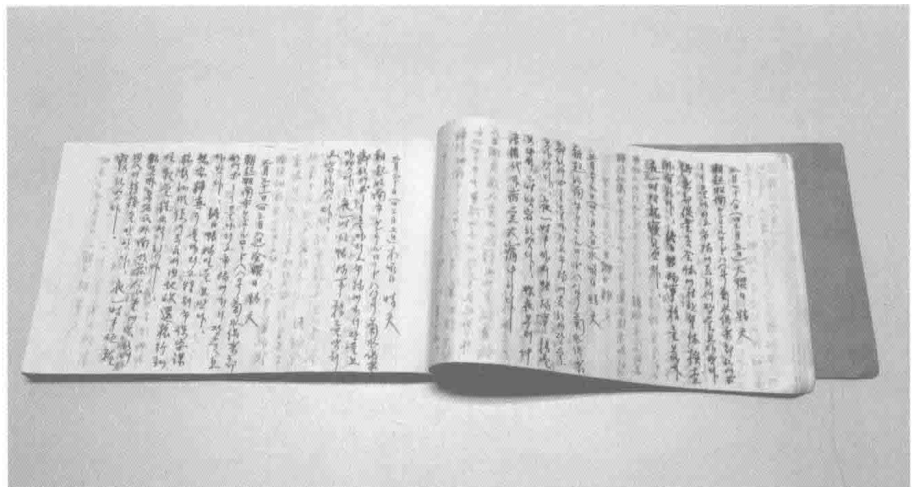
2 这本日本老兵的日记，记载着日军从缅甸到中国西南侵略中的详细情况，包括慰安所和“慰安妇”。日记现藏于韩国民族问题研究所。〔苏智良2014年摄〕

3 1944年11月，日军第三、第十三师团侵入贵州八寨、独山等地。根据日本老兵的回忆，日军在独山设立了慰安所。图为日本老兵村濑守保战时拍摄的各地慰安所的写真集封面。

4 日本老兵金子安次证言，对那些拒绝强奸的妇女，就把她们投进井里，随后将她们的孩子也扔进去。他还按照上级命令，把手榴弹扔进了井里。〔张国通：《为历史作证》，（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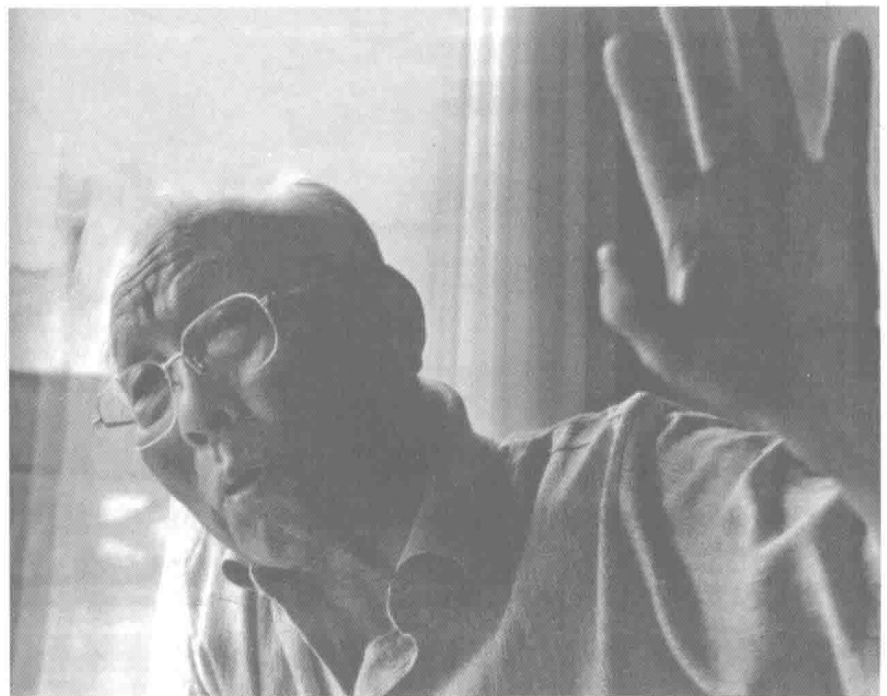
1



2



3



4

七、香港、台湾的日军慰安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香港。1942年4月，日本香港总督部鉴于日军军纪涣散、性病流行，决定加强推行慰安所；“拟计划对慰安所经营者进行限定，将慰安所集中到一定地区，配齐慰安所内的卫生设施，以期使军人和军队聘用人员安全”^[1]。日军香港总医官江口上校找到香港名流、养和院长李树芬，提出，只有设立了慰安所红灯区，士兵的性欲问题获得了解决，才可使香港妇女免于被滋扰。李树芬医生坚决反对，但江口仍决心在港岛设立慰安区。

于是，香港的慰安区便出现了。稍后不久，日军竟公开在媒体上刊登征召“慰安妇”的广告了。萨空了在他的《香港沦陷日记》中记载，曾亲眼目睹日军的“慰安妇招贴”。他写道：1942年1月7日，“今日香港街头又出现了一种手写的招贴，上面写着‘日本军慰安所’招用军妓，并有‘名额有限，报名从速’的字样”^[2]。

在湾仔的骆克道周边，出现了一批供普通士兵使用的慰安所。而“千岁馆”等是日军军官的享乐场所。日军步兵第二二八联队所著的《南华抄》（1978年版）一书，记载了该联队在香港时官兵到过的慰安所。

同样，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地区，从台北到台南，从城市到乡村，也出现了许多日军慰安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湾强征妇女到南洋去，仅台北妇女救援基金会的调查登记，人数就有上千人。这是比较保守的数字^[3]。显然，台湾总督府深度参与了征召台湾妇女充当“慰安妇”并在台湾各地设立慰安所^[4]。台湾拓殖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台拓公司）是由日本官方与民间财阀企业合资，于1936年成立，它是日本准备发动侵华战争、肩负日本国家特殊使命的国策公司。台拓公司总部设在台北，在东京设有分部。战时为配合占领军，在广州、海口、河内、西贡等地设有分部，其主要活动之一是设立慰安所。据调查，在彰化、台北、台中、屏东、基隆、高雄等地设立了慰安所。台湾“慰安妇”被送到华北、上海、海南等地方，也有不少朝鲜“慰安妇”被送到台湾充当日军性奴隶。

[1]（日）吉见义明主编：《从军慰安妇资料集》，大月书店1992年12月版，第295—297页。

[2] 萨空了：《香港沦陷日记》，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版，第130页。

[3] 台北市妇女救援基金会采访记录：《铁盒里的青春——台籍慰安妇的故事》，（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71页。

[4] 朱德兰：《台湾总督府与慰安妇》，（东京）明石书店2005年11月版。

■1 “千岁馆”位于坚尼地道，在同济中学里面，是两幢独立的三层楼宇。知情者说，里面陈设精美豪华，纸窗灯笼，木栏草席，有浓厚的日本艺伎院之风味。日军占领后，即指定“千岁馆”为军官高级慰安所。一时，这里军车川流不息，侵略军的头目们在此花天酒地。“千岁馆”成为当时的畸形繁华地。同样，骆克道也曾有不少慰安所。〔苏智良 2010 年摄〕

■2 日军占领香港后，第三十八师团第二三〇联队的官兵冲进圣斯蒂芬妮学院，强暴了该学院的女医生和护士，然后将她们带到慰安所，强征为性奴隶。后来有的受害者还被运至新加坡，被编入第 44532 号慰安营，战争结束时，又被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用毒气弹和炸弹结束了生命。香港岛上有不少日军的慰安所。这是骆克道上的慰安所遗址。〔苏智良 1998 年摄〕

■3 湾仔是香港日军慰安所的集中地。日本香港副总督平野茂选择在海旁街的湾仔圈定一块长 800 公尺的地方，逼迫居民在 3 天内迁走，不久，一个特大型的慰安所便在湾仔出现了，里面有数百个房间，每日来此的日军官兵川流不息。〔苏智良 1998 年摄〕

■4 香港沦陷时期，日军还征用过一些酒店，将其改作临时慰安所。汉奸也奉日军之命令，征集中国女子，设立慰安所以供日本士兵使用。九龙旺角弥登道上的伦智中学，就被日军占领改造为慰安所。图为湾仔最大的日军慰安所遗址。〔苏智良 1998 年摄〕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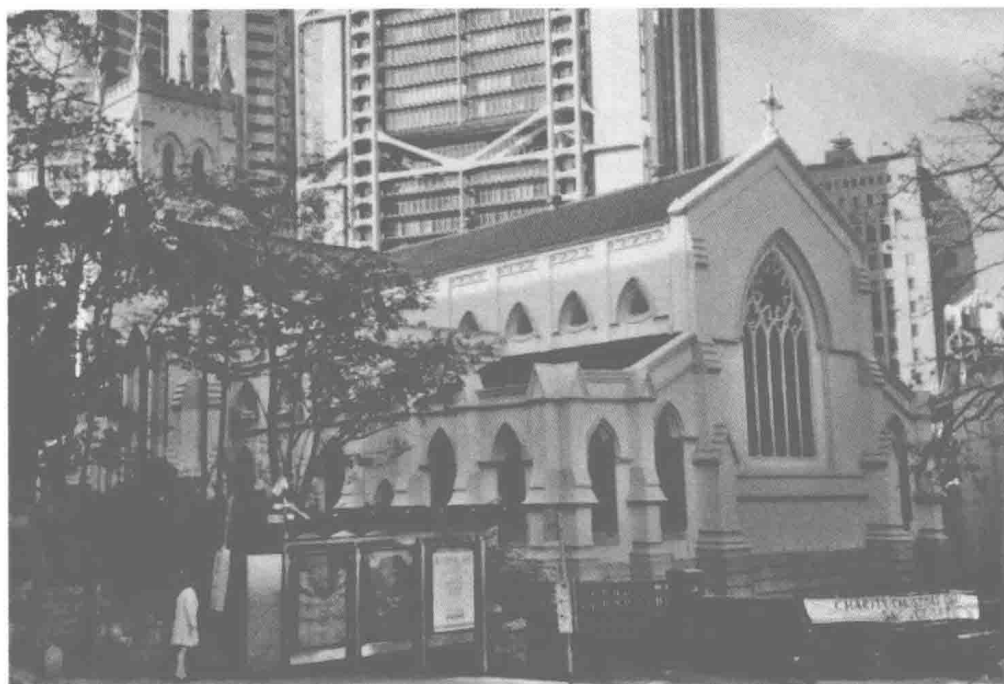
4



1

■1 香港士他令道上的九龙城浸信会教堂，战时曾被日军占领，并准备建立慰安所。这一计划因被较为正直的参谋长菅波阻止而未实现。菅波说：“若要把教堂改做慰安所，倒不如烧掉它，反而更体面。”〔（日）鲛岛盛隆：《香港回想录》，龚书森译，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71年版，第96页〕

图为香港士他令道。〔苏智良2010年摄〕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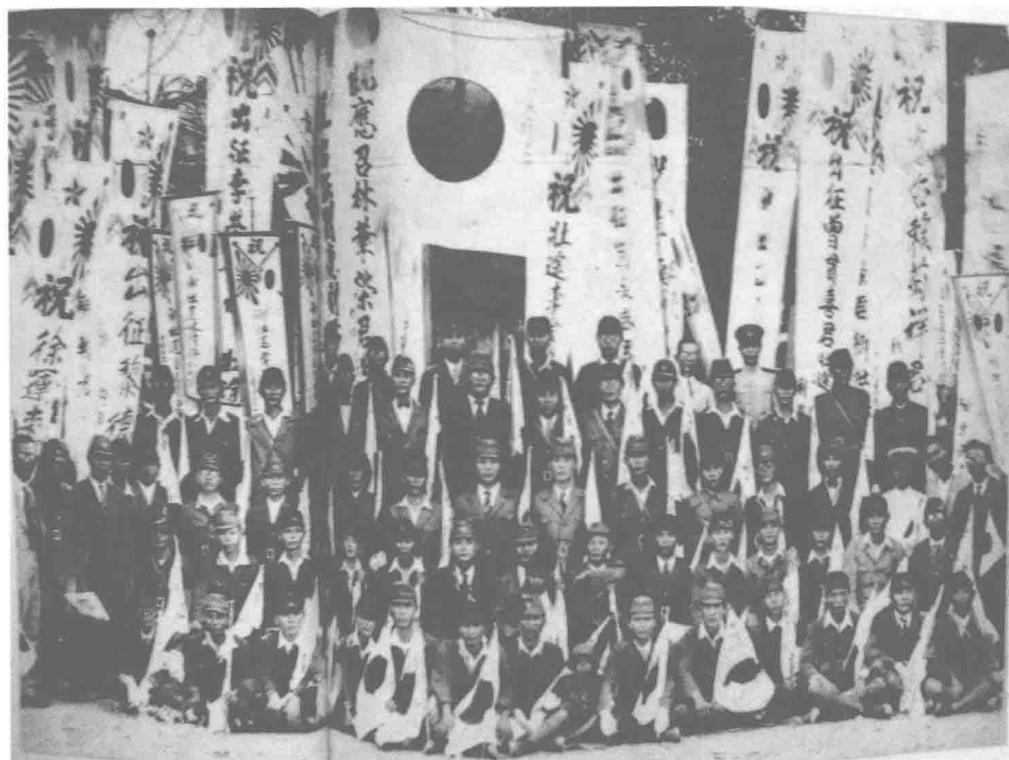
■2 花园道上的圣约翰教堂，是老牌的英国人教会，每逢英国国家性节日，典礼多在这里举行，但日军占领香港后被视此为“敌产”而遭接收。日军实际上并不需要教堂，他们竟将教堂改作了军人及军属的俱乐部。图为港岛上的教堂。〔苏智良1999年摄〕

■1 新界粉岭，远离港岛和九龙的繁华地，现在那里有一条主要道路名沙头角路。这里虽因广九铁路设有粉岭车站，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仍没有繁华起来，想见战前这里是很荒凉的。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偏僻之地，竟也有日军设立的慰安所。图为新界粉岭楼村的老屋。〔苏智良1999年摄〕



1

■2 台湾拓殖株式会社是由日本官方与民间财阀企业合资，于1936年成立，它是日本准备发动侵华战争、肩负日本国家特殊使命的国策公司。台拓公司总部设在台北，在东京设有分部。战时为配合日本占领军，在广州、海口、河内、西贡等地设有分部，其主要活动之一是设立慰安所。图为日军在祈祷武运长久。〔中央研究院朱德兰教授提供〕



2

1 1936—1943 年間に、台湾地方公署公开发表慰安所兴建计划、在基隆市、台北市、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市等地设立军人慰安所、为日军提供性服务。这是屏东建立慰安所的新闻报道。〔《台湾日日新报》1943 年 9 月 14 日、第 4 版〕

2 在基隆市、1940 年 7 月、建成木造的二层慰安所。这是关于台中市“娱乐慰安所”建造的新闻。〔《台湾日日新报》1943 年 6 月 12 日、第 4 版〕

軍人慰安所を 屏東に新設

武徳殿の西隣りに

【屏東通信】屏東市では近年の急激たる軍人慰安所を急々州内防務會の手により工費二万四千円を投じて建設する事となり、この程工事入札に附した結果、北村組に落札し、近々着工の運びとなつた。同慰安所は武徳殿の西隣りに建設され、武徳殿を他に移轉せしめ、この跡に建設せんとするもので、設計は二階建ての堂々たるもの、五十名程の大ホール兼會所を、軍士突発的攻撃等を受ける慰安所を取入れ軍人の娯楽慰安の一施設とならうとする。

1

軍人慰安所建設

嘉義有志が市と協力し

公會堂の午後

【嘉義電話】嘉義市が支那事變を記念し且つ皇軍將兵に感謝の一端として計画中の軍人慰安所建設は、最近民間有志者の積極的働きにより市と協力の下に工費二万四千程の豫算で急上具體的進行を見ることとなつたが建設敷地は今の所位留その他各種の條件より大體公會堂内を最適當と見られ完成の上は將兵の慰安娛樂を原則とするが維持經營の都合上會員組織の市民のクラブにも兼用する事を考慮されてゐるが近日中世話人會を開き種々打合せをなし実行に移す事となつた。

【嘉義電話】嘉義市が支那事變を記念し且つ皇軍將兵に感謝の一端として計画中の軍人慰安所建設は、最近民間有志者の積極的働きにより市と協力の下に工費二万四千程の豫算で急上具體的進行を見ることとなつたが建設敷地は今の所位留その他各種の條件より大體公會堂内を最適當と見られ完成の上は將兵の慰安娛樂を原則とするが維持經營の都合上會員組織の市民のクラブにも兼用する事を考慮されてゐるが近日中世話人會を開き種々打合せをなし実行に移す事となつた。

【嘉義電話】嘉義市が支那事變を記念し且つ皇軍將兵に感謝の一端として計画中の軍人慰安所建設は、最近民間有志者の積極的働きにより市と協力の下に工費二万四千程の豫算で急上具體的進行を見ることとなつたが建設敷地は今の所位留その他各種の條件より大體公會堂内を最適當と見られ完成の上は將兵の慰安娛樂を原則とするが維持經營の都合上會員組織の市民のクラブにも兼用する事を考慮されてゐるが近日中世話人會を開き種々打合せをなし実行に移す事となつた。

2

1 位于台南的高雄市设立了多个慰安所，有海军慰安所、军人会馆等。朱德兰教授提出，台湾的慰安所总数应超过海南岛六十多个的数量。这是朱教授绘制的台湾日军慰安所分布图。〔朱德兰：《台湾慰安妇》，（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 4 月版，第 189 页〕

2 1939 年 7 月，嘉义市政府以 2 万元工程费设置军人慰安所。图为《台湾日日新报》1939 年 9 月 16 日第 5 版刊登的新闻。

3 1939 年 4 月 1 日，台湾总督府官房调查课长木原圆次命令台湾台拓公司理事高山三平，尽快在台北募集 90 名“艺伎”“艺伎兼娼妓”等前往海南岛，为当地的日海军服务。这是征调的文件。〔朱德兰编辑、解说：《台湾慰安妇关系资料集》第 1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 217 页〕



1

臺中市に、工費十萬圓
軍人慰安所（假稱）

【臺中市訊】最近、海に、空に敵艦を撃つ大砲隊を呼びつけてゐる皇軍將兵に慰養の一環にと臺中市では飛騨に從軍してゐる兵隊さん達の遊びの慰養として市内に慰安所なる地を指定して軍人慰安所（假稱）を建設すべく自下財源を運んでゐるが、工費は十萬圓内外の額である。

壯烈南

2

秘電報譯 六月三日 發信者 考 謀長

訓 官宛 第九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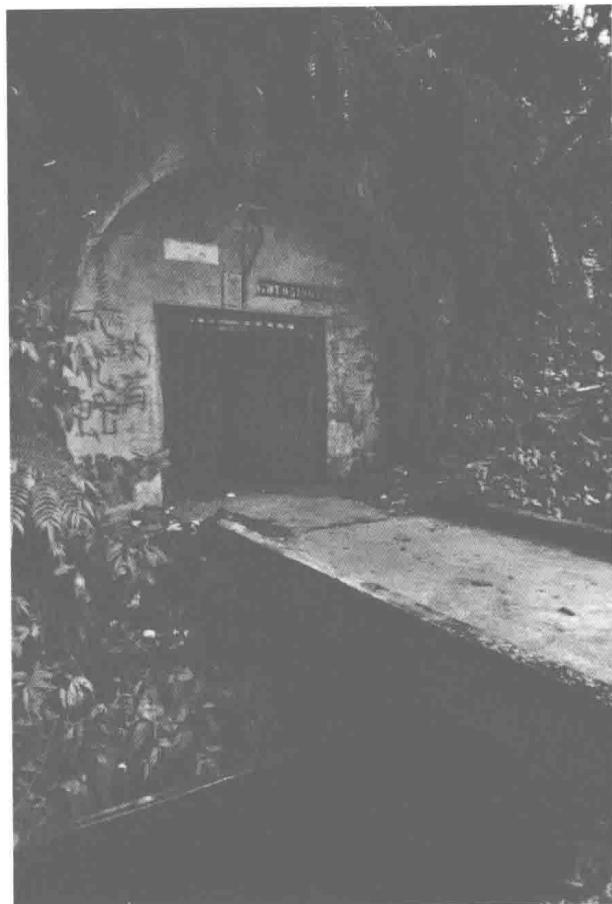
本年三月廿六日第六〇二號申請陸軍省電第一八八號認可。依此ホルネオに派遣した特種慰安婦五十名。隨之現地着後、實況人員不足に據り、堪ハル者等々生スル爲、尙二十名増加ノ要アリトシ左記列奉聞

3



1

1 台湾女子陈妹被日军带到海南，1944年8月，日军给她拍了这张照片，背后就是日军慰安所。〔妇女救援基金会主编：《沉默的伤痕——日军“慰安妇”历史影像书》，第33页〕



2

2 花莲县秀林乡山洞——原住民阿嬷当年被逼为日军性奴隶遭受欺辱的地点。〔妇女救援基金会主编：《沉默的伤痕——日军“慰安妇”历史影像书》，第42页〕



1

1 2005年9月，苏智良教授在平壤出席追究日本战争责任国际会议时，与台湾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合影。〔河北大学教授刘宝辰2005年摄〕

2 日本老兵证言：分遣队一般都没有配给安全套，因此有很多“慰安妇”怀了孕。但是，只要还能受得住，怀了孕也还得被使用，实在使用不了了，便拉到壕沟外面去，绑在木桩上，做新兵练习突刺用的靶子。当这名“慰安妇”连同腹中那不知是哪个大兵的胎儿一同被杀死之后，马上被就地埋掉。在长达15年的战争中，这两三千个据点里被暗中杀掉、埋掉的中国妇女是数也数不清的，恐怕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人。〔何吉：《日军强逼中国妇女为“慰安妇”资料摘编》，《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

安全套被日军视为战争物质而运往前线。图为当时使用的日军战略物质“突击一番”安全套。〔中国“慰安妇”资料馆所藏图片〕



2

第三章

“慰安妇”制度的中国受害者



早在侵华战争初期，日军高层便号召部队官兵“抢粮于敌”，在这一口号下，日军需要的各种物资及补给品尽可能抢自中国战场，其中也包括性奴隶——“慰安妇”。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升级，侵华日军人数不断增加，日军更加残暴地抢夺中国女子充当“慰安妇”。

被强逼为“慰安妇”的中国妇女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的妇女，其中有东北满族和朝鲜族、台湾高山族、云南傣族、海南苗族和黎族、广西壮族和瑶族等。吉林延边地区的朝鲜族是最早被征用充当性奴隶的民族。“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关东军便在东北地区强掠朝鲜族年轻女子充当性奴隶。

尽管来源与途径有不同，但是，在我们为期近20年的调查中，（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中国的“慰安妇”均是日本侵略者强逼而成的。这类事例举不胜举。1942年日军在海南陵水县广设据点后，立即下令汉奸到各个村寨强征民女，15岁的黎族少女陈亚扁便被押入军营，她回忆当初是被汉奸团长征为后勤服务队进入军营，白天干杂活，晚上被迫接受日军性强暴，还轮换了不同的地方，忍受了三年多非人的生活，直至1945年日军投降，才见天日，同行的姐妹在此期间不少死于非命。与她一同被迫沦为“慰安妇”的还有陈金妹、陈亚妹、陈进女、卓理女、陈亚曾、卓亚天、卓石理、卓毛天、胡有英、卓亚广、陈亚合、卓毛定等。1944年8月的一天，海南保亭县的黎族少女杨嫫榜在田寮里守田赶鸟。一队日军路过看见后，即将杨嫫榜打倒在地，进行轮奸；然后，押着她回兵营，编入战地后勤服务队，供他们蹂躏^{〔1〕}。

大量史料表明，由于中日两国处于交战状态，日军对中国妇女的欺凌、迫害最惨无人道。例如，海南石碌铁矿慰安所建筑面积约300多平方米。室内中间一条约1.5米宽的通道，两边对列隔成20多个小房间。为防止“慰安妇”逃跑，慰安所四周均设警戒网，日夜都有日本兵巡逻，戒备森严。对逃跑被抓回来的“慰安妇”，有的当场被活活打死，有的被脱掉衣服后赤裸着身子吊在树上毒打，施加电刑、灌水等。“慰安妇”每人每天接客最少8次，碰到日本官兵休息日，多时接客竟达24次。每个星期她们都必须集中排队到医务室做一次体检，以防性病传染。慰安所大门有日军把守，日军官兵凭特制的小木牌进门。“慰安妇”在接客时，稍有怠慢，便惨遭毒打，完全是性奴隶状态。这个石碌铁矿慰安所里有300多名青年妇女，被毒打、奸淫、折磨，惨遭暴行致死和病死、饿死的就有200多人。一个叫黄玉霞的“慰安妇”，

〔1〕符和积主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海口）海南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533页。

因不堪凌辱，乘黑夜在慰安所的一棵大树上上吊自尽。另一位叫娜芳姐的“慰安妇”，跟着10多个姐妹一起跳出苦海后，却无颜回家去见丈夫和孩子，从悬崖上纵身跳下，抛尸异乡。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幸存下来的“慰安妇”只有10多人^{〔1〕}。

〔1〕符和积主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海口）海南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749页。

一、中国受害者的身份与年龄

在日军征用的中国“慰安妇”中，部分是21岁以上的成年妇女，还有大量未成年女子。据日军官方文件，曾征用14岁的台湾少女运至中国南方。1940年8月，台湾步兵第一联队中，就携带了6名少女，其中1名18岁，2名不满16岁，1名15岁，2名只有14岁^[1]。调查发现，在中国很多地区都有未成年的日军“慰安妇”受害者，云南、海南和广西等地的一些少数民族少女被掳掠为日军性奴隶时，很多是未成年人，如陈亚扁、蔡爱花被抓入慰安所时只有15岁，郑金女被抓时只有13岁，南京的雷桂英被日本兵强暴成为性奴隶时只有13岁。

被日军强征的中国妇女，其身份多是农民，也有工人、学生、店员、佣工、家庭妇女、被俘的女战士等，甚至还有尼姑。日军占领芜湖后，就曾到尼姑庵劫掠年轻的尼姑^[2]。



1942年夏天，雷桂英月经初次来潮，日本人山本即逼迫她也充当“慰安妇”。她回忆：“日本兵把我拖出去，把我的裤子强行脱掉后扔在大通铺上，我在反抗中把手腕磕伤了，现在还能看得到伤口。然后，日本兵用两个膝盖顶在我的肚子上，把我压在下面，同时还用军刀的刀把猛砸我的脑袋，就这样把我强奸了。”雷桂英腿上有刺刀的伤痕。〔苏智良2006年摄〕

[1] (日)吉见义明主编：《从军慰安妇资料集》，大月书店1992年12月版，第130—137页。

[2] 汪业亚：《凤宜楼“慰安所”始末》，《芜湖文史资料》第3辑，第120页。

1 陈桂英战前住在上海。日军占领上海后，兵荒马乱，难以活命。这时有人来招工，她应征后，便被日伪人员骗至北国，后被迫进入黑龙江东宁的慰安所，饱受欺凌。图为她20岁时在东宁的留影。〔苏智良2001年摄〕



1



2

2 陈桂英记得，东宁绥阳镇地处与苏联对峙的前线，驻扎着不少日军官兵，还有师团的司令部。绥阳的慰安所有二十多个，她在“乔燕堂”慰安所。她回忆，“日本兵只给老板钱，我没有钱。我只是吃三顿饭，一周改善一次伙食”。陈桂英自离开上海后，六十多年里再也没有回过上海，于2004年去世。图为陈桂英生前的照片。〔苏智良2001年摄〕

3 1941年底，南京汤山的雷桂英在汤山高台坡一个日本人家做佣人。这个叫作山本的日本人的职业就是开设慰安所。慰安所有17个中国“慰安妇”。这是高台坡的慰安所遗址（今为汤山农村信用社，地址为汤泉东路61号）。〔苏智良2006年摄〕



3

4 香港离岛隐居的阿月老人曾控诉说：“全家死光，我还被舅父卖给日本人家做女佣，自己虽不愿意，但又不甘心就此死去。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现时想起还觉得无面目见人。”〔《星岛晚报》1992年7月12日〕

图为2001年苏智良教授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的日本侵略亚洲见证会上，与受害者李秀梅老人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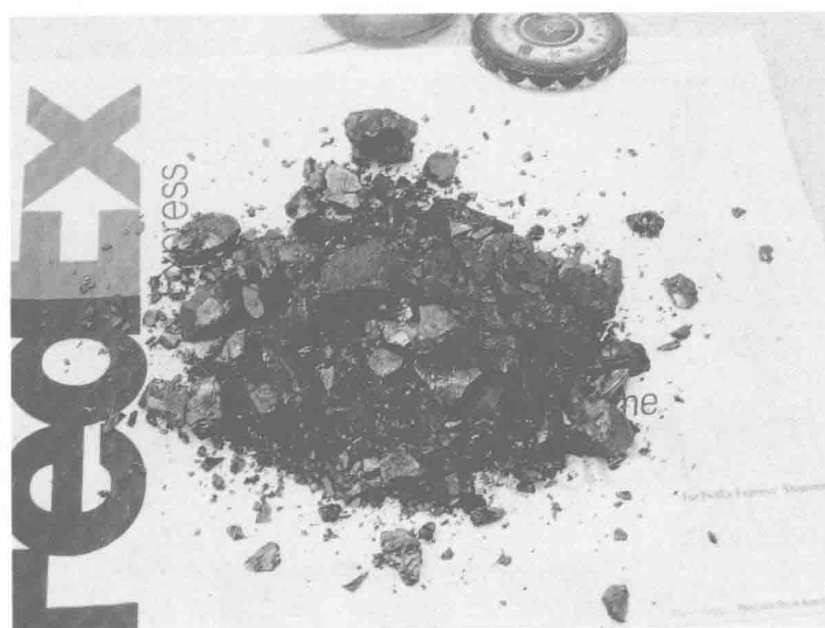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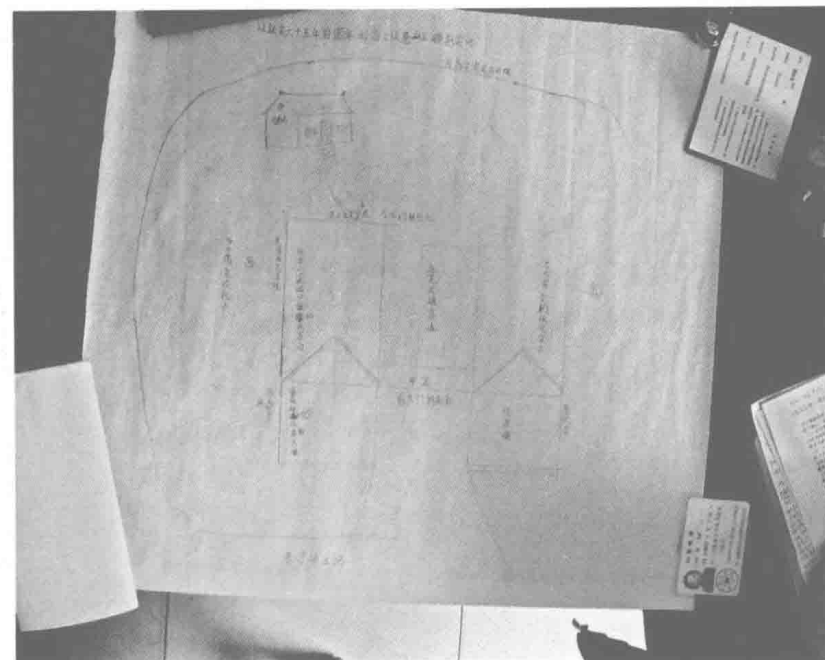
1

1 在高台坡慰安所，雷桂英受尽凌辱，直到老年，她头上还留有被日本兵毒打的疤痕。〔苏智良 2006 年摄〕



2

2 1943年冬天的一个凌晨，趁人还在熟睡的时候，雷桂英悄悄地从慰安所的后门逃了出来。从慰安所逃出时，她将慰安所里消毒身子用的药带出，放在家中，一直没有使用过。这就是她捐献的高锰酸钾，今存于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资料馆。〔苏智良 2006 年摄〕



3

3 日军高台坡慰安所示意图，这是根据雷桂英的回忆绘制的。她说，在慰安所里，姑娘的生活就像奴隶一样。整日除了吃饭，就是遭受日本兵的凌辱，甚至有些姑娘被折磨死了。说起往事，雷桂英悲痛不已。〔苏智良 2007 年摄〕

1 2006年5月6日，苏智良教授等与各报记者到雷桂英家调查探望时，正遇上雷大娘78岁诞辰，大家购买了生日蛋糕，唱着生日歌为她祝福。〔苏智良2006年摄〕

2 雷桂英大娘当时的卧室。〔苏智良2006年摄〕

3 雷桂英老人多次来上海，向各国友人讲述她的受害经历。图为2006年她给香港浸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师生作报告后与大家的合影。〔姚霏2006年摄〕



1



2



3

■ 1 雷桂英老人来到上海，向加拿大友人讲述抗战时期自己的遭难和所见所闻，回忆往事，雷大娘十分痛苦。〔苏智良 2006 年摄〕

■ 2 日军在天津的最高军事机关防卫司令部也设有慰安所，由当地臭名昭著的大恶霸王士海统率的武装别动队负责抢劫、绑架年轻妇女，定期献纳给日本防卫司令部充当“慰安妇”。每批约二三十人，以三个星期为期，实行轮换。日本兵时常迫害被抓来的女性。〔天津市档案馆藏〕

图为受害者尹玉林老人在回忆当时的受害情况，并模仿日本兵打人的场景。〔苏智良 2006 年摄〕

■ 3 海南乐东县黄流机场的日军慰安所称“军中乐园”，设在黄流机场东门外围。第一慰安所有“慰安妇”5人，专供日军航空部队军官使用；第二慰安所有“慰安妇”16人，供航空部队士兵使用。受害者往往遭受日本兵殴打。海南苗族邓玉民老人战时被抓为日军性奴隶，至今她背部仍留有日本兵刺刀划下的长长伤痕。〔苏智良 2014 年摄〕



1



2



3

1 海南北黎市慰安所的“慰安妇”，有时一天最多要遭到二十多名日本兵欺凌。其老板是从台湾或朝鲜挑选而来的女人，心狠手辣，往往强迫“慰安妇”抱病接客，不达到规定的人数就不给吃饭休息，因而有的“慰安妇”被活活折磨至死；有的不堪受辱而拼死逃走，若被抓回便遭到严刑拷打，或致残或被打死均无人过问；有的“慰安妇”实在过不了这非人的生活而上吊或服毒自杀，用死来摆脱这个人间“魔窟”。对于这些死于非命者，日军仅用一张草席裹尸，挖一个土坑掩埋了事。可怜这些抱着养家的愿望来海南岛求职的女性，竟化作抛骨他乡的孤魂。图为海南澄迈县的三位受害者（右起：符美菊、王美金、王志凤）。〔2013年摄，海南澄迈县政协提供〕



1

2 在临高县的加来、临城、新盈，战时曾设有三个慰安所，被日军抓来强迫当“慰安妇”的妇女数以百计。王玉开老人就是当年被抓入慰安所的受害者。2014年1月，王玉开老人不幸去世。〔张国通2012年摄〕



2

3 1940年1月5日，日军川冈队长在今新盈镇红民街设立了一个慰安所。这个慰安所原是三间民房，其中两间给4个“慰安妇”居住，中间用木板隔开，一间为管理人员（两个日本中年妇女）居住。三间民房的后面又有三小间低矮的瓦房，其中一间为“饭堂”，一间为洗澡堂，一间为勤杂人员居住。在海南临高，回忆受害往事，90岁的林爱兰老人不禁痛哭流涕。〔苏圣捷2014年摄〕



3



1

■1 日本记者千田夏光记载：如果有“慰安妇”怀孕了，野蛮的关东军常常把怀孕的“慰安妇”扔掉，并说：“随便你到哪里去，到你自已想去的地方去吧！”连1元钱也不给。〔（日）千田夏光：《从军慰安妇》〕

图为在黑龙江东宁受害的金淑兰老人，回忆往事，她泪流不止。〔苏智良2001年摄〕



2

■2 一个日本老兵回忆在天津去慰安所的情景时说，慰安所只有3个塌塌米的房间，门口有20到30个士兵排队，时间是每人只有2—3分钟。因此，士兵在排队时为了尽量抓紧时间，已将短裤脱了下来。“慰安妇”最初穿着土黄色的军服，后来穿中国衣服的女子增加了。中国的“慰安妇”只有十多岁，她们每人一天要接待100人。〔从军慰安妇110番編集委員会編集：《从军慰安妇110番》，明石書店1992年版〕图为日军士兵拍摄的中国“慰安妇”照片。〔《萩岛静夫日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62页〕

■3 蔡爱花1926年出生于海南澄迈县中兴镇。1941年她15岁时被日军抓入中兴镇据点，成为“慰安妇”。其堂姐蔡金和被日军迫害致死。蔡爱花后来出逃，一直藏身于深山之中，直至日本投降。战后，蔡爱花体弱多病，一直卧病在床，于2012年9月病逝。〔黄大强2008年摄〕



3

1 日本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在回忆录中记述说，日军行进途中，随意抓捕中国女子，设立临时慰安所。日军到江苏东台县三仓河镇时，小仓队长即向维持会提出“需要姑娘”。维持会的代表只得表示：“这个镇没有妓女，可以从附近的村庄中找些良家姑娘。”于是，几天后，十多名良家少女被押到日军驻地，在较大的民房里，慰安所就这样开张了。图为江苏如皋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幸存者周粉英。〔苏智良 2007 年摄〕



1



2

2 1938 年，江苏如皋县白蒲镇下辖的杨家园村的年轻女子周粉英被抓入白蒲日军慰安所。她记得被关押在里面的中国女子有 40 多人。每个人都有编号，她的编号是 1 号。慰安所防守很严，昼夜都有日本士兵轮班看守，甚至连她们上厕所也有人跟随。图为双目失明的周粉英老人。〔苏智良 2007 年摄〕



3

3 日军的蹂躏给周粉英老人带来一生的痛苦，她的丈夫为报仇而投军抗日，后被日军杀死。她不断哭泣，渐至双目失明，同时留下了妇科病后遗症，到了晚年，每天几乎都要花 8 小时在卫生间里，排尿极其困难，后来被确诊为“盆腔肿瘤晚期”，之后病情越来越严重。2008 年 7 月 6 日，92 岁的周粉英离开了人世。图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及陈丽菲在周粉英家调查慰问时的合影。〔陈克涛 2007 年摄〕

4 图为国家民政部 1983 年颁发给周粉英丈夫倪金成的烈士证书。〔苏智良 2006 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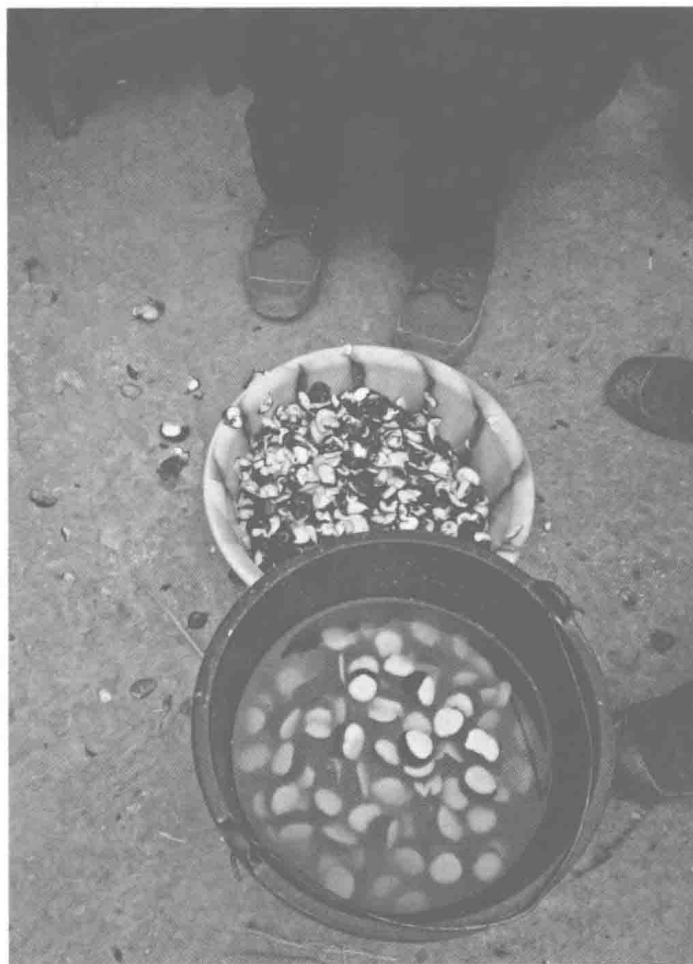
4



1



2



3

1 何玉珍老人，生活在广西荔浦新坪镇广福村坡上屯，战时曾被日军抓入慰安所。〔陈丽菲 2008 年摄〕

2 八十多岁的何玉珍老人饱经风霜，双手粗糙，布满了皱纹。〔陈丽菲 2008 年摄〕

3 一到冬天，何玉珍老人每天的劳动就是削荸荠出售，以换取生活费。2014 年 11 月，何玉珍老人逝世。〔陈丽菲 2008 年摄〕

1 图为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周变香老人。
〔姚霏 2006 年摄〕



1

2 1943 年 6 月，日军 3500 人侵入八路军易县狼牙山地区进行大扫荡，在“菜园沟另一山庄，敌围住妇女百余，均迫令将衣服脱去，投火焚之；赤身为敌担水、挑菜、背鸡、抬子弹数十里，敌则一旁侧目观笑，兴之所至，山坡道上，随处掳住强奸，夜晚并分配兽军，每班妇女几个加以轮奸。此种万恶滔天之残暴罪行，遍及敌寇所到每一个村庄”。〔《晋察冀日报》1943 年 6 月 6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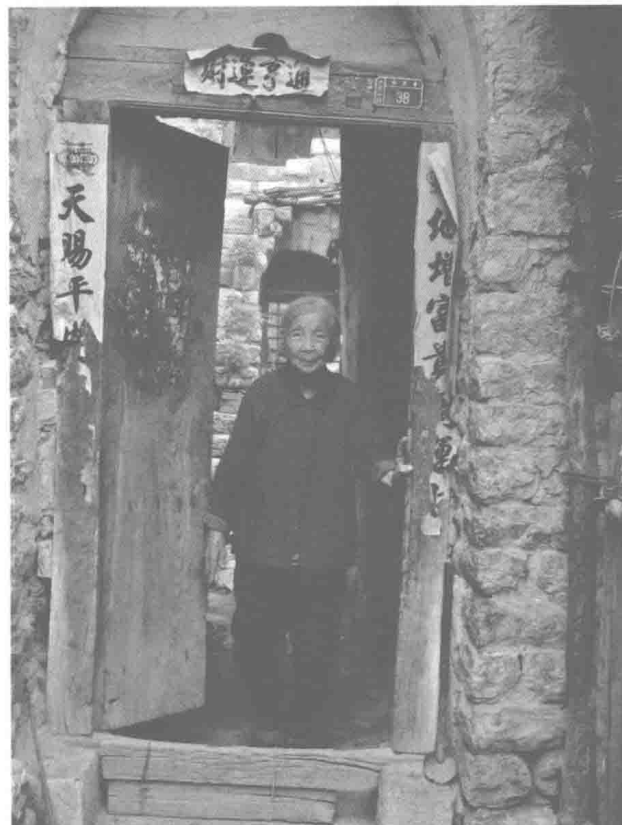
图为山西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周喜香老人。
〔姚霏 2006 年摄〕



2

3 在保定，日军第一一〇师团控制区也设有各种慰安所，“慰安妇”被按照国籍分开。朝鲜人的慰安所通常有二三十人，大多是年轻的女孩子，还配备了翻译。慰安所由野战医院管理，有些设在农村，条件简陋，没有电气，没有自来水。〔慰安妇情报电话报告集編集委员会編集：《性と侵略—軍隊慰安所 84 か所元日本兵らの証言》，第 81—84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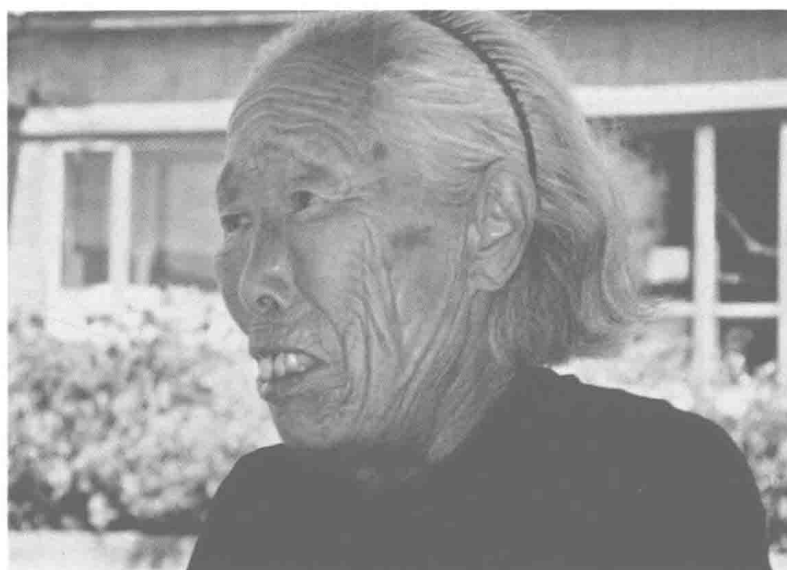
图为山西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尚春燕老人。
〔姚霏 2006 年摄〕



3



1 来自朝鲜的李风云，1940年被诱骗到黑龙江东宁，成了石泽郎慰安所的性奴隶，受尽凌辱——在那里，她的日文名字发音是“西刀米”。李风云战后仍生活在东宁。图为2001年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在东宁看望李风云老人。〔敬老院工作人员摄〕



2 京都出身的原上等兵(70岁)证言：1943—1945年间，在满洲牡丹江北面的东安、东宁(今牡丹江市)驻扎。在东安有慰安所，与军队一起行动，“慰安妇”有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日本人“慰安妇”只有军官才能接触。一般士兵只能找中国人和朝鲜人。与士兵接触的“慰安妇”，年龄在二十二三岁。一个慰安所有15到20人。〔慰安婦情報電話報告集編集委員会編集：《性と侵略—軍隊慰安所84か所元日本兵らの証言》，第40—41頁〕“慰安妇”的名字似乎是启子(けいこ)、喜子(のぶこ)、纯子(じゅんこ)、绫子(あやこ)，这样的名字是很多的。在东宁受害的李风云老人回忆往事，老泪纵横。〔苏智良2001年摄〕



3 一位在难民区生活过的市民说，他经常看见佩带臂章的汉奸，押着挑选出的“花姑娘”从中正桥(当年漓江上的浮桥)上通过岗哨，将“花姑娘”送给日本军官。许多被掳掠去遭日军强暴的妇女，因无颜面对亲人和乡亲，往往走上寻短的路。〔《桂林日报》2007年5月18日〕

图为被日本兵没日没夜地蹂躏后时常处于失常状态的受害者杨时珍老人。〔苏智良2000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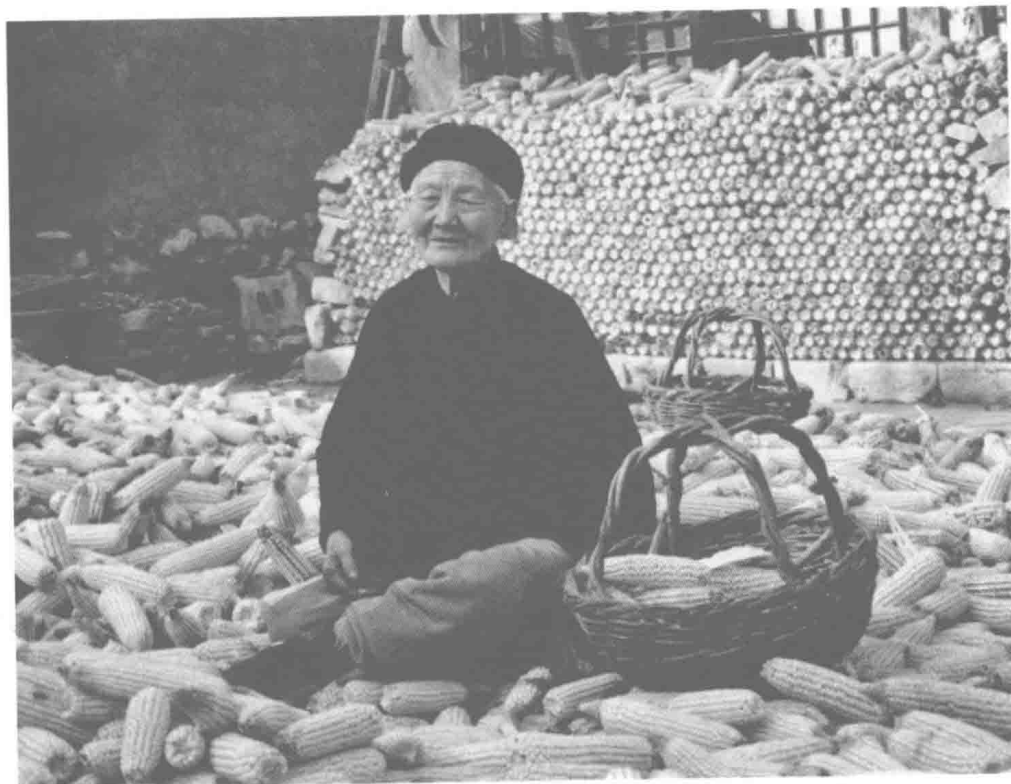
二、日军强征中国性奴隶的途径

在中国占领地和战场上，日军主要通过以下五种途径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性奴隶——“慰安妇”。第一种，使用暴力强掳当地妇女。第二种，以招工等名义设下各种圈套，引诱妇女坠入陷阱。第三种，日军占领一地，形势稍稍稳定后，便依靠汉奸组织协助，强征妇女充当“慰安妇”。第四种，将中国军队女俘虏强逼为性奴隶。第五种，征用妓女。在大城市，日军机关常常征用现有的妓女来充实其“慰安妇”的队伍。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和天津等地，都有不少妓女被迫加入“慰安妇”的行列。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面对残暴的日军，面对被送去前线的命运，妓女也不是甘愿去做“慰安妇”的，史料显示，她们往往被日军或汉奸政权强征，不少妓女以逃跑甚至自残的方式抗拒从命。

日本老兵证言，日军在扫荡作战中，以间谍名义俘获了中国妇女及八路军正规军和游击队的女战俘，立即将其送到后方的大队本部。在大队本部，如果她们受了伤，就由医务室先给她们治伤，如果没有受伤，则由担任情报工作的军官对其进行审讯，这是通例。接着，这些中国女性就不知所踪了。虽然士兵中有时也偷偷传言说：这些当官的家伙又干好事了，但谁也不会去追查这些中国女人的去向。她们都成了日军的性奴隶。



日军占领山东曲阜后，随即指使汉奸设立维持会，每日必须提供100名妇女充当“慰安妇”，而且还要逐日轮换。日军对日侨等开设的慰安所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这在当时被称为“特别卖钱税免除票”。
〔中国“慰安妇”资料馆藏〕



1

1 山西的受害者李喜梅大娘自述，“当时我的三舅是抗日的共产党员。汉奸谭岩军、王林和季禾子就带了三个日本兵来我家，拷问我谁是共产党，追问三舅的下落。我当然不能说。日本兵便将我带往进圭社村。我虽然不肯走，但被日伪军不断鞭打，也被迫进了炮楼”。就这样，李喜梅成为了日军的性奴隶。〔苏智良 1998 年摄〕

2 日军占领南昌后，第一〇六联队的一个中队侵入安义县后，中队长便召集当地村长威胁说：“每个村庄都要交出一个女人！”结果日军抢到 8 名中国女子，开设了临时慰安所，40 岁的中队长挑选了一个最美的姑娘供自己专用。〔前一〇六联队一等兵熊本、小田亚纪夫语，《朝日艺能》1971 年 5 月 27 日〕

图为日军当年检查妇女下体的鸭嘴器。〔资料照片〕



2

■ 1 日军在山西交城扫荡时，向附近村庄征用13至17岁之幼女和少女15人，分为两班，轮流调换，供其发泄兽欲。〔著者无，左铭三序：《抗战第一期之日寇暴行录》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1940年版，第19页〕

2006年，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志愿者姚霏、陈克涛探望山西孟县的受害者周变香老人，并致送生活援助费。〔陈克涛2006年摄〕

■ 2 据当时报纸揭载，日军占领河南东部后，强迫各村庄，每保必须选送青年女子20名，供日军轮奸。缺少一名，即逼令折缴120元，以作罚金，并令住户妇女不准逃走，昼间头戴鲜花，在家裸体呆着，任凭日本兵调遣轮奸；夜间不准闭门，以供随时泄其兽欲。乡间树上，时常有因受辱自缢之妇女尸体。〔《敌在豫东尉氏烹食儿童轮奸妇女》，《新华日报》1938年7月18日〕

2006年，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志愿者赴山西孟县调查。图片为受害者王改荷老人。〔姚霏2006年摄〕



1



2



1



2



3

1 日军为扩大海南的慰安所，派特务乔装公司职员到上海、广州、香港等地招聘游说，“海南岛开办许多大医院，招聘大批姑娘去学习当护士和护理，薪水高，到那里去做工有吃有穿，还有大钱寄回家”等，并且当场给应聘者发放半年薪水作为

安家费。于是那些在饥饿线上挣扎的良家姑娘为养家糊口，就这样上当受骗而来，统统被打进“慰安所”，陷进了暗无天日的人间“魔窟”。〔符和积主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5 年 5 月版〕

图为海南临高的幸存者林爱兰老人，满脸沧桑，住在临高的敬老院里。〔苏圣捷 2014 年摄〕

2 据日本老兵回忆，南昌作战结束后，日军第一〇六联队的一个中队侵入安义县，中队长召集当地村长威胁说：

“每个村庄都要交出一个女人！”结果日军抢到 8 名中国女子，开设了临时慰安所，40 岁的中队长挑选了一个最美的姑娘供自己专用。〔前第一〇六联队一等兵熊本、小田亚纪夫语，《朝日艺能》1971 年 5 月 27 日〕

邢三妮，一个农家的少女，被日本兵抢到炮楼里，成为日军性奴隶。〔陈克涛 2007 年摄〕

3 77 岁的老人王树芝拨通《桂林日报》热线，讲述了他亲眼目睹的日军暴行：“1945 年，这个日军小队里共有 10 至 20 个随军‘慰安妇’，由汉奸看守着，还不时去抓桂林本地妇女。每到晚上，日本人就去看她们。”〔《桂林日报》2007 年 4 月 30 日〕

图为一位母亲为女儿的死去而痛哭。〔（日）荒井信一解说：《20 世纪的战争：日中战争》（第 2 册），草根出版会 2001 年 4 月版，第 81 页〕

1 八路军的女战俘大都被送到华北、华中一带最前线地区的两三千个分遣队据点里去了。在据点外面用土坯盖的仓库里开辟一个角落改造成慰安室，里面用在扫荡中抢来的衣服被子什么的垫一垫，然后就是让这些妇女不分昼夜地遭受日本兵的蹂躏了。〔何吉：《日军强逼中国妇女为“慰安妇”资料摘编》，《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

郭喜翠姐夫是抗日村长，她因此受到牵连，被日军抓到炮楼，受尽凌辱。2013年7月23日，郭喜翠老人在山西孟县去世。〔苏智良2012年摄〕



1

2 1941年春，日军侵入孟县南社乡南社村，抓走张五召和高银娥等人，张五召等每天遭受日本兵欺凌，处于被奴役状态。这是受害者张五召大娘的最后岁月。〔苏智良2000年摄〕



2

3 战时报刊报道，在浙西各地发现暴敌汉奸的一种掳拐妇女手法，就是由汉奸冒充上海某某大工厂招女工，于是一些乡间贫苦妇女，为生活所迫，纷纷前往应募。日军先唆使汉奸择有姿色者录取，旋即用轮船运往上海虹口，贩售于日鲜浪人所组织之慰安所，从此受骗妇女陷入火坑，供敌泄欲。该乡女家属等因亲人一去无音，因此起疑，始悉个中情形。亦有家属因此自杀者。此种掳拐女子方法，最先发现于上海租界及苏州无锡一带，继则嘉兴、杭州、吴兴一带各地乡镇亦续有发现。其欺骗我国无知妇女手段之恶毒，使人切齿难忘。〔《胜利》第7号，1938年12月24日〕

周喜香曾是妇救会主任、共产党员，被日本兵抓进据点遭到日军强暴长达20多天，致使怀孕7个月后流产，终生不能生育。苏智良教授探望老人时，老人右腿骨折，只用树枝绑着坐在炕上。老人于2012年12月21日去世。〔苏智良2012年摄〕



3

三、幸存者的控诉

“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们处于非人的、奴隶般的苦难中，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进入慰安所后不久，受害者都会产生各类生理异常状况。在我们所访谈过的受害者群体中，几乎无一例外都有各类在生病期间、生理期间、施虐者心情不好期间遭受虐待的经历，她们身体的各部分被刺、被打、被咬、被烫，伤痕累累。特别是生殖系统备受摧残，悲惨程度无法尽述。时间长了，大部分受害者就失去了生育功能。另一方面，怀孕的恐惧也一直跟随着受害者们。由于“慰安所”中的中国或着朝鲜女性绝大部分是日军或者日军指使伪政权以欺骗或者强制手段征集来的良家妇女，日军（特别是军官们）就会不使用安全套，这种情况在我们调查的受害幸存者证言中为数很多。于是，在中国各地的“慰安所”里，相继诞生过不少无辜的婴孩。受害幸存者和当时住在“慰安所”附近的老人们对我们说过这样的故事：或者可怜的母亲和婴孩被抬出去，死了，埋了；或者母亲活了下来，孩子却不知去向。在广西荔浦，有一位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受害幸存者韦绍兰老人，她的儿子罗善学，就是在“慰安所”里怀孕后生下来的中日混血儿。



1926年出生的台湾女孩满妹，1943年与其他三十多个台湾女子被骗至海南榆林上午启南庄慰安所，这个“慰安所”的老板是日本人山本。满妹几乎每天都要接待二十多名军人，九死一生，才捡回一条命。〔2008年摄〕

1 朱巧妹老人，因丈夫姓周，因此也曾被叫作周巧妹，或周阿巧。1910年11月7日出生于上海市松江县小昆山西门，后住上海市崇明县庙镇镇庙中村598号（剧场路22弄5号），属庙中村第5小队。〔苏智良1999年摄〕

2 阿巧曾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里做装订工，1928年与周守文结婚，住在上海城里。1932年2月日军炸毁了商务印书馆，阿巧没有了工作，只好逃难回到丈夫的故乡崇明，不久迁至庙镇，从此以后没有离开过崇明。夫妇俩开了一间名为“永兴馆”的小饭店来维持生计。图为朱巧妹在自己的老屋前。〔苏智良1998年摄〕

3 阿巧证言：日军的部队大概有六七十个日本兵，好像名叫“松井中队”，住在一个二三层的楼房里（楼房已被拆毁，地址在今庙镇镇政府）。阿巧还记得中队长叫“森格”（音译），小队长叫“黑联”（音译，据说后来战死），还有一名日军专职翻译黄春生（此人当地人认识。后来换为金盛生，金可能是朝鲜人，但当地也有人认为其是华侨）。他们帮着日本人到处搜寻长得好、比较体面的女子专为日军军官“慰安”。图为病中的朱巧妹老人。〔苏智良1998年摄〕



1



2



3



1

1 1938年春天，日本人占领了崇明。日军在崇明庙镇建造了炮楼，驻扎的鬼子兵，经常出来骚扰村民。女人也没有地方可逃。阿巧就在小饭店里，有一天，几个穿黄军装的日本兵手拿长枪冲了进来，他们把客人全部赶走，把朱巧妹关进房间强奸了。当时她已怀孕两三个月。〔苏智良 2001年摄〕



2

2 朱巧妹生孩子后仅两个月后，就被日本兵拉去镇上炮楼里。当时，阿巧奶水很足，无耻的“森格”和“黑联”，每次都要先吸干她的奶水，然后再强奸。日军炮楼里的那间房屋不大，里面有一个浴缸，一张床。阿巧进去后被命令要先洗澡。阿巧说：“日本兵从未采取过卫生措施，我不记得有吃药和检查身体的事情。连命也差一点送掉，不去就要烧掉我们的房子，哪里还有什么报酬？”图为陈丽菲教授岁末上岛探望朱巧妹老人时与其合影。〔孙爱民 2002年摄〕



3

3 庙镇镇上流传着“七个姐”的说法。这“七个姐”，都是曾经被日本兵抓进过炮楼的受害者，其中还有妯娌亲戚，人们对她们以小名相称。这几位女性是周海梅（梅姐）、陆凤郎（凤姐）、杨七姐（七姐）、周大郎（大姐）、金玉（玉姐）、郭亚英（英姐）和朱巧妹（巧姐）。阿巧证言：她们基本是被固定为森格、黑联等军官霸占的，“小兵一般不让进来。小兵很多都到镇上去，随便糟蹋女人，坏透坏透”。灶台上的观世音菩萨，是阿巧的精神寄托。〔苏智良 2002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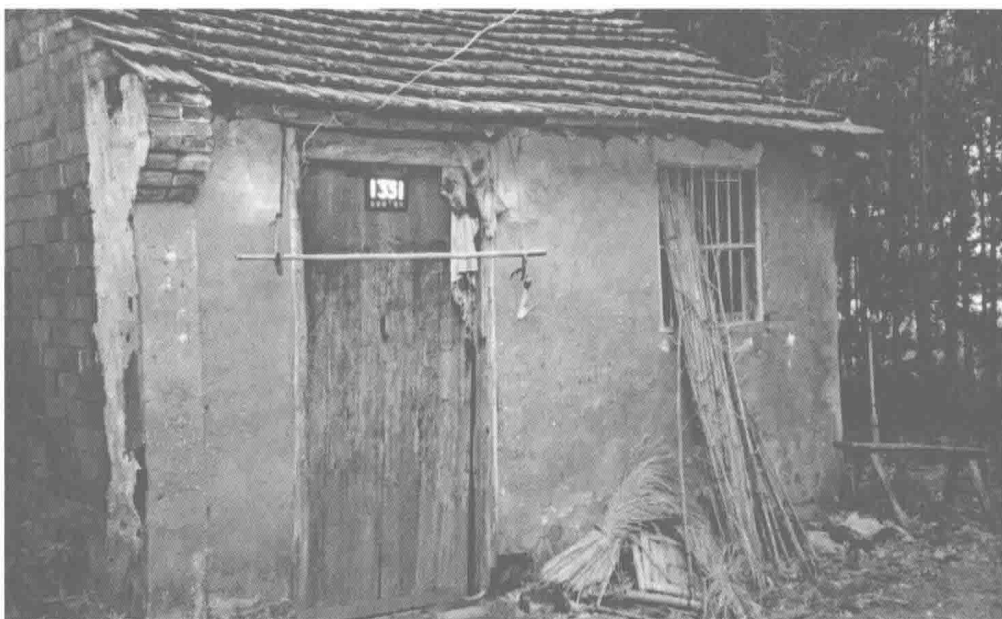
1 朱巧妹的丈夫周守文因妻子遭受日军的折磨，奋而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游击队，但后来不幸被日军抓住，活活打死。因为“解放后只找到一个证明人，不符合要两个以上证明人的规定”，所以并没有被认定为“烈士”。这是朱巧妹老人反复陈述、痛心不已的事情。〔苏智良 2001 年摄〕

2 这种情况持续到 1939 年底。每周几次被强制送入炮楼，有时被抓进去后要关上一天一夜，才被放回来。阿巧曾悄悄地告诉我们：“七个姐”里，梅姐是巧姐的婆婆，那时已经 50 岁了，日本兵真是罪孽啊！凤姐是朱巧妹婆婆的妹妹，也有 40 来岁了，而大姐周大郎则是她的远房姐姐。朱巧妹一家四人，惨遭荼毒。朱巧妹老人晚年住在这间简陋的屋子里。〔陈丽菲 2001 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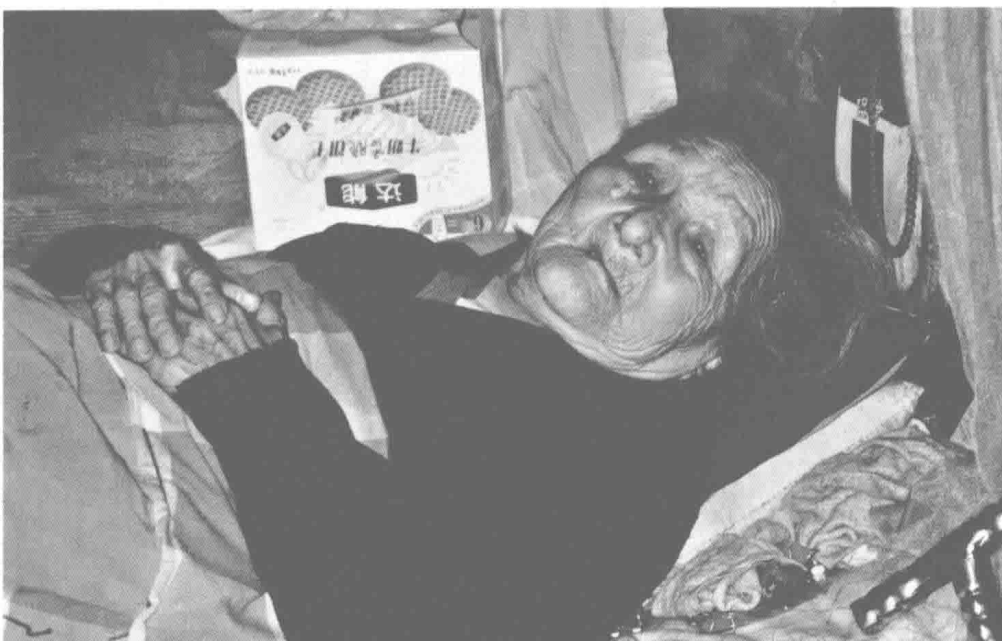
3 至 1939 年这支日军撤出庙镇，朱巧妹才得解脱，但已患了严重的妇女病。她长期遭受妇女病与肾病困扰，并在精神上留下深重创伤。图为病中的朱巧妹躺在床上。〔苏智良 1998 年摄〕



1



2



3



1

1 2005年2月20日上午10时15分，朱巧妹老人在崇明家中病逝，终年95岁。一个月后，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请当地石匠为老人竖了一块墓碑。〔姚霏2002年摄〕

2 万爱花原名刘春莲，1929年农历十二月十二日出生在内蒙古河林格尔县韭菜沟村，后被吸食鸦片的父亲卖到了山西孟县，成了李五小家的童养媳。图为万爱花老人2000年在上海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办的国际会议上讲话。〔苏智良2000年摄〕



2

3 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来到孟县后，苦大仇深的万爱花成了抗日积极分子，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图为万爱花老人2007年来上海出席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开馆仪式。〔姚霏2007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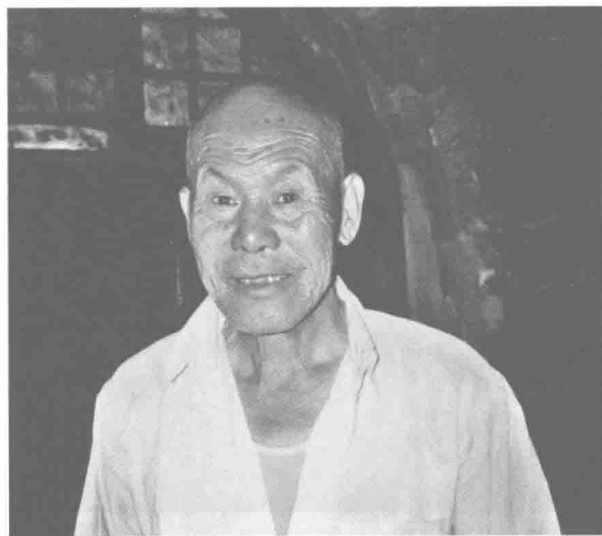


3



1

1 1943年春，院子里的扫帚草长嫩苗时，驻扎在进圭社的日军扫荡羊泉村。万爱花因服侍患病的公公没来得及躲避而被捕，日军将她和另外4名妇女作为战利品带回进圭据点。图为当年她被关押的窑洞。〔苏智良1998年摄〕



2

2 日军曾将万爱花吊在窑洞外的槐树下拷打，逼问村里其他共产党员的名单，晚上则将其关在窑洞里，野蛮地轮流强奸。在万爱花被关押强奸的二十多天后的一个深夜，她乘看守的汉奸不注意，悄悄地弄断了窑洞窗户上的井字形木栅栏，从窗户跳了出来，然后拼命逃回了羊泉村。她出逃时，还将铺在她身下的、日军抢劫本村农民侯大兔的被子送还给侯家。2001年我们专门到侯大兔老人家证实此事。图为侯大兔老人。〔苏智良2001年摄〕



3

3 不幸的是，万爱花很快又落入了虎口。1943年8月吃西瓜的季节，她正在池塘边洗衣服，驻守西烟和进圭的日军兵分两路从南北两个方向包围了羊泉村，万爱花再次被日军抓住并投入了进圭据点，遭受蹂躏。一天，她趁据点里的日军外出扫荡的间隙，又逃了出来，回到了羊泉村。图为万爱花老人。〔2003年摄〕



1



2



3

1 1943年腊月里，刚吃过腊八粥时，日军再度包围羊泉村，万爱花第三次落入虎口。为了严惩她的逃跑行为，日军在实施性暴行的同时，更野蛮地对其进行摧残。面对日本兵的轮番审问拷打，万爱花咬紧牙关什么也不说，搏斗中，她的耳环连肉被日本兵撕去。图为万爱花耳朵下部的缺口。〔苏智良2001年摄〕

2 万爱花多次被折磨得昏死过去。1944年1月除夕的时候，日军见她昏死过去一直未醒来，以为她已经死去，便将其扔到村子旁边的乌河里。后被同村人张孟和的父亲张妹孩（记音）发现，将其救了起来，并偷偷将她送到其丈夫的妹妹王喜贵家里。万爱花伤病极重，但顽强的她挣扎了两年，还是捡回了一条命。回忆往事，万爱花时常泪流满面。〔苏智良2000年摄〕

3 万爱花再也没有结婚，她领养了一个小姑娘，与她相依为命。1992年，勇敢的万爱花站出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日军二战时期实施的性奴隶制度罪行。她去东京出席了国际听证会，这是中国受害者第一次出国控诉。在台上，万爱花想起过去遭受日本兵欺负的悲惨经历，昏厥了过去。图为万爱花大娘在日本作证。〔日本友人1998年摄〕



1



2



3

1 2000年12月，苏智良教授作为代表团团长，与国内34名检察官、受害者和家属、调查者等一起出席东京国际战犯法庭活动。王大娘是中国大陆原告之一，9日上午，王大娘第一个上法庭控诉。她打算解开棉袄的纽扣，以便让全世界目睹日军在她身上留下的累累伤痕，由于情绪激愤而又一次昏倒在台上。法庭不得不休庭一小时。这是万爱花大娘在讲述受害遭遇。〔苏智良2000年摄〕

2 万爱花大娘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恢复党籍。2005年获得国家颁发的“抗战老战士”的勋章。2007年她戴着勋章来到上海，出席了腾讯网的采访活动。〔苏智良2007年摄〕

3 晚年的万爱花身体日益衰弱。2012年5月，苏智良教授到太原的医院探望万爱花大娘。〔董天艺2012年摄〕

1 2013年7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派遣调查员李金玲博士生去太原探望王大娘，这时王大娘身体已更加虚弱了。〔李金玲提供〕

2 2013年9月4日，万爱花老人去世。8日，王大娘的葬礼在她的家乡——孟县羊泉村举行，陈丽菲教授带着研究生赵蓓红出席。到场的最高官员是村长，但山西和孟县的媒体全程报道，中央电视台派出了两个摄制组，记录了这个告别的时刻。〔陈丽菲2013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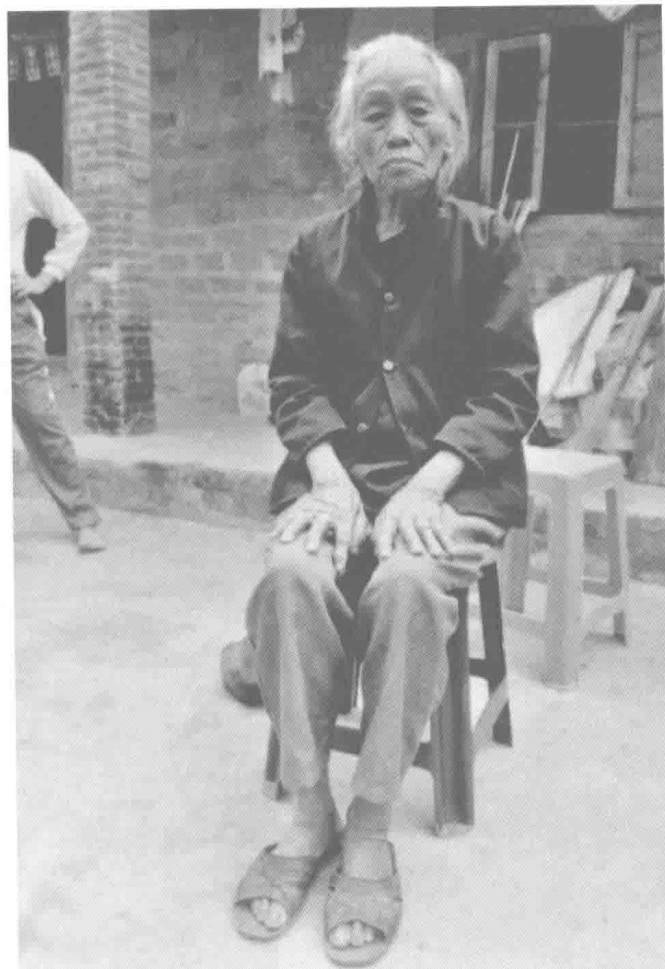
3 陈亚扁老人是海南陵水县本号镇祖孝村人，1927年出生，虚岁17岁那年被日本兵和汉奸以帮工的名义抓到三亚，关在两层楼的木板房子里，断断续续度过了三年左右身为性奴隶的痛苦生涯。〔苏智良2000年摄〕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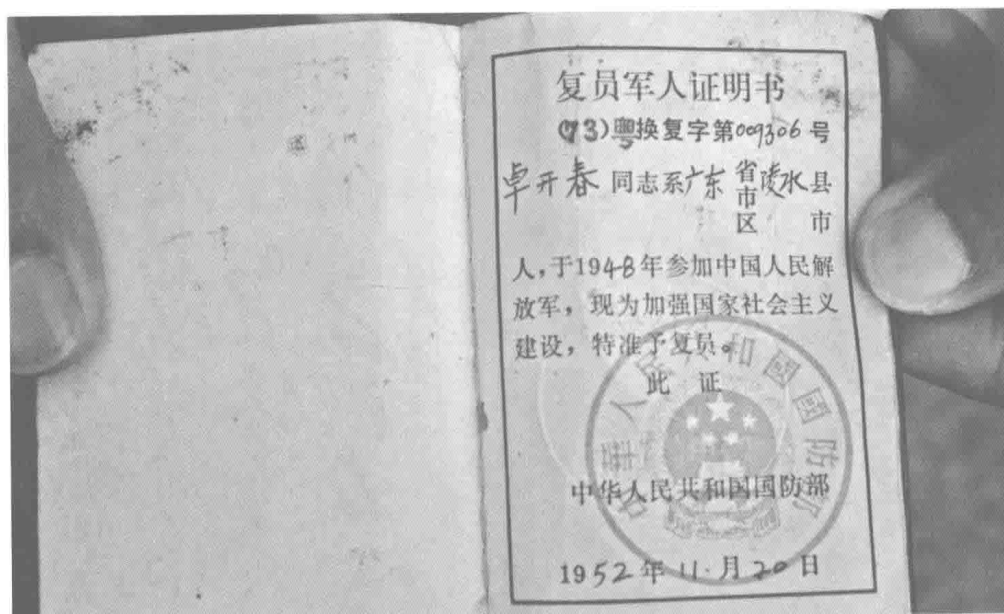
3

■ 1 陈亚扁老人回忆：每天下午5时开始，日本兵就轮流进来。“被糟蹋了大半年后，我的下身被那些日本兵弄得又红又肿，很痛很痛，就连大小便都困难。我都害怕得哭了。这些可恨的日本人见我哭，就狠狠地打我，不让我哭。打我的时候，有时候用手煽耳光，有时用脚踢，有时用鞋打，有时候还会用手紧紧地捏住我的脖子。但我还是忍不住哭，有时候他们走后我还在哭。就这样我把自己的眼睛都哭坏了。”她最痛恨的是，“日本兵让我没有儿子”。图为中日联合调查组在陈亚扁家。〔上海电视台工作人员2000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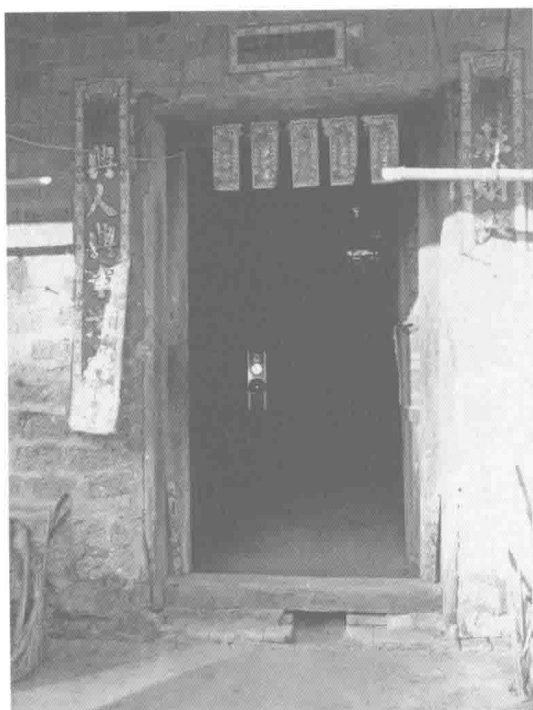
1

■ 2 陈亚扁遭日军凌辱后，她的爱人卓开春对她不离不弃。定了婚后，这个有血性的男子便当兵去保家卫国，后加入解放军，因伤退伍。图为这位可敬的黎族汉子的退伍证。〔苏智良2003年摄〕



2

■ 3 十多年来，我们多次探访陈亚扁。第一次去她在深山里黎寨的家，看到两口大锅里有一口煮着黑黑的蔬菜，问了才知道，这是野菜，平时就是陈亚扁老人的主食，她常常是先舀一碗给自己吃，其余的给猪吃。图为陈亚扁的家。〔苏智良2001年摄〕



3



1

1 2014年1月底，苏智良教授、陈丽菲教授第三次到陵水，在医院旁边的养老院探望陈亚扁大娘。亚扁大娘两次赴沪为国际国内媒体讲述她的经历。〔苏圣捷2014年摄〕

2 黎族老人陈亚扁尽管浑身是病，但却十分坚强通达。〔苏智良2009年摄〕

3 1944年冬天，日本鬼子的铁蹄踏进了广西荔浦。一个早晨，日本鬼子对荔浦县新坪镇桂东村进行扫荡。从此改变了村妇韦绍兰的生活轨迹。这是村妇韦绍兰大娘生活的村庄——荔浦县新坪镇小古告村。〔苏智良2006年摄〕



2



3



1

1 日军扫荡时，丈夫不在家，22岁的韦绍兰便独自背着一周岁的孩子随着村人向村北面离家约一公里远的对门村的牛尾冲山上跑去。很快，韦绍兰跟着村人钻进了山上的溶洞。但最终韦绍兰和她的孩子一起被抓走了，被送入兵营，开始了三个月左右梦魇般的生活。图为韦绍兰避过难的牛尾冲山。〔苏智良2006年摄〕



2

2 当时韦绍兰并不知道自己被抓进了马岭慰安所。第二天，“一个穿白白衣服的，要我们脱衣服，拿着戴在耳朵上的东西（听诊器）在我们身上听听，又把一个长管子塞进下面”。老人比划着。图为韦绍兰老人的家。〔苏智良2004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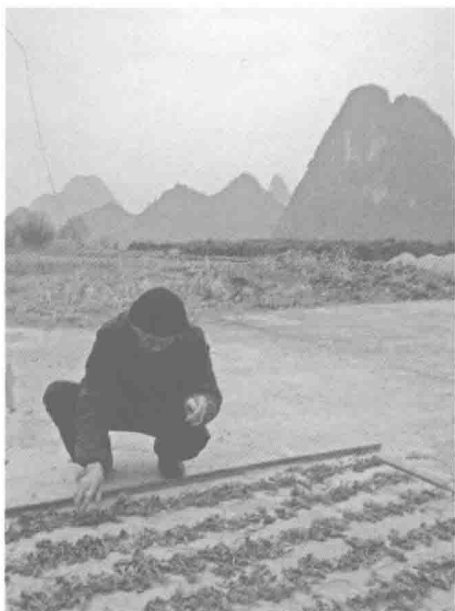
3

3 “慰安所”里还有其他中国女子。日本兵有时候还用汽车将她和其余的女子拉到其他日军的驻地供别的日本兵蹂躏。图为韦绍兰大娘在家门口。〔苏智良2008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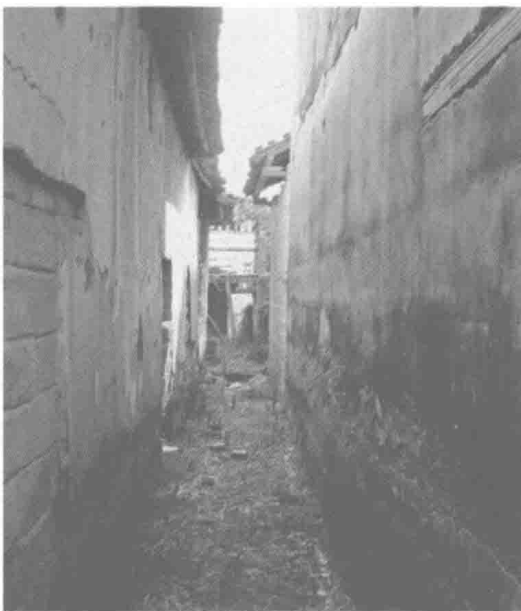
1 “慰安所”里，韦绍兰在孩子的哭声中被日本兵强暴。后来一个日本军官经常过来，就带点糖果哄住孩子再带走韦绍兰，可怜的孩子往往半天或一天见不到妈妈。整日受惊吓和饥饿的幼儿在韦绍兰背着她逃回家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图为韦大娘在侍弄她采来的草药。〔苏智良 2009 年摄〕

2 一开始，日本兵对韦绍兰她们看得很紧，连上厕所也有人跟着。由于韦绍兰平时比较听话，日军就慢慢地放松了警惕，聪明的韦绍兰悄悄地察看地形，三个月后的一个深夜，她带着娃娃从厕所边的小门沿着照片上的这条道逃跑了。〔苏智良 2008 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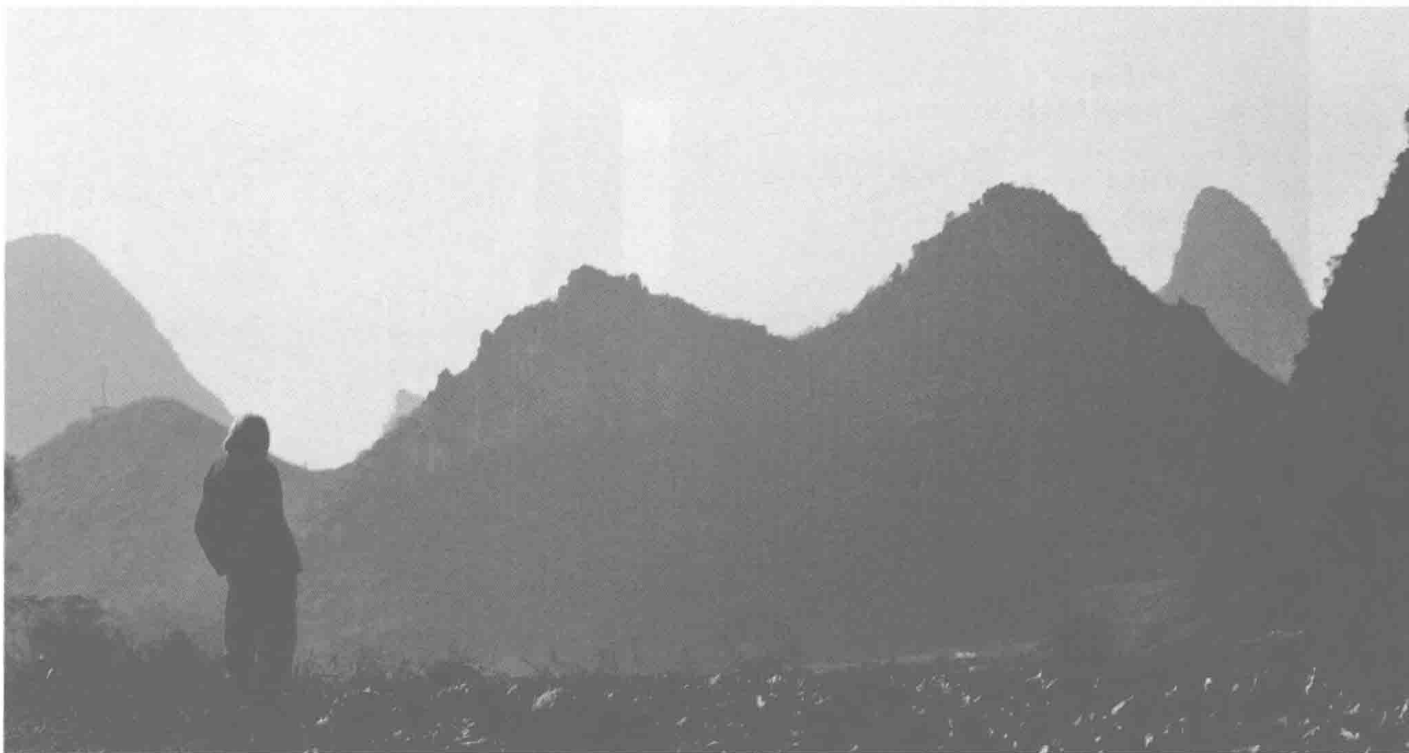
3 韦绍兰借着朦胧的晨光没命地朝着日出的方向逃跑，两天后终于回到家。图为韦绍兰老人在眺望家乡。〔郭柯团队提供〕



1



2



3



1

1 如今，90岁的韦绍兰与60多岁的儿子罗善学生活在广西的荔浦。儿子一辈子生活在歧视和失落中，受尽苦难、风烛残年的母亲，则还在时时试图宽慰这个与众不同的儿子。〔郭柯2013年摄〕

2 90岁的韦绍兰每天都在地里劳作，这是她在侍弄她的菜地。〔苏智良2008年摄〕

3 罗善学认为自己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因为身世而遭受歧视，至今没有结婚。在中国父亲的墓前，他有感而泣，泪流满面。〔苏智良2008年摄〕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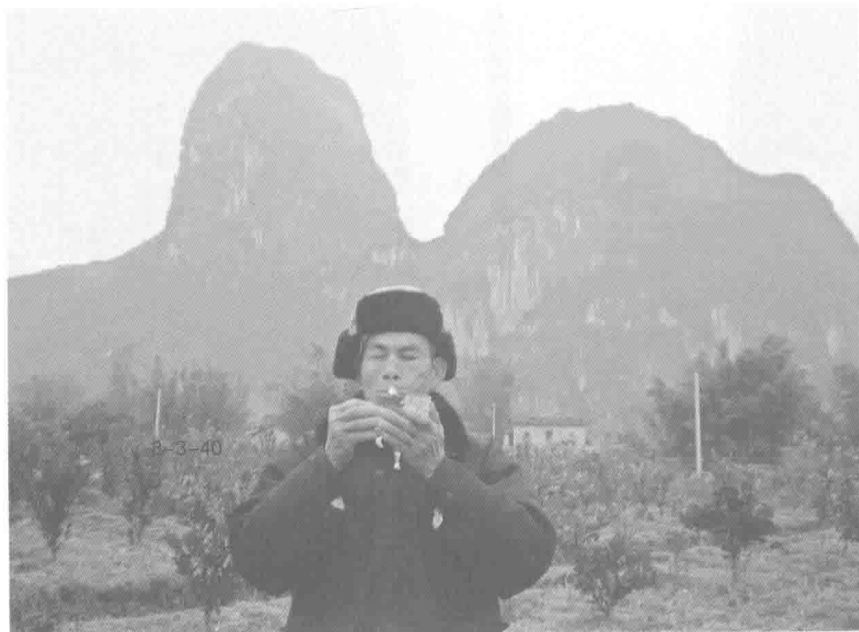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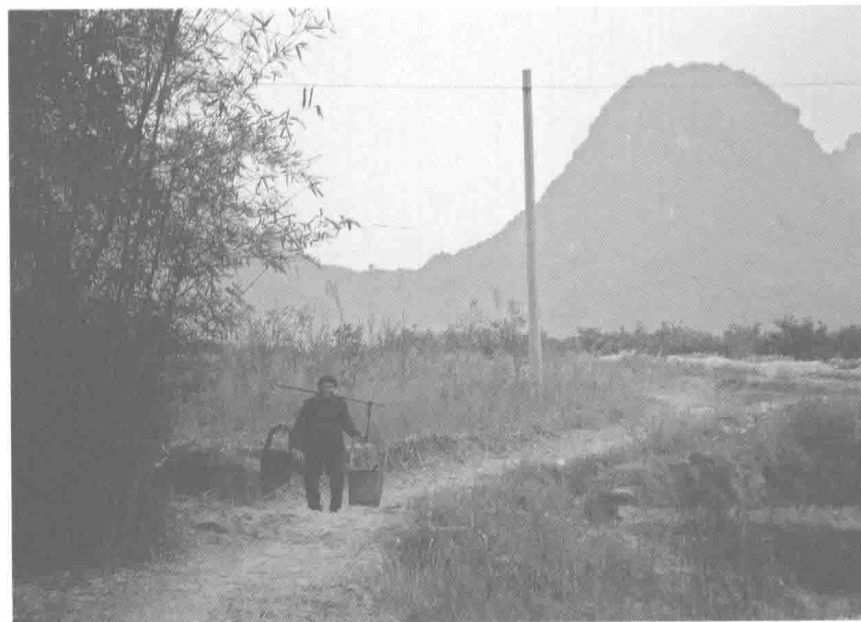
1 罗善学对于农业并不在行，与侍弄庄稼相比，他更擅长养鸡养鸭。每天都要卷很多根土烟抽。〔苏智良 2008 年摄〕

2 劳动是韦绍兰大娘每天主要的活动，她关心着明天的天气，庄稼的收成。这是她挑着水桶正从田地中返回。〔苏智良 2008 年摄〕

3 尽管生活十分艰辛，但韦绍兰大娘始终通达乐观。这是她的灿烂笑容。2014 年，韦大娘跌了一跤，生活更加辛苦了。〔苏智良 2008 年摄〕



1



2



3

1 1923年阿桃出生在台湾桃园一个客家家庭。1943年她应征去当护士，她与18个女孩一起到了婆罗洲，却被送入“松之屋”慰安所，被迫成为了“慰安妇”。这是年轻时的阿桃。〔朱德兰：《台湾慰安妇》，第352页〕



1

2 李连春老人的故乡是云南龙陵腊勐乡的白泥塘村。日军进山进行扫荡。长箐有个保甲长叫杨山，为日军办事，强迫其父交出两个女儿去给日本兵“洗衣服”，李父不从，被日本兵打伤而死。图为白泥塘村。〔陈丽菲2001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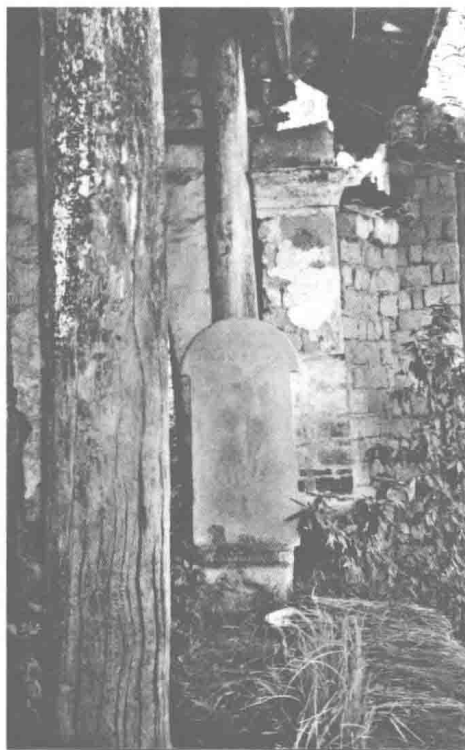


2

1 恐惧中的李连春设法逃跑，但是被日本兵发现，押送到长箐的李家祠堂，遭到日本兵的强暴。李家祠堂成了日军的慰安所。这是长箐的李家祠堂。〔苏智良 2001 年摄〕

2 然后，李连春又被押送到大垭口慰安所，在那里受尽侮辱。松山是日军在滇西防卫系统的核心阵地。大垭口慰安所地处松山，那里被日军一一三联队占领并防守。图为大垭口今貌。〔苏智良 2013 年摄〕

3 有个放牛的老倌，是大七树村人，因李连春的姑母嫁到该村，所以知晓李连春。李连春向这个老倌诉苦引起了他的同情，老倌便冒着风险在一天夜里给李连春换上他自己的衣衫，于是，李连春逃出松山，来到潞江坝香树村，求人将她用划筏子过了江。图为地势显要的怒江江畔。〔苏智良 2013 年摄〕



1



2



3



1



2

1 经过一连串的生活变故，李连春又逃往秉塞大山去，在龙洞坡那里的一个山洞当了一段时间的“白毛女”。说是山洞，不如说是大石头下面一个可避风雨的空间。石头从坡面伸出，离地面不过半丈左右，坡上生长着长春藤，顺大石头披下，掩蔽着石头的正面，直拖到地，石头的斜面和密密的藤丛，正好构成一个三角形的顶，可以容身。在这里，她被山民高习贤收留，并与之结婚。图为李连春当年避难的山洞。〔苏智良 2001 年摄〕



3

2 李连春与高习贤奋斗 10 年在大山深处建成一个家，两层的民居，生育了两女一子。不幸的是，高习贤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因癌症而去世了。这是他们的家。〔苏智良 1998 年摄〕

3 历经磨难的李连春老人非常开朗豁达，遇事有主意，是家里儿孙辈的主心骨。图为陈丽菲教授与李连春大娘在谈心。〔苏智良 1998 年摄〕



1 李连春是非常自尊、要强的女性。教育后代，再穷再苦，也要认真读书上学。她的儿女均有良好的教养，孙子、孙女也先后考上大学。
〔苏智良 1998 年摄〕

2 2004 年 1 月 10 日，李连春老人因脑溢血离开了人世。2007 年，苏智良、陈丽菲教授再次进入兼塞大山探望其全家，并在李连春老人墓前留影。

3 如今，李连春老人的故事成为董家沟慰安所陈列馆的主要内容之一。来此参观的人们，可以从图片、文字了解李连春曲折的人生。
〔苏智良 2013 年摄〕



1

1 袁竹林的家乡在湖北省武汉市，她 1922 年农历五月十六生于武汉，15 岁就结婚了，丈夫是个汽车司机，叫汪国栋。他们生活虽谈不上小康，但粗茶淡饭，还算过得去，特别是夫妇感情很好。图为 1998 年袁竹林来到多伦多，第一次走出国门，讲述她受害的故事。〔苏智良 1998 年摄〕



2

2 不料，安定的生活刚刚开始，第二年日本侵略者的战火就烧到了武汉。袁竹林的丈夫被征派到大后方去了。岂料婆婆在穷困中强逼着她嫁出去，这样袁竹林与刘望海结了婚。17 岁时，生下一个女儿，取名蓉仙。图为袁竹林老人在加拿大多伦多留影。〔苏智良 1998 年摄〕



3

3 1940 年春，有个当地女子叫张秀英，到处招工，说是到湖北一个地方的旅社去做清洁工。靠为人洗衣为生、孩子饿得直哭的袁竹林也报了名。报名时，有好几个小姑娘。袁竹林当时 18 岁。图为袁竹林在香港控诉日军暴行。〔苏智良 2001 年摄〕

1 张秀英的丈夫是个日本人，会说些中国话。袁竹林等一群姑娘坐船到了鄂州，上岸被赶进了一个庙，庙门口有日本兵站岗。大家都开始慌了，袁竹林哭起来，转身就想逃，被一把抓住，张秀英和她的丈夫威胁她们：“想死吗？”原来这里已是日军慰安所。根据实地调查，这个慰安所遗址应该是原鄂州关帝庙。〔陈丽菲 2001 年摄〕

2 进了慰安所，老板就命令大家将衣服脱光，以便检查身体。女孩子们哭闹得更厉害了，张秀英的丈夫就带人用皮鞭抽打她们。张秀英还指着袁凶狠狠地训斥道：“你是游击队员的老婆（因袁竹林的丈夫去了四川），老实点。”身体检查很快，因为都是良家妇女，根本没有什么性病。检查后，老板给每个人取了个日本名字，袁竹林被叫作“吗沙姑”（根据音译可能是“雅子”）。女孩子每个人分到一间房间，大小约七八个平方，里面有一张床，一个痰盂。图为袁竹林出席纪念活动。〔苏智良 2003 年摄〕

3 第二天早晨，房门口挂上了一块六七寸长，两寸宽的木牌，上面写着她们的日本名字。在慰安所的入门处也挂着很多这样的牌子。这天的上午，门外就来了大批的日本兵，于是，每个房间门口都排起了长队。一天下来，袁竹林连坐也坐不稳，下身疼痛得像刀割一般。图为袁竹林在上海师大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人员的陪同下，专程访寻当年受害之地，并在原慰安所前留影。〔陈丽菲 2002 年摄〕



1



2



3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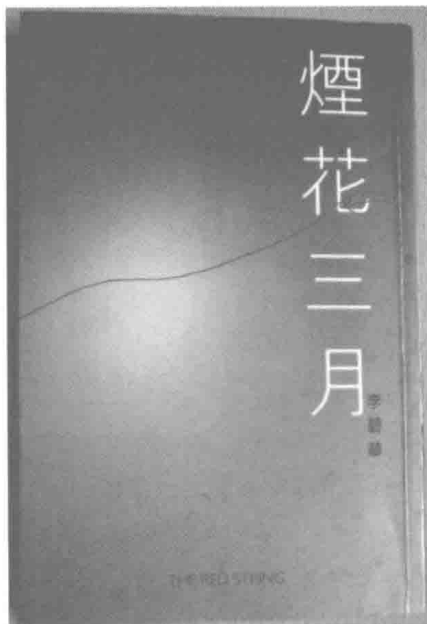
1 此后，每天的生活就是被逼着做日本兵的性奴隶。一般，日本兵要买票进入，但要多少钱，袁竹林从来没有看到过，也从来没有得到过一元钱。每日三餐由老板雇佣来的一个中国男人烧做。妇女被规定要洗澡，但在厨房的木桶里轮流洗。据袁竹林回忆，这个慰安所的中国“慰安妇”总有几十人，洗澡水到后来已脏得不行了。陈丽菲教授来武汉探望老人并陪同老人畅游东湖，袁竹林说，我尽管是武汉人，但这是我第一次到东湖游玩。图为袁竹林老人在游艇上用日语唱当年的歌谣。〔陈丽菲 2002 年摄〕



2

2 老板也强逼她们吃避孕药。开始，袁竹林害怕，常常将这种白色的药片扔掉，后来，老板发现大家都不吃，就看着她们吃下去。日军规定，士兵必须要用安全套，但很多士兵知道来的都是良家妇女，有意不用安全套，经过一段时间后，袁竹林就怀孕了。2000 年，袁竹林在东京民间法庭作证时，坚决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认错。〔苏智良 2000 年摄〕

3 怀孕后，日子更苦了。袁竹林心想：这样下去，早晚要被日本人弄死了，但我不能死，我还有父母亲和孩子。于是她便暗中与一个被日本人叫作“路咪咕”（音译应为“留美子”）的湖北女子商量，决心要逃出去。但刚逃跑马上就被日本人抓了回来。日本人将袁竹林的头死命地往墙上撞，一时鲜血直流，从此她就落下了头痛病。她后来才知道，她的女儿蓉仙因为失去母亲的照顾，已活活饿死了。而从此以后，袁竹林也失去了生育能力。香港作家李碧华为袁大娘写了《烟花三月》一书。



3



1



3

1 据袁竹林回忆，日军规定，“慰安妇”接待军人时，必须穿日本式浴衣，平时则穿连衣裙之类的衣服。如果遇到日本的重大纪念日或出席重大活动时，“慰安妇”还要穿和服，带面具（做游戏活动）。和服和化妆品等是慰安所发给“慰安妇”的。2005年7月，苏智良教授到武汉探望袁竹林老人。〔陈恒 2005年摄〕

2 日本人投降后，袁竹林回到了母亲的家乡——武汉附近的一个山村，靠洗衣、做临时工而与母亲一起维持生活。1946年，她从朋友那儿抱养了一个生下来只有70天的女孩做养女。后来与廖斌结婚。这里就是当年袁竹林受害的鄂州城隍庙慰安所内景。〔陈丽菲 2002年摄〕

3 到了20世纪50年代，袁竹林与母亲的生活已经十分平静了，但内心常常因回忆起耻辱的遭遇而彻夜不眠。然而，善良单纯的母亲在里弄的忆苦思甜大会上，情不自禁讲出了女儿被日本人强暴的悲惨经历。从此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祸害。小孩会追在袁竹林后面骂“日本婊子”。图为袁竹林居住的汉口鄱阳街。〔苏智良 2003年摄〕



2



1



2



3

1 1958年，袁竹林被调整户口，她去黑龙江北大荒，投奔丈夫廖斌。户口本和购粮证被吊销了，房子也被没收了。袁竹林在米山建设兵团整整呆了17年，种苞米、割大豆、天寒地冻，丈夫在冻饿交加的情况下出走。1975年，袁竹林带着养女只身回到武汉。图为袁竹林出席听证会。〔苏智良2001年摄〕

2 晚年的袁竹林在早年生活摧残留下的病痛中生活。几乎每日都要头痛，头痛时不能入睡，安眠药不断地服用，每晚也只能睡两个小时左右，大半夜就这么坐着，等待天明。她说：我的女儿饿死了，我一生都不能再生小孩。我被人赶来赶去，我的养女跟着我吃尽苦头。我的苦不是日本人拿钱就能补偿的。我就是要向他们讨一个清白，就是要他们给我们道歉。我们中国人有骨气，就是饿死，也不要他们封我嘴巴的钱！〔苏智良2003年摄〕

3 2006年初，袁竹林老人被养女接到广东湛江一起生活，直至3月29日去世。老人晚年皈依基督教，这是追思会前的场景。〔陈丽菲2007年摄〕

1 袁竹林老人的骨灰安放在武汉的基督教墓地。来宾从北京、香港、上海等地赶来出席袁竹林老人的追思会，这是追思会上的场景。〔陈丽菲 2007 年摄〕

2 2007 年 7 月 5 日，中国“慰安妇”资料馆落成开放，我们邀请袁竹林的养女程菲女士光临落成仪式。程女士将袁竹林老人的护照、身份证等大量身前用品，捐献给资料馆。

3 林亚金 1924 年出生于海南省保亭县南林乡番云淘(黎语，黑豆村)。1939 年，日军占领了海南岛南部重镇三亚，保亭是与三亚毗邻的区域。1940 年，驻三亚日军派出部队进犯保亭县城并建立军部兵营。为了保住在东南亚的战略基地海南岛，日军在三亚、藤桥、崖县驻屯重兵。图为晚年的林亚金老人。〔苏智良 2009 年摄〕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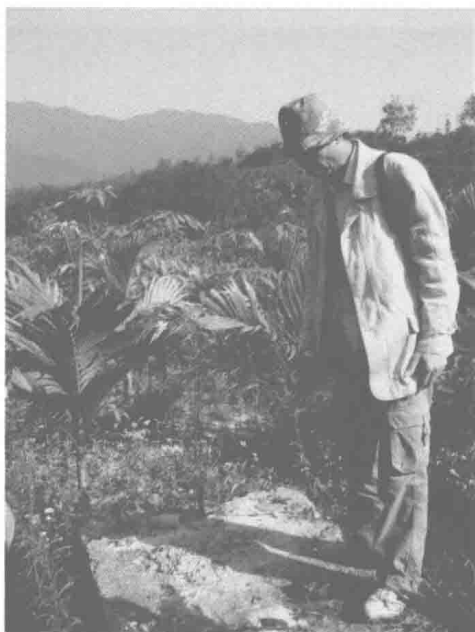


3



1

1 大概在1943年10月份，林亚金与邻村的三个姑娘打南通村的谭亚鸾、谭亚优，番清村的李亚龙在一起割稻，这时日军出动，枪声忽然响了。趴在田垄下藏身的四个姑娘被五花大绑押解上路，带到了南林庆训村据点关押。图为林亚金山清水秀的家乡。〔陈厚志2009年摄〕



2

2 第二天，几个日军押着林亚金等四个女孩子，经过“打滚卖”（黎语“汉人的路”），往崖县的打朗据点去。她们四个被关进一座“奇怪的房子”。进了大门，她们分别被关进小屋，关押亚金的屋子房间黑黑的，没有窗子却有两道门，先是一个铁栅栏样的门，外面还有一扇木板门。木板门一关上，房间就全黑了。图为打朗据点的遗址。调查员陈厚志说，在地上能看到当年日本兵工厂的地基。〔苏智良2009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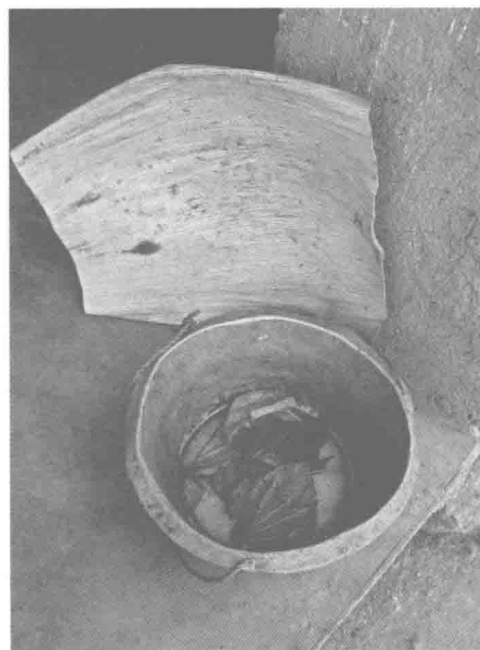
3

3 在那里，林亚金一天吃两次饭，一次算午饭，大概10点以后吃，一次是晚饭，大概下午五六点吃。吃过午饭，亚金害怕的时间开始了。房门被打开，每次都会进来一两个或两三个日本兵，他们进来就把衣服全脱光，有时还会为了谁第一个抓到亚金而大打出手，亚金东躲西藏，怕得发抖，冷汗都会流下来。他们轮流着欺负亚金，有的还会第二次去欺负她。晚饭之后，还会有日本兵三两个地来，像野兽一样地轮流施暴。图为林亚金大娘家里的厨房。〔苏智良2009年摄〕

1 假如亚金表现出不愿意的神态或动作,那就要被打。假如日本兵哪天心情不愉快,更是亚金的厄运。一次,一个日本兵抽着香烟进来,摁住亚金后竟将燃着的烟头狠狠地揪下去,痛得亚金大叫起来,当天就肿了半个脸,后来在左鼻根留下黄豆大凹下的一个疤。图为林亚金老人。〔苏智良 2007 年摄〕



2 亚金和其他三位姑娘不能随便走出去。饭由别人送进来,基本是稀稀的饭,只一碗,总吃不饱。洗身体的水也是人拎来备好,每次受欺负后,亚金被规定必须要洗下体。日本人强迫她们吃药,有白色的,也有红色的,扁扁的如小手指甲那么大。每天上午,尿桶就由她们自己提出来,倒在旁边野地里。平时房子的大门,总是有日本兵站岗把守。图为林亚金采集的草药。〔苏智良 2009 年摄〕



3 每天晚上,她们都扶壁痛哭,每天都哭,相互隔着薄薄的墙哭诉,似乎能得一些安慰。她们之间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想父母,想家,想什么时候日本兵放她们走,自己能不能活到回家的一天。亚金浑身都痛,到后来全身发肿,下体破溃,小便出血,“就像红糖水一样”。她甚至以为自己就要死了,不能活着见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了。图为林亚金老人厨房的门。〔苏智良 2009 年摄〕





1

1 亚金的父母一直在努力打听女儿的下落。打听到之后，就到处想办法、求人。幸好，有一个远房亲戚，住在另一个叫“打泵”的村子当保长，心肠很好。他答应那次被抓去的四个女孩的父母的请求，带上了四家人家准备的鸡、米等，想办法送给日军，请求赎回女孩。病得奄奄一息的亚金等四人，居然被放回来了。图为林亚金老人的家。〔苏智良 2009 年摄〕



2

2 回来时林亚金病得已经不能走路，是家人抬着回来的。衣服筒裙全都给日本兵扯烂了，衣服连袖子也不见了，穿着那破烂的衣服，感到非常非常的冷。因为看林亚金她们病得太重，保长将她们送到自己所在的村子，由懂医的人给她们治病。林亚金 80 多岁仍天天劳作。〔苏智良 2009 年摄〕



3

3 当年，和林亚金一起被赎回的另外三个女孩，没有被救治回来。听说她们全身浮肿，越来越肿，先后死了。先死的是阿优，她一年不到就死去了。然后是阿鸾、阿龙，也是在一年光景的时候死了。林亚金是四个女孩中唯一的幸存者。那一年，亚金 19 岁。林亚金到日本起诉作证时用的箱包就放在床上，好像随时要准备出远门。〔苏智良 2009 年摄〕

1 2007年7月，上海师大“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筹建的“慰安妇”资料馆开馆，邀请林亚金阿婆与照顾她的中心特约调查员陈厚志先生来上海师大出席开馆仪式，并为海外留学生团队做报告。她指着自己的头顶、脸面、左胸、手背，叙述当时日本兵如何欺负她而留下这些累累伤痕。说到痛处，老人失声痛哭。图为林亚金老人在资料馆。〔苏智良2007年摄〕



2 林亚金被抓以后，父亲为了亚金能顺利被赎回，努力去为日本人做民夫、当差，忍气受累，身体越来越差；等林亚金回来不久，父亲的病日益严重，不治身亡。妈妈接连不断地生孩子，最小的弟弟妹妹是年头年尾各生一个，没有休息，没有营养，最小的弟弟阿椰才五六个月，爸爸就死了，妈妈的担子也更重了。她没日没夜地劳作，抚养六个孩子，终于全身浮肿，没有声息地在一个早上离开了人世。图为林亚金在上海电视台做节目后留影。〔苏智良2007年摄〕



3 林亚金认识了后来的丈夫吉文秀。文秀待亚金很好，他了解亚金以前的事情，但并不多问，让亚金感激不已。然而，厄运还是降临到林亚金的身上。结婚两年，亚金怀孕了，却在3个月不到的时候毫无征兆地流产了。从此，亚金就永远失去了生育的机会。图为林亚金家的橱柜，已破旧不堪。〔苏智良2009年摄〕





1

1 20世纪50年代末，文秀被调派外地做税务工作，“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抓起来，在监狱里患了浮肿的病，死了。林亚金成了“反革命”家属、孤苦伶仃的寡妇。图为2007年，受害者中国“慰安妇”万爱花、韦绍兰、林亚金亲临中国“慰安妇”资料馆。〔苏智良2007年摄〕



2

2 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林亚金受到了歧视。在大食堂里吃饭，分给她的饭菜比别人要少一点、差一点，是家常便饭。“文革”开始了，林亚金被视为“日本娼”，有人要批斗她，但乡亲们救了她。图为日本“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林亚金与各国参观者在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姚霏2007年摄〕

3 20世纪80年代初，亚金身体越来越不好，也越来越感到寂寞。娘家番云淘的族姐为她选了男孩女孩作为养子。然而，养女长大后得了精神病；养子结婚后，成家另过。亚金慢慢地从村人眼皮底下消失了。

图为不会写字的林亚金老人应外国朋友要求，在书上写记号。〔苏智良2007年摄〕



3

■ 1 2001年，林亚金等8名受害海南黎族和苗族女性，作为原日军性奴隶（即“慰安妇”），在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但是日本法院以“国家无答责”的理由驳回了中方的诉讼请求。此案败诉。听完老人的控诉，美国友人拥抱林亚金老人。〔苏智良 2007年摄〕



1

■ 2 在交谈时，林亚金深陷的双眼空茫茫地望着前面，反复小声地对陈丽菲教授说：“我恨日本人，要日本人认罪，要日本人赔偿。现在我老了，连工也做不来了，还在受这个气。”图为美国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会长李培德教授、苏智良教授、陈厚志先生与林亚金老人的合影。〔姚霏 2007年摄〕



2

■ 3 2009年1月，在调查员陈厚志陪同下，苏智良教授再次探望林亚金阿婆。80多岁的亚金阿婆，因为乏人赡养，几乎天天下地干活。在寨子里找了一个小时，才见她抱着一些猪草——海芋头叶出现在路上。只见极瘦的阿婆佝偻着腰赤着脚，左脚趾上还缠着一些植物叶，一问，原来她的脚趾被割破了。



3



1

■ 1 2013年7月被诊断罹患老年痴呆和脑萎缩之后，林亚金老人几乎不再说话，糊涂了。但是，提起那段苦难的日子，老人仍然记得，说忘记不了。然而，苦难岂止仅这段？亚金的一生，唯剩苦难。苦难深镌在她的脑海，即便是脑萎缩。老人的最后岁月从这张生着褥疮的照片中就可以看出，是非常痛苦的。〔陈厚志提供〕



2

■ 2 2013年10月17日，林亚金在海南保亭家乡去世，享年89岁。在我们的印象中，很少看到林亚金老人的笑容，尤其是在海南，她总是张着大大的眼睛，惊恐地看着这个世界。这张照片中，老人展现出了难得的笑容，在2007年中国“慰安妇”资料馆的开馆仪式上。〔陈丽菲2007年摄〕



3

■ 3 中国“慰安妇”如怀孕，其下场往往十分悲惨。海南保亭的黎族少女李亚茜被日军抓入南林据点充当性奴隶，后来怀孕，日军即以中国人怎能怀日本“种”的罪名，将其绑在庆训村的坡地上，剖腹杀死。80多岁的海南幸存者陈金玉天天劳作，这是她在编竹席。〔赵青青2007年摄〕

1 日本女性天羽美智子在1971年发表自己的回忆录，控诉其在台湾沦为“慰安妇”。她说，“无论名义上还是现实中，我都变成了一名奴隶”。〔《日军高层看慰安妇：不得建号编档的军需品》，《长江日报》2010年2月19日〕


2 “到了周六周日，（前来的日军士兵）排成长队，他们抢着进来。这就像出售肉体的市场，没有任何感情。每个女人（一天）要接待10到15个男人。”天羽美智子是唯一写出回忆录的日本“慰安妇”，战后她长期住在关东一个避难所里，直至1993年去世。图为2007年5月24日，东京一位天主教信徒在纪念受尽磨难日本“慰安妇”天羽美智子。〔新华社：《日慰安妇回忆录讲述悲惨经历 公开控诉战争罪行》，2007年7月7日〕



1



2



第四章

日军对中国女性的强奸暴行

得到来自加害方——日军部分官兵的供认。日军第十六师团骑兵第二十联队下山雄一郎回忆占领南京后的情形说，也有人去征发女人。可能越是有老婆的人就越是忍不住吧，他们经常强奸女人。骑兵当中也有这种人。他们抓住女人就在百姓家里干了，我甚至亲眼见过在路中央干的，就是我们中队的。师团不是有过“不准强奸”的命令吗？听说宪兵也进城了，不过最终还是没来。他们强奸过女人之后就将其杀掉^{〔1〕}。新井宗太郎是关东军第五十九师团的一个分队长，他后来回忆，1944年11月22日，他们在山东滨县（今滨州市）抓获一名女八路，严刑拷打后没有收获。使用刺刀挑刺她的两个乳房，然后再刺腹部，最后朝她胸部猛刺。“鬼子，要杀就快杀！就算你们能杀死我一个，也杀不完中国人哪！”女八路说完，“那双美丽的黑眼睛安静地闭上了。”^{〔2〕}中央档案馆公布的45名战犯供状中有不少涉及对中国妇女的暴力。如关东军第三方面军第三十九师团中将师团长佐佐真之助供认，1945年3月，在湖北襄樊作战期间，“强奸的中国妇女数字约50名”。在东北担任军官的相乐圭二承认，他曾强奸过34名中国妇女。菊地修一犯下强奸暴行多起：1939年3月下旬，在山西省代县峨口镇，对拒绝借用做饭用具的两名妇女进行殴打，“在房屋内又把30岁左右的女性和她的孩子2名刺杀了，接着又在民房内刺杀了居民3名”。1939年12月中旬，“在太原市内一家民房里强奸中国女性1名”。1940年5月中旬，“仗分遣队长的权力，把16岁1名中国女性强奸了”。1940年9月上旬，“于五寨县五寨城内，把1名20岁左右的女性强奸了，以后又强奸2次”。1941年9月上旬，“在偏关城内宪兵队，由特务工作队领来妇女3名，叫她们在筵席上斟酒后，23时我在宪兵队把22岁左右的妇女强奸了，并纵容部下军官2名强奸其他妇女2名”。1942年5月上旬，“叫翻译把从大同市来神池城1名19岁中国女性带到神池城内翻译家里强奸了，以后又强奸该女性3次”^{〔3〕}。总计“强奸60名。个人强奸39名”。真是罄竹难书。

〔1〕（日）松冈环编著：《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侵华日军原士兵102人的证言》，靳内如、全美英、李建云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351—352页。

〔2〕袁秋白、杨瑰珍编译：《罪恶的自供状：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历史审判》，（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42页。

〔3〕袁秋白、杨瑰珍编译：《罪恶的自供状：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历史审判》，（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55—64页。

一、日军在占领地的强奸暴行

日军在占领地的奸淫行为十分普遍，可以说是严重的战争罪行之一。无论是在广阔的农村，还是人口稠密的城市，日军的强暴行为成为当地中国人最深刻的记忆之一。1937年12月1日，日军从南门和西门攻入了江阴县。江阴当时留在城里没有避开的妇女，哪怕是五六十岁的老太婆，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很少不遭到侮辱的。更残酷的是，日军强奸了妇女，还把她们杀死。城郊大吴家村吴姓的媳妇被日本兵轮奸后投河想自尽，丧心病狂的日军仍不甘心，又把她从河里捞起来强奸致死。扛煤工人刘大炳的妻子被日军强奸后，又被用竹竿插入阴户而死。日军见到年轻妇女，声称“花姑娘”，中青年妇女被其遇见者必遭难，因此在逃难时都装得蓬头垢面，脸上涂着锅灰，但有的被日军识破、有的被汉奸告知真相，她们照样被日军官兵糟蹋^[1]。河北赞皇县北清河村的张门氏控诉，1938年她20岁，这年的3月25日，3个日本兵冲进家园，强暴了已经怀孕的她，导致其流产^[2]。龙堂院村的商姓少女，一天在河边洗衣被日本兵发现，抓到炮楼，惨遭蹂躏，数日后乡民被通知，到炮楼去抬死尸^[3]。在海南岛的澄迈县，日军强奸的妇女就达879人^[4]。1938年6月8日，隶属于奉天（今沈阳）工藤部队的木村镇雄在寄给石川县金泽市的妻子木村美代子的信中写道：“同事通过地理和语言判断强奸的对象清一色是满洲女人，然后不分日夜对其强奸。很多女人被数百名男子强奸……”^[5]二战时期日军的强奸行为如此的普遍和野蛮，不但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奋勇抗击，也遭到了来自全世界各地有良知的外国人士的严厉谴责。

[1] 禹硕基、杨玉芝、邢安臣主编：《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213页。

[2] 王之鉴：《日军暴行目睹实录》，Li Kung Shaw Publisher 出版，台湾旺德印刷有限公司2002年3月版，第45页。

[3] 王之鉴：《日军暴行目睹实录》，Li Kung Shaw Publisher 出版，台湾旺德印刷有限公司2002年3月版，第60页。

[4] 中共澄迈县委党史研究室、澄迈县地方志办公室编：《抗日战争时期澄迈县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资料》，2008年内部印行，第13页。

[5] 关东宪兵队：《邮检月报》，吉林省档案馆藏。

1 日军冲到腾冲芒棒村，有一户人家住房离村子较远，未听到警报声。日本兵闯入他家，将其60多岁的母亲轮奸后杀害，又将其儿子也杀害了。为了取乐，还将母亲的乳房割下放在儿子胸前。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在云南调查日军暴行。

2 谷山吉藏，1916年7月生。日军占领南京时，他隶属于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第一机枪中队。1999年4月，他在接受松冈环女士等采访时指出：“在南京的前一站无锡一带，五六个士兵抓来一个妇女在宿舍里强奸的事情，我是知道的。”〔松冈环编著：《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侵华日军原士兵102人的证言》，第110—111页〕这张照片的日文说明道：运送途中随手一拍，士兵们正赶往慰安所。



1



2



1

■1 战争使得妇女们陷入绝境。这是一位逃难中家破人亡的母亲，正在痛哭流涕。
〔(日)荒井信一解说：《20世纪的战争：日中战争》，照片页〕

■2 一位妇女被轮奸后，日军将其剖腹断肢然后投入火中焚烧。图为被烧焦后的残尸。
〔张承钧主编：《强盗自白：来自日本随军记者的秘密照片》，(北京)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258页〕

■3 图为因反抗日军强奸而被刺三十多刀并流产的李秀英，在南京鼓楼医院医治的情形。此照片根据马吉拍摄的电影胶片制作。
〔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全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版，第350页〕



2



3

1 在杭州，日军到处搜索妇女，街头巷尾女子多被轮奸，泣叫声与狂笑声划破一座死城的空气，使中国民众战栗愤恨。有许多女尸体赤条条躺卧大街，乳房被割，小腹被刺，凹处呈褐色，肠涌出堆于身旁，阴户中塞以纸烟或木头。图为苦难中绝望的中国妇女。〔（日）荒井信一解说：《20世纪的战争：日中战争》，第80页〕

2 日军强奸妇女后，迫其裸露下身，并与之合影，这张照片是自日军战俘身上搜得的。〔张承钧主编：《强盗自白：来自日本随军记者的秘密照片》，第260页〕

3 日军强暴中国女子后，时常杀人灭口。图为被日军凌辱后惨遭杀害的中国少女。〔李秉新等主编：《侵华日军暴行总录》，照片页〕





1

■1 图为被日军轮奸后染上性病，在金陵大学医院接受治疗的18岁少女。〔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全史》，第334页〕

■2 拖儿带女的母亲流露出绝望的眼神。〔（日）荒井信一解说：《20世纪的战争：日中战争》，第84页〕



2

■3 《新华日报》1938年4月9日报道：前月敌军盘踞山西垣曲县政府，退走后，我军在县府内查获我同胞妇女之衣裤六十余套，均系鲜血淋漓，惨不忍睹。1942年5月1日，日军对冀中地区进行疯狂扫荡。图为在河北保定狼牙山扫荡中，被日军先奸后杀的农村妇女。〔李秉新等主编：《侵华日军暴行总录》，照片页〕



3

■1 根据《冀鲁豫区山东部分八年抗战损失统计表》的记录，山东根据地被日军奸淫而染上性病的妇女有10766人。《晋冀鲁豫边区八年抗战中人民遭受损失调查统计表》载，被奸淫妇女达36.3万人，其中的12.2万妇女患有性病，痛苦不堪。1943年大扫荡中惨遭日军杀害的阜平县罗峪村妇救会主任刘耀梅，日本兵还残忍地割下她腿上的肉包饺子吃。〔杨克林、曹红编著：《中国抗日战争图志》，（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857页〕



1

■2 关东军第十八师团的早川部队，1932年冬占领辽宁北票后，以散发洋货和奇缺物资为诱饵，挟持美貌女子到日军军营，进行强奸或轮奸。后来，成群结队的日军，部分昼夜闯入民宅，到各家各户任意蹂躏和奸淫妇女。1943秋，日军荒井大队扫荡河北阜平县，在平阳村屠杀千余无辜平民，照片为屠杀现场，有不少妇女死亡。〔杨克林、曹红编著：《中国抗日战争图志》，第733页〕



2

■3 1938年7月14日，一个日本兵光天化日之下在山东菏泽万家村强奸妇女万静，当即被村民刺死。接着日军血洗该村，烧掉房屋280多间。图为日军扫荡轰炸之惨状。〔杨克林、曹红编著：《中国抗日战争图志》，第731页〕



3



1

1 1937年12月9日，日军第十八师团侵入安徽芜湖地区，见到妇女就施暴，有的妇女被奸后还惨遭杀害。萧家巷韩姓大屋躲藏着60多人，被发现后全部被杀。其中孙、翟、张3位女性被轮奸而死。还有的妇女被逼裸体在火中跳舞，有的被日本兵绑在树上遭受凌辱。芜湖市内的尸体就达2500具。日军强奸中国妇女后，还要迫使其裸体。〔杨克林、曹红编著：《中国抗日战争图志》，第393页〕



2

2 1938年日军第十四师团侵入河南浚县裴庄。常李氏和常张氏两位老妇被抓住，扣在两辆太平车里，被用火烧死。日军见妇女就好淫，上至老嫗，下至幼女，受害者达二十多人。日军强奸中国妇女后，强迫其裸体，并恣意侮辱。〔杨克林、曹红编著：《中国抗日战争图志》，第393页〕



3

3 日军侵犯襄城杨沟时，将抓到的人都集中到杨列娃的院子里，有学生、有农民、有商人，也有被俘的士兵，还有一部分妇女，大约六七十人。一共拴成三串。这时天已经黑了，还刮着西北风，日军将抓来的妇女拉到屋里糟蹋，有的就在院中当着众人的面奸淫。可怜这些妇女哭叫着挣扎反抗，也无济于事。图为受害者邓玉民老人，她于2014年6月20日病逝。〔苏圣捷2014年摄〕

1 1945年，日军第十一军的一个联队在湖南桂阳县樟市乡扫荡，樟树村陈福义的妻子被日军强奸。妇女被奸达35人，其中70多岁老太婆2人，12岁的女孩1人。

“一·二八事变”中，日军在上海对中国妇女进行强暴与摧残。图为被日本兵割去双臂的妇女。〔杨克林、曹红编著：《中国抗日战争图志》，第850页〕

2 这是南京大屠杀时期遭受日本兵强暴的南京妇女，痛不欲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编：《南京大屠杀图录》，（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7月版〕



1



2

二、妇女受害的个案

女性与生俱来维护自我精神和身体清白的意识，深深地根植于每一个普通中国女性的心中，二战时期侵华日军在性暴行方面的兽行，给中国女性带来无法言喻的苦痛，这种苦痛甚至深深震撼到施暴者日军个体的心灵。日军某军医在1940年8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在华中某地，“（最初的性病检查时）一进行局部内诊，（中国女子）她就越发害羞，怎么也不肯脱裤子。翻译和（治安）维持会长怒骂起来，好不容易才解开。让她仰卧在床上，进行触诊时，又拼命地抓医生的手，哭了起来。离开房间后，好像还哭了一阵子。接着的一位姑娘也是这样，泪流满面。……保长和维持会长一再地劝说道：‘这是为了村里的治安，怎么哭着来呢？’……”这个军医接着写道：“这种工作，实在不是我的意愿，一种蹂躏人性的意识，难以离开我的脑际。”^{〔1〕}二战时期被揭露出来的妇女遭受性暴力伤害的，可以说是难以数计。例如在湖南长窖，一个20多岁的女教徒，遭到5名日军士兵的轮奸。事后好多日子，她动都动不得。杨某某的3个儿媳，被9个日本兵轮奸。一些经期的妇女，也不得幸免。惨无人道的是，日军竟强迫男人去喝妇女的经血，谁拒绝，就杀谁。彭叔山的父亲抗拒，日军一刺刀在他胸口上插了个对穿，死在地上。日本人脚踏在他胸脯上，才抽出刀来。如有反抗者，皆被杀害。日军强奸杨某某的二媳妇时，他二儿子眼睁睁地看着老婆被奸，忍无可忍，操起一条板凳把强奸的日本兵打昏。日军便将他二儿子、三儿子用乱刀砍死。这以前，杨某某和他的长子，已被杀死。凶暴的日军觉得杀了他们全家还不泄恨，又一把火将他家房屋烧了个片瓦不留^{〔2〕}。1942年，日军占领云南腾冲东平镇，将罗香寨的一个11岁小女孩抓住强奸，致使该女孩大出血死亡^{〔3〕}。龙陵松山永兴的张凤英是一位瘫痪妇女，日军天良丧尽，几次入村强奸她。为了取乐，日本兵竟放出狼狗对其进行摧残，最后张凤英被折磨而死^{〔4〕}。这些遭侵犯的女性个体，大多是无辜的平民，当然也有抗日的女战士。二战时期的侵华日军对妇女个体甚至尸体的侮辱，是令人发指、惨无人道的法西斯行为。

〔1〕（日）矢野玲子：《慰安妇问题研究》，大海译，（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226页。

〔2〕王长生：《铁蹄践踏风车拐》，《厂窖惨案》，第151—152页。

〔3〕沙必璐主编：《血肉丰碑——侵华日军滇西暴行与滇西抗日战争纪实》，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

〔4〕沙必璐主编：《血肉丰碑——侵华日军滇西暴行与滇西抗日战争纪实》，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

日軍虐待狂

鞭撻英女裸體 陳列櫥窗中充模兒特

尿糞桶，以供排洩。他們不論日夜，沒有半張毯子或席子。這位主教某次會觸怒一個日兵，他便被縛在庭柱子上，被皮鞭抽打了二百餘下，直到他暈厥過去。他們每天只有吃一些些腐化變味的食物。在八個月之後，他們活著的統統只剩幾根皮包骨頭了。

有一個被俘虜的軍曹，因為反抗日軍種種慘酷對待，便被縛手縛腳丟在曠地上，日兵以巨大石滾筒推過他的身上，作為一種遊戲，這個不幸的士兵就此骨折斷腿而死。

一位高級的英國軍官，在搜集了許多日本軍的獸行的記錄之後，寫信給倫敦的聯合處置戰爭罪犯委員會，他如此陳述：「日本的戰犯應該處以絞刑；若僅判決槍斃，那是太優待他們了。」

這位軍官曾與數百名受日人虐待的不幸者會談過。他的報告中：在馬來亞，日本兵士常常褫去英國婦女的衣服，甚至于內衣，然後用鞭抽打她們全裸着的肉體，鞭打過後，還要逼令她們站在大街上百貨店的櫥窗裏，令行人駐足而觀；她們竟被如此「陳列」着達一星期之久，真可算極盡蹂躪女人的能事了。

有十九個看護少女，因抗拒此種侮辱的待遇，立刻被日兵當着許多婦女的面用刺刀戳斃。還有一個可憐的女人，她的乳房被日兵削去，用燃燒着的香烟插入她的鼻空中。還用種種猥褻得不堪形于筆墨的獸行來蹂躪她。

新加坡的主教和其他十七名英人同時被執，他們被幽禁了八個月之久，始終囚在一所寬僅八方尺的暗室裏，這裏還要放一隻



一婦人被人輪姦後，小肚上刺給破刀戰破，出腸肚，狀至慘！

1 在 1938 年 2 月 22 日的山西离石县九里湾惨案中，几十个日本兵窜入一户人家，将一位姓杨的老太太轮奸致死。不仅如此，日军在强奸妇女后，还往往对被其奸污的妇女，进行惨绝人寰的摧残、践踏乃至杀害。（禹硕基等主编：《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例如，在 1939 年 8 月 22 日的大同大王村惨案中，日军在对一位年轻妇女进行强奸后，还割掉其乳房，捆住其四肢，并将其扔进地窖中，用火烧死。又如，在 1941 年 9 月底的平鲁县白家庄（幸庄）惨案中，日军在强奸一名负伤的妇女后，还在该妇女的阴道内塞上木棍、石块等，最后又将其杀死，等等。图为一名妇女被强奸致死，又被日军挑开腹部的惨状。〔《日军暴行备忘录》，上海联美图书公司 1946 年版，第 5 页〕

2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 1942 年 10 月 6 日赣州电讯指出，南昌市东南 60 里外岗山附近的玉华观，14 名尼姑被日军奸淫，寺内食物也被抢劫一空。尼姑痛恨清门受辱，生活无着，被迫集体举火自焚。〔禹硕基等主编：《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12 月版〕

图为陈丽菲教授在广西向知情人了解女性受害情况。〔苏智良 2008 年摄〕



2



1



2

1 女战士 20 岁的成本华是在坚守安徽和县城门时被捕的。照片的背景是 4 个坐在长椅上嬉笑的日本士兵，他们手持屠刀。成本华面带微笑，将生死置之度外。〔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编：《支那事变画报》第 28 辑，大阪每日新闻社 1938 年 5 月 21 日发行，第 17 页〕



3

2 在海南长流，日军尽管已设立慰安所，但有时“慰安妇”供应不及，日兵便四处强奸妇女。因此，附近的青壮年妇女只好蓬头垢面外出，以此来逃避日兵糟蹋。图为海南保亭日军性奴隶制度受害者谭亚洞老人，2010 年 9 月 6 日去世。不少被抓入军营成为性奴隶的受害女子，在成为性奴隶之前均有被日军乱兵强奸的惨痛经历。〔苏智良 2009 年摄〕

3 对于官兵的强奸暴行，其上司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处罚。原日军三十九师团师团长佐佐真之助供认，1945 年 5 月，该师团一名士兵强奸了一名中国妇女，“我下令把这名士兵从我师团调入新成立的一三二师团就算完事了”。图为日军在南京强暴中国妇女后强逼妇女们拍摄的照片。〔杨克林、曹红编著：《中国抗日战争图志》，第 394 页〕

■ 1 著名记者、社会活动家冯英子的妻子和弟媳曾遭日军轮奸，1996年6月27日，冯英子向日本驻沪总领事转交了致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的抗议信函。7月2日香港《星岛日报》全文刊载。图为2000年3月底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冯英子先生（中）与日本华侨领袖林伯耀先生和苏智良教授的合影。〔胡海英2000年摄〕

■ 2 张改香 1925年出生于山西省孟县西潘乡进圭村，战时被日军抓入该村的炮楼。〔苏智良2012年摄〕



1



2



1

1 1941年9月20日，5名日军在湖南岳阳的金沙乡上甘冲屋轮奸一少女后，不顾她已奄奄一息，又强逼邻居68岁的伍葵清去行奸，吴愤怒已极，痛骂日军的无耻暴行，当场被日军活活打死。

孟县进圭村的炮楼就在山顶上。

2 日本老兵回忆：“在衡阳下游七八公里的村庄，第二九五七部队抓了两个十七八岁的姑娘，非常漂亮，服装也很美。两个姑娘被绑着押回，当日本兵把两个中国姑娘带回兵营时，一个一等兵兴奋地喊叫：‘今日开始开设慰安所啦，大家来玩啊！’于是，姑娘们被关进了防空洞，里面传来哭泣的声音。我想看个究竟就进去了，只见那个一等兵好像已把那两个姑娘的手指给弄折了，姑娘很可怜地用包带包着手。”图为受害者张改香老人家的窑洞。〔姚霏 2007年摄〕



2



1

1 张改香老人于2014年1月28日8时在孟县去世。图为追悼会场景。〔赵文杰2014年摄〕

2 1942年9月4日在云南松山，快要生产的李早焕，挺着大肚子走到户外舒缓筋骨。不巧，一伙日军也从大垭口外出，正在蚂蟥水寨子寻找“花姑娘”，看到她，日军便蜂拥而上，恶狼般扑向她。日军像老鹰叼小鸡似的将她拉出来，撕开衣服，使她全身裸露，将她轮奸致死。丈夫杨春外出归来，见妻子被日军轮奸而死，十分悲愤，他找了几个逃难的人帮忙料理后事，剖开妻子的腹部，见怀的是双胞胎，更加伤心，失声痛哭，拿起菜刀要找鬼子拼命，被人劝住。图为曾在云南遭受苦难的朴永心老人重返云南龙陵。〔朱弘2003年摄〕



2



1

1 在云南腾冲的一个村寨里，小媳妇郭咪芹因为碾坊里的声音太大，没有听到日本兵扫荡的警报。十来个日本兵冲进了碾坊，发现了这个“花姑娘”，非常地兴奋。郭咪芹吓得抱住一根柱子。日本兵就用刺刀挑开她的衣服，用木棒把她绑成一个大字，开始轮奸。最后，把奄奄一息的郭咪芹吊起来绑在两根柱子之间，用刀把她劈成了两半。图为腾冲西华街蔡国柱家的大门，战时这里曾是日军慰安所。〔苏智良 2001 年摄〕

2 战时报刊揭露日军在上海的暴行：“日兵进驻南翔，大索民女，最后索到安老院里，有一鸡皮老妇，竟亦不免，被数兵按至厨房，一一加以轮奸，这是日军的兽性暴露。在浦东下沙地方，一个六岁女孩子被日兵强奸后，复以刺刀刺入该女孩肛门，以致惨叫一声而死，日兵将尸抛弃地方，大笑而去。”图为当时报纸揭露日军强奸一老年妇女的暴行。〔《日军暴行备忘录》，第 4 页〕

• 暴行進行之惡魔 •



。淫姦機趁，服衣女婦破刺，名為查搜以寇敵
！淚無哭泣，辱侮軍日遇遭正人婦老一：示圖

筆者曾見到一張照片，照相上拍的是許多赤身裸體的婦女，手足部份都用繩連繫起來，爬在山上，宛如一羣羔羊，但旁有日兵押守，用意不詳，但總之不脫日兵的荒淫故事。

-4-

★ 敵 暴
魔 惡 ★

怎樣發洩獸慾蹂躪婦女？

最早聽說在上海的虹口地區，日兵把中國少女捉來強姦後加以殺害，並把乳房割下來，這樣一隻隻的乳房積成幾十隻之多，別無用處，祇能割了玩，以肉肉作兒戲而已；此事雖出傳聞，但關於日本人連人肉亦要吃，野蠻如此，割乳房區區小事，亦絕不足奇了。這是日兵的淫虐成性！

日兵進駐南翔，大索民女，最後索到安老院裏，有一雞皮老婦，竟亦不免，被數兵按至廚房裏，一一加以輪姦，這是日軍的獸性暴露。在浦東下沙地方，一個六歲的女孩子被日兵強姦後，復以刺刀刺入該女孩肛門，以致慘叫一聲而死，日兵將屍拋棄地上，大笑而去。再有在嘉定，一家姓徐的家裏，某夜突然來了幾個日兵，先是我到了主婦，叫他脫光衣服，赤裸裸地躺在牀上，然後再找一個青年男子與她交合，同時復命其夫在旁觀看，日兵引為笑樂。那個青年男子，與主婦為叔嫂關係，但在日兵刺刀下，雖經說明，不能還其諒解，於是不能不做這件亂倫的事情出來，日本人自就文明，原來是不知道羞恥的動物，與獸無異。

1 在海南，一对因迷路被抓来石碌矿山的未婚大学生，男的被迫到宝桥（今叉河镇）去修铁路，女的被迫进了“慰安所”接客。她死也不从，被日军吊在树上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因经受不住日军惨无人道的摧残，不久，便死在“慰安所”里。有一位叫阿青的姑娘，年仅17岁，抓来“慰安所”的当天，就惨遭几名日军轮流奸淫，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其惨状实在不忍用文字来表叙。

在海南临高县的加来、临城、新盈，日军设立3个慰安所，被日军抓来强迫当“慰安妇”的妇女数以百计。陈林村生于1926年，是保亭县加茂镇毛立村人。1942年起，她三次被逼为性奴隶，受尽日本兵的欺凌。

苏智良教授、陈丽菲教授在海南万宁探望陈林村老人。〔苏圣捷2014年摄〕

2 日军占领香港后，强奸惨事时有发生。连10多岁的儿童和60多岁的老妇都不放过。1941年12月29日，在中环俞寰澄家附近，有一户人家的妇女，一夕之间竟被日军强奸三次之多。图为曾经是香港慰安所集中的湾仔道。〔苏智良2009年摄〕



1



2

第五章

Women's International War Crimes Tribunal
on Japan's Military Sexual Slavery

战后日本对“慰安妇”制度的
掩盖与否认

December 12, 2001 Tokyo Japan



自20世纪90年代初“慰安妇”问题浮出水面后，日本的不少政要就百般否认这一战争罪行。1990年6月6日，劳动省职业安全局长清水传雄就说，“军队‘慰安妇’的任务与国家业务无关，民间业者跟随军队。调查是不可能的”。此后，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又发言说，“对‘慰安妇’而言，虽然有程度的差异，而美国 and 英国也有类似方式。当时，‘慰安妇’是公娼，不能从现在的视界看，说那是轻视妇女或者对韩国人的歧视”。此类谬论可以说不绝于耳。

中国、韩国的官员、专家、记者和民众们对日本政府否认“慰安妇”战争罪行的言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各国的敦促下，1993年8月4日，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发表谈话，全称《慰安婦関係調査結果発表に関する河野内閣官房長官談話》，简称“河野谈话”。河野代表日本政府承认“慰安妇”问题给很多女性的名誉和尊严带来了严重的伤害，日本政府表示由衷道歉。这个“河野谈话”，成为日本政府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基本立场。

然而二十年来，日本政界的一些人不仅不恪守“河野谈话”，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人类社会的公理。特别是近期以来，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似乎正在进行一场“谁比谁更右”的荒唐游戏，以吸引日本民众的眼球，来谋求各种政治利益。这里仅以大阪市长、日本维新会会长桥下彻的“慰安妇必要论”为例。2013年5月，桥下彻公然声称，在战时的情况下，“慰安妇制度是必要的存在”；他甚至建议，驻日美军官兵可充分利用日本的色情场所。

桥下彻的“慰安妇必要论”一出，世界舆论为之哗然。

桥下彻为日军暴行辩护的行为是十分可笑的。毫无疑问，“慰安妇”制度侵犯了人权，违反了人道法及国际惯行的保护妇女儿童权利的法规，就是一种大规模战争犯罪。对此国际社会早有定论。1996年4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公布的《关于战时军事性奴隶的报告》认定，战时日本实施了“慰安妇”制度，日本政府应对此负责。报告还忠告日本政府：应当公布一切相关资料，承担法律责任，对每位受害者予以赔偿和谢罪，并在教科书中正确反映这一历史事实，对于战争犯罪进行惩罚。

日本国内数以百计的团体，要求声称“随军慰安妇有必要”的日本维新会共同党首桥下彻收回发言并道歉。他们指出，“从桥下身上丝毫感受不到人权意识，他根本没有好好学习历史”，“他应该道歉并辞去公职”^{〔1〕}。桥下彻的谬论就连近年

〔1〕《日冲绳女性团体要求桥下彻收回慰安妇发言并道歉》，《人民日报》2013年5月15日。

来一贯右倾的日本官方也回护不了，日本政府及日朝野政党纷纷提出批评。日本政府担心，历史认识问题因此发酵。首相安倍晋三在参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示，“发自内心地同情慰安妇们笔墨难尽的痛苦经历”。日本自民党参院干事长沟手显正在记者会上也痛批桥下彻，称其“发言愚蠢且草率”。

“慰安妇”制度侵犯人权，违反了国际惯行的保护妇女儿童权利的法规，是一种明明白白的战争犯罪。不直面“慰安妇”问题，日本就不能“完全卸下历史包袱，成为一个全新的、令人尊敬的国家”。

一、日本政界否认“慰安妇”制度罪行的言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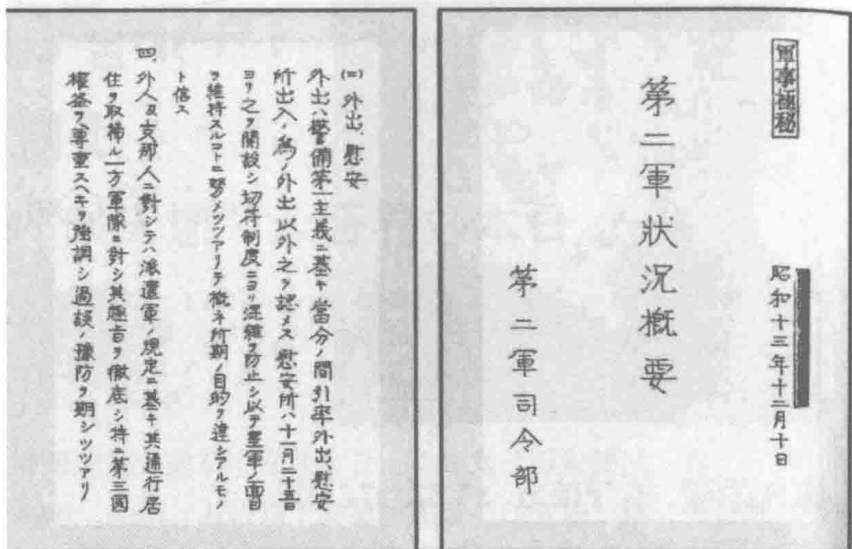
在“河野谈话”发表后，日本政府中某些持强烈民族主义立场的官员在种种场合发表奇谈怪论，对“慰安妇”等历史事实予以否认。例如，1998年8月，时任小渊惠三内阁农林水产相的中川昭一发表过“从军慰安妇并不带有强制性”的言论。2007年，安倍晋三第一次内阁时期，安倍公开否认日本政府实施了“慰安妇”制度，强调说是商业行为。2013年，大阪市市长桥下彻不仅认为“慰安妇”是商业行为，还无耻地建议冲绳美军可找“慰安妇”。2014年1月，新上任的日本NHK电视台新任会长舛井胜人竟然胡说，慰安妇问题“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1〕}，引起各国舆论的批判，不得不表示收回。日本政府内这些民族主义者在包括“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上不时发出噪音，扭曲、否认历史事实，致使“慰安妇”问题成了困扰日本与亚洲邻国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1993年8月4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承认日军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但二十年过去了，日本高官仍不断否认这一历史事实。日本高官的谬论引起受害者、受害国及世界舆论的强烈批判。这是菲律宾的受害者来到上海，控诉日军的暴行。〔苏智良 2003年摄〕

〔1〕《产经新闻》2014年1月27日。

1 1996年6月5日，日本自民党议员奥野诚亮胡说，“慰安妇是商业交易，没有强征，自己愿意参加的，与国家（军队）无关”。图为日第二军占领汉口后开设慰安所的文件，这份《第二军状况概要》标明，早在1938年11月3日，日军在汉口就开设了慰安所。〔日本防卫省研究所图书馆藏〕



2 1997年2月6日，日本国会议员岛村宣伸恬不知耻地发表谈话说，“从军‘慰安妇’一定会对为日军服务感到自豪。募集者不是日军，而是卖春业者。做募集角色的大部分也都是韩国人或者中国人”。对此，大宫市的日本老兵小平喜一就指出，当时日本的大部队都带着“慰安妇”一起行动，“慰安妇”们的食粮也是由部队供给的。当时，日本在海外的军人有一百多万，现在这些人都对慰安妇问题闭口不言，我认为这是很奇怪的。特别是那些军医们，应该积极地站出来讲话。图为韩国慰安妇纪念馆再现了日军慰安所的场景。〔陈丽菲 2009年摄〕



3 2004年10月27日，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说，“日本教科书有多处自虐性的阐述。‘从军慰安妇’或者‘强征’这些词减少是相当值得肯定的”。图为韩国受害者李容女所绘图画，再现了当年她们在日军的押送下乘兵船前往未知命运之地的场景，表明当年的她们成为“慰安妇”完全是强迫的。〔1995年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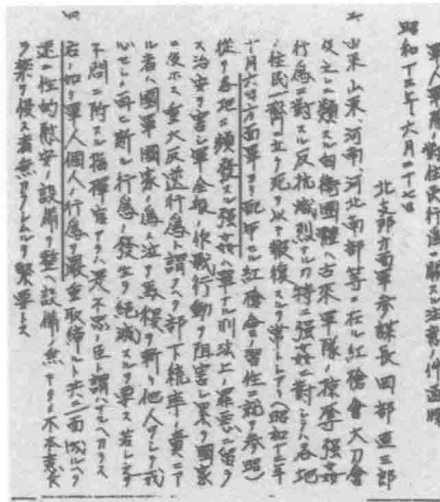
1

1 2007年2月19日，针对美国议会讨论敦促日本政府承认“慰安妇”犯罪提案一事，日本内阁外务大臣麻生太郎狡辩称，“美国议会的决议案未基于客观的事实。不考虑‘河野谈话’等日本政府的应对，让人感到非常遗憾”。图为根据受害者的回忆复原的日军慰安所内部场景。〔摘自韩国慰安妇纪念馆〕



2

2 在战争最后的时刻，日本兵甚至杀死“慰安妇”给他们陪葬。这是云南松山战役最后的时刻，这堆自杀的日本兵尸体中，就有两具“慰安妇”的尸体。〔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4

3 这是日本“慰安妇”资料馆内的展示牌，展示牌关于“慰安妇”制度加害者的内容，明确指出战争的最主要的责任者就是裕仁天皇。

4 尽管战败时，日本销毁了大量的文献，但日本政府及其军队推行性奴隶制度仍有不少人证物证。1938年6月27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在签署的文件中，承认日本兵的强奸案不断发生，为此要建立慰安所。图为该文件。〔日本防卫省研究所图书馆藏〕



3

二、日本司法界否认“慰安妇”制度的罪行

为了给自己战争时期遭受的迫害讨回公道，世界各国的受害妇女一直都在进行着不懈的斗争。1991年，67岁的韩国老人金学顺第一个勇敢地站出来坦承“我就是一名曾经的慰安妇”，并奔赴东京状告日本政府，要求其认罪并赔偿，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向东京法院就日本强征“慰安妇”罪行作证的受害妇女。中国受害妇女随后也开始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从1992年起，以山西的李秀梅、万爱花为代表的中国受害妇女曾先后6次到日本进行了血泪控诉，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和赔偿。到目前为止，中国“慰安妇”对日诉讼索赔案件有5起，其中大陆4起，台湾1起。



山西“慰安妇”诉讼。1995年8月7日，山西省孟县的李秀梅、刘面换、周喜香和陈林桃4名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了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的诉讼请求。〔（日）女性的战争和和平资料馆编：《女性国际战犯法庭集》，第19页〕

■1 受害者的起诉得到中国和日本律师群体的积极支持。图为中国律师康健与李秀梅大娘 2000 年 11 月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前的留影。〔康健提供〕

■2 2001 年 5 月 30 日，东京地方法院做出驳回李秀梅等原告要求的判决，当年 6 月原告上诉到东京高等法院。图为原告陈林桃老人，老人于 2014 年 1 月 29 日 16 时去世。〔苏智良 2000 年摄〕

■3 对日提起诉讼的曹黑毛老人生活在山西孟县，战时被日军抓到进圭村据点，遭受日本兵欺凌，并在被关押期间两次怀孕。〔苏智良 2014 年摄〕



1



2



3



1

2

1 2004年12月15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以“国家无答责”和“诉讼时效已过”为由，驳回了山西受害群体的上诉，原告方败诉。此后到2007年3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驳回，维持原判。图为2000年陈丽菲在山西探望与访谈原告刘面换老人。刘面换老人于2012年4月12日病逝。〔苏智良2000年摄〕



3

2 李秀梅老人曾多次到东京作证，与否认历史的日本右翼作斗争。2013年9月8日，陈丽菲教授专程到孟县探望慰问李秀梅大娘。图为陈丽菲教授与李秀梅大娘的合照。〔赵蓓红2013年摄〕

3 2014年4月10日，李秀梅老人因心肌梗塞发作而病逝。4月18日，追悼会在孟县西烟镇举行，图为苏智良（右二）、陈丽菲（右三）、张双兵（右一）与李大娘的家属合影。〔赵文杰2014年摄〕



1



2



3

1 山西“慰安妇”诉讼（第二批）。1996年2月22日，郭喜翠、侯巧莲两名来自山西的原告在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是日本国家。图为2000年在日本东京参加女性审判战争责任法庭活动的郭喜翠老人。〔苏智良摄〕

2 2001年5月30日，东京地方法院做出驳回原告要求的判决，2001年6月，原告上诉到东京高等法院。侯巧莲早在1999年5月病故。这是郭喜翠老人到东京抗议日本法院不公判决的照片。〔（日）女性的战争和和平资料馆编：《女性国际战犯法庭集》，第19页〕

3 2005年3月18日，东京高等法院再次做出驳回郭喜翠等原告要求的判决，并首次支持了日本政府提出的“请求权放弃论”的主张。该判决认为：1952年《日华条约》缔结时已放弃了国家赔偿权，中华民国政府是“正位政府”，与日本缔结的条约是有效的。关于战争赔偿问题是适用国家间的，不是限定在部分地域适用的，因此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中国全境，都可以适用《日华条约》。图为中国律师康健与郭喜翠老人在日本举行控诉会。〔康健提供〕



1



2

1 此后，原告郭喜翠等上诉到东京最高法院。2007年4月27日，日本高院终审判决原告败诉。次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对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表示强烈抗议，认为判决不当，是为日本政府推卸了本无可否认的法律责任。图为2006年的郭喜翠老人，老人始终坚持自己的诉求。〔姚霏2006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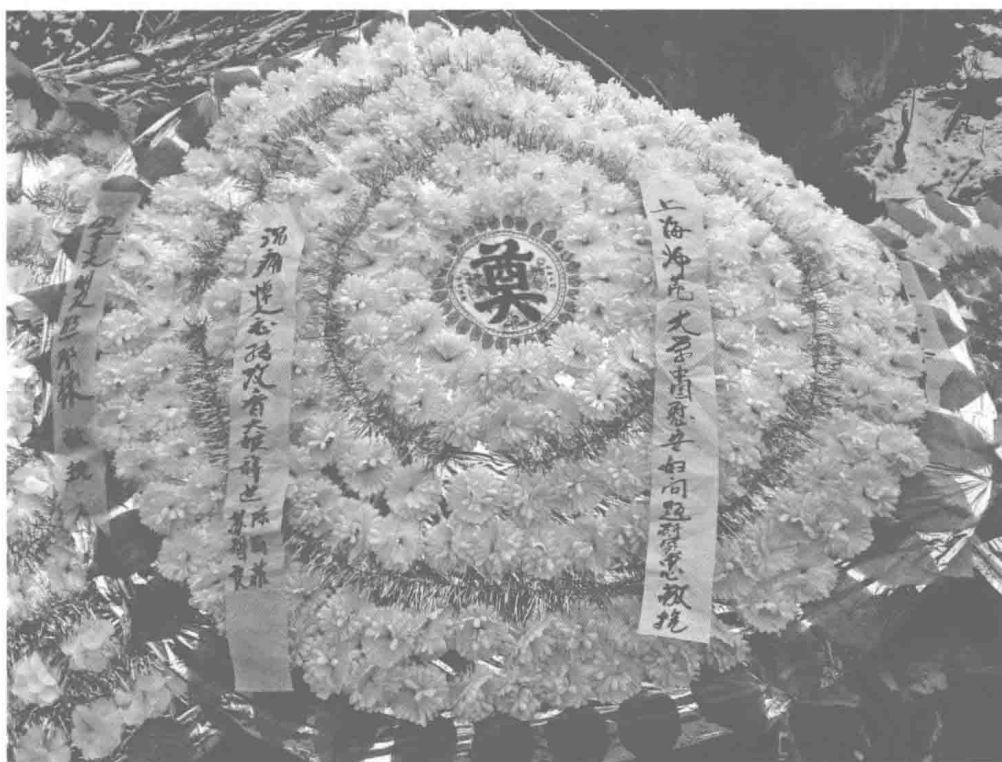
3

2 第三起起诉案是山西省性暴力受害者诉讼。1998年10月30日，万爱花、赵润梅等10名原告（其中1人为受害者家属）在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是日本国家。图为原告之一的赵润梅大娘。〔姚霏2006年摄〕

3 2003年4月24日，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了驳回万爱花等原告要求的一审判决，但认定了加害和受害事实。这是万爱花等原告到东京起诉日本政府。〔（日）女性的战争和和平资料馆编：《女性国际战犯法庭集》，第19页〕



1



2

1 2005年3月31日，东京高等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原判。7月，万爱花等原告向日本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是年11月，日本最高法院判决原告败诉。图为2012年5月苏智良到孟县探望受害者张改香大娘。〔董天艺2012年摄〕

2 2014年1月28日8时，张改香老人在孟县去世，这是葬礼上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敬献的花圈。〔赵文杰2014年摄〕

1 海南“慰安妇”诉讼。
海南受害者陈亚扁、黄有良、林亚金等8名原日军“慰安妇”于2001年7月16日在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是日本国家，要求判令日本政府在中日两国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每位原告2300万日元。8名原告都是黎族或苗族，她们当年最小的年仅14岁，最年长的也只有17岁，均未婚。诉讼中有2名原告已去世，她们的7名遗属参加了诉讼，因此当时共计13名原告，索赔金额共计1.8亿余日元。

图为陈金玉老人去东京作证的护照和日本签证。〔苏智良2009年摄〕



1

2 此后，林亚金、陈亚扁等分别以原告代表的身份赴日本出庭作证。一审审理期间，杨嫫榜等3位原告已因病去世。这是林亚金等原告在东京活动。〔(日)女性的战争和和平资料馆编：《女性国际战犯法庭集》，第1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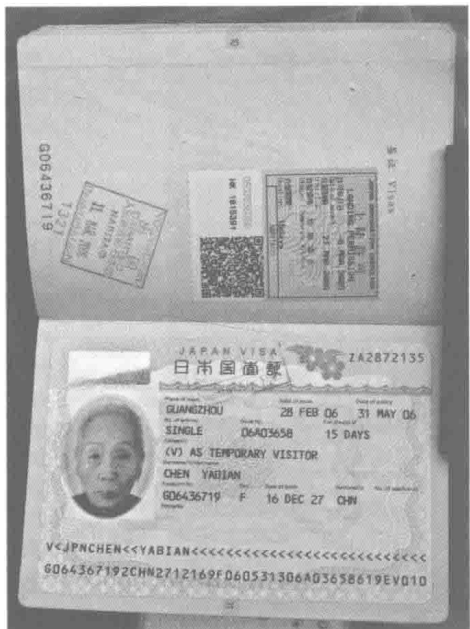


3

3 2001年11月28日，下午13点10分，黄有良老人在委托中日律师团日本律师和翻译胡月玲女士的陪同下，走进了东京地方法院，代表8名中国海南妇女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所受到的终身伤害出庭作证。2014年1月，苏智良、陈丽菲再次来到海南陵水黄有良老人的家探望慰问。〔苏圣捷2014年摄〕



2



1 陈亚扁多次到东京出席各种揭露日本性奴隶制度的活动，这是她到日本打官司所用的护照、日本签证。〔苏智良 2014 年摄〕

2 2006 年 8 月 30 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原告败诉。法院认定了当年的侵害事实，但以“个人没有权利起诉国家”为由宣布原告败诉。陈亚扁老人亲身到法院和东京街头表示抗议。2008 年 12 月，陈金玉出席东京高等法院开庭并作证。照片为陈金玉老人。〔苏智良 2009 年摄〕

3 2009 年 3 月 26 日下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就中国海南岛“慰安妇”诉讼作出二审判决，驳回原告方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给予赔偿的诉求。原告陈亚扁老人等再度提出上诉。图为陈金玉等受害的日军慰安所遗址，原建筑已被毁。〔苏智良 2009 年摄〕

4 2010 年 3 月 2 日，日本最高法院第三小法庭决定驳回原告上诉，维持一、二审判决。至此，海南受害者起诉案如同其他案件一样，原告方败诉。2009 年，苏智良教授、陈厚志调查员到陵水探望陈亚扁老人。〔陈亚扁家属 2009 年摄〕



1

2

3

4

1 台湾“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在台北参加韩国幸存者第600次周三抗议活动。〔台北市妇女救援基金会：《沉默的伤痕——日军慰安妇历史影像书》，第115页〕

2 2002年10月15日，一审判决原告败诉。台湾的阿妈们即提起上诉。受害阿妈阿桃的肚子上留有当年日军虐待所致长长的刀痕。〔陈丽菲2002年摄〕

3 2005年2月25日，日本最高法院驳回原告的上诉。审理终结，此时已有两位阿妈病逝。这是阿桃阿妈在东京出席要求日本赔偿的活动。〔（日）女性的战争和和平资料馆编：《女性国际战犯法庭集》，第19页〕



1



2



3

三、国际社会谴责日本的“慰安妇”制度

自20世纪90年代初日军“慰安妇”暴行被揭露以后，世界各国尤其是亚洲各国对此进行了认真地调查、研究与评判。199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报告确认，日本实施了战时性奴隶制度，敦促其深刻反省。

1993年8月4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承认，日军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史称“河野谈话”。但二十年过去了，日本高官仍在不断否认这段历史。

2007年3月5日，针对美国众议院通过谴责日本战时推行性奴隶制度的决议，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竟说，“美国议会的决议案不基于事实。虽然得到通过，但我不会谢罪。从狭义看，没有证明强制性的根据。也没有能证明那些的证词。也许不会有从军‘慰安妇’自己意愿走那条路，的确有业者在中间强征的情况。可是，没有官员冲进屋子里、把人带走的那种强征性”^[1]。2012年安倍第二任内阁以来，在历史问题方面立场更加右倾化。那些否认历史、毫无道德感的言论，是对受害国和受害者的再度伤害，是对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公然挑战，因而遭到中、韩等国舆论的强烈批判。各国舆论正敦促日本政府承认“慰安妇”犯罪并正式道歉。

近年来，联合国各机构对日本政府否认“慰安妇”罪行的行径进行了谴责。2014年7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日本人权审查结论》报告，认为日本应该为二战期间的“慰安妇”问题承担责任。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新闻公报称，人权理事会会议结束了对日本人权的本次审查，最终结论认为，日本应该为二战期间的“慰安妇”问题负责任。公报称，有关“慰安妇”问题，日本政府曾主张“未强征慰安妇”，但承认曾“录用、输送和管理这些违背了她们个人意志的妇女”。人权理事会认为，这本身就是侵犯人权的行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新闻公报中敦促日本政府尽快对“慰安妇”问题的人权侵害问题继续调查；如发现能够证明强征“慰安妇”资料，应对责任人实施法律及行政处罚措施；对受害者及其家人“应还以正义并安抚他们”等^[2]。8月6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在日内瓦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近七十年后，日本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言行仍在侵犯受害者人权。

希望日本民众、世界人民都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清醒地认识侵略战争的暴虐，防止被军国主义狂热分子“洗脑”，警惕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泛滥社会以危害和平，铭记历史、面向未来。

[1] 韩国慰安妇问题对策协议会：《不可擦掉的历史，日军“慰安妇”》，中文版（无版权页），第68页。

[2] 《联合国认为日本应为慰安妇问题负责任》，《光明日报》2014年7月27日。

1 1992年2月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来自日本民间团体的代表报告了日军在战争期间强征“慰安妇”的情况。吉见义明、林博史、松井耶依、西野瑠美子等学者代表着日本人的良心,对“慰安妇”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与研究,取得重大突破。韩国的金学顺是世界上第一个站出来控诉日军性奴隶制度暴行的受害者。〔(日)女性的战争和平资料馆编:《朝鲜人“慰安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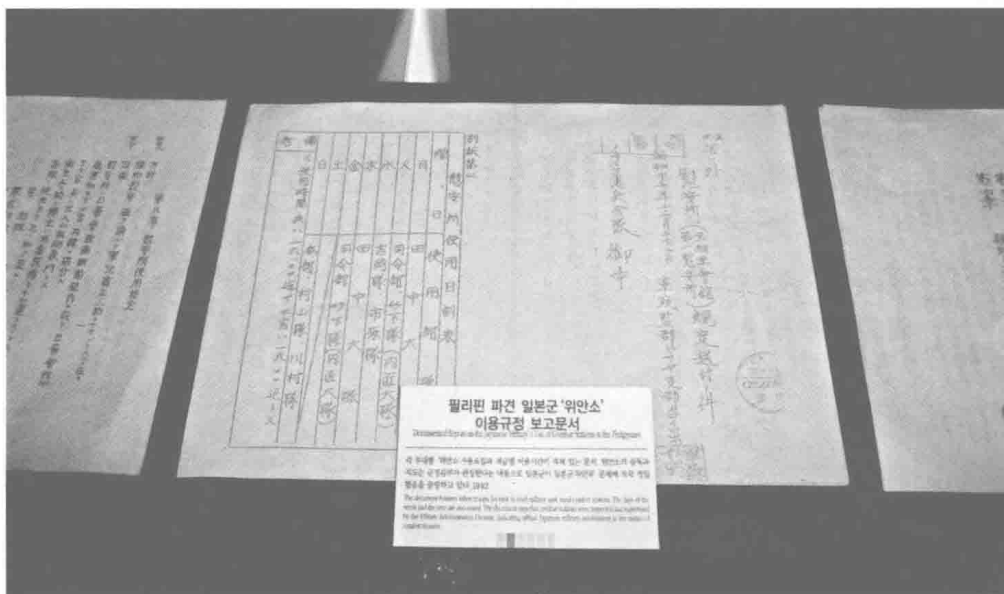
1

2 1993年6月,在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废除对女性暴力的宣言》。宣言谴责日军“慰安妇”问题是侵犯女性人权的行,是“战争中对女性的奴隶制”,并提出有效追究的法学原则。更多人希望探究日本实施性奴隶制度的原因。图为加拿大的教师们到上海浦东钱仓路原日军慰安所旧址参观。〔加拿大访华团团员 2006年摄〕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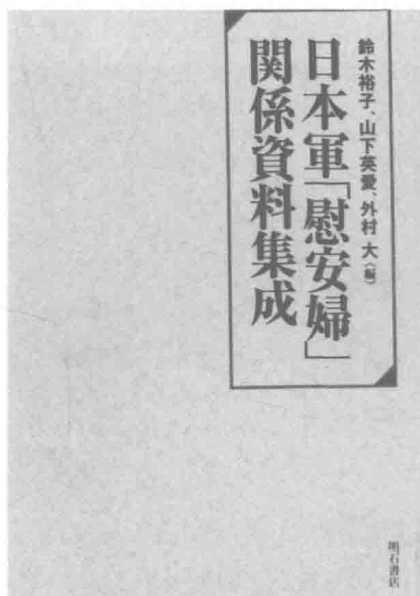
3 斯里兰卡著名法律专家库马拉斯瓦米在1996年4月1日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根据在朝鲜、韩国和日本的调查资料提出了《关于战时军事性奴隶》的报告。这一报告明确向日本政府提出:a.应当对违背国际法设立慰安所的行为负法律责任;b.应当对被作为性奴隶受害的每个人予以赔偿;c.应当公布一切有关资料;d.正式向受害者谢罪;e.在教科书中正确反映这一历史事实;f.对于战争犯罪进行惩罚。图为韩国“慰安妇”纪念馆里陈列的日军征募“慰安妇”的文件。〔陈丽菲 2009年摄〕



3



1



2



3

1 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是日本学界研究“慰安妇”问题的杰出代表，他经过长期深入的调查，出版了《从军慰安妇资料集》一书，将日本政府和军队推行“慰安妇”制度的文件公布于众，引起世界政界、学界的高度关注。图为该书的书影。

2 此后，铃木裕子、山下英爱和外村大合作，也编辑出版了《日军“慰安妇”关系资料集成》，并由明石书店出版。

3 1995年7月，日本成立亚洲妇女基金会，通过民间募款和政府资助的形式，向原“慰安妇”支付约500万日元的补偿金。但是在该基金会的补偿计划公布后，由于条款规定“慰安妇”“若接受援助，则放弃控告日本政府的权利”，且没有承认日本国家的责任，因此而遭到各国“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及相关人权组织的强烈抗议和抵制。该亚洲妇女基金会于2002年5月停止运作。全世界受害区域一共只有266人申请补偿，中国大陆没有一人领取此基金款。但该基金会编辑的《从军“慰安妇”关系资料集》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暴行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图为该书书影。



4

4 各国各地区以不同形式搜寻资料，探访幸存者，找寻历史的真相。图为中国台湾地区的“慰安妇”幸存者在台北举行记者见面会，帐幕之下，露出老人们的脚。
〔台北市妇女救援基金会：《沉默的伤痕——日军慰安妇历史影像书》〕

1 杜学魁先生是香港著名的绅士，也是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的创始会长。他出生于东北，对日军的暴行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他曾积极支持亚洲各国对日军“慰安妇”罪行的调查。图为1999年苏智良教授在杜学魁先生香港家中交谈。2001年11月17日，杜先生在香港仙逝。

2 杜学魁先生亲自到香港中文大学出席苏智良教授的日军“慰安妇”问题演讲会，并即席发表评论。照片中为报告会支持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金观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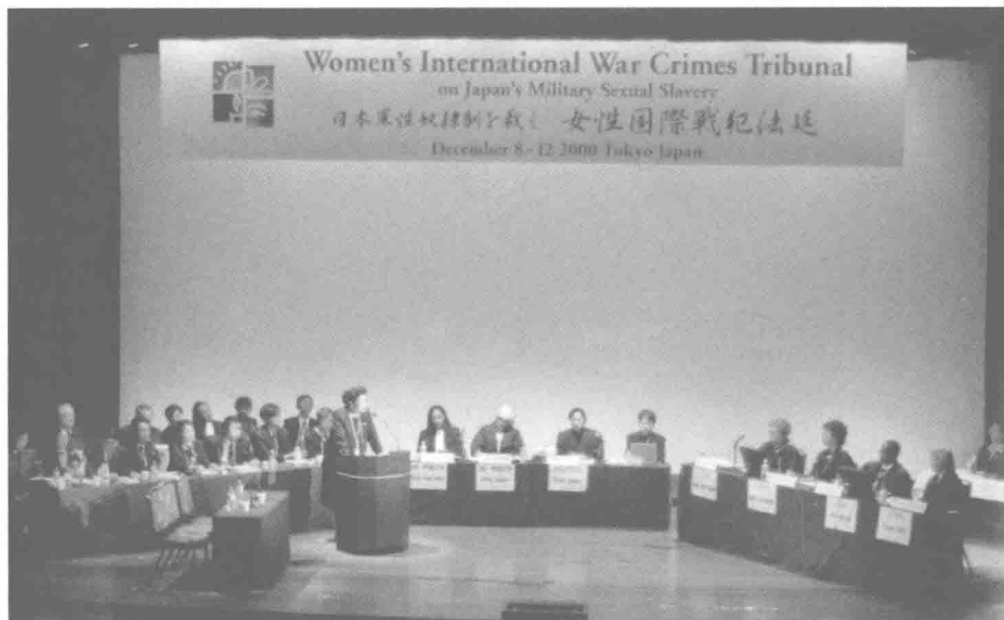
3 2000年12月8日，由世界多个国家与地区的法律专家、学者、人权活动家等组成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5天，针对日本军人在二次大战中犯下“慰安妇”罪行，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这是庭审场景。〔资料照片〕



1



2



3



3

2

1 在东京九段会馆举行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是战后关于日军“慰安妇”问题的全球最大规模的活动，一早就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图为排队等待进入现场的听众们。〔苏智良 2000 年摄〕

2 法庭认定史料和证人陈述的真实性，对日本天皇是否有罪进行辩论。有事实表明，裕仁完全知晓战场上日军的暴行。这张出版于 2000 年 6 月 16 日的《朝日新闻》披露，三笠宫崇仁对平山郁夫指出，天皇知晓日军在华暴行。三笠宫崇仁曾任日本华中方面军总司令。

3 法庭认定日本政府和天皇在实施性奴隶制度上有罪，应该谢罪、道歉和赔偿。法庭判决后，来自世界各地的六十多位幸存者登台庆祝。〔苏智良 2000 年摄〕

■1 这是女性法庭中来自中国的检察官(左起)周洪钧、管建强、龚柏华、康健、陈丽菲与法庭的总检察官和庭长的合影。〔苏智良 2000 年摄〕

■2 这是中国检察官团的合影。左起:周洪钧(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陈丽菲(时华东师范大学副编审,现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康健(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主任)、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龚柏华(复旦大学教授)。〔张国通 2000 年摄〕

■3 原日本众议院议长、日本国会议员、社民党党首土井多贺子女士支持“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立场,并出席了2000年的“慰安妇”制度审判活动。〔管建强 2000 年摄〕



1



2



3



1

1 海峡两岸的同胞在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审判活动中并肩作战，结下友谊。图为两岸部分工作人员的合影。

2 2001年12月4日，东京民间审判活动的终审活动在荷兰海牙举行。法庭判决日本裕仁天皇和冈村宁次、松井石根等8人因为二战时期在亚洲推行“慰安妇”制度而犯下反人道罪。这是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苏智良教授在海牙国际法院拜会大法官史久镛先生。〔周洪钧2001年摄〕



2

3 2002年5月，亚洲各国在朝鲜平壤举行批判日军战争犯罪的东亚和平论坛，苏智良教授、刘宝辰教授等代表中方出席。图为各国的“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和强制劳工代表的合影。〔苏智良2002年摄〕



3

1 2003年9月18日，日本侵略亚洲战争责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韩国、朝鲜、日本、菲律宾、美国和中国的学者、律师、受害者等出席。这是中国代表步平教授在发言。
〔胡海英 2003年摄〕



2 2007年7月7日，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在上海师范大学开馆。幸存者万爱花（山西）、林亚金（海南黎族）、韦绍兰（广西瑶族）出席中国“慰安妇”资料馆的开幕式。
〔高凡夫 2007年摄〕



3 万爱花老人戴着光荣的抗战老战士纪念章出席中国“慰安妇”资料馆的开幕式。
〔苏智良 2007年摄〕





1

■ 1 面对观众和镜头，受害者们讲述着苦难的往事。〔姚霏 2007 年摄〕

■ 2 师生与媒体共同聆听抗战老战士万爱花老人的诉说。〔姚霏 2007 年摄〕

■ 3 万爱花、林亚金、韦绍兰三位老人与韦绍兰的儿子罗善学、已故袁竹林老人的养女程菲一起，在上海师大“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畅游黄浦江，他们笑得非常甜。〔陈丽菲 2007 年摄〕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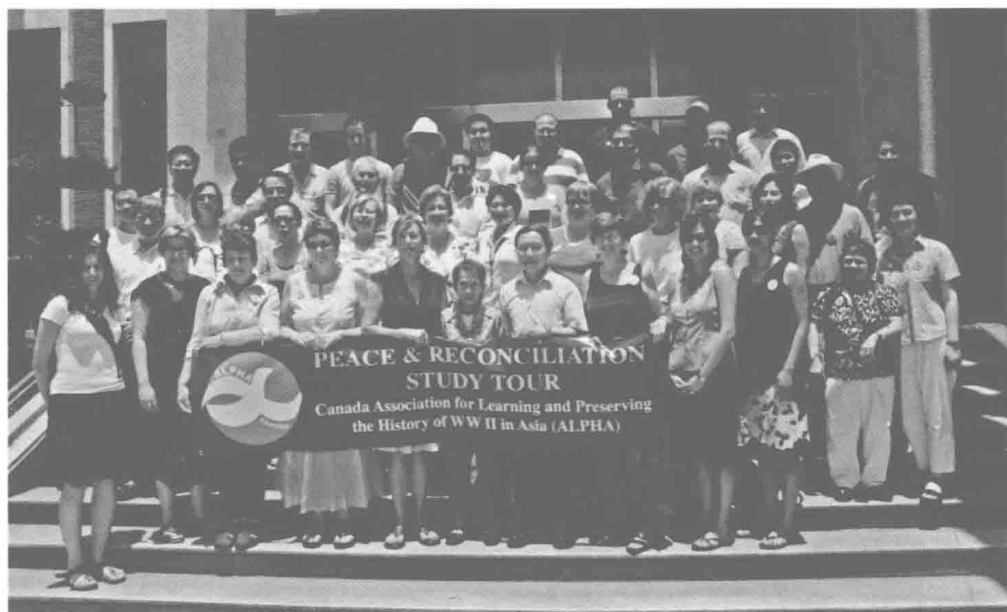
3

1 2007年以来，欧盟、荷兰、加拿大、菲律宾、韩国议会等均通过“慰安妇”提案。谴责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是“20世纪最大的人口贩卖行为之一”，决议案敦促日本政府尽快负起历史、法律和政治责任，正式向所有被征为“慰安妇”的女性及其家属道歉并给予经济赔偿。照片为在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尹贞玉教授（左）与日本松井耶依女士的合影。她们是国际“慰安妇”调查运动的倡导者。〔苏智良 1998年摄〕



1

2 2007年7月7日，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在上海师范大学建立并开放。许多参观者在这里第一次知晓“慰安妇”的事实。这是来自加拿大的访华团在聆听中国湖南的受害者谭玉华大娘报告后的合影。〔姚霏 2008年7月摄〕



2

3 2008年11月7日，日本北海道最大城市札幌市议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措施恢复“慰安妇”尊严。在这份题为“要求努力查明随军‘慰安妇’问题真相和恢复受害者尊严”的决议书中，札幌市议会要求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就“慰安妇”问题谢罪；制定法律解决“慰安妇”赔偿问题；就“慰安妇”问题进行历史教育等。近年来，各国对“慰安妇”问题日益关注，这是2012年德国青少年访华团来到中国“慰安妇”资料馆，聆听姚霏副教授的讲述。〔陈克涛 2008年摄〕



3



1 2013年8月，韩国“慰安妇”调查团来到上海，与中国学者探讨资料交换、合作研究，这是中韩两国学者在中国“慰安妇”资料馆的合影。〔张帅 2013年摄〕

2 中国“慰安妇”问题的调查得益于全国各地许多志愿者的努力付出。这张名单是海南保亭的张应勇先生和陈厚志先生调查当地幸存者的汇总。后来张应勇本人于2005年12月28日因病离世，陈厚志先生接下了继续调查、关心受害者的重任。〔苏智良 2009年摄〕

3 世界各国民众、团体、媒体对日军性奴隶制度受害者群体日益关注和关爱，大家以不同的形式对幸存者进行慰问和支持。这是韩国艺术家创作了谴责日军“慰安妇”制度的舞蹈，以表达对无数已死去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的哀思。〔陈丽菲 1998年摄〕

海南岛保亭地区“日本慰安妇”受害者情况一览表

核对时间：2002年7月20日，06:21

受害者姓名	出生时间	民族	受害时间	受害地点	现居住地址	身份证证号	备注
杨瑞娟	1920.10.8	黎	1940.4-1945.8	县城日军据点	保城镇什聘什村		已故 2006.8.17
邓玉昆	1925.4.30	苗	1940.5-1945.8	县城日军据点	响水镇什月什村		
伍来春	1923.10	黎	1940.5-1945.8	县城日军据点	保城镇春天扫例村		已故 2000.7.29
林亚金	1924.9.21	黎	1943.10-1945.8	南林日军据点	南林乡罗斐什村		
谭亚洞	1925.8.20	黎	1943.10-1945.8	南林日军据点	南林乡东方万如村		
谭玉莲	1925.9.12	黎	1943.10-1945.8	南林日军据点	南林乡东南通村		已故 2002.11.10
黄玉凤	1926.8.28	黎	1940.5-1945.8	加茂日军据点	南茂农场三区什坡村		已故 2004.1.7
陈金玉	1926.12.15	黎	1941.5-1945.6	加茂日军据点	南茂农场五区北岭村		已故 2005.12.28
陈建村	1926.11.4	黎	1940.5-1945.8	加茂日军据点	万宁市大茂镇红石村委会进坑村		已故 2005.12.28

负责核对：张应勇，陈厚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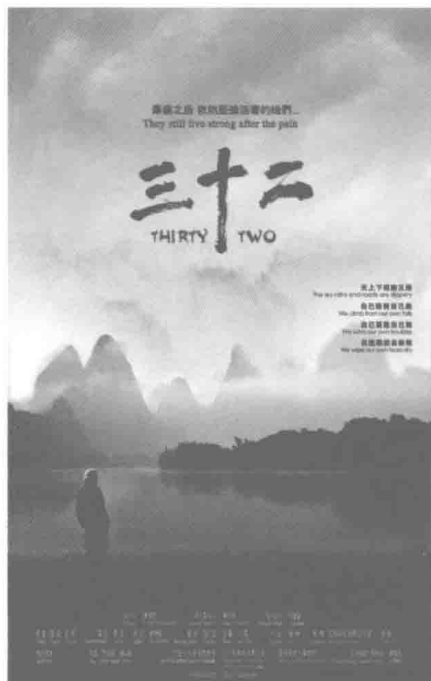
3

1 1999年，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在旧金山举行集会，苏智良教授介绍了中国的日军性奴隶受害情况，引起正在写作《南京大屠杀》的美籍华人女作家张纯如的重视，双方曾相约在“慰安妇”历史研究方面进行合作，可惜后来由于张纯如女士的早逝而未能实现。图为苏智良教授与张纯如女士的合影。〔1999年美国友人摄〕



1

2 2013年由郭柯先生编导、苏智良教授担任顾问的纪录片《三十二》在国内外放映。该片记录了韦绍兰和她儿子罗善学的日常生活，开拍时中国大陆还有32名幸存者，到拍摄完成时，“慰安妇”幸存者仅存23人了。该片已引起广泛关注。图为郭柯先生提供的《三十二》的海报。



2

3 菲律宾受害者来到上海，参加控诉日军暴行的国际活动，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图为她们在观看演出，听到东南亚传统音乐时，翩翩起舞。〔张姚俊2003年摄〕



3

4 近年来，亚洲各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普通国民对日本战争时期的性奴隶制度犯罪也愈加关注。日本的大学生、教师以及一般国民也经常到上海、南京来参观日本暴行的陈列馆，反省战争。这是日本冈山县民众组团到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参观。〔张帅2008年摄〕



4



1

■1 2009年，卢旺达大屠杀纪念馆派遣访华团到上海参观中国“慰安妇”资料馆。这是苏智良教授在为团员讲述战时日本违反人道主义的罪行事实。〔江文君2009年摄〕

■2 为了促使日本政府承认性奴隶制度战争罪行，世界各国正直的人士和组织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清算日本战争罪行国际协议会就是其中之一。这是国际协议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后的合影。

■3 图为2013年，日本女教师访华团参观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后的合影。〔上海妇委会2013年6月7日摄〕



2



3

大事记

1931年

9月18日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

1932年

1月28日 日军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

1月 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将“大一沙龙”“小松亭”“永乐馆”“三好馆”等四家风俗店确定为海军指定慰安所。

2月 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要求长崎县知事征集妇女组织“慰安妇团”，到上海设置慰安所。

12月 在上海的日海军慰安所达17家。

1933年

3月 20名日本“慰安妇”到东北赤峰的日军兵营。

4月 日军第十四旅团旬报中记载，其管理的慰安所中有女子38人，内有朝鲜女子35人。

12月 朝鲜总督府警务局颁布《娼妓取缔规则修正》布告。

1936年

是年在上海的日海军慰安所有14家。

1937年

7月7日 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日本华中方面军决定建立慰安所，要求日本关西妓业协同征集“慰安妇”。

12月15日，福冈县知事致函日本外务、内务大臣，要求批准2名朝鲜女子前

往上海北四川路的海军慰安所。

1938年

1月13日 日本华中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直营的“杨家宅慰安所”开张（地点：上海东沈家宅），其中最初有80名朝鲜女子，24名日本女子。

2月23日 日本内务府警保局颁发《关于处理前往中国的妇女的文件》。

2月，日军华中派军遣宪兵队司令官大木繁向该军参谋部报告南京、下关、镇江、句容、金坛、常州、丹阳、芜湖和宁国地区慰安所的情况。

春，一批日侨经营的慰安所在上海江湾镇出现。

4月16日 日军驻南京各部与领事馆举行联席会议，研究慰安所问题。

5月28日 日陆军省的教育总监颁布《战时服务提要》，要求“军队慰安所的卫生设施必须完备”。

10月27日 日第十一军村中参谋要求本部队设立慰安所。

11月中旬 日军在汉口开设30家慰安所，有“慰安妇”300人左右。

12月 日军开始在台中强征妇女去华南充当“慰安妇”。

1939年

1月 山西文水县汉奸政权张贴布告，公开为日军强征“慰安妇”。

春，日军汉口慰安所中尉吉川、军医藤泽到上海、南京慰安所考察。

6月26日 军医麻生彻男向军方呈《花柳病的积极防止法》的报告。

上海最大的日本海军慰安所“海乃家”在公平里开业。

7月1日 日军华北警务部统计在华部分地区的日军“慰安妇”达8931人。

12月23日 外务大臣向日汉口领事发出《关于汉口陆军天野部队慰安所妇女赴华的文件》。

1940年

1月 日军在内蒙古草原的日军部队中设置大量慰安所。

9月19日 陆军省副官川原直一向部队颁发文件《由中国事变的经验观测军纪振作的对策》，要求加强对慰安所的管理。

1941年

7月 关东军准备举行特种演习，参谋原善三郎要求朝鲜总督征集2万名妇女到“满洲”。

12月8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始在东南亚的占领区设立慰安所。

12月底 日陆军省、海军省要求日本的妓业经营者开设慰安所。

是年 日本朝鲜总督府的《来华身份证明书的发给状况》中称，该年7至12月间，发给来华“艺娼妓”的身份证明共402人。

日军在海南岛设立大批慰安所。

1942年

2月 日军第二十二军在南宁设置慰安所。

3月 驻台湾日军发布《关于南方派遣渡航者的文件》，要求征集50名台湾“土人”到南方充当“慰安妇”。

5月 日军天津防卫司令部命令伪天津特别市政府警察局征用妓女送往前线“慰问”日军部队。

6月18日 陆军省医务局起草《关于大东亚战争中将士的性病处置文件》。

7月 130名各国“慰安妇”被日军从上海集中后送到新加坡继续充当“慰安妇”。

8月 朝鲜“慰安妇”700人到达缅甸。

9月 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提出，须保证平均每两个月给1名士兵发一只安全套。

12月 120名“慰安妇”到达马利亚纳群岛。

1943年

1月 日军军医对江苏江阴的12名日本“慰安妇”作调查，年龄最大的为32岁，最小的为19岁，平均年龄为23岁。

2月 马尼拉日军兵站颁布《慰安所规则》。

是年 日军在新加坡设立慰安营。

日军在云南腾冲掳掠汉族、傣族妇女设立慰安所。

1944年

1月 爪哇宪兵队司令部的《宪兵月报》记载了不少官兵违纪去慰安所的情况。

3月 日军掳掠100名荷兰妇女送入马尼拉的慰安所。

5月 日军天津防卫司令部强征80名妓女充当“慰安妇”。

日军广东中山警备队颁布《军人俱乐部利用规则》。

1945年

4月 日军在河南邓县东河街设立“慰安团”。

7月28日 日军天津防卫司令部强征34名妓女去山东莒县日军部队充当“慰安妇”。

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结束。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国民政府在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北京先后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1951年

9月8日 英、美单独与日媾和，与日本政府签订《旧金山和约》。

1972年

9月29日 中日两国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

1973年

日本记者千田夏光出版《从军慰安妇》。

1976年

研究者金一勉出版《天皇的军队与朝鲜人慰安妇》。

1980年

韩国梨花大学教授尹贞玉开始调查“慰安妇”问题。

1985年

8月15日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首次正式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

1990年

5月18日 韩国卢泰愚总统访日前夕，韩国妇女团体发表声明，要求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进行谢罪和赔偿。

24日 卢泰愚总统访日，韩国外相要求日方提供当年日军强制带走的朝鲜人名册。

6月 日本社会党议员冈本昭次要求对“慰安妇”问题进行调查。

1991年

8月14日 韩国原“慰安妇”金学顺第一个站出来，控诉曾被日军掳掠为“慰安妇”。

12月6日 金学顺等3名原日军“慰安妇”向东京地方法院作证，要求日本政府认罪、赔款。

1992年

1月13日 《朝日新闻》刊登消息，在日本防卫研究所发现日本军队设置、管理慰安所的档案资料。

同日 日本加藤官房长官发表谈话，承认战时日军军方参与了“慰安妇”强征，并表示谢罪。

1月17日 日本首相宫泽喜一为“慰安妇”问题表示道歉，但谈到赔偿时则态度暧昧。

2月 中国驻日大使杨振亚要求日本查明“慰安妇”问题的真相。

5月13日 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现代奴隶制作业部会上，就“慰安妇”

问题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调查申请。

7月4日 日本驻华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通报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的调查结果，中国方面希望日本政府将中国与韩国“慰安妇”问题同样对待处理。

7月6日 日本发表《朝鲜半岛从军慰安妇问题调查结果》。

7月 中国4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向日本驻华大使递交请愿书，要求赔偿。

8月10日 韩国、日本、菲律宾等国妇女于汉城召开“亚洲联合会议”，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泰国、香港等地约100人出席，会议成立了“强制从军‘慰安妇’亚洲联合组织”。

8月14日 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小委员会决议，就日军“慰安妇”问题进行资料搜集，1993年夏天前作出特别报告书。

9月1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揭露——日本政府必须说明慰安妇事实真相》报告书。

12月9日 日本赔偿国际听证会组委会和日本报业律师联合会共同举办“首次慰安妇国际听证会”。

是年 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出版《从军慰安妇资料集》。

1993年

6月 在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废除对女性暴力的宣言》，并谴责日本的“慰安妇”战时暴行。

8月4日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承认，战时日军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慰安所的设置、管理及“慰安妇”的运送，是为“河野谈话”。

10月21日 第二届关于“慰安妇”的“亚洲联合会议”在日本举行。

1994年

1月25日 荷兰原日军“慰安妇”向东京地方法院诉，要求予以赔偿。

5月 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声称：“慰安妇是军队的公娼，没有强迫女性。”

1995年

1月 奥野诚亮等自民党议员成立“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同盟”，极力抵制国会通过《不战决议》。

2月27日 第三届关于“慰安妇”问题的“亚洲联合会议”在韩国举行，反对日本政府的关于设立民间基金的设想。

3月 中国外长钱其琛指出：中国尽管放弃了国家赔偿，但是，并没有放弃民间赔偿的诉求。

6月7日 日本亚洲妇女基金会议决定对当时还在世的韩国、台湾、菲律宾等地的300名原“慰安妇”每人补偿200万日元。

8月15日 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明确承认，日本过去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并对此“深深反省和谢罪”，是为“村山谈话”。

8月7日 山西省孟县的李秀梅、刘面换、周喜香和陈林桃4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了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的诉讼请求。

9月 北京国际妇女大会提出揭露“慰安妇”制度真相，追究犯罪者的责任并对受害者予以赔偿的要求。

1996年

2月5日 科马拉斯瓦密受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委托，撰写了关于“慰安妇”的调查报告书，对日本政府提出史料公开、处罚责任者、进行历史教育、对受害人进行赔偿等劝告。

2月22日 郭喜翠、侯巧莲两名原告在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是日本政府。

3月28日 第四次关于“慰安妇”问题的“亚洲联合会议”在菲律宾召开。

4月10日 中国副代表张义山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指出，日本有责任切实解决“慰安妇”问题。

4月19日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官完成日本《对女性施暴的报告书》。

6月3日 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向“亚洲女性和平基金会”理事长原文兵卫表示，同意以首相的名义写信给原“慰安妇”，向她们表示深刻的反省和道歉。

6月4日 奥野诚亮等自民党议员成立“光明的日本”国会议员联盟，该联盟会长奥野说，“‘慰安妇’是由业主经营的，是一种商业行为并非被迫在陆军慰安所服务”，“日本政府没有干过那种事情”。

7月9日 韩国国会议员向日本政府递交呼吁书，要求日本政府不要再回避国家在“慰安妇”问题上的责任。

7月 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李秀梅、刘面换到东京地方法院出席“慰安妇”听证会。

8月14日 日本“亚洲妇女基金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向4名菲律宾籍原“慰安妇”每人支付1.85万美元的“人道赔偿金”，是为日本首次给前日军“慰安妇”颁发慰问金。

是日 韩国原“慰安妇”等在日本大使馆前集会，要求日本就“慰安妇”问题公开道歉并予赔偿。

同日 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发表致原“慰安妇”的道歉信，称：“从军慰安妇是在日本军队的参与下，给多数妇女的名誉和尊严造成严重伤害的问题，……我们以道歉和反省为基础，正视过去的历史，并将这一认识正确地传给后代。”

10月7日 日本民主党、新进党、共产党、先驱新党和新社会党认定“慰安妇”问题是战争犯罪。

12月2日 新成立的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要求文部大臣删除有关“慰安妇”的记载。

1997年

1月11日 韩国7名原“慰安妇”在汉城向日本首相提出从日本国民基金中对

“慰安妇”进行赔偿的要求。

1月13日 自民党国会议员、前总务厅长江藤隆美在北九州发表谈话，对教科书中编入有关随军“慰安妇”的内容表示抗议。

1月21日 “制订新的历史教科书之会”的东大教授藤冈信胜、评论家西尾干二等7名发起人代表与文部科学大臣小杉隆会谈，提出从1997年春使用的中学教科书中删除“从军‘慰安妇’”的记叙，被文部科学大臣拒绝。

1月24日 日本官房长官梶山静六批评教科书中关于“慰安妇”问题的记述。27日又发表谈话，对其错误谈话表示道歉。

2月5日 日本前文部科学大臣岛村宜伸对记者说：“有些‘慰安妇’是她们自己选择这条道路的，并没有人强迫她们。”

4月22日 日本自民党、新进党和太阳党的国会议员成立“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并呼吁除共产党以外的全体议员每年至少参拜三次靖国神社。

9月6日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会见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时明确指出：“正确认识和对待（日本侵华的）这段历史是两国面对未来的重要前提。”

同日 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沈阳参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后说：“看了展览后，我的情绪非常低落，但这是过去的历史。”他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历史感到“深深的悔恨和痛惜”。

1998年

10月30日 山西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万爱花、赵润梅等10名原告（其中1人为受害者家属）在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1999年

3月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在上海师范大学成立。

7月14日 台湾9名“慰安妇”幸存者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起诉，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她们的损失。

2000年

3月30日 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

12月8日 东京女性战犯法庭在九段会馆举行，60余名受害者出席。法庭判决日本天皇、日本政府有罪。

2001年

5月30日 东京地方法院做出驳回中国山西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李秀梅等原告要求的判决，当年6月原告上诉到东京高等法院。

7月16日 海南陈亚扁、黄有良、林亚金等8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

者在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12月 东京女性战犯法庭终审活动在荷兰海牙举行，维持初审原判。

2002年

3月29日 东京地方法院做出驳回郭喜翠、侯巧莲原告要求的判决，但认定了加害和受害事实。

10月15日 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中国台湾受害者原告败诉。

2003年

4月24日 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了驳回万爱花等原告要求的一审判决，但认定了加害和受害事实。

9月16日 “慰安妇”与日本国家战争责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

2004年

10月27日 日本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认为，“日本教科书有多处自虐性的阐述。‘从军慰安妇’或者‘强征’这些词减少是相当值得肯定的”。

12月15日 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以“国家无答责”和“诉讼时效已过”为由，驳回了李秀梅等的上诉，最后原告方败诉。

2005年

2月25日 日本最高法院驳回台湾原告的上诉，审理终结。

3月18日 东京高等法院再次做出驳回郭喜翠等原告要求的判决。

3月31日 东京高等法院对万爱花等上诉作出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8月26日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指出，“对从军‘慰安妇’问题，我们的立场与韩国政府不同。日本政府对所谓‘从军慰安妇’不负有法律责任”。

2006年

8月30日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海南“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原告败诉。

2007年

3月5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认为，“从狭义看，没有证明强制性的根据。也没有能证明那些的证词。也许不会有从军‘慰安妇’自己意愿走那条路，的确有业者在中间强征的情况。可是，没有官员冲进屋子里、把人带走的那种强征性”。

6月14日 日本部分国会议员、“名学者”“名评论家”在美国的《华盛顿邮报》上刊登整版广告，极力否认“慰安妇”历史。

7月6日 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在上海师范大学建成开放。

7月30日 美国众议院通过“慰安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承担责任。

11月28日 加拿大联邦众议院通过“慰安妇”决议。

12月13日 欧盟议会通过“慰安妇”决议。

2008年

3月11日 菲律宾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慰安妇”决议。

10月27日 韩国议会通过“慰安妇”决议。

11月11日 台湾“立法院院会”通过“慰安妇”决议。

2013年

5月13日 大阪市市长桥下彻抛出“慰安妇必要论”，遭到世界舆论的严厉批判。

5月 南京市秦淮区政府上报利济巷慰安所遗址筹建纪念馆计划。

8月 韩国派遣“慰安妇”研究访华团来上海、南京等地，希望合作研究和资料共享。

2014年

1月25日 新上任的日本NHK电视台新任会长舛井胜人说，慰安妇问题“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引起各国舆论的批判。

1月31日 舛井胜人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就“慰安妇”问题此前的表态进行道歉。

2月8日 亚洲“慰安妇”工作会议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倡议“慰安妇”资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记忆名录。

3月 中国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专家委员会向联合国提出，将“慰安妇”档案申请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5月30日 延边大学主办“日军慰安妇国际学术会议”。

7月14日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日本人权审查结论”，指出，日本应该为二战期间的“慰安妇”问题承担责任。

8月6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在日内瓦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近七十年后，日本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言行仍在侵犯受害者人权。

8月14日，韩国妇女家族部等在首尔举行“慰安妇”问题国际研讨会。

主要参考文献

〔日〕稻叶正夫編：《冈村宁次大将资料(上)・战场回想篇》，原书房 1970 年版。
和歌森太郎、山本藤枝：《日本の女性史 1：古代女性のたくましさ》，集英社 1970 年版。

〔日〕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編：《太平洋戦争史 5・太平洋戦争 1》，（東京）青木書店 1972 年版。

〔日〕千田夏光：《从军慰安婦》，双叶社 1973 年。

森崎和江：《からゆきさん》，朝日新聞社 1976 年 5 月版。

金一勉：《天皇の軍隊と朝鮮人慰安婦》，（京都）三一書房 1976 年 1 月版。

〔日〕千田夏光：《从军慰安婦》（正篇），三一書房 1978 年 9 月版。

和歌森太郎、山本藤枝：《日本の女性史 2：戦乱の嵐に生きる》，集英社 1982 年版。

長沢健一：《漢口慰安所》，図書出版社 1983 年 7 月版。

〔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編：《我们在中国干了些什么？——原日本战犯改造回忆录》，吴浩然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5 月版。

従軍慰安婦 110 番編集委員会編集：《従軍慰安婦 110 番》，（東京）明石書店 1992 年 6 月版。

華公平：《従軍慰安所「海乃家」の伝言》，日本機関紙出版センター 1992 年 8 月版。

〔日〕吉见义明：《从军慰安婦资料集》，大月書店 1992 年 12 月版。

慰安婦情報電話報告集編集委員会編集：《性と侵略—軍隊慰安所 84 か所元日本兵らの証言》，（東京）社会評論社 1993 年 7 月版。

麻生徹男：《上海より上海へ》，（福岡）石風社 1993 年版。

〔韓〕韩国挺身队对策协议会、挺身队研究会：《中国に連行された朝鮮人慰安婦》，（京都）三一書房 1996 年版。

〔日〕亚洲女性和平国民基金会编：《慰安妇关系文献目录》，株式会社ぎょうせい 1997 年版。

〔日〕松冈环编著：《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侵华日军原士兵 102 人的证言》，新内如、全美英、李建云译，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版。

〔澳〕乔治·希克斯：《慰安妇》，滕建群译，新华出版社 2002 年 10 月版。

〔日〕松井耶依、西野瑠美子、金富子、林博史、川口和子、东泽靖编著：《女性国际战犯法廷全记录》，绿风出版社 2002 年版。

村瀬守保：《私の従軍中国戦線—村瀬守保写真集》，日本機関紙出版センター 2005 年 3 月版。

〔新〕卓南生：《日本社会》，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年版。

日本の戦争責任資料センター：《戦争責任研究》（季刊），1993 年创刊—2014 年。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Ms. Radhika Coomaraswamy, in accordance with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Resolution 1996.

Patricia B. Sutker, Albert N. Allain, Jr.: *Assessment of PTSD and Other Mental Disorders in World War II and Korean Conflict POW Survivors and Combat Veterans,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A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996.VoL8.No. 1, pp.18–25.*

Sangmie Choi Schellstede, Soon Mi Yu, *Comfort Women Speak: Testimony by Sex Slaves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Incorporated, 2000.

David A. Schmidt, *Ianfu—The Comfort Women of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of the Pacific War: Broken Silence*, Edwin Mellen Press Limited, 2000.

Margaret Diane Stetz, *Legacies of the Comfort Women of World War II*, M E Sharpe Inc. 2001.

Nora Okja Keller, *Comfort Woman: A Novel*, Virago Press, 2001.

Toshiyuki Tanaka, *Japan's Comfort Women: Sexual Slavery and Prostitution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the US Occupation*, Routledge, 2002.

Peter Li, *Japanese War Crimes: The Search for Justice*,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3.

May Fong Yue Lo, *International Law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Comfort Women: The Limits of the Law*, Harvard Law School, 2004.

Akitsu Kida, *Comfort Women: Facts and Justice Under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Harvard Law School, 2005.

Shizu Maekawa,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South Korean Comfort Women and Japan: An Analysis and Proposal from Conflict Resolution Perspective*,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2005.

Bogyean Ok, *Humanistic Globalization, Womanhood, and Comfort Women in South Korea*, Southern Connecticut State University, 2006.

Masako Ikenushi, *Mizushobai Literature, Prostitution, and Comfort Wome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2007.

Mariko Izumi, *Rhetorics of Responsibility: Comfort Women Reparation Debates and the Ethos of Postwar Japan*, ProQuest, 2007.

Tongbuga Yöksa Chaedan, *The truth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comfort women”*, North-east Asian History Foundation, 2007.

Protecting the human rights of comfort women: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Asia, the Pacific,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Hundred Ten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February 15, 2007, 第4卷

C. Sarah Soh, *The Comfort Women: Sexual Violence and Postcolonial Memory in Korea and Japa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Krishna Ignalaga Thomas, *Lola' s Story: Writing Comfort Women in World War II 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s*, Ea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 2008.

Gilbert Delgadillo, *Comfort Women: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the Age of Rape Warfare*,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 2008.

Johnson, Howard; Thompson, Andrew: *The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in civilian adult survivors of war trauma and torture: A review.*,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Vol. 28 (1), Jan, 2008. pp.36-47.

Tiantian Zheng, *Red Lights: The Lives of Sex Workers in Postsocialist China*, U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Burkhard Eiswaldt, *Hainan – Comfort Women Mit Photos Von Huang Yiming*, BoD-Books on Demand, 2009.

Caroline Norma, *Comfort Women for Coporate Slaves:Prostitution and the Japanese ‘company State’ , 1955-1973*, University of Melbourne,2011.

Kathy Ramos Matsui, Ramos Matsui Kathy, *Lessons from Ww Ii Comfort Women*, LA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2012.

Peipei Qiu, *Chinese Comfort Women: Testimonies from Imperial Japan' s Sexual Slave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3.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张效林译，群众出版社 1986 年 2 月版。

符和积主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海南出版社 1995 年 5 月版。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一），北京出版社 1995 年 7 月版。

〔韩〕朴宣泠、〔中〕刘宝春：《历史的漩涡——一个韩国“慰安妇”的悲惨故事》，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5 年 8 月版。

符和积主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续编），海南出版社 1996 年 8 月版。

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上下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7 月版。

苏智良：《慰安妇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年 3 月版。

妇女救援基金会主编：《台湾慰安妇报告》，（台北）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苏智良、荣维木、陈丽菲主编：《滔天罪孽——二战时期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学林出版社 2000 年 11 月版。

《台日官方档案慰安妇史料汇编》，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 2001 年版。

李碧华：《烟花三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2002 年 1 月版。

刘大项：《无尽的冬日：慰安妇寻求正义的漫长旅程》，（台北）智库股份有限公司 2002 年版。

陈祖樑编著：《血雾迷茫——滇缅抗日及日军罪恶揭秘》，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4 年 11 月版。

妇女救援基金会主编：《铁盒里的青春——台籍“慰安妇”的故事》，（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版。

妇女救援基金会主编：《沉默的伤痕——日军“慰安妇”历史影像书》，（台北）商周出版社 2005 年版。

陈丽菲、苏智良：《追索——朝鲜“慰安妇”朴永心和她的姐妹们》，香港时代有限公司 2005 年版。

陈丽菲：《日本慰安妇制度批判》，中华书局 2006 年 11 月版。

苏智良、姚霏、陈丽菲：《侵华日军“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

朱德兰：《台湾慰安妇》，（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 4 月版。

索引

A

阿桃 171, 224
阿也美本馆 83
阿也美馆 83
安倍晋三 211, 213, 225, 245
奥野诚亮 214, 242, 243

B

白蒲日军慰安所 69, 146
白云慰安所 88
坂下熊藏 4
坂下元司（华公平） 4, 45, 46, 47, 48,
49, 50
浜崎富藏 106
贝茨博士 13
贝德士 63
钡乃 98
本多立太郎 71
本多胜一 68
博鳌市慰安所 6
步平 232

C

蔡爱花 139, 145
蔡金和 145
草镇慰安所 62
柴珍 85
阆门饭店 68, 70
长泽健一 79, 80, 82, 83, 247
朝日楼慰安所 57
陈阿金 25
陈炳荣 54, 56
陈福义 200
陈公博 61
陈桂英 140
陈厚志 90, 181, 184, 186, 187, 223, 235,
260
陈家宅慰安所 119
陈金妹 136
陈金玉 90, 187, 222, 223
陈进女 136
陈丽菲 3, 4, 6, 7, 19, 66, 86, 93, 117, 118,
119, 124, 146, 147, 157, 158, 163, 165,
171, 173, 174, 176, 177, 178, 179, 180,
186, 187, 202, 208, 214, 218, 222, 224,
226, 230, 233, 235, 250, 260

陈林村 208
 陈林桃 216, 217, 243
 陈妹 133
 陈亚扁 136, 139, 163, 164, 165, 222, 223,
 244
 陈亚合 136
 陈亚妹 136
 陈忠孝 83
 陈祖樑 66, 118, 119, 121, 124
 成本华 203
 程菲 180, 233
 川中洁一 64
 村濑守保 126
 村山富市 242
 长生楼 68

D

大和馆 81
 大陆饭店慰安所 71
 大木繁 34, 35, 72, 239
 大山正五郎 10
 大盛馆 81
 大埡口慰安所 172
 大一沙龙(大一、大一记) 2, 4, 21, 22,
 23, 24, 25, 27, 28, 29, 30, 31, 32
 戴笠楼 72
 丹阳门大街慰安所 71
 岛村宣伸 214
 邓玉民 143, 199
 第44532号慰安营 128
 第一、第二兴亚馆 111
 第一旅社 68, 70
 东山慰安所 88
 东亚楼 3
 董家沟慰安所 121, 122, 123, 174
 杜佩华 59

E

峨眉路慰安所 37
 鄂州城隍庙慰安所 178
 恩赏课长 87
 二大马路纬九路慰安所 106

F

饭沼守 34, 39
 范学贵 71, 260
 方玉翠 114
 冯英子 204
 凤宜楼慰安所 4, 76
 符美菊 144
 富岛健司 14
 傅厚岗慰安所 64
 傅筱庵 62

G

冈部直三郎 101, 215
 冈村宁次 2, 18, 104, 231, 238, 247
 高桥哲郎 99
 高山三平 132
 高台坡的慰安所 140
 高习贤 173
 高兴祖 64
 高银娥 154
 割烹屋 107
 歌川国芳 20
 根娣 59
 龚柏华 230
 谷山吉藏 194
 谷寿夫 14, 15
 管建强 230
 光辉旅舍 115
 广濑三郎 106
 郭柯 167, 169, 236
 郭咪芹 207
 郭沫若 13

郭喜翠 154, 219, 220, 243, 245

郭亚英(英姐) 157

国际馆 83

H

哈尔滨北二道街鱼市胡同的慰安所 110

哈尔滨市内的将校俱乐部 114

海军慰安所 52, 98, 132, 238, 239

海乃家 4, 45, 46, 47, 48, 49, 50, 51, 239, 247

海南东方市的日军慰安所 91

海南东方市的慰安所 92

海南临高县新盈镇的慰安所 91

海南省海口慰安所 91

海南榆林上午启南庄慰安所 155

何玉珍 147

河钩焕 74

河南慰安所 88

河南舞钢朱兰店村 85

河野洋平 210, 213, 225, 242

贺家巷妓院 7, 8

贺广堃 95

鹤屋 68

侯巧莲 219, 243, 245

胡有英 136

胡月玲 222

“皇军俱乐部” 99, 102

“皇军招待所” 105

黄惠蓉 12

黄流日军机场慰安所 12

黄文忠 54, 55

黄伍仲 77

黄有良 222, 244

黄玉霞 12, 136

绘鸠毅 99

火巷 32 号慰安所 71

J

积庆里日军慰安所 79

吉见义明 9, 127, 139, 226, 227, 242, 247

济南纬三路 106

江先光 14

金德镇 9

金淑兰 145

金学顺 216, 226, 241, 259

金玉(玉姐) 157

金子安次 108, 126

京城慰安所 111

久保二郎 107

菊地修一 191

菊水慰安所 74

军人会馆 113, 132

军人集会所 89

军人俱乐部 83, 101, 115, 240

K

康健 217, 219, 230

库马拉斯瓦米 226

“快乐房”慰安所 6

L

老苏台旅社 68, 70

乐群楼 95, 96, 97

乐乡饭店 68, 70

雷桂英 11, 139, 140, 141, 142, 143

李阿珠 59

李碧华 177, 250

李风云 149

李家祠堂 172

李金玲 163, 260

李连春 171, 172, 173, 174

李培德 186

李鹏兆 99, 102

李容女 214

李树芬 127

李天英 76
 李喜梅 151
 李秀梅 12, 140, 216, 217, 218, 243, 244,
 245
 李秀英 195
 李亚茜 187
 李英淑 9
 李玉善 112
 李早焕 206
 李正早 67
 力馆 83
 利济巷东云慰安所 64
 梁信 12
 料亭 3, 34, 112
 廖斌 178, 179
 林爱兰 144, 153
 林博史 226, 248
 林铃娣 25
 林亚金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222, 232, 233
 临清县慰安所 108
 铃木启久 103
 刘大炳 193
 刘面换 108, 216, 218, 243
 刘望海 175
 刘秀英 84
 刘耀梅 198
 刘玉花 85
 六大马路“星俱乐部” 106
 六一亭 52
 泷端良介 57
 泷田良助 57
 卢英 61, 62
 陆凤郎(凤姐) 157
 陆军慰安所 37, 57, 59, 119, 243
 陆明昌 24
 伦智中学 128
 罗善学 155, 168, 169, 170, 233, 236

洛克道上的慰安所 128

吕耀先 190
 绿扬精舍 71

M

麻生彻男 37, 38, 39, 40, 41, 42, 57, 58,
 239
 麻生太郎 215
 马吉 195
 马岭慰安所 118, 166
 满妹 155
 梅崎楼 81
 绵引 109
 明月 87, 98
 木村美代子 193
 木村镇雄 193
 木原圆次 132

N

那大市慰安所 4
 南勋街上的慰安所 114
 柵井胜人 213, 246
 娜芳姐 137
 倪金成 146
 女郎屋 34, 39

P

P屋 104
 彭叔山 201
 皮莱 225, 246
 平和庄陆军慰安所 57
 平山郁夫 229
 平野茂 128
 朴来顺 93
 朴永心 2, 63, 65, 66, 67, 206
 浦上路慰安所 61, 62

Q

其昌栈慰安所 54, 55, 56
 千岁馆 127, 128
 千田深谷部队慰安所 37
 千田夏光 10, 11, 40, 100, 113, 145, 241, 247
 乔燕堂 140
 桥本龙太郎 204, 243, 244
 桥下彻 210, 211, 213, 246
 亲善馆 63
 清水传雄 210
 庆子 10, 11, 39, 40
 秋田松吉 108

R

人民俱乐部 4
 日军白塔慰安所 118
 蓉仙 175, 177

S

萨空了 127
 三好馆 18, 21, 238
 三井泰治 103
 三棵树慰安所 118
 三笠宫崇仁 229
 三亚慰安所 90
 沙必璐 124, 201, 260
 山根信次 108
 山内小夜子 44
 山田定 84
 山雄一郎 191
 山中三平 60
 上村利道 63
 上海老城梦花街上的慰安所 60
 上海浦东钱仓路原日军慰安所 226
 尚春燕 107, 148
 沈美娣 43
 沈月仙 42

石禄慰安所 7
 石碌铁矿慰安所 136
 石桥德太郎 39, 41
 石田干雄 14
 石泽郎慰安所 149
 史富生 44
 史久镛 231
 史留留 44
 市川一郎 115
 水野靖夫 104
 寺田雅雄 34
 泗水新村 73, 74
 松冈环 191, 194, 248
 松井石根 39, 231
 松井耶依 226, 234, 248
 松山腊勳慰安所 67
 松上年雄 75
 松下芳松 57
 松之屋 171
 宋神道 12
 苏明娃 85
 苏州大东旅社 70
 孙建国 86
 孙吴曾家堡 115

T

台中市“娱乐慰安所” 131
 太阳咖啡屋 107
 谭亚洞 203
 谭岩军 151
 谭玉华 84, 234
 特种慰安所 35
 腾冲文庙 120
 腾越镇蔡家慰安所 119
 天羽美智子 188
 田岛寿嗣 121
 田口新吉 8, 99
 土井多贺子 230

土屋芳雄 115

W

万爱花 11, 159, 160, 161, 162, 163, 185,
216, 220, 221, 232, 233

万安路慰安所 37, 59

万静 198

万水楼 111

汪国栋 175

王春生 14

王改荷 152, 221

王桢林 101

王林 151

王美金 144

王士海 143

王树芝 153

王喜贵 161

王玉开 144

王志凤 144

韦绍兰 155,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85, 232, 233, 236

纬八路慰安所 106

文明金 113

吴宝初 59

吴三让 31

伍葵清 205

武昌街南巷慰安所 110

武田武二郎 109, 116

武汉市汉口生成北里的日军慰安所 82

X

西野瑠美子 28, 65, 67, 226, 248

香港士他令道上的九龙城浸信会教堂 129

祥符旅社 68, 70

小梅园慰安所 3

小平喜一 100, 214

小山三男 80

小松亭 18, 21, 238

小野武雄 19

小俣行男 94, 118, 146

“偕行社” 99

新街市慰安所 12

新井宗太郎 191

新苏台旅社 68, 70

新町慰安所 88

新盈镇红民街 144

行乐所 5

熊维元 66

徐宝 190

徐祖恩 54

Y

崖泉庄 90

杨春 206

杨嫫榜 136, 222

杨家运 125

杨家宅慰安所 2, 3, 37, 38, 39, 41, 42,
43, 44, 239, 259

杨金水 62

杨七姐（七姐） 157

杨时珍 149

姚霏 26, 27, 28, 30, 31, 107, 108, 142,
148, 152, 159, 185, 186, 205, 220,
233, 234, 250, 260

叶隐居酒屋 107

一面街慰安所 109

伊藤博文 20

易英兰 81

“银水” 112

尹林香 9

尹玉林 9, 143

尹贞玉 112, 234, 241

瀛洲旅社 68, 70

永乐馆 18, 21, 238

永野茂门 210, 242

游廓 3, 20

玉华观 202
 裕仁天皇 215, 231
 袁竹林 3, 20,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233
 约翰·拉贝 2, 13

Z

曾根一夫 10
 张纯如 236
 张凤英 201
 张改香 204, 205, 206, 221
 张孟和 161
 张双兵 218, 260
 张五召 154
 张秀英 175, 176
 张银富 25
 张应勇 235, 260
 长沟手显 211
 赵家园慰安所 11
 赵其慧 124
 赵润梅 220, 244
 郑金女 139
 中川昭一 213
 中村信 100

中华旅社 68, 70
 中山成彬 214, 245
 周变香 148, 152
 周大郎(大姐) 157
 周粉英 69, 146
 周海梅(梅姐) 157
 周洪钧 230, 231
 周守文 156, 158
 周喜香 148, 154, 216, 243
 周新民 60
 朱德兰 130, 132, 171, 250
 朱弘 65, 67, 206
 朱巧妹(阿巧、巧姐) 9, 156, 157, 158,
 159
 卓开春 164
 卓理女 136
 卓毛定 136
 卓毛天 136
 卓石理 136
 卓亚天 136
 卓亚广 136
 佐佐木到一 13
 佐佐真之助 81, 191, 203

后 记

关于我是怎样会关注与研究“慰安妇”问题的，我已讲过多次。

那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的1992年。当时我在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担任外国人研究员。那时，“慰安妇”这个词，因为韩国幸存者金学顺（韩籍“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裴奉奇（冲绳的韩籍“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的公开而正在揭开历史的内幕。在六本木国际文化会馆国际会议的讨论间隙，一位日本教授得知我是从中国上海来日时就问我，听说第一个日本军慰安所就在上海。他急切地表示，这事应该有人把它搞清楚。

作为一个上海历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我似乎没有转身离开的理由和权利。于是，1993年6月归国后，我便从翔殷路旁的杨家宅慰安所的调查，开始了研究“慰安妇”的学术旅程，想不到这样的旅程到现在，竟行走了二十余年，“慰安妇”研究也成为我的学术生涯中的最重要的课题。

就像本书所展示的，日本政府及其军队明白无误地推行了“慰安妇”这一军事性奴隶制度，所谓的“慰安妇”就是没有人身自由的、遭受非人待遇的性奴隶。但日本总有些人前仆后继地矢口否认这一历史事实，显然这种鸵鸟战术于事无补，它只会加深日本与亚洲各国、甚至整个世界历史观的分歧。这些年来，日本否认战争罪行的言行日益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批评，就可见一斑。

在我看来，日本唯一的明智之举，就是学习德国，彻底地反省。从勃兰特一跪以来，德国民族以他们真诚的忏悔与反思得到了世界的谅解和赞誉。德国前任总理施罗德曾指出：“对纳粹主义和其发动的战争、种族屠杀及其他暴行的记忆，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自身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我们的一种道义责任。”“过去的历史我们已无法挽回，但我们能够从那段历史中，从我们国家刻骨铭心的那段耻辱中吸取教训。德国决不向试图忘却或不承认那段历史的任何企图让步。”^{〔1〕}如果“慰安

〔1〕于涛、徐勇、张利：《施罗德：记忆是我们的道义责任》，《新华每日电讯》2005年4月12日。

妇”——日军性奴隶制这份独特的战争记录无法存在于日本民族的集体记忆中，那将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缺口。

日本能完成这看似简单、实际是全民族的思想大反省吗？

我们拭目以待。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日本侵华战争‘慰安妇’资料的整理与研究”（13&ZD094）的中期成果。本书的照片，多为我们在二十余年调查中所拍摄，尤其是“慰安妇”幸存者的生活状态。遗憾的是，这些老人很多现在已经离世，看着她们的遗容，这二十年调查的种种往事浮上心头，感慨万分。读者可以从中得到许多的信息和思考。我们声明版权所有，请不要随意引用。

在此，我还要感谢不少朋友、同事与学生。如长期从事调查和关爱受害者的云南的陈祖樑先生、沙必璐女士，海南的符和积先生、苏光明先生、已故的张应勇先生及后继者陈厚志先生、黄大强先生，山西的张双兵先生、李贵明先生和英豪先生，江苏的范学贵先生、广西的孟绍淦先生，湖北的孙维玉先生等。二十年来，我们的不少学生曾许多次去海南、山西、河北、湖南、湖北等地慰问探望幸存者老人，帮着送钱、拍摄照片和录像，记录她们的生存状态，参加追悼会。本书中的一些材料和照片，就出自他们之手。如张虹、姚潇鹤、胡海英、侯桂芳、张姚俊、姚霏、陈克涛、潘同、张婷婷、刘效红、孙爱民、赵青青、许瑶、陈晔、赵盼盼、赵蓓红、董天艺、张帅、刘蕊、王亚琴、赵文杰、李金玲、张亚运、郭利军等；感谢北京大学博士生苏圣捷，从2000年起，他就陪伴我们走山西，下云南，仅在今年，他已陪伴我们到海南协助调查8名幸存者，到山西探望和协助调查了8名幸存者。在这样一个漫长而极为压抑、摧折人心的研究中，因为有你们的陪伴和支持，我与陈丽菲才能坚持走到今天。

感谢所有曾经帮助和支持过我们的人，谢谢！

苏智良

2014年8月15日于海上蒲汇塘畔



“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队在二战时期实施的军事性奴隶制度，是日本国家实施的反人类的战争罪行。本书作者足迹遍及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山东、湖北、湖南、福建、广西、广东、云南、海南、台湾、香港等 24 个省区，以及韩国、朝鲜、菲律宾、冲绳等地，调查研究 22 年，以广泛翔实的档案文献、报刊杂志、战史图片，参以大量珍贵的第一手田野调查口述实录，展示了“慰安妇”制度在中国的实施过程及其暴行。此书是目前“慰安妇”研究领域内，图片与资料采集研究面最为丰富细致、最具权威性的著作。

ISBN 978-7-5474-4674-3



9 787547 446743

定价：330.00 元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日本侵华图志 第19卷

“慰安妇”与性暴行

作者 = 张宪文主编

页数 = 259

SS号 = 13877641

DX号 =

出版日期 = 2015.05

出版社 =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综述

第一章 “慰安妇”制度的发端
一、近代日本社会的“性”
二、首个日军慰安所——大一

沙龙

第二章 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实施
一、华东地区的日军慰安所
二、华中地区的日军慰安所
三、华南地区的日军慰安所
四、华北地区的日军慰安所
五、东北地区的日军慰安所
六、西南地区的日军慰安所
七、香港、台湾的日军慰安所

第三章 “慰安妇”制度的中国受害者
一、中国受害者的身份与年龄
二、日军强征中国性奴隶的途

径

三、幸存者的控诉
第四章 日军对中国女性的强奸暴行
一、日军在占领地的强奸暴行
二、妇女受害的个案

第五章 战后日本对“慰安妇”制度的

掩盖与否认

一、日本政界否认“慰安妇”
制度罪行的言论

二、日本司法界否认“慰安妇”
制度的罪行

三、国际社会谴责日本的“慰
安妇”制度

大事记

主要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